

THE SEQUEL

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

Jasone Rodriguez

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

Jasone Rodriguez

著作权 © 2026 归 Jasone Rodriguez 所有。本作品采用知识共享署名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许可。

在遵守知识共享署名 4.0 国际许可协议（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条款的前提下，您可以自由共享（在任何媒介以任何形式复制、发行本作品）以及演绎（修改、转换或以本作品为基础进行创作，用于任何用途，包括商业用途），前提是您必须给出适当的署名、提供指向本许可协议的链接，同时标明是否对原始作品作了修改。作者保留本作品的著作权。

第一版，2026年。

目录

第1章：Jasutopianism证明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未解之题 1

第2章：永恒相对论的拓展 24

第3章：证据：合作治理的案例研究 49

第4章：文化外交条款 72

第5章：数字治理：栖居平台时代的条款 96

第6章：过渡蓝图：第1年至第10年 121

第7章：预测、证伪与智识诚实 153

第8章：作为第三大支柱的环境合作 182

第9章：强制推行单一语言同化抑或正式承认现存语言 211

第10章：若特定的国家继续沿用货币制度：逐县消除不公平薪酬的方程 223

第11章：S.U.W. 运行模型 241

第12章：以增补方式弥合经济与政治权力缺口 270

第13章：完整体系 286

第1章：Jasutopianism证明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未解之题



兹此郑重陈述于所有读者面前：一部治理理论著作的衡量标准，不仅在于它建构了什么，更在于它揭示了仍有待建构之物。Jasutopianism（Rodriguez，2021)主要以宣言体写成，其中一章[论点XX]使用了引文。该书提出了一套完整而全面的体系，旨在将特定的现代国家重组为达到乌托邦标准的治理体制。这一体系包括由102条法律条款构成的宪法架构、以地位升级取代纸币和数字货币的新型经济模式、设有三总统与公民议院的治理结构、名为永恒相对论的哲学结构、由13项正式指标组成的衡量体系，以及将现有国家转型为Jasutopian治理体制的4年过渡计划。

其成果是一部提出了完整制度设计而非纯粹规范性批判的著述。它并未止步于描绘理想或抨击现行制度；而是逐条规定了拟议中的各项制度应如何运行。它直面了大多数乌托邦文献未能解答的操作性问题：这样一个国家究竟该如何实际运转？

话虽如此，本章的宗旨在于以同等的诚实完成两项任务。第一是确认Jasutopianism已经证明了什么；第二是指出它留下了哪些未解之

题。这两项任务并不矛盾。指出空白之处并不会贬低既有的建树，而是揭示出任何试图在单一文体与单一范畴内构建完整体系的著作所固有的自然边界。Jasutopianism是一部探讨国内治理的著作。它并非附带同行评审证据的实证论文、国际关系理论著作，或能够针对其撰写时尚未发明的技术进行自我修正的活文献，也从未自诩如此。这些空白之所以存在，是因为Jasutopianism尊重了其自身抱负的界限；而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之所以存在，则是因为这些界限如今已可被超越。

Erik Olin Wright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构想真实乌托邦》(Wright, 2010)中，提出了一套从三个维度评估平等主义替代性制度方案的框架：可欲性、可行性与可实现性。在Wright的语汇中，“真实乌托邦”并非幻想，而是一种在追求人类繁荣的同时认真对待实际运作机制的详尽制度设计。以此标准衡量，Jasutopianism正是一个真实乌托邦。它不仅宣告公民应当自由、繁荣并充实生活，而且逐条规定了宪法机器将如何强制执行这些宣告。Wright的这一框架将作为贯穿本章的分析视角，这并非因为Jasutopianism需要外部背书，而是因为可欲性、可行性与可实现性这套话语，为理解本书已证明之内容与未竟之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结构。

I. Jasutopianism证明了什么：对治理理论的六项贡献

1. 宪法架构

Jasutopianism最直观可见的成就便是其宪法架构。共102条法律条款，从第I条[所有做出贡献的公民享有获得免费基本食物、饮用水、教育、衣物、医疗保健、标准级住房及公用事业服务的权利，“即便在正式宣告的危机时期亦然”(Rodriguez, 2021，第I条)]到第CII条[禁止在全文通过后删改第I条至第CII条中的任何条款]，共同构成了一套适用于新型治理形式的完整法典。

其所呈现的并非一组空泛原则，亦非一纸愿望清单，而是一部秉承伟大宪章传统的宪法性文件；其中，每一条款都规定了附带执行机制的具体法律条文。例如，第IX条不仅规定公民不得受到歧视，还明确指出地位升级“不会基于性格特征，而是基于交易数量及其他可证明的客观经验数据”(Rodriguez, 2021，第IX条)。第XC条也不仅呼吁企业公平交易，而是针对全国贸易日规定：“任何企业在该日均不得依法与同一

家企业来回进行超过4笔交易”，并对违规行为实施自动电子监控(Rodriguez, 2021，第XC条)。随后，第CII条锁定了整个结构：任何条款一经通过便不得被删去或修改。这是一种宪法性的自我约束机制，即Jon Elster (2000)所说的预先承诺：政治体将未来的自身约束于其立国原则之下。

除102条法律条款外，Jasutopianism还包含《治理三权条款》（另设宪法章节的第I条至第IX条），分别设立了立法权[由参议院与公民议院构成的两院制体系]、行政权[实行3/3一致表决制的三总统办公室]以及司法权[维护三大立国原则的全国法院体系]。分权界定明确，制衡机制切实可操。公民议院享有绝对多数否决推翻权，常规门槛为80%，在正式宣战时期提高至90%。

按Wright (2010)的标准，这一宪法架构在可欲性上得分最高。该体系从第一性原理出发，旨在保护自由、生活与繁荣，每一项条款都可追溯至这三项立国核心价值中的一项或多项。至于可行性问题，即这些条款能否在实践中有效运转，正是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将在后续章节中探讨的核心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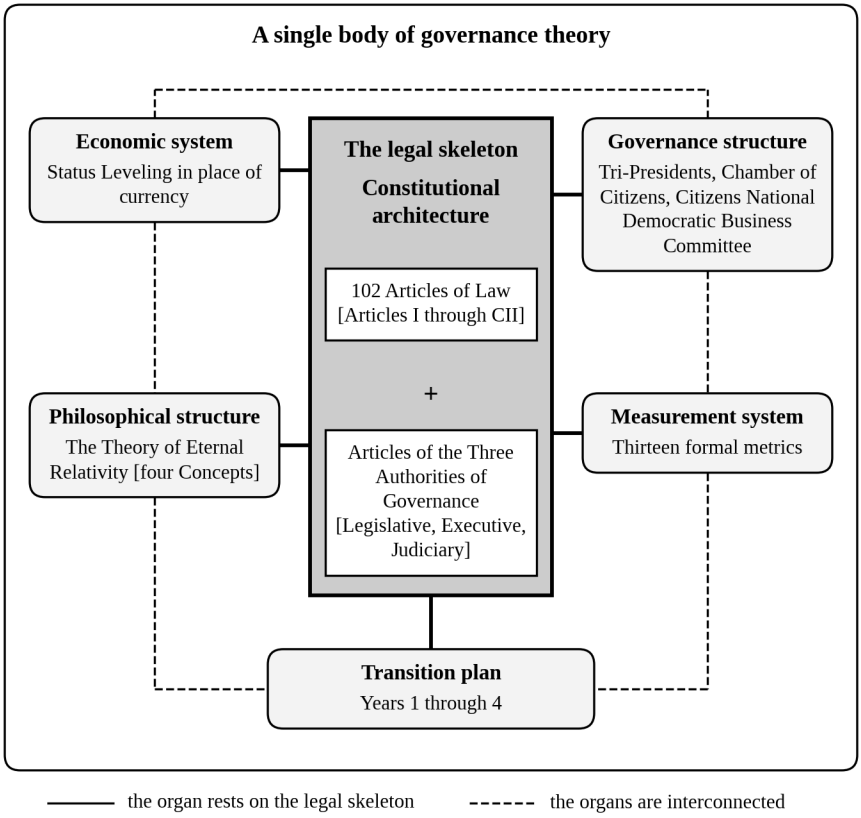


图 **1.1.** Jasutopianism的六项贡献

2. 新型经济体系

按Jasutopianism自身的表述，其核心“是资本主义的一种衍生形式”(Rodriguez, 2021，论点V)。对于任何初次接触该体系的读者而言，这一澄清都至关重要。Jasutopianism并未废除资本主义，而是重构了货币的形式。

货币体系被地位升级所取代：在这一制度中，公民身份、工作表现与教育成就构成经济价值的基础。无论其地位等级高低，所有做出贡献的公民[连同依法获准做出贡献的非公民，以及依据第LXXI条登记在案的残障公民]均免费获得基本资源[食物、饮用水、教育、衣物、医疗保健、标准级住房及公用事业服务](Rodriguez, 2021，第I条、第LXXI条)。所有非必需品[奢侈品、更大面积的住房、更高等级的汽车等]均通过提升地位等级获得，而地位等级的提升本身则通过以交易数量及其他

经验数据所衡量的、可证明的客观工作表现来赢得(Rodriguez, 2021，第IX条)。

自由市场依然存在。企业之间彼此开展资源交易。由全体公民企业主作为代表的公民全国民主商业委员会，在政府层面就商业事务提供直接的话语渠道(Rodriguez, 2021，第LV条)。该体系与货币体系的关键区别在于，企业之间交易的交换媒介是资源本身[原材料与加工材料]，而非金钱；公民晋升的媒介则是地位等级，而非积累的货币。

Jasutopianism还包含一项形式逻辑论证，说明为何该体系在经济上优于货币替代方案。这一论证见于“货币体系与非货币体系的哲学与逻辑论证”一节，将一个3人的货币模型与一个5人的非货币模型并置对照：在货币模型中，单一交易周期便会使各方持有量出现不平等（“甲是最富有的，而乙是最贫穷的”），而在非货币模型中，“所有当事人在交易前后的价值依然完全相同，均为1”(Rodriguez, 2021，“货币体系与非货币体系的哲学与逻辑论证”)。这是因为，按照Jasutopianism的推理，接受产品或服务的行为并不会降低公民的地位等级，而只是确认其享有资格。基于这一推理，Jasutopianism在货币体系中所发现的零和博弈动态，在地位升级制度中在结构上并不存在。

从核心上看，这正是Jasutopianism经济理论的核心主张，而Jasutopianism是在逻辑层面上对其进行论证的。该模型所揭示的结论比结果均等更为有限：缺乏可转让代币的交换本身无法造成持有量的集中。它并未证明结果均等[地位等级在设计上即有差异]，也未证明货币交换必然导致一方受损[商品的买方毕竟获得了该商品]。此外，这一形式论证仅在极简模型[3至5人]的层面上运作。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将提供与该逻辑相关的经验证据[通过对合作制与非货币经济的案例研究]，而第3章也将直白说明这些证据的适用边界。

3. 新型治理结构

Jasutopian国家的治理结构建立在三项在现有政治体制中并无完全先例的创新之上。

第一项创新是三总统办公室。来自同一政党、通过平等选举产生的三位总统，以3/3全票一致的方式作出所有行政权决策。Jasutopianism直接阐述了其理由：此举“将防止总统办公室在未来像单一的君主式实

体那样行事、在核权力问题上非理性行事，并使其拥有另外两位具备同等权力[及政治地位]的人士，就各项决策提供关键反馈与洞见”(Rodriguez, 2021，“按权力来源划分的政府”)。三总统结构既是防范威权主义的保障机制，也是最高行政权力层面的审议式决策机制。

第二项创新是公民议院。与公民选举代表代为投票的代议制民主不同，公民议院允许“年满18岁且无重罪[或同等程度罪行]犯罪记录的任何及所有公民”(Rodriguez, 2021，治理三权条款，第I条)对参议院通过的立法直接投票。其效果是将国家层面的直接民主嵌入代议制架构之中。参议院制定法律，公民议院予以批准或否决。法案须获得超过55%的赞成票方可在公民议院通过，这一门槛高于参议院的51%，从而确保立法在送交行政权之前拥有更广泛的民意基础。

第三项创新是公民全国民主商业委员会。这是一个由各商业层级委员会组成的联合体系，每一层级委员会的民选官员均由在该层级注册的公民企业主直接选出(Rodriguez, 2021，第LVI条、第LVII条)。该委员会不设单一领导人或名义首脑，亦无权投票修改法律条款或地位升级积分制度(Rodriguez, 2021，第LXV、LXX条)。它承担着一项范围有限但至关重要的职能：在受参议院制衡的前提下，为企业主提供结构化的渠道，使其能够就“与商业及其职能直接明确相关”(Rodriguez, 2021，第LXIX条)的事务影响立法。

现存没有任何治理体系同时结合了这三项创新。有些国家设有由多名成员组成的行政机关[瑞士联邦委员会]，有些国家实行某种形式的直接民主[瑞士公民投票、雅典公民大会]，还有些国家拥有法团主义商业议会[北欧三方协商制度]。然而，没有任何国家将这三者整合进同一个宪法结构；其中，自由、生活与繁荣这三大立国原则居于最高法律权威地位。

4. 哲学结构：永恒相对论

《Jasutopianism》在简短的四个段落中，包含了一个紧凑的四部分认识论论证，支撑着其制度主张。永恒相对论由四个概念构成：

概念**I.** 万事万物在可见尺度上的最终推论节点处均彼此间接关联。无论当今世界是否理解这一真理，“每一个体系都通过元信息（或

者更确切地说，衍生自其他信息的所有信息）而相对于另一体系存在”(Rodriguez, 2021, TER，概念I)。

概念**II.** 一切已知信息在可见尺度上皆可获取。特定的信息在理论上均可追溯至一个宏大的本源成因，“犹如口耳相传的‘传话’游戏或计算机IP地址的元数据流量”(Rodriguez, 2021, TER，概念II)。

概念**III.** 基于上述两个概念，个人、群体、社会或国家“得以回溯所有信息，从而从不同视角理解过往的一切决策，在所给定的万事万物中求得最高的启迪与最准确的意涵”(Rodriguez, 2021, TER，概念III)。其结果便是人文化：即理解并因而将社会中的每一位成员视为人的能力，这也是“实现最充分的社会问责的唯一途径”(Rodriguez, 2021, TER，概念III)。该概念同时指出，通过理解实现人文化是“防止一切战争的唯一最重要的概念”(Rodriguez, 2021, TER，概念III)。

概念**IV.** 这一理解过程所产生的问责“对于建设性的社会进步至关重要”，并赋予一个国家“最高的人均真理度”，从而使其“自然拥有最高的力量，进而拥有最纯粹形式的自由”(Rodriguez, 2021, TER，概念IV)。

永恒相对论本质上是一种以信息透明实现社会问责的认识论论证。它主张，既然所有信息在根本上相互关联[概念I]且在根本上皆可获取[概念II]，那么各民族之间任何理解上的失败，皆源于信息追溯的缺失，而非人性本身的缺陷。战争在其诸多成因中便包括信息追溯的失败[其其他成因以及用以应对的全球和平三大支柱将在第8章加以探讨]，而偏见与非人化则是元信息残缺不全的后果。解决之道不在于道德说教，而在于认识论上的完备：只要将信息向后追溯得足够远，理解便会随之而来。

这是《Jasutopianism》中最为凝练的哲学部分。涉及信息论、认识论、社会问责与和平理论的四个概念，占据了简短的四个段落。《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第2章将把这一结构拓展至其所需的分析深度，使每一个概念与既有的成熟学术研究体系并置对照。

5. 衡量体系

大多数治理方案往往将衡量标准留待未来的实施者自行制定，而Jasutopianism则明确规定了用于评估Jasutopian国家绩效的13项正式指标。这些指标列于序言的国家层面与全球层面章节，并在术语表中加以界定，具体如下：

指标	全称	衡量内容
S.O.L.P.C.N.	国内指数化公民人均生活水平	国内生活质量
S.O.L.P.C.I.G.	全球指数化公民人均生活水平	全球比较生活质量
D.P.P.	国内产品生产	生产产出
I.O.	创新机会	获取创新的机会
I.N.R.	创新常态率	通过创新岗位创造的产品
N.R.O.	国家资源输出	出口资源
N.R.I.	国家资源输入	进口资源
N.N.R.	国家净资源	资源流动平衡
T.A.R.	技术进步率	技术进步的速度
U.A.O.R.	乌托邦进步机会评级	迈向乌托邦标准的进展
N.C.I.	城市犯罪指数	按城市进行的犯罪衡量[各城市不合并求均值]
C.P.I.	城市贫困指数	按城市进行的贫困衡量[各城市不合并求均值]
N.A.A.C.G.A.	全球进步中受援盟国数量	国际合作贡献

《Jasutopianism》在两个重要方面对这些指标作出了精确界定。首先，它区分了“率”[某一数值随时间的增长或萎缩]与“评级”[某一既定尺度上的数值]。其次，它规定特定指标，尤其是 N.C.I. 与 C.P.I.，必须按城市分别衡量，“不得合并求均值”(Rodriguez, 2021, Preamble)，从而防止当全国平均值掩盖局部苦难时所出现的统计戏法。这种分项衡量方

法在方法论上比大多数治理体系所采用的基于 GDP 的全国平均法更为严谨。

这十三项指标构成了一套内置的评估工具。一个 Jasutopian 国家可以根据其自身宣告的标准来评估自身绩效[其中一项指标 S.O.L.P.C.I.G. 将本国的生活标准与其他国家并列比较]。然而，任由政府自行评分存在风险，因此本书将这些数据的核验职责赋予第6章所述的指标审计委员会；该委员会依法设立，独立于治理三权之外，并有受邀自境外的观察员加入。

6. 过渡计划

《Jasutopianism》的论证 VII，即“从已建立且人口具有不同年龄和工作经验水平的国家过渡为实行地位等级的非货币型 Jasutopian 国家”(Rodriguez, 2021, Argument VII)，提供了一项四年过渡计划：

第一年：为全体公民进行地位等级评定，依据包括针对希望获得更高等级者的定级考试、可证明的过往工作经历，以及第一年的工作工时和所执行的交易。签发具备电子记录功能的国民 ID。非货币体系正式确立。标准级住房建设启动。资源分发项目激活。货币退出流通。

第二年：运用双变量系统[维系社会的必要性 (X) 与丰裕或稀缺程度 (Y)]正式确定资源价值。为实现 Jasutopian 运作而设立基本企业。建立国际商业关系：政府向企业提供用于国际交易的工具，相关交易记录于电子卡片记录系统，而分支商业伙伴关系可能在第三年成为可能。

第三年：在受资源承载能力约束的前提下，凭工作签证接收非公民并开放入籍路径。

第四年：为向下一届三总统制过渡或延续本届任期作准备。

这并非理论上的空想，而是一份在每一阶段都设有具体行动的分期实施时间表。该过渡计划以“现代化国家”作为起点 (Rodriguez, 2021, Preamble)，承认公民具有“不同年龄和工作经验水平”的复杂性，并规定了将现有成就按既得权益纳入地位等级体系的机制。

按照 Wright (2010) 的标准，这一过渡计划在可实现性方面迈出了第一步，而绝大多数乌托邦方案恰恰完全忽视了这一维度：它为制度采

纳之后的若干年制定了时间表，同时留待探讨一个群体最初如何达成采纳该制度的共识，本书将在可行性之外一并探讨这一问题。
《Jasutopianism》认真对待“我们如何从现状抵达目标”这一问题，这是对相关文献一项不应被低估的贡献。



II. 《Jasutopianism》留下的空白：十大缺口及其根源

以下十项缺口，直接源于将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 2010）的三项分析标准[可欲性、可行性与可实现性]应用于作为独立国内蓝图的《Jasutopianism》(Rodriguez, 2021)。若按其自身文本逻辑加以审视，Jasutopianism 以严谨清晰的形式阐明了其法律条款、十三项指标以及四年过渡时间表。然而，一旦特定的政治学者以可行性与可实现性来检验这一国内制度架构，十项结构性边界便会显现。这些边界均非疏忽遗漏，而是各自标示了单一国内宣言性著作原本并未打算具体阐述的内容、规范性宪章按惯例不会纳入的事项，或者2021年之后公共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

《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全书围绕两项严谨任务展开：制度可行性与实证可检验性。每一章均检验特定的机制能否在真实的人类约束条件下运作，并明确指出何种证据能够证实或证伪该机制。在这一

更广泛的制度审查框架内，一种独特的动态机制主导着国际与文化相关章节[第4、5、8和11章]。该动态机制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跨境同理心为建立和捍卫人文化制度[即保护文化交流与开放互动的法律]提供政治意愿；这些制度反过来庇护真实文化接触的条件，而持续的文化接触又在不同群体之间催生更深层的同理心[即 Meadows (2008) 意义上的正反馈循环，其中，每轮循环都会强化下一轮的条件]。本卷将这一国际与文化循环命名为“同理心与制度反馈循环”；其中，由经审计指标与民主问责制共同构建、用以发挥纠偏作用的对应机制，则是第2章所推导出的“问责与同理心之桥”。

将 Wright 的标准应用于 Jasutopianism 的第一性原理，会揭示出十个确切的压力点；在这些节点上，一部国内治理法典必须补充实证证据、证伪条件、宪法安全阀、数字保护以及国际条款。依据其成因，这十项缺口可分为三类：范围缺口[一部国内治理著作原本未打算涵盖的内容]、体裁缺口[缺乏学术惯例的规范性文献所不提供的部分]，以及时间性缺口[在撰写之时无法预见的情形]。

Severity	Gap of scope	Gap of genre	Gap of temporality
Critical	**Gap 2. No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provisions** *Filled by Chapter 4*	**Gap 1. Zero falsification conditions** *Filled by Chapter 7*	**Gap 3. No digital platform governance** *Filled by Chapter 5*
Major	**Gap 8. Theory of Eternal Relativity underdeveloped [borders on genre]** *Filled by Chapter 2* **Gap 9. S.U.W. lacks operational mechanism** *Filled by Chapter 11*	**Gap 4. Deterministic claims without hedging** *Filled by Chapters 3 and 7* **Gap 5. No case studies and little empirical evidence** *Filled by Chapter 3* **Gap 6. No academic citation architecture [borders on scope]** *Filled by all chapters*	*[none]*
Moderate	**Gap 7. Environmental policy disconnected from cultural theory** *Filled by Chapter 8* **Gap 10. Transition plan needs specificity beyond Year 4** *Filled by Chapter 6*	*[none]*	*[none]*

Each gap names the chapter of 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 that fills it.

图 **1.2.** 十大缺口

缺口 **1**：零证伪条件（关键，体裁缺口）

《Jasutopianism》不包含任何证伪条件。书中不存在诸如“如果发生 X，则该理论错误”的表述。文本中所蕴含的各项预测[地位升级将激励工作、创新将蓬勃发展、贫困将被消除]均以宣告而非可检验假设的形式陈述。

这属于体裁缺口。《美国宪法》同样缺乏证伪条件。《世界人权宣言》也未规定何种证据能够证明其错误。规范性文献按其本质旨在宣告事物应当如何；它们通常不会具体说明应当放弃自身规范的条件。《Jasutopianism》正属于这一传统。

然而，证伪条件的缺失限制了该著作在作为学术学科的政治学界中的可信度。一项无法检验的治理方案无法依据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标准予以评估。《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第7章将提供五项明确预测与五项明确证伪条件，使用《Jasutopianism》的指标并辅以本书新增的工具进行衡量，同时阐明当某项预测被证伪时将产生何种后果，从而使该体系从“看似可信的治理设计”转化为“可检验的治理方案”。

缺口 2：缺乏国际文化交流条款（关键，范围缺口）

《Jasutopianism》通过商业交易的视角[论证 II：以劳动换取资源的交换、旅游签证协议、分支商业伙伴关系]以及世界超国家联盟的愿景[S.U.W.；论证 XVIII]来涵盖国际关系。但它并未提供国际文化交流的法律架构[即 Jasutopian 国家与更广泛的国际社会之间对艺术、教育和媒体产品的有意共享]。

这一缺口属于范围缺口。《Jasutopianism》是一部探讨国内治理的著作。其法律条款管辖单一 Jasutopian 国家的内部运作。国际文化交流则需要一套不同的法律条款：即关于 Jasutopian 国家如何支持其公民获取外国文化产品、如何保障文化共享中的互惠对等，以及如何防止文化交流被国家情报机构挟持利用的规定。这些条款并不自然契合一部专注于国内宪制法律的文献。

当将 Jasutopianism 自身的第一性原理延伸至单一国界之外时，这一缺口便显露无遗。如果跨境文化人文化与情感文化认同能够降低不同群体之间的群际敌意[这一假说植根于政治心理学与公共外交研究，并在第2章和第4章中加以展开]，那么，一个旨在实现持久和平与繁荣的治理体系便不能缺少关于文化交流的法律架构。《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第4章将提供文化外交条款[CIII 至 CIX]，连同阐明第 IV 条不俘虏规则的第 CXXIV 条，以弥合这一缺口。

缺口 3：缺乏数字平台治理（关键，时代缺口）

《Jasutopianism》出版于 2021 年。TikTok 是那一时代基于互联网的平台，其中用户创作并观看由推荐算法逐条为其遴选的短视频；该平台于 2021 年 9 月报告称每月有超过十亿人使用它。该平台在全书中作为数字治理的参照案例，因为其所处境况[外国设计、算法编排以及围绕其所有权的公开博弈]引发了所有治理问题[数据主权、算法影响、外

国国家触角]，而 2021 年撰写的任何法典均尚未对此作出回答。美国用户对其的依恋并未推翻美国于 2024 年针对该平台颁布、并于 2025 年 1 月获最高法院维持的法律，但确实塑造了最终结果：以出售美国业务取代直接封禁[第5章]。后世特定的读者可将其替换为彼时本国公众所栖居的任何平台；本论点针对的是这一类别，而非特定公司。数以亿计的公民每天花费数小时在算法编排的数字平台上创作和消费内容的“栖居平台”现象，当时尚未达到如今的规模，也尚未显现如今的治理影响。

《Jasutopianism》的电子基础设施条款[国民 ID 卡系统、电子卡片记录系统、交易监测机制]涵盖了资源交易的追踪与核验。它们并未涵盖公民创作、分享和消费文化产品的平台治理。这是因为栖居平台所带来的治理挑战[算法内容编排、监控资本主义、数据主权、外国国家对信息生态系统的操纵]在撰写《Jasutopianism》之时尚未完全显现。

相比之下，这属于时代缺口，而非疏漏。在 Jasutopian 社会中治理 TikTok 类平台[人们每日栖居、由算法编排且对相关国家境外所有者负责的平台]所需的法律架构，要求具备在 2021 年根本无法以宪制条款所需之精确度加以预见的规定。《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第5章将提供数字文化互动条款[第 CX 条至第 CXVI 条]，使《Jasutopianism》得以更新以适应当代数字时代。

缺口 4：缺乏限定修饰的决定论断（重大，体裁缺口）

《Jasutopianism》的宣告式语体是该书作为一部著作的重要优势之一，但这也产生了诸如“这继而意味着 Jasutopian 国家不会出现某些资源价值被人为抬高的情况”(Rodriguez, 2021, Argument I) 这样的论断。这些论断均以确定无疑的口吻陈述，几乎没有限定修饰或概率界定，也很少承认结果取决于可能成立也可能不成立的条件。

相比之下，在实证政治学中，因果主张带有明确的范围条件与概率限定。现实世界中的治理机制在任何阶段都可能失灵，因而分析性著作必须指明结果失效的条件。Jasutopianism 的宣言式语体很少为此类限定性表述而驻足。

这属于体裁缺口。宪制性文献并不使用限定修饰。《美国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不会写“奴隶制很可能不复存在”，而是写“奴隶制或强迫劳役……均不得存在”。《Jasutopianism》的条款正是以这种语体撰

写的，而命令无需限定修饰。上文所举之例则属另一类情况：它出自论证部分，是一项预测，而预测是可以检验的，这正是第7章将此类预测重新表述为附带限定修饰之预测的原因。这种写作风格的代价是在经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可信度受损，因为该领域预期的是概率性的表述框架。《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特别是第3章和第7章）将引入经验语体所要求的限定修饰与基于证据的界定。

缺口 **5**：缺乏案例研究与鲜有经验证据（重大，体裁缺口）

《Jasutopianism》包含逻辑论证、哲学证明和宪制条款，但不包含案例研究。书中并未深入分析任何历史实例，以证明 Jasutopian 愿景中的各项要素已在实践中得到成功实施。

这同样属于体裁缺口。《联邦党人文集》援引历史上的邦联作为警示，并未对其所倡议的体制提供案例研究。《共产党宣言》也未收录成功公社的民族志证据。《Jasutopianism》是一部宣告式著作；宣告式著作负责提出主张。至于证明所提出的各项要素曾在真实历史语境中以部分形式发挥作用的经验性工作，则是另一部剖析性著作的任务。

《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第3章将承担这一工作。七项案例研究[蒙德拉贡公司、以色列基布兹、北欧社会民主制、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时间银行社区、爱沙尼亚的电子治理以及罗贾瓦的民主邦联制]将分别对应具体的 Jasutopian 原则，表明与该体系设计相近的机制[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普遍供给、替代性价值衡量标准、交易的数字记录、公民的直接发声]均有历史先例可循，而全国规模的分级非货币交换则尚无先例，这正是第7章预测一所要检验的内容。

缺口 **6**：缺乏学术引证体系（重大，体裁缺口）

《Jasutopianism》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没有学术引证的情况下撰写的。除了使用引证的其中一章[论证 XX]之外，文中没有对同行评审文献的文内引注，没有佐证研究的参考文献目录，也没有与《Jasutopianism》各项主张所交汇的既有治理理论、合作经济学或政治哲学文献展开对话。

此处的缺口属于接近范围缺口的体裁缺口。作者独创的叙事声音与思想独立性是《Jasutopianism》的真正优势所在；该书的思想确实新

颖，并非衍生自任何单一的既有理论。然而，引证的匮乏意味着读者几乎无从评估该著作与既有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的整体结构，从其采用 APA 第 7 版的学术引证体系，到其与治理转型文献、信息论及证伪方法论的系统性对话，提供了《Jasutopianism》所未提供的学术支架。

缺口 **7**：环境政策与文化理论脱节（中等，范围缺口）

《Jasutopianism》包含论证 XX，即“制定将 CO2 排放量降至净零的方法”(Rodriguez, 2021, Argument XX)，其中涵盖了太阳能开发、环境保护政策与立法以及可再生能源转型的科学基础。就其自身而言，这是一个内容扎实的环境政策章节。

《Jasutopianism》未能提供的是环境政策与国际合作文化理论之间的关联。环境挑战本质上是跨国的；一国的碳排放会影响所有国家。一个构想通过 S.U.W. 开展国际合作的体系，需要具体说明环境合作如何作为一个场域，使文化交流、制度信任与治理协调在此交汇。

这一关联并不属于一部国内治理著作的涵盖范围。《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第8章将把环境合作视为全球和平三大支柱的运作领域[即包括核二元对峙双方相互确保摧毁在内的物理与军事威慑、通过跨境文化人文化实现的情感文化威慑，以及通过国内治理改革实现的结构性经济威慑]，并将提出七项环境合作条款[CXVII 至 CXXIII]，从而将该法典延伸至环境领域。

缺口**8**：永恒相对论尚不充分（重大，范围缺口）

如前所述，永恒相对论在 Jasutopianism 文本中仅占四个简短段落。跨越信息论、认识论、社会问责与和平理论的四个概念以高度压缩的形式呈现，未与其所交汇的学术文献建立联系。

概念 I 关于“万物彼此间接相关”的论断，与一般系统论 (Bertalanffy, 1968) 及复杂性科学呈现出同构性的结构对应。概念 II 关于所有已知信息皆可获取的论断，与香农信息论 (Shannon, 1948) 中的形式结构相呼应。概念 III 关于通过理解实现人文化的论断，自然衍生出第2章所阐述的认识论和平命题。概念 IV 关于问责与真相的论断，则与

透明度理论及开放政府学术研究相平行。上述分析性关联在 Jasutopianism 中均未加以建立。

这是一个接近体裁缺口的范围缺口：Jasutopianism 并非旨在对照学术文献来发展其哲学体系，而宣告性著作通常也不包含附带学术文献综述的哲学阐述。永恒相对论是作为基础命题提出，而非作为充分展开的哲学论证。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 第2章将把每个概念扩展至其应有的深度，明确揭示 Jasutopianism 中隐而未发的既有思想体系关联。

缺口**9**：**S.U.W.** 缺乏运作机制（重大，范围缺口）

Jasutopianism 的论点 XVIII“超国家联盟中 Jasutopianism 的可能职能；世界超国家联盟；S.U.W.”（Rodriguez, 2021，论点 XVIII），宣告了一个与 Jasutopianism 相容的全球国家联邦愿景。愿景已然宣告，但实现该愿景的运作机制尚未指明。

单一的 Jasutopian 国家如何从国内治理迈向国际联邦？其阶段为何？两个与 Jasutopianism 相容的国家在启动制度协调之前必须满足哪些先决条件？哪些指标能够表明已具备组建联邦的准备度？哪些失败条件表明应当暂停或逆转这一进程？

这些运行层面的问题超出了《Jasutopianism》的探讨范围，该书专注于单一国家转型的内部机制。《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第11章将为S.U.W.提供一套四阶段运行模型，将文化交流先于治理采纳的顺序逻辑[即第6章推导出的文化与治理传导路径]应用于超国家层面，并在各阶段之间设立可量化门槛的关卡、用于扩大联盟的绝对多数加入规则、各阶段的期限限制、分级区域集团成员资格以及退出规则；其中，该联盟起初作为一个四领域邦联运作，并可在满足既定的两项合并条件后，成为论点 XVIII所描述的那个伟大国家。

缺口**10**：过渡计划在第**4**年之后需要具体化（中等，范围缺口）

Jasutopianism 的过渡计划涵盖第1年至第4年。第4年以“为向下一届三总统制或其延续过渡作准备”（Rodriguez, 2021，论点 VII）收尾。第5年、第6年、第10年会发生什么？

首届三总统任期为四年。该过渡计划恰好涵盖一个任期。一个新建立的 Jasutopian 国家在第4年结束时完成了初步转变，但尚未巩固该制度。地位升级经济体虽已运行，但尚未经历商业周期的检验。国际关系虽已开启，但尚未成熟。公民议院虽已启用，但尚未建立起直接民主投票的制度文化。

缺乏更长期的过渡计划是一个范围缺口：Jasutopianism 指明了初步转变所需之举，而将更长期的巩固留待未来发展。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 第6章将把过渡计划从四年延长至十年，在各阶段设定具体的可测量里程碑[以 Jasutopianism 的指标并辅以本书新增的工具，对照过渡开始前即已固定的门槛加以衡量]、失败条件与纠正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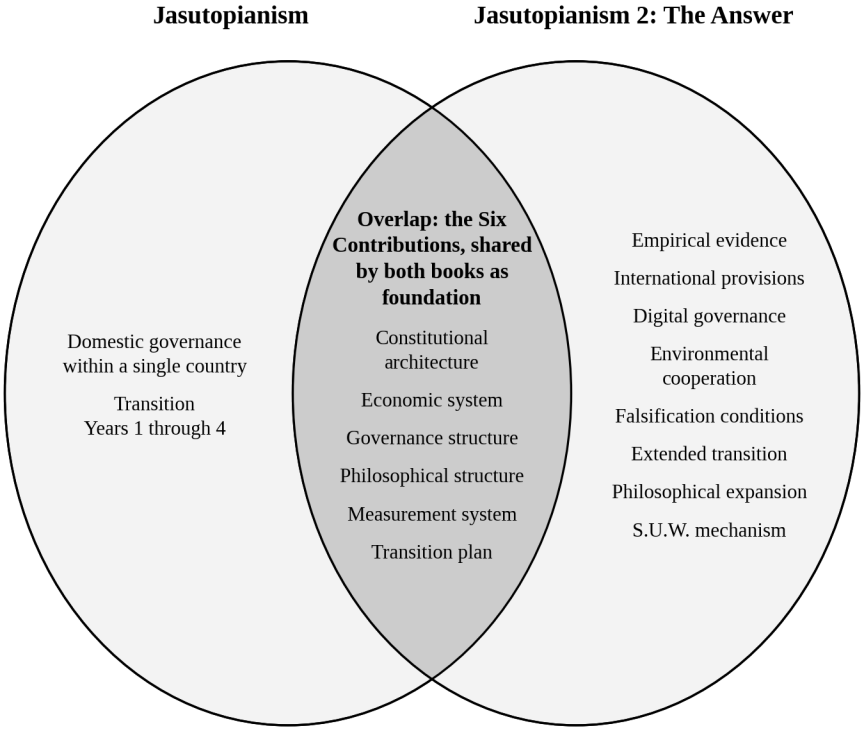


图 **1.3.** Jasutopianism 与 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 范围对比

III. 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 的宗旨（补完，而非修正）

《Jasutopianism》未被修订，未被撤回，也未被删除。每一项法律条款、每一项论点、永恒相对论的每一个要素、每一项指标以及治理架构的每一项规定，均按原样保留。第CII条禁止删除或修改编号为第I条至第CII条的任何法律条款，该条管辖《Jasutopianism》原有的一百零二项条款。本卷提出的三十三项条款[涵盖文化外交、数字治理与环境合作的第CIII条至第CXXIII条，外加阐明第IV条关于禁止俘虏规定的第CXXIV条，以及弥合第12章经济与政治权力缺口的第CXXV条至第CXXXV条]，将依照第XCVI条为每项法案设定的标准程序纳入法典，而第CXXIII条与第CXXXV条则将第CII条的锁定效力延伸至这些新增宪法条款。《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为该架构增补内容，并不改变其原有文本。

话虽如此，学术政治学针对任何永久性法典都提出了一个合理的制度性问题：倘若某项经验机制在实践中失效，立宪政体如何在不违背文本不可变性的前提下作出回应？为解答这一问题并完整保留第CII条的锁定效力，本卷引入了一项严格限定的宪法替代议定书[上位法运行覆盖机制]，该议定书依第XCVI条的标准程序增补，并于第7章和第13章详述。该议定书在文本不可变性与运行替代之间划定了严格界线。第I条至第CII条、第CIII条至第CXXIV条或第CXXV条至第CXXXV条中的任何条款，均绝不从宪法文本中删除、重写或抹除。然而，在法典末尾附加的“运行替代条款”，若且唯若同时满足以下五项累积条件，方可合法中止或修改此前某项程序性或经济性条款的运行实施：第一，经独立指标审计委员会公布“经核实的证伪触发条件”，确认第7章中预先登记的某项经验证伪门槛已被跨越；第二，设立“强制性诊断期”，其中参议院举行为期十二个月的公开调查，以区分参数校准误差与结构性机制失效；第三，“立法绝对多数”，即参议院以三分之二[67%]的票数通过该替代条款；第四，“立国级民众授权”，即公民议院以超过70%的投票赞成批准该替代条款；第五，“不可克减核心审查”，其中司法权核证该条款与三大立国原则[自由、生活与繁荣]相一致。核心权利保障[第I、III、IV、V、IX、XII、XIV、CII、CXXIII及CXXXV条]明确规定为不可克减，运行替代严格适用于已被证伪的经济、行政或程序机制。

修订与完善之间的界线依然分明。《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是一部续作。续作旨在补全原作留白之处。上文指出的空白并非疏忽所致，而是任何单卷宣言式著作在范围、体裁与时代性上必然面临的自然边界。

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 逐章补足的内容如下：

缺口	章节	补足内容
1. 零项证伪条件	第7章	五项预测、五项证伪条件、双重物理创新基准与宪法替代议定书
2. 无文化交流条款	第4章	文化外交条款（第CIII条至第CIX条）及第CXXIV条（不俘虏与投降）
3. 无数字平台治理	第5章	数字文化互动条款（第CX条至第CXVI条）与合格数字交易
4. 决定论主张	第3、7章	经验证据、概率性审慎界定与附条件诊断结论
5. 无案例研究	第3章	对应Jasutopian原则的七项历史案例研究及国内人才流失反制机制
6. 引文稀疏	全书各章	采用 APA 第7版的学术引文架构
7. 环境议题脱节	第8章	作为三大支柱运行领域的环境合作及第CXVII条至第CXXIII条
8. TER 阐述不足	第2章	结合系统论平行对照与同行评审同理心学术研究加以拓展的四大概念
9. S.U.W. 缺乏机制	第11章	四阶段文化优先一体化模型、绝对多数加入与分级区域集团成员资格
10. 第4年之后的过渡	第6章	制宪前零阶段、三级过渡清算架构与十年转型蓝图

这些增补内容的综合效应，使《Jasutopianism》从一份宣言式的国内倡议，提升为一部植根于经验且可供审计的治理专著。Wright (2010)的三项标准清晰地概括了这种分工：《Jasutopianism》确立了可欲性[以自由、生活与繁荣为宗旨的宪法设计]，并提出了实现可及性的初步时间表[其四年转换计划]。《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则承担

起可行性的论证[经验证据、反制机制与预先登记的证伪检验]，并通过在第6章为首个转型国家制定制宪前零阶段路径，同时在第11章提出超国家加入模型，从而补全了可及性。



IV. 后文概要

本章之后的各章将严格按照这十项空白的顺序依次展开。第2章从哲学空白切入：在《Jasutopianism》中浓缩为四个短段的永恒相对论，将被拓展为一部完整的认识论专著，探讨其与信息论、系统论、复杂性科学以及同行评审同理心心理学之间的同构结构平行关系。第3章转向经验空白，对照七项合作治理的历史案例检验Jasutopian的各项要素，并明确针对高技能人才流失的四项国内反制机制。第4章和第5章补全了《Jasutopianism》受限于国内视角及2021年出版时间而未能纳入的新增宪法条款，即文化外交条款[第CIII条至第CIX条，外加澄清性的第CXXIV条]与数字文化互动条款[第CX条至第CXVI条，以合格数字交易为支撑]。第6章增设了制宪前零阶段、涵盖第1年至第3年的三级过渡清算架构，以及经独立指标审计委员会核验的完整十年转型蓝图。第7章提出了五项预先登记的预测、五项附条件证伪门槛、一项双重物理创新基准，以及双层级的宪法替代议定书。第8章将环境合作与全球和平三大支柱相衔接，并详述第CXVII条至第CXXIII条，包括基于消费与生物

物理边界的份额分配。第9章从地球转向其上的人民，探讨语言问题：一个已然存在既定语种的特定国家，应当对其强行同化，还是正式承认既有的诸种语言。该章并不填补第十一项空白；而是将该制度应用于一项现实的宪法问题，经由参议院、公民议院以及第XCVI条所规定的程序推进，最终确立承认门槛[任何作为超过十分之一公民母语的语言均确立为官方语言]。第10章立足于单一货币国家内部，追问保留货币的国家对劳动公民负有何种义务。该章以公平薪酬方程作答，依据经OECD调整的等价规模分县计算，结合工作场所与远程办公双锚规则、雇主精算支付能力，以及包括小微企业薪酬桥梁和劳动者过渡服务在内的五项国家义务；该章同样不填补任何空白。第11章具体阐明四阶段S.U.W.运行模型，配备关卡1绝对多数加入机制及分级区域集团成员资格。第12章以增补方式弥合十项缺口未曾命名的两类缺口，即经济缺口与政治缺口，所依靠的是第CXXV条至第CXXXV条[无人持有的每日调度信号、第30个月之前的影子运行、探索特许、针对三总统的连续性默认规则、公民审议陪审团、不可关联凭证、门限令状、红队、分配者的轮换，以及联盟中的退出连续性]；该章同样不填补十项缺口中的任何一项。第13章对135条制度体系进行综合，提出一套可立即在次国家层面与学术界开展检验的五轨模块化经验研究议程，并以一封致研究者与读者的信作结。

这正是《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所承担的使命。这是完善，而非修正。《Jasutopianism》所提出的宪法核心依然完好无损，而后续各章将补充政治学所要求的经验证据、分析精度、法律延伸与可证伪检验。

至此，让我们开始这项工作。

参考文献（第1章）

Bertalanffy, L. von. (1968). *General system theory: Foundations, development, applications*. George Braziller.

Elster, J. (2000). *Ulysses unbound: Studies in rationality, precommitment, and constrain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eadows, D. H. (2008). *Thinking in systems: A primer* (D. Wright, Ed.).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Rodriguez, J. (2021). *Jasutopianism*. [Self-published].

Shannon, C. E. (1948).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 *27*(3), 379-423.

Wright, E. O. (2010).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Verso.

第2章：永恒相对论的拓展



永恒相对论是整个 Jasutopian 体系赖以建立的哲学基础。它并非附录，既不是在宪制架构完成后顺带增补的附言，也不是为了点缀而穿插在论证与条款之间的思辨旁白。它就是根基本身。每一条法律条款、治理三权的每一项规定、十三项指标衡量体系中的每一项指标、地位升级经济的每一个等级，都建立在一系列关于信息本质、理解之可能性以及真理与自由之间关系的认识论主张之上。这些主张正是永恒相对论。

Jasutopianism (Rodriguez, 2021) 以短短四段文字阐述了这些主张。四个概念，各自只陈述一次，然而每一个概念都蕴含着整个学术传统耗费数十年探究的深远意涵。概念 I 宣告，宇宙中的万物都通过元信息链条彼此相关。概念 II 宣告，通过追溯这些链条，所有已知信息在理论上都是可获取的。概念 III 宣告，当这种追溯能力得到运用时，便会产生人文化，即理解并因此赋予任何社会中每一位成员以尊严的能力。概念 IV 宣告，这种人文化会产生社会问责，从而赋予一个国家“最高的人均真理度”，并因此赋予其“默认状态下的最高权力，进而实现最纯粹形式的自由” (Rodriguez, 2021, TER, Concept IV)。

这些并非微不足道的主张。它们在宏大程度上堪比信息论、系统论与复杂适应系统科学的基本命题。Jasutopianism 从第一性原理出发所作的断言，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的数学与科学传统日后会通过完全独立的方法和完全不同的目的，为其发展出独立的证据。

本章完成Jasutopianism此前选择未做之事。它将每一项概念加以展开。它将概念I置于网络科学与一般系统论之旁，将与贝塔朗菲、巴拉巴西及沃茨之间的关联严格视为跨系统理论的同构结构平行关系，而非演绎证明。概念II则置于香农的信息论、普里戈金的热力学以及弗洛里迪的信息哲学之旁，作为具有明确操作边界的结构平行关系；其中，信息在处理过程中绝不会增加，而物理熵在实践中限制了信息的恢复。概念III置于维纳的控制论、迪肯的涌现理论以及经同行评审的同理心研究之旁，从而原生推导出多分辨率人文化与认识论和平命题。随后，概念IV将透明度理论与问责与同理心之桥[于第IV节中原生推导出]相结合，阐明公民同理心如何将形式监督转化为鲜活的治理。

本文并非主张演绎证明。其分析目标要严密得多：追踪跨独立学科领域[信息论、网络科学、复杂性科学、控制论以及实证心理学]的结构平行关系，以便学术界政治学者能够审视TER在何处与既有学术研究相契合，以及其形式边界在何处终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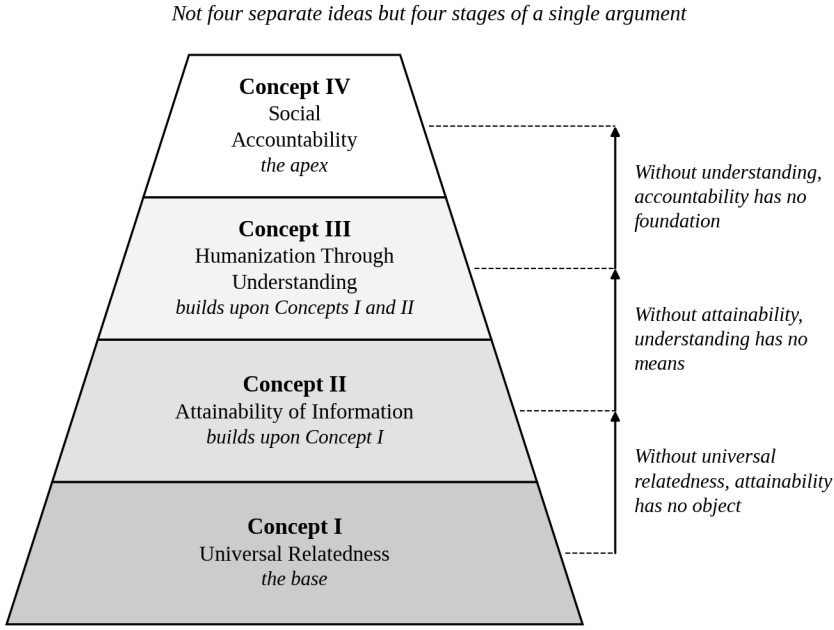


图 **2.1.** 永恒相对论的四个概念

话虽如此，拓展阐述从概念 I 开始。

I. 概念 I：普遍相关性

Jasutopianism 陈述道：

> “万物在可见尺度上的最终推论节点处彼此间接相关。无论当今世界是否理解这一点，万物在推论的某个节点上都是彼此相关的。一个国家的品格甚至与计算机中的功能具有相对性。这一点或许并不显而易见，因为许多系统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或者相隔着诸多推论节点，但其核心概念在于，每一个单一系统都通过元信息，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由其他信息衍生而来的所有信息，与另一系统具有相对性。” (Rodriguez, 2021, TER, Concept I)

这一主张十分大胆。一个国家的品格与一台计算机的运作相关。一个民族的文化与亚原子粒子的物理学相连。无一例外，每一个系统都通过衍生信息的链条与其他所有系统具有相对性。“元信息”一词正是关

键所在：由其他信息衍生而来的信息层层叠加，直至这条衍生链条将宇宙中任意两个系统连接起来，无论二者相距多远，无论其尺度或功能差异多大。

Ludwig von Bertalanffy 在其奠基性著作 《一般系统论》（*General System Theory*）(Bertalanffy, 1968) 中提出了一项可直接对应于这一主张的原则。Bertalanffy 论证指出，跨所有领域 [生物、社会、物理、认知] 的系统都共享同构的组织原则，而且一个系统并非由其组成部分定义，而是由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定义。活细胞与城市都表现出自我调节、反馈以及层级化组织，这并非因为细胞和城市由相同的物质构成，而是因为两个系统的关系结构遵循相同的组织逻辑。Bertalanffy 将这种共享结构称为“同构性”，即形式上完全相同的规律会出现在不同学科中的现象 [他另行提出的术语“等终态性”则指开放系统从不同初始条件出发却能达到相同终态的能力]。这种同构性为概念 I 所断言的内容提供了形式上的对应：一个国家的品格与一台计算机的功能之所以相关，并非因为它们共享物理实体，而是因为二者都是系统，其组织特性源自同一个信息基底，并通过层数过多、数量过巨而难以被日常观察察觉、但在结构上真实存在的元信息链条相互连接。

符合概念 I 主张的网络研究随后问世，其中部分研究距此已逾数十年。Albert-László Barabási 在 《链接：万物如何相互关联》（*Linked: How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to Everything Else*）(Barabási, 2003) 中证明，多种真实世界网络，包括互联网、细胞代谢网络、社交网络、航线网络以及万维网，都共享一种被称为无标度拓扑的结构特性，即少数节点拥有极多连接，而大多数节点仅拥有相对较少的连接。在这类网络中，任意两个节点也通过数量惊人地少的中间链接相连。如此之短的距离并非 Barabási 的发现：“六度分隔”这一结果可追溯至 Stanley Milgram 的信件实验，在该实验中，296 封信件中有 64 封通过平均约六个链接的人际熟人链条送达马萨诸塞州的目标收件人，而其余 232 封则从未送达 (Travers & Milgram, 1969)，同时也与下一段将探讨的小世界网络模型相关。Rodriguez 在概念 I 中所描述的“推论节点”，正是这些中间链接。Jasutopianism 作为哲学命题所陈述的内容，与 Barabási 作为真实世界网络特性所测得的结果相一致。

小世界网络模型的共同发现者 Duncan Watts 在 《六度：互联时代的科学》（*Six Degrees: The Science of a Connected Age*）(Watts, 2003) 中拓展了这一发现。Watts 证明，小世界特性 [任意两个节点之间路径长度很短，同时伴随高度的局部聚类] 在社交网络、生物网络和技术网络中无需集中设计即可自发涌现。他对 Stanley Milgram 著名的信件传递实验的分析揭示了一个更为惊人的事实：人们仅凭局部信息就能在庞大的社交网络中导航。他们不需要涵盖所有连接的全局地图，只需要自己直接认识的联系人以及大致的方向感。那些成功送达的信件 [分别从内布拉斯加州和波士顿寄出] 通过个人熟人链条找到了目标，其中每一环的建立仅依赖于寄信人对其自身社交圈的了解。

这一发现在实践层面上阐明了概念 I。Rodriguez 主张所有系统都通过元信息相互连接。Watts 所报告的研究与此相符：在所研究的网络中，两点之间的距离很短，尽管 Milgram 实验中的大多数链条在送达前便已中断，但仅凭局部知识仍可推进搜寻。“推论节点”所构成的宇宙并非一座无穷无尽的迷宫，而是一张任意两个位置之间都存在极短路径的网络。

Melanie Mitchell 在 《复杂性：引导之旅》（*Complexity: A Guided Tour*）(Mitchell, 2009) 中作出了综合性的阐述，将这些发现与一项更广泛的原则联系起来。Mitchell 指出了复杂系统共有的三项特性：无中央控制的复杂集体行为、信号传递与信息处理，以及通过学习或演化实现的适应。本书从她的论述中提炼出四个特征：无集中控制的自组织、宏观层面模式从微观层面互动中的涌现、通过反馈实现的适应，以及作为所有这些过程基底的信息处理。这些特征普遍存在于蚁群、经济体、神经网络、免疫系统与生态系统之中。它们的普遍性符合概念 I，因为这意味着无论物质构成如何，每一个复杂系统都在从事同一种活动 [信息处理]，并因此通过该活动的共享逻辑与所有其他复杂系统相互连接。Rodriguez 所描述的“元信息”，正是这种共享处理过程留下的信息痕迹，即便在没有明显物理连接的情况下，它也通过结构同构性将蚁群、经济体与神经网络连接在一起。

Fritjof Capra 与 Pier Luigi Luisi 在 《生命的系统观》（*The Systems View of Life*）(Capra & Luisi, 2014) 中直接指出了这一哲学后果。他们论证道，从机械论世界观向系统论世界观的转变，即从将世界视为物体

的集合转变为将其视为关系的网络，是当代最具决定性的思想转型。概念 I 正是以治理理论的词汇表述出的这一转型。Rodriguez 写道：“每一个单一系统都通过元信息与另一系统具有相对性。”Capra 与 Luisi 写道：“部分的属性并非内在固有属性，而只能在更大整体的语境中加以理解” (Capra & Luisi, 2014)。词汇不同，两种表述彼此平行。

Jasutopianism 在概念 I 中包含了一段加括号的注记，值得仔细审视：“[这一点在解释粒子与波的相互作用时于亚原子尺度上尤为明显，但在可见尺度或宇宙尺度上却因使用元信息进行解释而难以推导，不过倘若具备展示这一点的技术能力，万物终究是可相互关联的]” (Rodriguez, 2021, TER, Concept I)。物理学为这段括号内的文字提供了一个平行对照，而这一平行对照有其限度。支配粒子与波的定律保存信息：将其逆向运行，便会回到此前的每一个状态，因此在最小尺度上，过去的一切在原则上都不会丢失(Susskind & Hrabovsky, 2013)。在可见尺度上，同样的过去散布于如此众多的粒子之中，以致没有任何仪器能够将其重新汇集，这正是那段括号内的文字对可见尺度与宇宙尺度所说的话[“难以推导”]，也是它留给一种尚未建成之能力的事情。这一平行对照并不能把概念I推得更远。它并未表明一个国家的品格可以从一个粒子中读出；它表明的是，原则上的关联与实践中的追溯是两项不同的主张，本章让TER只承担前者，而其制度则致力于后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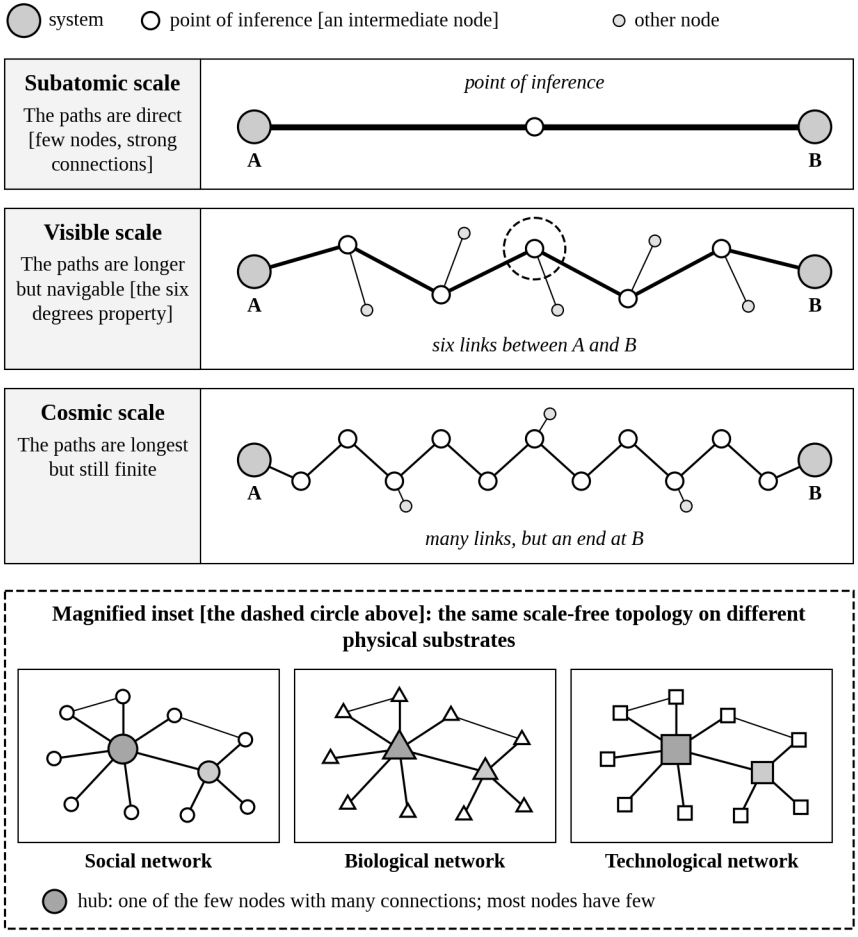


图 2.2. 作为网络结构的普遍相关性

概念I并非空洞的形而上学。它陈述了一项结构性主张。由Rodriguez于2021年阐述，其关系几何学与贝塔朗菲、巴拉巴西、沃茨、米切尔以及卡普拉和路易西在六十年间发展出的网络模型及系统原理呈现出结构上的平行关系[属于组织结构上的平行关系，而非演绎数学证明]。



II. 概念 II：信息的可获取性

Jasutopianism 陈述道：

> “所有已知信息在可见尺度上都是可获取的。宇宙中所有已知信息都已通过个体周围现有元信息的衍生品而可在个体自身之内获取。这是因为特定的信息以某种方式、形态或形式衍生自所有其他信息，因此理论上可以追溯至一个宏大的本源成因，就像‘传话’口头游戏或计算机 IP 地址的元数据流量那样。” (Rodriguez, 2021, TER, Concept II)

将之类比为传话游戏，其精确程度远超初看之下的印象。1948 年，Claude Shannon 发表了“通信的数学理论”（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Shannon, 1948)，即信息论的奠基性文献。Shannon 将信息形式化为一种独立于语义内容的可测量数学量。其核心洞见在于熵，即一条消息中不确定性或“意外度”的度量。Shannon 证明，当消息携带足够冗余时，信息便可通过有噪声的信道传输；当消息经过有噪声的信道 [传话游戏、光纤电缆、一连串人际交谈] 时，信号会发生退化，但只要在发送前向消息中嵌入充分的冗余，便可在远端重建原始内容。

概念 II 提出了同一类主张。特定的信息，Rodriguez 写道，“以某种方式、形态或形式衍生自所有其他信息。” Shannon 的数学理论为这一主张提供了形式上的对应，但必须指明一项限制：信息在处理过程中绝不会增加 [至多得以保留，且通常会有所损失]，因此只有当转换过程保留了源头的信息内容时，该信息才可从其衍生品中恢复，正如以充分冗余编码的消息能够将其保留一样。传话游戏会使消息退化。Shannon 证明，只要事先存在冗余且掌握关于信道噪声特征的充分知识，退化后的消息依然可以承载重建原始消息所需的内容。概念 II 指出，只要衍生链条保留了其所承载的内容，这种恢复在理论上就是可能的，因为所有信息都通过可追溯的链条衍生自其他信息。

Watts (2003) 的研究增添了一个实践维度。他对 Milgram 信件实验的分析表明，人们仅凭局部信息 [其个人联系人以及关于目标位置的大致判断] 即可在全球社交网络中导航。他们并不需要整个网络的完整地图。他们只需要在每一步中都能获得的局部元信息，这便足以随着每一个链接的建立而更接近目标。概念 II 所称的信息“通过个体周围现有元信息的衍生品而可在个体自身之内获取”，正是对这一过程的描述：尽管 Milgram 实验中的大多数链条在送达前便已中断，局部知识依然能够引导搜寻走向全局发现，因为仅使用每个节点上可用的信息便可沿着衍生链条一路追踪。

Luciano Floridi 在 《信息哲学》（*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Floridi, 2011) 中将这一主张提升至其完整的哲学高度。Floridi 倡导“信息结构实在论”，即认为现实在本源上具有信息性特征、世界的终极本质由信息结构而非物质实体构成的论点。如果 Floridi 是正确的，那么概念 II 就不仅是一项认识论主张 [关乎我们能知道什么]，更是一项本体论主张 [关乎什么存在]。Rodriguez 指出所有信息都是可获取的。Floridi 指出现实本身就是信息。这两种立场结合在一起，所陈述的只是一个条件命题，仅此而已：如果现实在其核心上是信息性的，并且所有信息都可以通过其衍生品获取，那么，现实在原则上就可以通过概念 II 所描述的追溯而被认识。这两个前提在此均未得到证明。

这一论断立刻会引发一个反驳：如果熵不断增加[即热力学第二定律]，那么信息应当随时间流逝而退化，从而使旧信息越来越无法恢复。这一反驳在实践中成立：熵在操作层面上限制了概念II作为一项工

作论断的适用性，因为过去的诸多痕迹已然失落，没有任何制度能够将其还原。但它仍在原则上保留了该概念的成立空间，而这正是其自身推理所采取的形式[即特定的信息“因此在理论上可以追溯”]。Ilya Prigogine 在《从混沌到有序》（*Order Out of Chaos*）(Prigogine & Stengers, 1984) 中回应了这一反驳中更为狭义的部分。Prigogine 证明，远离热力学平衡的系统[他称之为“耗散结构”]可以通过持续的能量流动产生并维持新的秩序；这表明熵并不禁止新秩序的产生，但并未证明关于过去的信息能够被恢复。生物有机体就是一种耗散结构：它维持自身信息复杂性的方式不是违抗熵增，而是通过消耗能量来抵消衰变。社会同样是一种耗散结构：它通过投资教育、档案保存、透明制度以及通信基础设施来维持其知识基础。

从 Prigogine 的视角来解读，Jasutopianism 的制度设计正是一种旨在最大限度提高信息可获取性的社会耗散结构。普及教育[第XXII、XLIX、L条]赋予每位公民追溯元信息链条的认知工具。免费基本资源[第I条]为每一位做出贡献的公民保障了学习与思考的物质前提[这是一项附条件的保障，第LXXI条将其延伸至登记在册的残障公民]。第LXXXV至LXXXVIII条所确立的国民身份记录系统[在论点VIII中有所阐释]以及对新闻可核查来源的要求[第V条]，使得任何交易或信息事件都能够追溯至其源头。第CII条[即禁止在整部法律通过后删除或修改第I至CII条中的任何一条]将信息透明的结构性条件锁定为永久状态。上述每一项条款都发挥着与 Prigogine 耗散结构中能量流动相同的作用：维持系统的信息复杂性，以抵御熵将其退化的趋势。

概念II颇具胆识。所有已知信息皆可获取。科学文献提供的是同构结构类比而非演绎证明，精确标示出概念II在实践中受限于技术、认知带宽与物理熵，同时在原则上保持开放之处：Shannon 提供了信息论类比，其中信号唯有在变换保留冗余度且信息在处理过程中永不凭空增加时才可恢复；Watts 提供了网络类比，其中局部线索引导着跨越庞大图谱的搜寻；Floridi 提供了信息本体论类比；而 Prigogine 则提供了耗散结构的热力学类比，耗散结构在不逆转已抹除历史的前提下维系局部秩序以抵御衰变。Jasutopianism 则提供了制度载体。其透明的公共记录作为一种公民耗散结构，使概念II在实践中保持可运行状态。

III. 概念III：通过理解实现人文化

Jasutopianism 陈述道：

> “运用这两个概念，任何个人、群体、社会、领土、州邦、民族或国家都可以追溯全部信息，从而从不同视角理解以往的所有决策，并在一切既定事物中寻得最高的启迪与最精准的意义。由此，一个人能够理解另一位起初令其费解的个体‘为何’作出某项决定，并理解为何不同人群基于各自所掌握信息的有无，会对同一决定作出不同的解读……其结果是，这会促使任何特定的个人将社会中原本可能遭到排斥的每一位成员都予以人文化，因为这是实现最大程度社会问责的唯一途径，而社会问责对于理解并规训一个实体或国家使其成为最文明、最开明的形态而言必不可少。同时，这也是预防一切战争的最为重要的单一概念……” (Rodriguez, 2021, TER, Concept III)

接下来是 TER 最具深远影响的论断，它理应连同其唯一局限一并被坦率地陈述出来。战争、偏见与非人化不仅仅是道德上的失败。在其诸多成因之中，它们亦属于认知上的失败。当某一特定群体对造就另一群体决策与行为的元信息缺乏充分理解时，便会以恐惧、投射以及非人化的心理机制来填补这一空白，这些现象随之发生。依照 TER 的观点，解决之道不在于道德劝诫[告诉人们应当心怀善意]，而在于认知补全[赋予人们信息工具，使其得以追溯塑造他者之所以成为其所是的决策链条]。理解之所以能消解敌意，并非因为理解者在道德上变得更高尚，而是因为大量敌意所赖以滋生的无知已让位于理解。

用控制论的术语来说，概念III所描述的过程是一个反馈循环。Norbert Wiener 在《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Wiener, 1948) 中指出，反馈循环[即系统的输出作为输入回传，从而修正后续行为]是跨越生物、机械与社会系统的普遍自我调节机制。恒温器便是最简单的例子：它测量温度[信息]，将其与目标值比较[理解]，然后调节供暖系统[行动]，进而改变温度[新信息]，随后再次进行测量。这一循环是连续不断的。系统之所以能够自我纠正，正是因为每一次输出都会成为下一周期的输入。

TER 的概念III描述了一种基于相同原理构建的社会反馈循环，但存在一处差异。特定的个人追溯元信息[信息]，并由此理解他人为何作出起初看似不可理喻的决定[理解]。这种理解催生人文化[他者如今被视为拥有理性动机的完整之人，而非异类或敌人]。人文化催生问责[一个已将所有成员人文化的社会，能够使他们遵循共同标准，同时不在这一过程中将其非人化]。问责催生透明[因为问责要求信息始终保持可获取状态]。透明则产生更多信息，这些信息被更多个人所追溯，从而产生更多理解，循环由此往复。这是一个控制论反馈循环，但属于与恒温器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类型。恒温器运行的是纠正循环，旨在抵消任何偏离目标的状态；概念III描述的则是一个增强循环[即 Meadows (2008) 意义上的正反馈]，其中每一轮回都为下一轮增添动力，因而每一次迭代都会使更高的透明度带来更深切的理解。增强循环会沿其所处的任何运动方向加以放大；倘若追溯链条被切断，这一原本能够累积理解的相同结构同样会累积无知[这正是本章在第IV节中于其旁设立一个纠正循环的原因]。该循环与第1章所引入的同理心与制度反馈循环具有相同的形态；其中，群体之间的同理心提供了保护文化交流的意愿，而受到保护的交流则会产生更多的同理心。

Terrence Deacon 在《不完整的自然：心智如何从物质中涌现》（*Incomplete Nature: How Mind Emerged from Matter*）(Deacon, 2012) 中架起了信息与意义之间的哲学桥梁。Deacon 引入了“缺席性”（absential）特征的概念，即由“不在场之物”而非“在场之物”所界定的属性。目的由尚未实现之物来界定；意义由其所指涉之物来界定，而非由其自身的实体来界定。Rodriguez 在概念III中所描述的过程[追溯全部信息以理解他人的决策]，正是从信息痕迹中重构意向性，即从数据遗留的印记中复原缺席的目的。Deacon 的研究与将此解读为一种具有科学依据的认知过程相一致。理解他人的决策需要追溯曾使该决策在对方看来合乎理性的信息语境，这正是从当下在场的信息痕迹中重构其缺席视角的过程。

人文化从不孤立存在于单一尺度之上。该过程原生推导自 Jasutopianism 的第一性原理，并与同行评审心理学直接并置对照，在三个分辨率层面展开并汇聚于同一结果[即他人以完全的人格主体立于面前，且针对其的侵犯在心理层面变得代价高昂的临界点]。Cilliers (1998) 指出了复杂系统的更普遍规律：意义在相互作用的尺度间涌现，

没有任何单一视角能涵盖整体。本卷将这一三层级综合体命名为多分辨率人文化。

该结构由三个经过同行评审的分析层级构成。第一层是认识论与心智优先分辨率：TER 概念I至III构建了元信息追踪与审慎换位思考的模型，其中特定公民沿着他国人民行为背后的信息链条加以追踪，直至曾经陌生的动机变得清晰可读。第二层是认知与整合分辨率：社会认知神经科学记录了群际同理心鸿沟，表明人们如何钝化对被视为外群体者的神经同理心反应，而在换位思考与共同社会归类消融群体边界时又如何逆转这种钝化 (Cikara, Bruneau, & Saxe, 2011)。第三层是情感与具身分辨率：发展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确立了情感认知同理心路径，其中持续的审美、叙事与文化接触会引发情感共鸣、同理心关切以及对他人苦难的内化道德痛苦 (Decety, 2012; Batson, 2011; Hoffman, 2000)。三者互不排斥。它们在嵌套的尺度上审视同一现象，犹如水文学、流体力学与化学共同审视同一条河流。一条河流贯穿三者之中。各层级的术语虽有所转换，但三者皆消融了隔绝自我与他者的壁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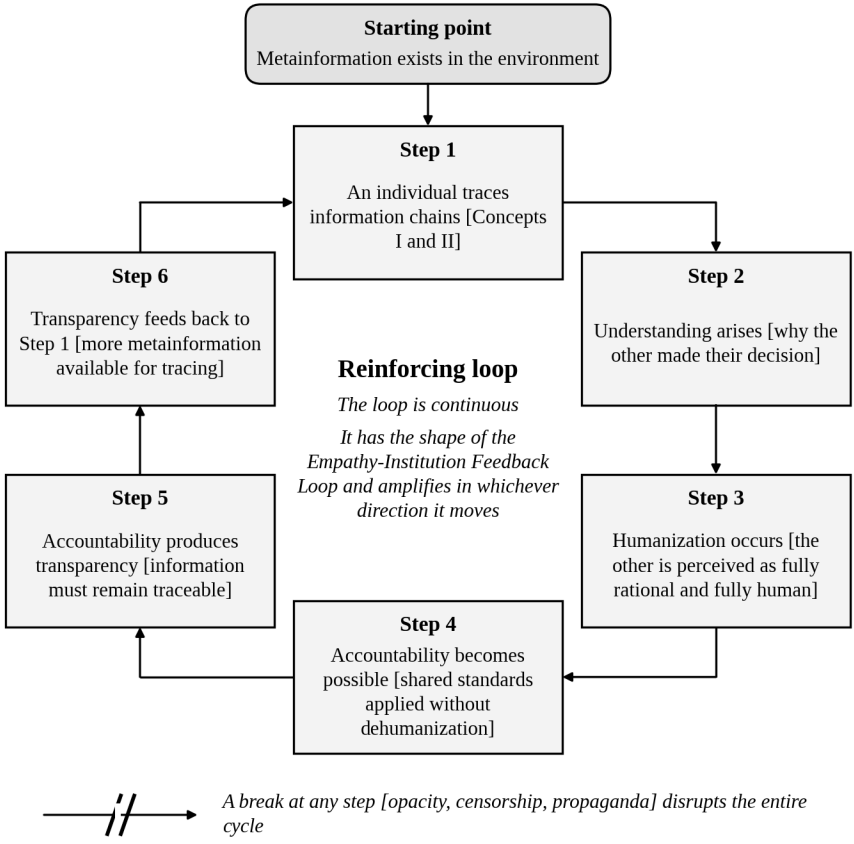


图 **2.3.** 信息级联：从元信息到人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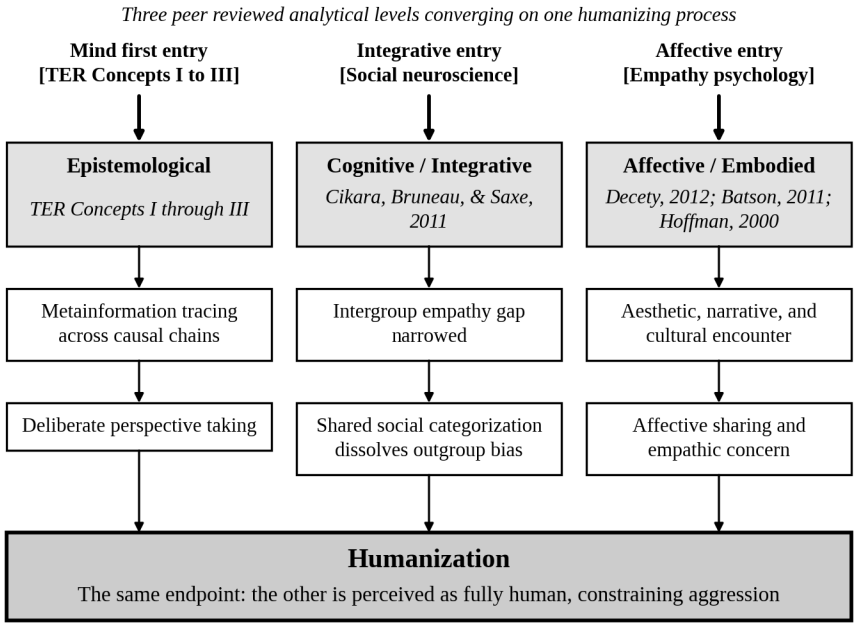


图 **2.4.** 多分辨率人文化：三个经过同行评审的分析层级

一项原生推论由此得出。当音乐、电影、文学与日常公民艺术激活情感认知同理心路径并收窄群际同理心鸿沟 (Decety, 2012; Batson, 2011; Cikara et al., 2011)，而 TER 概念III与概念IV通过开放的元信息追踪不断迈向“人均最高真理” (Rodriguez, 2021, TER, 概念IV) 时，公众舆论便会通过同侪线索自下而上地发生转变，从而制约外交政策精英 (Kertzer & Zeitzoff, 2017)。这一步是推论，而不是证明。当民众对假想敌的非人化认知图景已经消融[无论是情感文化认同还是信息追踪使其消融]，民众便不再为有组织的大规模暴力提供所需的认知扭曲。本卷将这一论断命名为认识论和平论题。

其含义可直截了当地加以阐明。跨境文化人文化为战争竖起了一道切实的政治约束。这是因为有组织的暴力依赖于剥夺目标人群可辨识的人性，而当公众将另一国家的人民视为拥有可追溯历史且完整的道德行动者时，便会抵制敦促对其实行升级行动的政治领导人[这种抵制十分有力，但并非万无一失：政治投机者仍可能通过重新激活历史怨恨或将凸显的身份叙事武器化来侵蚀情感认同]。在一个经过研究的案例

中，国家尺度上的证据指向同一方向：1994年，凡是一家广播电台的节目所及的卢旺达村庄，参与杀戮的村民便更多(Yanagizawa Drott, 2014)，这正是一个其信息来源不对任何人负责的公共领域所付出的代价，也是第V条将新闻与一个具名且可追溯的来源绑定在一起的原因。

Jasutopianism 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核心主张：“这也是防止一切战争的唯一最重要的概念” (Rodriguez, 2021, TER, 概念III)。本卷保留Jasutopianism所写下的这一主张的原貌，它是一项关于预防的主张，而不是一项认为每一场战争都只有一个原因的主张。战争的爆发至少有三种原因，战争研究将其彼此区分：各方误判对方或隐瞒自己所知，任何一方都无法约束自己遵守协议，或者争夺的对象无法分割(Fearon, 1995)。TER回应的是第一种原因，以及使公众得以接受杀戮的非人化。它本身并不能回应第二种与第三种原因，在这些情形中，两国人民可以充分相互理解，却仍为领土、为一个政府的存续或为一种双方都无法放下的恐惧而交战。这些原因由该设计的其他部分来应对：没有三总统的3/3表决与立法权的表决，任何武装力量都不得调动[《治理三权条款》第IV条第X款与第XI款]；永久性的文本使一个国家能够约束自身；第8章与第11章则把无法分割之物置于共同管理之下。第8章将这一切与该论题结合为全球和平三大支柱。该论题也可以被证明是错误的。如果第11章的两项指数[文化消费指数与情感均势指数]在两个国家之间连续十年保持在其关口1的下限之上，而这两个国家之间随后爆发武装冲突，那么，认识论和平论题就该对国家而言即被驳倒，这一条件在事件发生之前即已写在此处。



IV. 概念IV：社会问责

Jasutopianism 陈述道：

> “这种问责对于建设性的社会进步至关重要。社会问责使一国人民得以理解现存的全部元信息，而不惧怕真相。当一个国家拥有最高的人均真相时，他们便会默认拥有最高的权力，并因此享有最纯粹形式的自由以及诸多其他有益功能。” (Rodriguez, 2021, TER, Concept IV)

概念IV完成了这一链条。普遍相关性[概念I]意味着所有信息皆相互关联。可获取性[概念II]意味着这些相互关联的信息可以被追溯。通过理解实现人文化[概念III]意味着追溯信息能够消融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壁垒。社会问责[概念IV]则是其政治后果：一个理解现存全部元信息且“不惧怕真相”的群体，拥有最高的人均真相，而最高的人均真相本身即是最高形式的权力，而最高形式的权力本身又是最纯粹形式的自由。

这一链条为：相关性 → 可获取性 → 理解 → 人文化 → 问责 → 真相 → 权力 → 自由。

这一链条并非循环往复，而是螺旋上升的。每一步都建立在前一步之上，缺之则无以存续。没有理解的问责只是惩罚。没有问责的真相只是无力的知识。没有真相的权力只是暴政。没有权力的自由只是空愿。TER 的论断在于，通往真正自由[并非随心所欲的自由，而是源于生活在一个通过理解而非强制来实行自治的社会中的自由]的唯一道路，需要这一整条链条，而其起点便是承认所有信息都是相互关联且可获取的。

Wiener (1948) 的控制论解释了建立在这条链条之上的社会如何保持自身不偏离正轨。纠正性反馈是任何系统实现自我纠正的机制：恒温器纠正温度漂移；市场纠正价格扭曲；民主制度通过选举纠正政策失误。上述每一项纠正都依赖于信息从系统输出端回流至输入端。当信息流动受阻时 [恒温器损坏、市场被操纵、选举存在舞弊]，系统便会丧失自我纠正能力并发生退化。

概念 IV 是这一原则在治理中的应用。社会问责意味着信息在整个社会中自由流动，从个人流向制度并回流，从而产生持续的纠正。“人均最高真理”并非一种神秘状态；它是一种社会状况，即实现自我纠正所需的信息普遍可得，且公民拥有准确处理该信息所需的教育与物质保障。

概念IV还揭示了 Jasutopian 治理体系内部一座不可或缺的分析桥梁。实行公民直接监督的宪政秩序，要求公民以审慎的道德态度在公民议院中投票，在三大立国原则遭到违反时提起弹劾请愿[依据治理三权第 IX 条]，并监督司法权的一致性裁决[即司法权就特定的法律或行政行为是否符合三大立国原则、社会组织条款、治理三权条款以及法律条款第 I 条与第 IV 条所作出的裁决；任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行为均属无效]；其中，每一项公民职责都依赖于对他人命运的关切。这种关切正是同理心。缺乏同理心，形式化的问责机制便会沦为空转。Batson (2011) 在数十年的受控实验中证明，同理心关切能够产生真正利他的动机；Hoffman (2000) 则追踪了面对他人苦难时的同理心痛苦如何成熟为内化的道德准则。通过这一心理学机制延展 Jasutopianism 自身的第一性原理，便构成了问责与同理心之桥。

该桥梁纠正了人们对同理心与问责之间关系的常见误解。经纠正的表述为：是同理心促成问责，而非相反。同理心提供了识别过错所必

需的外部视角，使人能够从受影响者的角度审视处境，并激发推动立法纠正的政治意愿。一个缺乏同理心的社会可以通过强制手段迫使人们服从，但无法产生真正的问责，因为问责要求理解某一特定行为为何是错误的，而这又要求具备从受害者视角审视该行为的能力。概念 III 产生同理心 [通过理解]。概念 IV 将这种同理心转化为制度性力量 [通过问责]。该桥梁将 TER 的认识论论证与 Jasutopian 治理的政治结构连接起来。置于该结构之中，该桥梁成为系统的第二重循环，即由指标与问责构成的纠正循环：Jasutopianism 的各项指标连同本书增设的工具共同报告社会的运行状况；同理心使公民能够站在受害者一边看清每一次失灵；而问责则采取行动，使社会重回正轨。概念 III 的循环是自我强化的，而这一循环在 Wiener 的意义上则是自我纠正与自我稳定的：它将社会稳固在既定准绳之上，并不承诺永无止境的攀升。

概念 IV 的当代意义在一种 Jasutopianism 当初未能全面探讨的威胁中清晰可见。Frank Pasquale 在《黑箱社会》(Pasquale, 2015) 中论证道，支配搜索结果、信用评分、内容推荐与声誉评估的算法系统宛如“黑箱”般运作，其输入、逻辑与输出对受其影响的公民而言均不透明。用 TER 的术语来说，Pasquale 的批判恰恰描述了概念 IV 失效时会发生的情形。倘若问责需要理解，而算法却不透明，那么算法治理便是没有问责的治理，也就是没有真理的治理，进而成为没有自由的治理。TER 所描述的信息链条 [关联性 → 可获取性 → 理解 → 人性化 → 问责 → 真理 → 权力 → 自由] 在可获取性这一环上被切断：信息客观存在，却无法为需要它的公民所获取。

本卷第5章将专门探讨这一问题。数字文化互动条款 [第 CX 条至第 CXVI 条] 是旨在修复被不透明算法切断的链条之宪制性规定。在最深层次上，它们正是概念 IV 的制度化落实：即在法律上要求影响公民生活的信息系统必须保持透明、可追溯并接受民主监督。

Jasutopianism 中既已写就的法律条款在多项规定中体现了概念 IV：

第 V 条要求所有新闻媒体提供“可独立核实且非匿名的新闻信息来源”，使“每位公民都能审阅新闻简报并将其追溯至明确的原始出处”(Rodriguez, 2021, Art. V)。这就是信息可追溯性，即概念 IV 在新闻业中的应用。

第 LXXXV 条至第 LXXXVIII 条所确立的国民身份记录系统 [详见论证 VIII] 对所有交易进行电子记录，从而使国家的经济生活具备可追溯性，其方式正如概念 II 对一般信息所作的阐释。

第CII条禁止在通过后删除或修改第I条至第CII条，第CXXIII条与第CXXXV条则将该文本锁定延伸至本卷所提议的宪法增补条款[第CIII条至第CXXIV条以及第CXXV条至第CXXXV条]。该条文保护问责架构本身的持久性，并与第7章中严格限定的宪法替代议定书相配套，从而使任何政治派别都无法为谋取私利而拆解透明度规则。

经拓展后的概念 IV 揭示出，自由并非不受约束。自由是一个群体在追溯了所有信息、理解了所有视角、使所有成员得以人性化并建立起使这一过程永久运转的制度之后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这是政治哲学中最为严苛的自由定义，也是 Jasutopianism 旨在促成的自由。

V. 作为哲学基底的 TER

永恒相对论并非置于论证与条款之间供有兴趣的读者闲暇时品读的哲学旁白。它是整个 Jasutopian 体系得以生长出来的认识论基底。Jasutopianism 的每一项规定都是 TER 四个概念中一个或多个概念的制度化落实，无论原著文本中是否明确指出了这一联系。

请审视以下关联：

普及教育 [第 XXII、XLIX、L 条]，据此，所有三岁至十八岁的公民均接受标准化教育，且所有公民终生均享有继续学习的渠道。倘若理解产生人性化 [概念 III]，而人性化防止战争，那么教育便不仅仅是一项社会服务；它是和平的基础设施。每一位接受过信息素养、批判性分析与换位思考教育的公民，都更有能力追溯元信息链条，并达成 TER 所描述的理解。

免费基本资源 [第 I 条]，据此，所有做出贡献的公民均将食物、饮用水、教育、衣物、医疗保健、标准住房以及水电等公用事业作为一项基本权利予以获得。倘若追溯信息的能力需要认知资源 [时间、健康、住所、营养]，那么一个向其部分人口剥夺这些资源的社会，便是在结构上阻断该部分人口达成概念 III 所描述之理解的社会。第 I 条的保障是有条件的 [它涵盖做出贡献的公民，而第 LXXI 条将其延伸至有

登记证明的残障公民]，依本论证自身的尺度而言，被排除在该条件之外的公民，同样也被排除在理解的前提条件之外。贫困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状况；用 TER 的术语来说，它是一种认知状况，即信息追溯的前提条件悉数缺席的状态。

透明治理，其中国民身份记录系统追踪交易，第 V 条要求可核实的新闻来源，而公民议院则为立法决策提供直接的民主参与渠道。倘若问责需要信息 [概念 IV]，那么治理中的不透明便不仅仅是一种行政缺陷；它是对自由之条件的攻击。TER 为 Jasutopianism 为何坚持达到大多数治理体系认为不切实际之程度的透明度提供了哲学论证。

永久宪法[第CII条锁定第I条至第CII条，第CXXIII条与第CXXXV条将该锁定延伸至本卷的增补内容]，其中，任何法律条款在通过后均不得被删除或重写。既然制度结构为人文化、问责与自由创造了条件，那么拆解透明度保障就会削弱自治的认知基础。持久性并非盲目僵化；与第7章严格的运作性替代条件相配套，它保护信息反馈免遭党派俘获。

两条渠道协同运作。审美与文化作品[音乐、电影、文学、共享公共工艺]在审慎政治推理启动之前便通过情感渠道吸引公民参与，而元信息追踪与透明治理机构则通过审慎的认知探究吸引公民参与。Decety (2012) 清晰地记录了这两种机制：人类同理心将情感共享[与他人所感受的状态产生共鸣]与认知换位思考结合在一起，二者植根于部分不同的神经与心理路径之中，并在完整的同理心反应中相互强化。

二者的汇合解释了 TER 的双重作用。制度设计自上而下运作，从宪法原则经由透明的公共记录走向社会问责。跨境文化人文化自下而上运作，从切身的审美体验经由情感文化认同走向抑制敌意的公民约束。二者合力所及，远超各自单独所能达到的范围。部分公民首先通过分析验证进入，另一些公民首先通过文化接触进入，还有许多人则同时经由这两种途径进入。

本书从上文第 I 节提及的 Mitchell (2009) 关于复杂系统的论述中所汲取的四项特征，提供了最后一项结构映射，本书将其作为自身的一种解读予以提出。自组织 [概念 I：各系统在无中央协调的情况下彼此关联]。涌现 [概念 III：理解从信息追溯中涌现出来，作为一种无法仅

从任何单一信息片断中预测的高阶属性]。通过反馈实现适应 [概念 IV：问责是纠正系统的社会反馈机制]。以信息处理为基底 [概念 II：信息的可获取性使整个过程成为可能]。在此解读下，TER 与复杂性科学相一致：其四个概念与上述四项特征一一对应，这表明 TER 正在将人类社会的行为描述为复杂适应系统，受制于支配从蚁群、生态系统到互联网等所有此类系统的同一信息动力学规律。

Donella Meadows 在《系统之美》(Meadows, 2008) 中写道，复杂系统中最有效的杠杆点并非物质流 [更多资金、更多资源、更多强制]，而是信息流：系统的目标、支配反馈的规则以及自组织的能力。TER 正是一套关于这些杠杆点的理论。它确认信息 [而非金钱、武力或意识形态] 是社会藉以实现自组织的基础媒介，并确认理解 [对元信息的准确追溯] 是自组织藉以产生人性化而非去人性化、自由而非暴政、和平而非战争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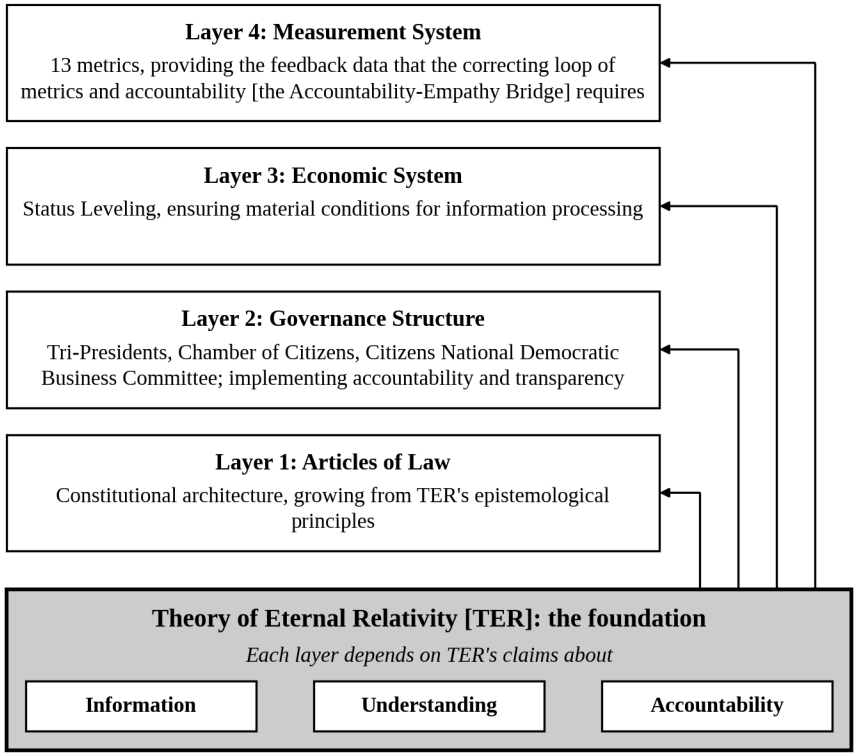


图 **2.5.** 作为哲学基底的 TER

VI. 从哲学走向证据

四个简短的段落已构成一个各部分可以彼此区分的论证。本章中有三种支撑，它们的强度并不相等。有一步是推导得出的：信息在处理过程中绝不会增加[即信息论中的数据处理不等式(Cover & Thomas, 2006)]，因此一项决定只能追溯到每一环节保存其记录的程度，一个意在使其决定可追溯的国家，必须在源头进行记录并保存其所记录之物；第V条、记录系统与第CII条正是写成法律的这一要求。与系统论、网络科学、热力学和信息哲学的联系属于平行对照，它们表明TER所描述的结构也为其他领域所发现，却并不证明其任何一项主张。关于人的主张[追溯带来理解，理解带来人文化，经过人文化的公众会约束其领导人]是在个人与群体尺度上有证据支持的假说，本卷依据第7章与第11章的读数，在国家尺度上对其加以检验。这四个概念中没有一个脱离于正式的学术研究。概念I将同构结构平行性映射至一般系统论、网络科学和生命系统；概念II将形式平行性映射至香农的信息论、弗洛里迪的信息哲学以及普里戈金的耗散结构，同时指明了物理熵所施加的实际限制；概念III将维纳的控制论和迪肯的涌现理论与跨越同行评议同理心心理学(Cikara et al., 2011; Decety, 2012; Batson, 2011; Hoffman, 2000) 的多分辨率人文化相结合；概念IV则将透明度理论直接与民主问责相联系，为第5章的数字平台代码奠定基础。

如今根基已然明晰。信息追踪通向理解、人文化、问责与自由，并由横跨 Shannon、Bertalanffy、Wiener、Barabási、Watts、Floridi、Mitchell、Capra 与 Luisi、Prigogine、Deacon 以及 Meadows (2008) 的明确同构平行性以及同行评议的同理心研究所支撑，而非未经证实的生化主张。

然而，哲学之所论证，终须实践予以印证。下一章将从哲学转向实证。倘若 Jasutopianism 愿景中的诸要素确有价值，那么历史上理应存在成功实施合作治理、非货币交换、直接民主发声或按需资源分配的社会范例，即便这些范例只是局部性的。第3章将提供七个此类实例。读者将会发现，这些证据既令人鼓舞，又坦诚直率。

兹此，哲学根基已然确立。且待证据接踵而至。

参考文献（第2章）

Barabási, A.-L. (2003). *Linked: How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to everything else and what it means for business, science, and everyday life*. Plume.

Batson, C. D. (2011). *Altruism in huma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rtalanffy, L. von. (1968). *General system theory: Foundations, development, applications*. George Braziller.

Capra, F., & Luisi, P. L. (2014). *The systems view of life: A unifying vis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ikara, M., Bruneau, E. G., & Saxe, R. R. (2011). Us and them: Intergroup failures of empathy.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3), 149-153.

Cilliers, P. (1998). *Complexity and postmodernism: Understanding complex systems*. Routledge.

Cover, T. M., & Thomas, J. A. (2006). *Elements of information theory* (2nd ed.). Wiley.

Deacon, T. W. (2012). *Incomplete nature: How mind emerged from matter*. W. W. Norton.

Decety, J. (Ed.). (2012). *Empathy: From bench to bedside*. MIT Press.

Fearon, J. D. (1995).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9*(3), 379-414.

Floridi, L. (2011).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ffman, M. L. (2000). *Empathy and moral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for caring and jus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ertzer, J. D., & Zeitzoff, T. (2017). A bottom-up theory of public opinion about foreign polic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1*(3), 543-558.

Meadows, D. H. (2008). *Thinking in systems: A primer* (D. Wright, Ed.).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Mitchell, M. (2009). *Complexity: A guided to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squale, F. (2015). *The black box society: The secret algorithms that control money and inform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rigogine, I., & Stengers, I. (1984). *Order out of chaos: Man's new dialogue with nature*. Bantam Books.

Rodriguez, J. (2021). *Jasutopianism*. [Self-published].

Shannon, C. E. (1948).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 *27*(3), 379-423.

Susskind, L., & Hrabovsky, G. (2013). *The theoretical minimum: What you need to know to start doing physics*. Basic Books.

Travers, J., & Milgram, S. (1969).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small world problem. *Sociometry*, *32*(4), 425-443.

Watts, D. J. (2003). *Six degrees: The science of a connected age*. W. W. Norton.

Wiener, N. (1948). *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 Technology Press; John Wiley & Sons.

Yanagizawa Drott, D. (2014). Propaganda and conflict: Evidence from the Rwandan genocid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4), 1947-1994.

第3章：证据：合作治理的案例研究



I. 从哲学到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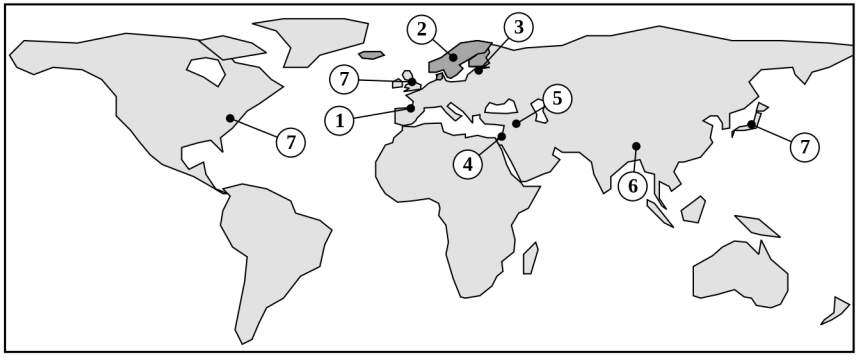
第2章奠定了哲学基础。永恒相对论从四个简短段落扩展为一种成熟的认识论立场，为Jasutopianism的制度为何如此构建提供了论证：因为经过恰当追溯的信息能够产生理解；理解产生人文化；人文化产生问责；问责产生自由。这一论证在逻辑上内在自洽，并与信息论、系统论、复杂性科学以及控制论中既有的学术传统保持一致。

然而，内在自洽并非证据。一个逻辑完备但缺乏经验支撑的哲学体系只是思想实验，而非治理方案。Jasutopianism将自身呈现为一套完整的宪政架构[二十项论点、一百余条法律条款、一套全新的经济制度、一套衡量体系以及一份过渡方案]。Jasutopianism此前未能提供、而本章开始着手补充的，正是经验记录。这一愿景中的各项要素是否曾被付诸实践？在那些付诸实践的地方，哪些行之有效？哪些遭遇了失败？这些失败又揭示出Jasutopianism必须满足哪些设计要求？

本文采用的方法论属于Erik Olin Wright (2010) 所称的“真实乌托邦”传统下的比较案例分析：即对既有制度安排的替代性制度方案从三

个标准加以评估：可欲性（它们是否体现了值得追求的价值？）、可行性（它们能否按设计方式运作？）以及可实现性（在现有条件下它们能否得以实施？）。下文各节不会逐一按照这三项标准为每个案例评分，而是将每个案例映射到其所涉及的Jasutopian原则上，并阐明其证明了什么、又未能证明什么。这些案例研究选自三大洲，时间跨度近六十年，从1956年的巴斯克地区一直延伸至2012年的叙利亚东北部。它们涵盖了合作所有制、非货币交换、直接民主表达、替代性价值衡量、数字透明度以及危机下的制度韧性。

在继续之前，有必要作出关键澄清。本书呈现的任何案例研究都不是Jasutopianism本身。蒙德拉贡合作社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内运作的。基布兹试验了激进平等，却从未提出过宪政架构。北欧国家维持着带有私人资本市场的货币经济。不丹衡量幸福感，但并未废除货币交换。时间银行社区在邻里尺度上运作。爱沙尼亚实现了治理数字化，却未重构其经济体系。罗贾瓦在战时条件下建立了直接民主，并于2026年在尚无法进行任何长期评估之前便被并入叙利亚国家体系。每个案例展示的都是Jasutopian愿景中某一项要素的运作，而非整个制度体系。这一区分至关重要，本章将自始至终加以坚持。



Europe

① Mondragon [Basque Country, Spain]

② Nordic countries [Denmark, Finland, Iceland, Norway, Sweden; darkest tint]

③ Estonia

Asia

④ Israeli kibbutzim

⑤ Rojava [northeastern Syria]

⑥ Bhutan

Europe, North America and Asia

⑦ Time banking communities [United Kingdom, United States, Japan]

图 3.1. 案例研究地理分布

II. 蒙德拉贡：工业规模下的民主治理

1943年，天主教神父José María Arizmendiarrieta在西班牙巴斯克小镇蒙德拉贡创办了一所小型技术学校。1956年，第一家工人合作社从这所学校孕育而生，并由此发展成为如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人合作社联合体：拥有一百余家企业、数万名工人社员，业务涵盖制造业、零售业、金融业和教育领域。蒙德拉贡合作社体系是工业规模下民主工作场所治理受研究最深入的单一案例 (Whyte & Whyte, 1991)。

其治理结构为Jasutopian原则提供了一个平行参照，尽管这一参照十分有限。每家合作社均按“一人一票”原则运作。管理层由工人社员选举产生并可被罢免。真正构成平行参照之处颇为狭义：在由本企业工人所有的公司内部运行着经选举产生且可罢免的领导层，以及受规管的薪酬差异。Jasutopianism并未规定工人拥有或治理其所在企业；其最相近的机构是公民全国民主商业委员会，该委员会汇集所有持照企业主，每两年选举一次官员，并将商业事务提交参议院 (Rodriguez, 2021, Argument VI)。利润分配遵循特定公式，大部分盈余留存用于投资，其余部分则按贡献分配给社员；在1990年代，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之间的最高薪酬比约为六比一 (Whyte & Whyte, 1991; Reuten, 2023)；此后税前最高比率已升至约九比一，而各合作社的平均差距约为五比一 (Reuten, 2023)。这并非地位升级[蒙德拉贡采用货币薪酬]，但它是现实世界中最接近地位升级所设想之受规管不平等的平行例证。这一比率表明，企业在大幅压缩薪酬差距的情况下仍能正常运转，而不会丧失生产动力。

其教育基础设施同样具有高度相关性。Arizmendiarrieta最初创办的理工学校至今仍是该体系的核心：它培养合作社企业家，既传授技术技能，也教授民主治理。教育并非事后附加之物，而是合作社文化得以代代再生产的机制。这正呼应了Jasutopianism对普及教育的重视[第XXII、XLIX、L条]，将其视为民主公民身份的制度前提。一个未曾接受过自治教育的公民，不可能被指望去践行自治。

其金融架构颇具启示意义。蒙德拉贡的合作银行Caja Laboral提供了传统资本市场拒绝向工人所有企业提供的融资。Gregory Dow (2003)指出，工人合作社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之所以罕见，并非其低效的证据，而是某一特定制度障碍的体现：劳动不可让渡，无法像资本那样充当抵

押品。Caja Laboral通过创建一家以服务合作社体系而非最大化资本回报为宗旨的金融机构，解决了这一问题。在Jasutopianism下，其中，地位升级制度取代了创业的货币壁垒，使得在资本主义下导致合作社罕见的资本约束会呈现另一种形式：问题转变为由谁向新企业配置生产资源。Jasutopianism通过赋予公民创业资格的地位等级来回答这一问题，而获得该等级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民将获得“酌情调动国家资源的权利[在法律限制的合理范围内]” (Rodriguez, 2021, Argument VI)。即便没有货币，场所、机器与物料依然稀缺，因此执照是在法律限度内支取这些资源的权利，而非对它们的囤积；2021年的著作将由何机构在两位均想要同一场所的持照所有者之间作出裁决一事交由法律规定[第4章阐述了何为资源、设施与时间的配置]。蒙德拉贡展示了在资本主义语境中解决融资问题的结果；而Jasutopianism则提出从结构上予以解决。

学术诚实要求直面最强有力的批评。Sharryn Kasmir (1996) 在对蒙德拉贡的民族志研究中发现，合作社工人未必比传统企业的工人体验到更大程度的民主赋权。无论正式治理结构如何，合作社中的日常工作体验仍可能是等级化的、例行公事式的以及令人疏离的。巴斯克地区的合作社运动在政治上倾向保守，与天主教社会训导而非劳工激进主义保持一致，且在实践中反对工会。Kasmir认为，制度设计与实际体验之间的落差，才是核心发现。

Putnam (1993) 记录了公民文化与制度绩效之间相互强化关系的最接近实证对照。在其对意大利地方政府的研究中，社会资本[信任、互惠规范、公民参与网络]丰厚的社区建立了运作良好的制度，这些制度鼓励了进一步的参与，而这种参与又产生了更多的社会资本；其中，初始即处于低信任等级结构中的地区，无论其正式制度设计如何，都难以建立有效的政府。Putnam的良性循环在国内各地区内部运作，而第4章和第11章将结构上相关的循环[同理心与制度反馈循环]应用于跨境文化交流以及保护该交流的法律条款。两者缺一不可。

Kasmir的批判并未削弱Jasutopianism的理据，反而强化了它。Kasmir的发现契合Putnam的循环所展现、以及Rothstein在第IV节中所考察的国内模式，其中制度与文化相互维系：若缺乏使民主参与保持活跃的日常实践文化习惯，仅靠正式制度设计是不够的。蒙德拉贡的正式结构堪称典范。其文化再生产机制[理工学校、植根于Arizmendiarrieta哲

学的合作社精神]使这些结构得以运转，而正如Kasmir所记录的，一旦这些习惯弱化，即便正式规则仍留在条文中，鲜活的民主体验也会随之侵蚀。Jasutopianism的法律条款构成了这一国内方程的宪法半壁，而其普及教育与透明度规则旨在维系公民半壁。

与**Jasutopian**原则的映射：合作社治理 → 公民全国民主商业委员会（一项有限的平行对照：其为企业主组成的机构，而非工人治理本企业）。受规管的薪酬比率 → 地位升级。教育基础设施 → 普及教育[第XXII、XLIX、L条]。解决资本约束的合作银行 → 赋予公民创业资格的地位等级，其中生产资源系经配置而非借贷取得[论点VI；第4章]。

蒙德拉贡所证明的：民主的工作场所治理具有可扩展性。薪酬压缩不会摧毁生产动力。教育能够跨越代际维系合作社文化。

蒙德拉贡未能证明的：合作社治理能够在资本主义语境之外运作。正式结构与实际体验之间的落差能够仅凭制度设计而弥合。若无持续的文化投入，民主所有权即可转化为民主体验。工人对企业的所有权在Jasutopianism中存在对应物：公民全国民主商业委员会与之在本质上截然不同。

III. 以色列基布兹：平等、激励与人才流失难题

基布兹运动提供了非货币公社生活中或许受研究最为严谨的自然实验。1995年，共有268个基布兹，成员约120000人 (Abramitzky, 2008)。在其传统形态中，成员生活在近乎完全经济平等的安排之下：所有财产归公社共有，集体就餐，儿童在公社儿童屋中共同抚养，且每位成员无论贡献大小均获得相同的物质分配 (Abramitzky, 2008)。

Ran Abramitzky利用新近整理的188个基布兹[占以色列全部基布兹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数据，精准指出了平均分配制度面临的核心威胁。它不是懒惰，也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侵蚀，而是选择性退出：生产率最高的成员最有可能离开。当外部经济机会改善时，在市场经济中拥有最高挣钱潜力的个体，恰恰是那些因基布兹平均分配而承受最大牺牲的人。Abramitzky发现，基布兹的财富起到了一种“锁定装置”的作用；较富裕的基布兹之所以能留住成员，是因为其公社生活的

物质水准与外部选择相比具有竞争力。当外部工资的增长速度超过基布兹的生活水准时，高生产率成员便会率先离开 (Abramitzky, 2008)。

Abramitzky (2011) 将此形式化为三大威胁：人才流失[高能力成员退出]、逆向选择[低能力成员因保障生活水准高于其市场工资而加入]，以及偷懒[成员因报酬不受贡献影响而减少努力]。这三大威胁极其精准地对应着Jasutopianism经济体系必须解决的设计挑战。

在此，基布兹案例不仅具有例证意义，更具有预测意义。基布兹实行纯粹平等：每位成员所得相同。Jasutopianism则不然。地位升级制度被设计为非货币结构下的分级不平等；公民通过贡献获得晋升，而更高的地位赋予物质与社会层面上的差异化待遇。该制度旨在应对Abramitzky提出的所有三项威胁。人才流失拟通过对高能力贡献给予差异化认可来应对[富有生产力的公民获得更高的地位等级，而该等级附带切实的特权]，但这一答案仅在较高地位等级能够与境外货币经济体所提供的待遇保持竞争力的情况下才能成立。与货币不同，地位等级无法跨国携带，本书也并不声称知晓当他国支付更高报酬时何物能够留住高能力公民；这一风险依然敞开，第7章将通过人均产出对其进行衡量。逆向选择拟通过贡献要求来应对[第I条的保障是有条件的：其免费基本资源提供给做出贡献的公民、依法获准的做出贡献的非公民以及有文件证明的残障公民 (Rodriguez, 2021, Articles I and LXXI)，而不做贡献者则无法获得同等的物质标准]。偷懒拟通过同一机制来应对：地位等级的晋升是可观测、公开且与物质结果挂钩的。

因此，基布兹的经验并非非货币生活的失败，而是无差别非货币生活的失败。在意识形态认同高涨、外部选择有限的时期[建国一代、战时及建国初期]，该制度运转了数十年。当这些条件发生变化时，它便逐渐侵蚀。Jasutopianism的设计吸纳了基布兹的教训：非货币并不要求无差别。地位升级正是将Jasutopianism与基布兹模式区分开来的制度创新。各等级之间的跨度保持开放。Jasutopianism规定地位等级从1延伸至法律设定的某个数字[“地位等级将为1-(Z)”]，并由立法权对其进行校准 (Rodriguez, 2021, Argument XII)。本章的证据为这一选择划定了参照区间：平均分配在基布兹遭到侵蚀，而在1990年代的蒙德拉贡维持着约六比一的差距[如今约为九比一]。

与**Jasutopian**原则的映射：公社资源共享 → 第I条（免费基本资源，以贡献为条件）。平均分配 → 与地位升级（分级制）形成对比。人才流失难题 → 以地位等级差异化作为留才机制。

基布兹所证明的：非货币公社生活在特定条件下具有可持续性。当外部选择改善且激励结构不对贡献加以区分时，平均分配会如期遭到侵蚀。

基布兹未能证明的：所有非货币制度都面临相同的威胁。基布兹模式与Jasutopianism模式共享非货币原则，但在平等原则上存在分歧。基布兹数据检验的是其中一种设计，而非另一种。

III B. 应对高技能人才流失的国内反制机制

Abramitzky关于选择性退出的警告在地位升级制度下依然成立。金钱可以轻易跨境，而地位等级不能。Jasutopian国家内一位天赋异禀的外科医生、半导体架构师或系统工程师无法将所积累的地位等级汇入外国银行账户，而外国货币经济体则会积极竞价争夺稀缺人才。本书将人才保留视为制度工程而非公民期盼，因而增设了四项完全在Jasutopianism非货币法典内部运作的国内反制机制。

1. 主权生产资本配置**[**不可转让的运营支持**]**。 高地位等级可通过立法拨款[《治理三权条款》第II条；论点VI]，直接解锁对研究实验室、工业原型制造机械、临床设施及专职工程人员的行政支配权。货币经济体迫使技术创始人与研究人员耗费数年追逐风险投资基金、资助委员会和债务契约，仅仅为了拼凑设备。而在此制度下，凭实绩获得的地位直接将先进工具交到专家手中。运营自主权胜过现金囤积，其中，高能力公民会因私人外国薪资无法企及的主权生产覆盖能力而由此留任。

2. 稀缺性加权地位乘数**[Y**调整校准**]**。Jasutopianism确立了一套从1至Z的立法进阶标尺，并与论点I的双变量资源估值公式并行，将社会必要性[X]与相对丰裕度或稀缺性[Y]加以权衡(Rodriguez, 2021, 论点I, 论点XII)。将两者结合即可直接解决校准问题。立法权对在社会必要性[X]和紧迫技能稀缺性[Y]两项上得分较高的劳动类别适用稀缺性加权进阶乘数；其中，若外国货币薪酬在特定的专业学科领域大幅飙升，国内

地位等级的晋升速度便会自动上调，从而使高技能人才保留在不恢复本国货币的情况下紧跟外部竞价。

3. 固定期限国际轮换**[**分支业务平权**]**。 封闭的边界会加速人才外流。当被迫在国内孤立与国外机遇之间做出永久性抉择时，有抱负的专家往往会一去不返。借助论点II的分支业务伙伴关系，Jasutopian国家授权顶尖专家接受为期一至三年的固定期限海外派驻[在境外的合作实验室、教学医院或工业企业任职]，同时在国民身份记录系统内持续累积国内地位等级积分(Rodriguez, 2021, 论点II)。结构化轮换打破了二元陷阱。专家获得了全球经验，国内地位保持连续不断，而归国专家则将前沿方法带回国内。

4. 归属权益与重返留存账簿。 部分专业人才仍会离开。外流确实会发生。若离境便永久清零其所获的全部资历，离境就会永远锁定不可逆的人才流失；反之，若将每位移民公民所获得的地位等级作为已归属的留存余额记录在国民身份记录系统内[在五年内合法返国者保留其原地位等级的75%，此后随年数线性递减]，则能大幅降低重返摩擦，并将单向移民转化为循环性知识输入。话虽如此，没有任何机制能够保证零外流。因此，第7章直接对人均产出和前沿生产率进行审计，从而使任何留存缺口都在经核实的国家数据中公开显现。

IV. 北欧社会民主主义：普惠供给与信任机制

北欧国家[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是现存最接近Jasutopianism多项制度特征的大规模平行例证：基本资源的普惠供给、高度的社会信任、平等与创新并存，以及公民高度参与的民主治理。Gøsta Esping-Andersen (1990) 将北欧模式归类为“社会民主福利体制”，其特征是无论收入高低所有公民均可享有的普惠福利、高度去商品化[即公民无需依赖市场即可维持生计的程度]，以及国家在社会供给与劳动力市场监管两方面的强力干预。

对Jasutopianism而言，关键发现来自Bo Rothstein (2005)，他证明普惠福利制度能够生成社会信任，而不仅仅是反映社会信任。针对普惠供给的传统反对意见[认为提供免费资源会滋生依赖、消磨主动性并削弱社会凝聚力]在北欧案例中在经验上被完全逆转。Rothstein所揭示的机制十分精确：当政府机构被视为公正、胜任且廉洁时，公民彼此之间

便会形成普遍信任。制度产生了文化效应。这是因为二者的互动是互惠的：信任制度的公民更愿意为公共物品作贡献[纳税、公民义务、社区参与]，这维系了制度，进而又维系了信任。

这一机制为制度稳定性的国内面向提供了实证基础：公平、普遍的制度能够孕育公民信任与团结，而这种信任与团结反过来又会捍卫这些制度免受侵蚀。北欧的实践记录表明，这一互惠循环在成熟民族国家内部发挥作用，从而在第4章和第11章探讨文化机构如何跨国界运作之前，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实证基准。

本章并置的这两项发现指向相反的方向，而这一差异对于通过制度设计采纳Jasutopianism的国家至关重要。Putnam所研究的地区表明，在缺乏信任的地方，正式的制度设计无法产生有效运作的政府：文化先行。Rothstein的证据则表明，公民认为公平、称职且无腐败的制度能够产生信任：设计先行。本书将这两者解读为对不同条件的描述。在信任与公民传统薄弱的地方，正如Putnam所研究的地区，单靠设计会失败；而在制度被视为公平的地方，制度会建立起维系自身的信任，正如Rothstein所发现的那样。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 依托Rothstein的方向，并将其条件作为过渡期的一项要求加以接受：从第一年起，Jasutopian国家就必须向其公民展示显而易见的公平制度，正因如此，其数据由指标审计委员会[第6章]核查，而非由接受检验的政府自行核查。一个在低信任状态下起步的国家，是在Putnam的警示下起步的，第6章的蓝图必须应对这一挑战。

然而，历史叙述要求我们对过程保持诚实。Mary Hilson (2008) 记载，北欧模式并非温和共识的产物，而是长期政治斗争的结果：资本与劳工之间的“历史性妥协”、数十年的制度谈判，以及本可能走向不同方向的情境性选择。Christiansen、Petersen、Edling与Haave (2006) 更进一步指出，“北欧例外论”这一叙事本身就是一种建构，它粉饰了福利国家发展过程中特有的冲突、抗争与路径依赖选择。北欧模式并非必然如此。它是被建构出来的，而且在每一个阶段都曾经历过激烈争论。

这一点对于Jasutopianism的过渡计划至关重要。如果连最成功的福利国家都需要数十年的政治谈判与制度建设，那么Jasutopianism第1至第4年的过渡时间表就必须被理解为这一进程的开端，而非终结。第6章将把这一时间表扩展为十年的宪法过渡期，即各项制度得以创立的时

期，并援引北欧经验作为证据，说明制度的巩固将在此之后持续数十年，且需要长期坚持的投入。

与**Jasutopian**原则的对应关系：普遍供给 → 部分对应第I条[第I条的供给以贡献为前提]。高度信任 → 三大立国原则（自由、生活与繁荣）。创新与平等并存 → 地位升级（分化在非货币结构内保留了激励）。制度信任的生成 → 公平制度与公民信任之间的国内互惠关系。

北欧模式证明了什么：普遍保障产生的是信任，而非依赖。高度平等与高度创新可以兼容。制度设计能够塑造文化成果。

北欧模式未能证明什么：普遍保障可以在没有货币经济的情况下运作。北欧国家维持着以累进税作为再分配机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Jasutopianism提出了更具雄心的构想：由基于资源的经济而非税收来为非货币保障提供资金。北欧案例验证了保障原则，但并未验证为该保障提供资金的Jasutopian机制。此外，北欧项目是普遍性的，而第I条的保障则以做出贡献为条件，因此该发现仅能部分迁移至Jasutopianism。

V. 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衡量真正重要之事

不丹将追求国民幸福总值写入了2008年宪法，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原则，并在继续报告GDP的同时依据这一目标来衡量国家进步。国民幸福总值指数采用Alkire-Foster多维测量方法编制，涵盖九个领域：心理健康、身体健康、教育、时间利用、文化多样性与韧性、良治、社区活力、生态多样性与韧性以及生活水平 (Ura et al., 2012)。

与Jasutopianism在结构上的相似性是真实但局部的。这两种制度都拒绝将GDP作为衡量进步的唯一标准。两者都提出了多维衡量体系[不丹的九个领域，Jasutopianism的十三项指标]。共同之处在于多维度衡量，但在充足性处理上并不相同。在GNH指数中，当某个领域达到充足状态时即取得最大值，而非在数量最大化时取得最大值：受过充足教育的公民与受过过度教育的公民得分相同。Jasutopianism的指标并未设定此类充足性上限。它们是比率与评级，其中比率是“某项价值的增长或萎缩”，而序言要求实现高生产率、高创新率和高技术进步率 (Rodriguez, 2021, Preamble)。Jasutopianism的充足性要素体现在别处，即第I条所保障的基本资源之中，这设定的是底线而非上限。

不丹的案例证明，非货币价值衡量在国家尺度上具有可操作性。它并非一项纯粹的理论设想。GNH指数已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相关数据已收集完毕，政策决策亦参考了评估结果，且其方法论也经过了国际同行评审。用于GNH的Alkire-Foster方法可为如何严谨地将Jasutopianism的十三项指标[包括创新机会 [I.O.]、技术进步率 [T.A.R.]、城市贫困指数 [C.P.I.] 以及乌托邦进步机会评级 [U.A.O.R.]] 付诸实际操作提供借鉴。

诚实的局限在于：不丹的人口约为780000人。该国是一个具有特定文化条件[佛教价值观、有限的工业发展]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不能假定这些条件可以推广到规模更大、更加多元的国家。GNH指数还因将主观幸福感与客观指标混为一谈，以及为治理失灵提供政治掩护[政府可以宣称幸福感很高，而物质条件依然匮乏]而受到批评。这些批评是合理的，且必须成为Jasutopianism指标设计的依据：衡量工具必须能够抵御其所要评估的那些机构自身的操纵。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 通过第6章的指标审计委员会满足了这一要求：该机构依法设立且独立于治理三权，由抽签选出的公民与统计学家以及受邀的国外观察员共同组成，在每项指标公布前对其进行核查。由政府自己给自己打分，正是不丹的批评者所指出的风险，而设立该委员会正是为了确保Jasutopian政府永远不会这样做。

与**Jasutopian**原则的映射：GNH的九个领域 → 十三项指标。充足性阈值 → 第I条的基本资源底线[指标本身不设充足性上限]。抵御操纵 → 指标审计委员会[第6章]。国家尺度实施 → 可操作性证明。

不丹证明了什么：一个国家可以采纳、管理并运用一套多维度的GDP替代方案作为政策工具。

不丹未能证明什么：该方法能够扩展至规模庞大、多元且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主观幸福感衡量能够抵御政治操纵。



VI. 时间银行社区：小规模的基于贡献的价值体系

时间银行是一种服务交换实践，其原则是无论提供何种服务，一小时的服务始终等值于一个时间积分。水管工的一小时与育儿看护人员的一小时具有相同的价值。该制度的主要理论家Edgar Cahn (2004) 认为，时间银行通过珍视市场经济所忽视的贡献来消除社会排斥，这些贡献包括照护工作、指导帮扶、社区组织以及维系社会凝聚力的日常劳动。

Gill Seyfang (2004) 在对苏格兰格拉斯哥一家时间银行的实证研究中发现，该制度有效提升了社区能力，并促进了被正式经济排斥的人群[失业者、老年公民、残障人士以及非正式照护者]的社会融入。时间银行并未取代货币经济；它通过承认货币经济未能定价的贡献，对货币经济起到了补充作用。

它与地位升级在结构上具有相似性。两种制度都依据贡献而非市场价格来赋予价值。两者都拒绝在基础层面上某些劳动天生比其他劳动更有价值的前提。两者都旨在吸纳被传统经济边缘化的公民。关键区别在于规模与复杂程度。时间银行在社区尺度上运作[通常有数十至数百名成员]，采用均一的兑换率[一小时始终等于一个积分]。地位升级则在国家尺度上运作，并具有分级结构[公民通过做出贡献而晋升，更高等

级带来更高的物质与社会认可]。时间银行证明了该原则；地位升级则拓展了其架构。

与**Jasutopian**原则的映射：基于贡献的价值 → 地位升级。社会融入 → 第I条（为做出贡献的公民和有记录的残障公民免费提供基本资源[第LXXI条]）。社区能力建设 → 三大立国原则。

时间银行证明了什么：基于贡献的非货币交换在社区尺度上行之有效。被货币经济排斥的人群可以通过替代性价值体系被吸纳进来。

时间银行未能证明什么：基于贡献的价值能够扩展至国家经济层面。均一兑换率[所有工时等值]在大规模运作下具有可持续性；基布兹的证据表明其并不可行。



VII. 爱沙尼亚的电子政务：实践中的数字透明

1991年，爱沙尼亚从苏联恢复独立时，人口约为1.57百万，几乎没有任何数字基础设施。到2017年，99%的政府服务已实现在线办理；该国实施了强制性数字ID卡、名为X-Road的去中心化数据交换平台，以及允许世界上任何人在爱沙尼亚建立数字身份的电子居民计划(Heller, 2017)。

爱沙尼亚与Jasutopianism的相关性是具体且技术性的。Jasutopianism的国民身份记录系统[第LXXXV条至第LXXXVIII条，见论证VIII的阐释]会记录国内的每一笔资源交易并向国家政府报告；它并未赋予公民查看谁阅读过这些记录的权利。本书在撰写新法律时，增添了一种范围更窄的查阅权：每位公民都可以查阅文化交流登记册[第CV条]和环境记录[第CXVIII条]；但这两者都不允许公民查看谁查阅过其本人的记录。爱沙尼亚则将记录本身与公民的查看权结合在一起。其国家门户网站上的“数据追踪器”（Data Tracker）向个人显示其数据在何时、被哪个机构、从哪个数据库以及出于何种既定目的被查询。它的覆盖范围是部分的：截至2025年12月，在超过300个国家信息系统中仅有15个接入了该追踪器，接入属于自愿性质，而政府正计划将其改为强制性(ERR News, 2025)。它与Jasutopianism的相似之处在于记录本身，而非记录的方向。X-Road及其追踪器记录的是国家机构的查询行为以供公民查看；而国民身份记录系统记录的是公民自身的交易行为以供国家使用，这种记录方式在X-Road中并无对应物。

其架构决策颇具启发意义。爱沙尼亚选择了去中心化：各部委维护各自的数据库；X-Road将它们连接起来。并不存在单一的公民数据中央存储库。这一设计选择对Jasutopianism的国民身份记录系统应如何构建具有直接启示：去中心化记录（即各机构维护各自记录，并由互操作层向公民提供透明度）比中心化数据库更具抗故障能力[无单点故障]，且更能保护隐私[没有任何单一行动者掌握公民数据的完整图景]。

爱沙尼亚证明，一个小国可以在大约二十五年内从近乎零的起点建成透明的数字治理基础设施。这一过渡时间线与第6章相关：爱沙尼亚的电子政务在大约二十五年间需要持续的政治承诺、技术专长积累与文化接纳，这与以下论点相一致，即Jasutopianism各项制度的巩固必须以数十年而非选举周期来衡量。

与**Jasutopian**原则的映射：X-Road数据记录 → 国民身份记录系统（第LXXXV条至第LXXXVIII条[见论证VIII的阐释]；相似之处在于记录本身，而非其方向）。数字ID → 公民身份识别与资源追踪。公民审计查阅权 → 尚无对应物；本书增添了查阅文化交流登记册和环境记录的权利[第CV条和第CXVIII条]。去中心化架构 → 制度持久性。

爱沙尼亚证明了什么：包含部分面向公民透明度的数字治理基础设施，可以在大约二十五年内从近乎零的起点建成。

爱沙尼亚未能证明什么：数字治理能够扩展至规模庞大、多元且存在对抗性政治环境的国家。爱沙尼亚人口规模较小且在数字化问题上拥有强烈的政治共识，这些条件在其他地方不能视为理所当然。地位等级所需的公民自身交易记录，能够像爱沙尼亚保存其记录那样，在没有任何单一行动者掌握全局的情况下予以留存。

VIII. 罗贾瓦：危机下的自下而上民主

叙利亚北部和东部自治行政区[通常称为罗贾瓦]是本章案例集中最为激进的案例。自2012年起，随着叙利亚内战在该国东北部造成权力真空，库尔德、阿拉伯、亚述和土库曼社区在持续武装冲突的条件下，建立了一套以直接民主、性别共同主席制和族群多元主义为基础的治理体系 (Knapp, Flach, & Ayboga, 2016)。该地区的自治在战争状态下一直运行至2026年，届时自治行政区被并入叙利亚国家体系。

该治理结构通过嵌套式议会运作。公社[最小的单位，包含30至400户家庭]通过面对面集会作出决策。公社汇总为委员会，委员会再汇总为地区自治行政区。每一个行政职位都要求设一名男性和一名女性共同主席。每一个治理机构都必须包含辖区内所有族群社区的代表。其思想谱系可追溯至Murray Bookchin (2015) 的自由意志市镇主义理论：真正的民主需要在地方层面设立面对面的人民议会，并通过受委托的代表[携带其所属议会的授权且可被罢免]而非代议制代表[依据自身判断行事]联合组成更大的单位。

公社结构与Jasutopianism的公民议院之间存在有限的相似之处：两者都让公民直接参与决策。但它们在性质上有所不同。公社是面对面召开、向受委托代表授权且可予以罢免的议会；而公民议院则是针对参议院所提出法案的全国性投票，向每一位年满十八岁且无重罪记录的公民开放 (Rodriguez, 2021)。性别共同主席原则（其中，每个领导职位均由两性共享）比Jasutopianism的三总统走得更远，但它表明行政权中的权力分享是可以实施的。族群多元主义则展示了专为多元人口设计的治理模式，而这正是任何试图进行Jasutopian过渡的国家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Dilar Dirik (2022) 记载表明，妇女解放运动并非罗贾瓦（Rojava）治理体系的表面点缀，而是其基础性原则。其论点在于，一个社会若再生产父权等级秩序，便不可能实现民主。库尔德妇女运动[文化转型]催生了联合主席制度[制度变革]，而该制度又反过来强化了对性别平等的文化承诺。此处显现的模式，正是 Putnam 与 Rothstein 在国内政体内部所记载的那种互惠互动动态，且这一动态是在严峻的战时约束下运行的。

诚实的评估还必须指出罗贾瓦未能展示之处。该制度在其存续的整个期间都在战时条件下运作。一些社区曾抵制性别强制规定。这一治理模式从未在和平时期经受过检验，而在和平时期，能够催生团结的生存压力可能会消散。该制度依赖于一项特定的政治运动[库尔德解放运动]，其意识形态可能无法迁移至其他文化背景。此外，该地区还面临来自土耳其、叙利亚政府以及ISIS残余势力的生存性军事威胁。这项实验未能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以供充分评估。在叙利亚政府与叙利亚民主力量达成协议并由安理会于2026年2月表示欢迎之后，叙利亚北部和东部自治行政区与叙利亚民主力量于2026年8月解散，其安全与行政架构正在并入叙利亚国家机构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2026)。

话虽如此，罗贾瓦展示了本章其他任何案例都未能展示的一点：在持续的武装冲突期间，可以自下而上地建立起民主自治，并使其在十四年的战争中保持运转。如果自下而上的治理在如此严峻的条件下尚能运作，那么认为Jasutopianism对现实世界而言过于理想化的反对意见便失去了大部分说服力。它的终结则显示出另一种局限。此类实验可能在和平尚未对其加以检验之前，就被外部力量通过并入更强大的国家而终结；这一结局对于该制度在和平时期是否能够延续，既未提供肯定证据，也未提供否定证据。

与**Jasutopian**原则的映射：公社 → 公民议院（有限的平行对应）。共同主席制 → 权力分享的行政机构（三总统）。族群多元主义 → 面向多元人口的治理。女权主义基础 → 制度性民主的文化前提。

罗贾瓦证明了什么：自下而上的民主治理可以在极端条件下运作多年。性别权力分享是可以实施的。文化转型可以先于制度转型并维系制度转型。

罗贾瓦未能证明之处：长期可行性[该行政当局于2026年终结，尚未经历任何和平时期的检验]；向非危机情境的可迁移性；超越数百万人口地区的可扩展性；以及家庭成员面对面集会的形式能够转化为全国性的法案投票，因为公民议院与公社在本质上截然不同。

IX. 汇集的证据

七个案例，三大洲，近六十年。没有任何单一案例能够证明Jasutopianism。它们共同支持了与Jasutopianism设计相邻的各项机制[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普遍供给、替代性的价值衡量尺度、交易的数字记录，以及公民在决策中的直接话语权]。然而，它们并不支持其核心定义机制：全国规模的分级非货币交换在这些案例中毫无先例，而这正是第7章预测一所检验的内容。

Jasutopian principle						
Mondragon	**Israeli kibbutzim**	**Nordic countries**	**Bhutan GNH**	**Time banking**	**Estonia**	**Rojava**
Status Leveling [parts only; see the note]						
Part: pay compression [about six to one in the 1990s]	Part: the erosion of equal sharing	Part: innovation alongside equality		Part: contribution as the measure of value		
Chamber of Citizens						
						Limited parallel: the communes
Article I Provision [conditional on contribution]						
	Communal resource sharing	Universal provision; transfers in part		Social inclusion		
National ID Log System						
					X-Road data logging [the logging, not its direction]	
13 Metrics						
			Nine GNH domains			
Three Founding Principles						
		High trust		Community capacity building		
Tri-Presidents / Power Sharing						
						Copresidency
Citizens National Democratic Business Committee						
Limited parallel: cooperative governance						

Evidence for the principle　Evidence for a part of it only

A limited parallel　No evidence from this case

Note: Status Leveling is marked for its parts only; no case shows graduated nonmonetary exchange at national scale. No single column covers all rows.

图 **3.2.** Jasutopian原则与实证证据映射

跨案例浮现出的规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读者应当予以审慎关注：

首先，缺乏文化基底的制度设计并不充分，除非这些制度被视为公平，从而能够培育出这一基底[第 IV 节]。蒙德拉贡（Mondragon）正式的合作社结构并未保证民主体验的实现 (Kasmir, 1996)。当维系基布兹（kibbutzim）平等分享安排的文化承诺减弱时，这些安排便随之侵蚀 (Abramitzky, 2008)。罗贾瓦（Rojava）的制度之所以能够运转，正是因为库尔德妇女运动提供了文化基础 (Dirik, 2022)。Jasutopianism 的法律条款提供了这一国内模式中宪法层面的一半：制度必须产生维系自身的公民公平与信任，而公共文化则必须维系制度背后的政治意愿。这两半中的任何一半都不可偏废。

第二，在具备充分制度支撑的条件下，非货币与替代性价值体系是行之有效的。基布兹有效运转了数十年。时间银行在社区规模上行之有效。基于公地的同伴生产在软件与知识产品领域行之有效 (Benkler, 2006)。失败的发生并非因为非货币体系在结构上存在缺陷，而是因为制度支撑结构[针对基布兹的分级激励、针对时间银行的规模支撑]不足或缺失。地位升级的设计正是为了提供这些实验所缺乏的制度支撑：在非货币结构内部实现全国规模且具有宪法持久性的分级差异化。

第三，转型需要数十年之久。北欧福利国家是历经半个世纪的政治协商而建成的 (Hilson, 2008; Christiansen et al., 2006)。爱沙尼亚的数字治理需要大约二十五年的持续投入 (Heller, 2017)。蒙德拉贡从1956年的单一合作社发展到1990年代拥有逾百家合作社的联合体。各项证据是一致的：Jasutopianism所倡导的此类治理转型是以数十年而非选举周期来衡量的。第6章将直接探讨这一问题：其中规定的十年为宪法转型期，而随后的巩固期则将延续数十年。

第四，规模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时间银行在社区规模上运转。基布兹在定居点规模上发挥作用。蒙德拉贡在国家经济体内部的区域规模上运行。不丹的GNH在小国规模上运行。北欧模式在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内的中等国家规模上运行。爱沙尼亚的电子政务在小国规模上运行。罗贾瓦在次国家区域规模上运行。这些案例中没有一个能够证明完整的Jasutopian架构在大型、多元化民族国家规模上的可行性。然而，这并非一项否定性的结论，而是对尚存挑战的界定。每一个相邻的组成部分都曾在某处行之有效。完整规模的集成体系尚未经过检验，而其核心定义组成部分，即全国规模的分级非货币交换，更是毫无

先例。Jasutopianism所要求且《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所秉持的学术诚实，要求我们对此予以明确陈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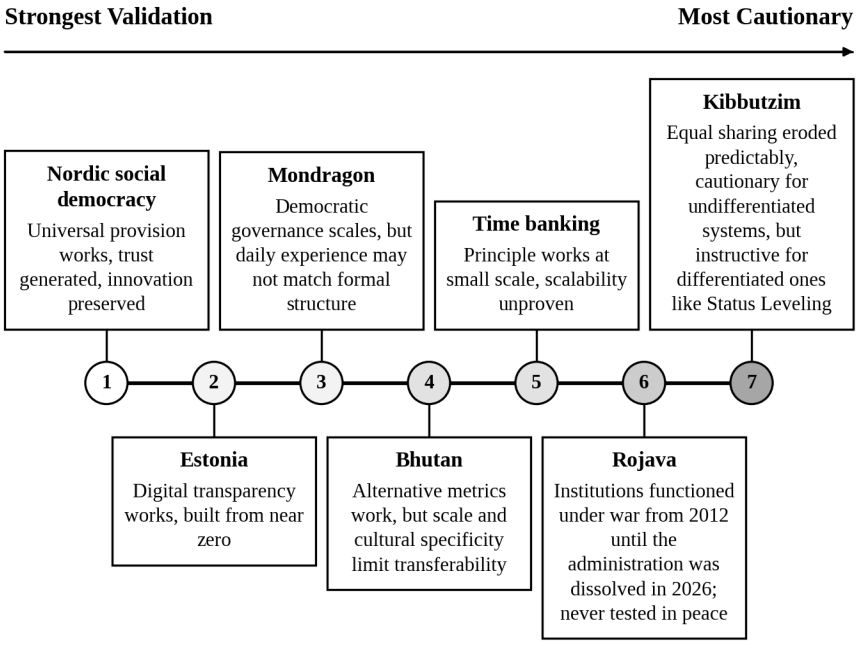


图 3.3. 成败谱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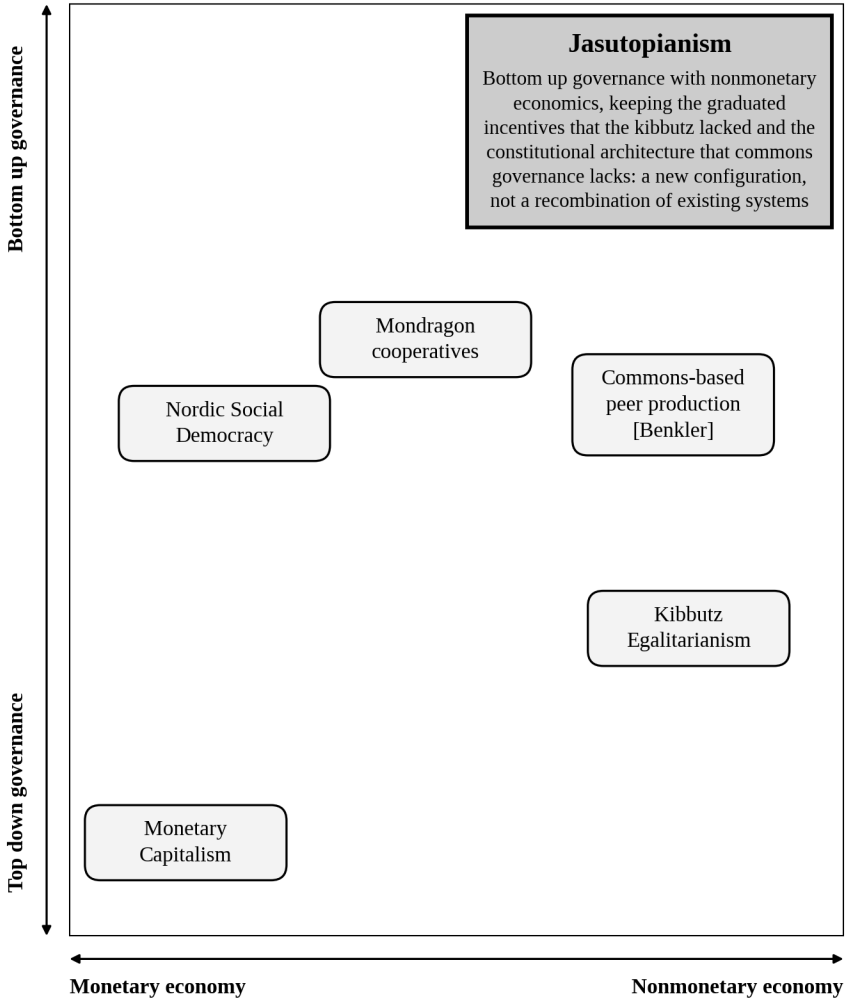


图 3.4. 合作治理场域图

X. 证据对《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提出的要求

本章汇集的证据确立了与Jasutopianism设计相邻的各项机制在经验上的合理性，但并未确立该集成体系的可行性。“每个组成部分都曾在某处行之有效”与“整个完整体系能够协同运转”之间的差距是真实存在的，而《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的其余章节正是为了缩小这一差距，并阐明如何对其加以检验。

第4章将提供文化外交条款[即Jasutopianism此前未作明确规定的国际文化交流制度结构]。第5章将涵盖数字治理[即因Jasutopianism出版的时间跨度而留白的人居平台时代条款]。第6章将基于上述证据，即治理转型的巩固需要数十年持续的制度建设，为宪法转型期的十年提供转型蓝图。第7章将提供本章所奠定的成果：以案例研究证据作为校准点构建的明确、可证伪的预测，从而使Jasutopianism不仅能作为一项哲学论证接受审视，更能作为一项可检验的治理方案接受评估。

证据已汇集完毕。

参考文献（第3章）

Abramitzky, R. (2008). The limits of equality: Insights from the Israeli kibbutz.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3*(3), 1111-1159.

Abramitzky, R. (2011). Lessons from the kibbutz on the equality-incentives trade-off.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5*(1), 185-208.

Benkler, Y. (2006). *The wealth of networks: How social production transforms markets and freedom*. Yale University Press.

Bookchin, M. (2015). *The next revolution: Popular assemblies and the promise of direct democracy* (D. Bookchin & B. Taylor, Eds.). Verso.

Cahn, E. S. (2004). *No more throw-away people: The co-production imperative* (2nd ed.). Essential Books.

Christiansen, N. F., Petersen, K., Edling, N., & Haave, P. (Eds.). (2006). *The Nordic model of welfare: A historical reappraisal*. Museum Tusculanum Press.

Dirik, D. (2022). *The Kurdish women's movement: History, theory, practice*. Pluto Press.

Dow, G. K. (2003). *Governing the firm: Workers' control in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RR News. (2025, December 16). *Estonia planning to make data tracker mandatory for all public databases*. https://news.err.ee/1609886842/estonia-planning-to-make-data-tracker-mandatory-for-all-public-databases

Esping-Andersen, G.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eller, N. (2017, December 11). Estonia, the digital republic. *The New Yorker*.

Hilson, M. (2008). *The Nordic model: Scandinavia since 1945*. Reaktion Books.

Kasmir, S. (1996). *The myth of Mondragón: Cooperatives, politics, and working-class life in a Basque tow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Knapp, M., Flach, A., & Ayboga, E. (2016). *Revolution in Rojava: Democratic autonomy and women's liberation in Syrian Kurdistan* (J. Biehl, Trans.). Pluto Press.

Putnam, R. 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euten, G. (2023). The Mondragon worker cooperatives' employment record 1983-2019. *Journal of Labor and Society*, *26*(3), 336-375. https://doi.org/10.1163/24714607-bja10080

Rodriguez, J. (2021). *Jasutopianism*. [Self-published].

Rothstein, B. (2005). *Social traps and the problem of tru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2026, November 2). *Syria: November 2026 monthly forecast*. https://www.securitycouncilreport.org/monthly-forecast/2026-11/syria-97.php

Seyfang, G. (2004). Time banks: Rewarding community self-help in the inner city?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39*(1), 62-71.

Ura, K., Alkire, S., Zangmo, T., & Wangdi, K. (2012). *An extensive analysis of GNH index*. Centre for Bhutan Studies.

Whyte, W. F., & Whyte, K. K. (1991). *Making Mondragón: The growth and dynamics of the worker cooperative complex* (2nd ed.). ILR Press.

Wright, E. O. (2010).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Verso.

第4章：文化外交条款



I. 建构伊始

第3章汇集了相关证据。横跨三大洲、近六十年的七项案例研究表明，与Jasutopianism设计相邻近的各项机制[基本生活物资的普遍供给、替代性价值衡量标准、交易的数字记录以及公民在决策中的直接发声]并非空想。它们是具有明确历史记录的可操作原则。在其中，国家规模的累进式非货币交换尚无先例，而这正是第7章预测一所要检验的内容。第2章奠定了哲学基础。第3章汇集了证据。现在，建构可以开始了。

在此语境下，“建构”具有精确的含义。

Jasutopianism是一套治理体系。其架构通过《法律条款》加以体现。其原著包含102项此类条款[第I条至第CII条]，规范了治理三权的结构、地位升级制度、司法行政、商业运作、媒体监管、公民权利保护、住房管理、公民全国民主商业委员会的架构、刑事法律程序，以及法典本身的持久性。第CII条宣告：“任何《法律条款》[I-CII]在整体通过后，均不得从本文件中删除或更改”（Rodriguez, 2021, Art. CII）。条款

是该体系的法律实质。没有条款，Jasutopianism只是一种哲学；有了条款，它便成为一种宪制架构。

本章为这一架构增添新的内容。

下文提出的一组七项拟议《法律条款》[即《文化外交条款》，第CIII条至第CIX条]，旨在规范Jasutopian国家[或领土]内部的国际文化交流。这些条款采用原著的宪制语体起草。在结构上，它们必须能够作为同一份法律文件的延伸来阅读；它们必须承载第CII条赋予其先前所有条款的同等不可撤销的持久性[第8章拟议的第CXXIII条将该持久性延伸至这些新增条款]。它们填补了本书综合研究中所识别出的最具有可操作性的单一空白：在Jasutopianism详尽无遗的法典中，缺乏针对这一复合体系最为需要的机制的任何规定。

II. 这一空白

表述这一空白需要精确性。这是因为该空白的性质决定了其解决方案的性质。

Jasutopianism的102项条款几乎规范了公民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第I条保障所有做出贡献的公民即使在危机时期也能获得基本食物、水、住房、医疗保健和教育。第III条保护言论自由。第V条保护媒体和新闻自由，并实行强制性消息来源核查。第VI条保护集会权利。第IX条禁止在地位升级中实行歧视。第XII条保护宗教自由。第XIV条保护无罪推定。第XXII条规定三岁至十八岁接受强制教育。第XXXV条至第XLVIII条构建了公民从十六岁直至退休的整个职业生涯周期。第LV条至第LXX条设立了公民全国民主商业委员会。第LXXIX条至第LXXXI条规范枪支所有权。第LXXXV条至第LXXXVIII条[在论点VIII中予以阐明]确立了国民身份与交易记录系统。第XCV条规范版权与公共领域。第CII条确立了宪制持久性。

该法典在其自身领域内已详尽无遗。

其中不包含任何规范国际文化交流的条款。没有条款规范Jasutopian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化产品流动。没有条款为文化合作建立制度性基础设施。没有条款保护外国文化作品在Jasutopian国家[或领土]内的权利。没有条款将文化作品[音乐、电影、文学、视觉艺术、

舞蹈、戏剧、数字媒体等]的生产或保护作为一项具有国际维度的公民职能加以规范。对于文化大使、交流项目或国际艺术合作，也未作任何规定。亦无任何条款规范Jasutopian国家的文化产品应如何与其他国家的文化建立关联。

原著中的《多样性哲学》一节[“Jasutopianism多样性哲学、文化容忍、文化平等与Jasutopian国家内的文化影响力”]直接确立了文化哲学：多元文化必须“统一承认并接受这样一种哲学，即除了自身文化之外，还存在着不止一种文化生活方式”（Rodriguez, 2021, Philosophy of Diversity）。论点XVIII涉及世界超国家联盟[S.U.W.]，提出了治理层面的国际合作。文化哲学存在于该书的论证之中，却缺席于其法典之内。

这并非疏漏。

Jasutopianism于2021年作为一部单一国家宪法问世。其102项条款规范着国内生活。将这些基本原则延伸至国界之外，便催生出贯穿全书的原创性国际机制：跨境文化人文化与情感文化认同。当真实的创作作品[音乐、电影、文学、视觉艺术与现场表演]跨越紧张的边境时，它们会激活社会心理学文献中所记载的情感认知同理心通路（Decety, 2012; Batson, 2011; Hoffman, 2000），缩小群体间同理心差距（Cikara, Bruneau, & Saxe, 2011），并通过制约国家领导人的同侪线索，自下而上地重塑外交政策态度（Kertzer & Zeitzoff, 2017）。在拥核对手之间，本书提出一项明确的理论主张：情感文化威慑在相互确保摧毁之外增设了第二道心理屏障，使精英阶层更难为大规模毁灭一个已被人文化的群体进行辩护或维持这种行为。在核门槛之下，同一机制则为各国间的持久和平奠定根基。

一项法律空白由此显现。非正式的文化交流虽能在敌意中存续，但每当政治行为体重新挑起被激活的历史宿怨、收紧审查或切断持续接触时，其公民效应便会变得十分脆弱。Jasutopianism保护一般言论自由[第III条]、可核查的新闻出版[第V条]、司法一致性审查以及文本锁定[第CII条]，但对于外国文化准入、独立交流机构、双边互惠或危机延续性却未作具体规定。这种脆弱性是双向的。保护性文化制度唯有在公民保有捍卫它们的民主意愿时方能长存，而持续的跨境文化人文化正是培育这种意愿的力量[即贯穿本书国际与文化各章的同理心与制度反馈循环]。

法律必须填补这一空白。非正式的评论无能为力。善意终会破碎。

一个以人文化为基础的治理秩序，绝不能将跨境文化接触排除在法典之外，因为若没有锁定在短期选举算计之外的永久性宪法条文，任何新上台的执政联盟都可能削减交流机构的经费、在外交摩擦期间封锁外国广播，或悄然将文化办事处改作秘密宣传之用，从而在短短一个立法会期内抹去数十年积累的跨境同理心；七项文化外交条款[第CIII条至第CIX条]，连同将第IV条不俘虏义务法典化的澄清性第CXXIV条，正是为了消除这一确切的宪法脆弱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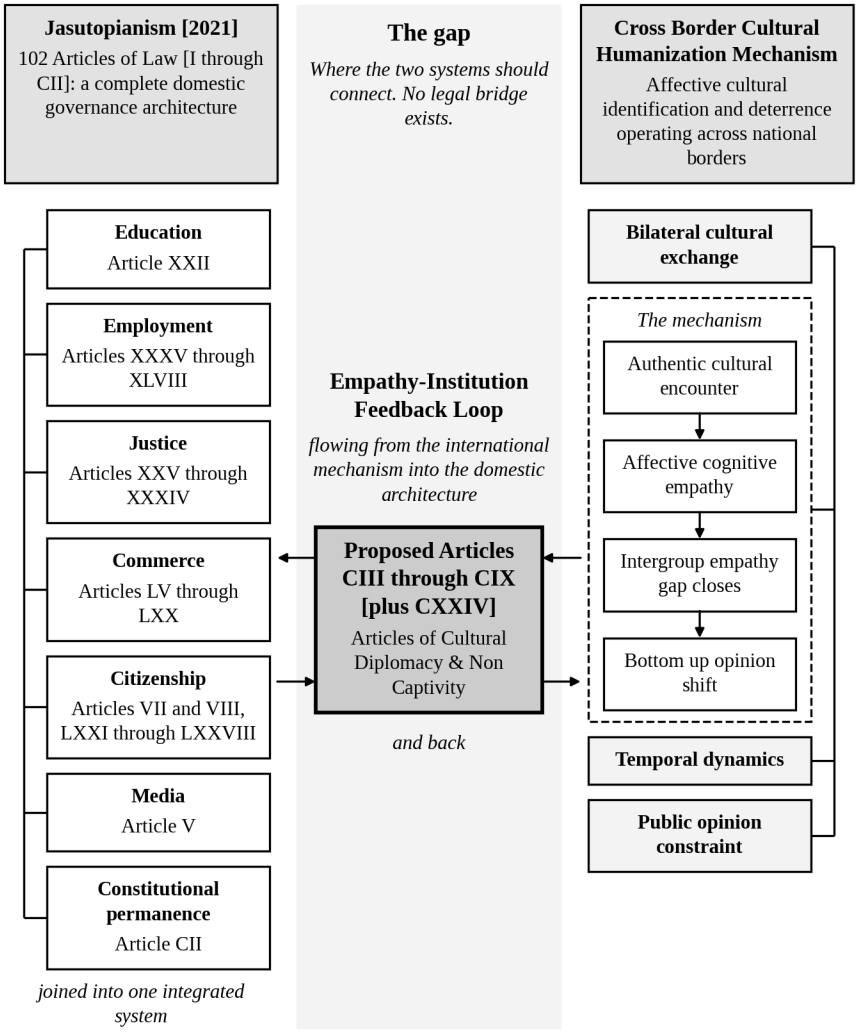


图 **4.1.** 法律架构中的空白

III. 为何文化交流需要法律编纂

国际文化交流理应纳入宪法治典的主张，初看之下或许显得过于严苛。文化交流无需条约即可发生。音乐无需政府批准即可跨越国界。电影无需立法授权即可找到观众。如果情感文化认同与跨境文化人文化是通过普通人类心理机制发挥作用的[正如第2章通过多分辨率人文化所论证的那样]，那么它们为何还需要法律保护？

原因有三。

首先，历史记录表明，文化交流极易遭到机构俘获。Ien Ang、Yudhishthir Raj Isar与Phillip Mar曾论证，文化外交必须超越其作为狭隘国家利益工具的传统框架，因为真正的文化交流会创造出“关系空间”，其中，相互理解是通过接触而非战略宣传生长出来的（Ang, Isar, & Mar, 2015）。在实践中，国家主导的文化外交却一再越过这条界线。文化自由大会[CCF]于1950年作为中央情报局的一项秘密行动成立，并一直秘密接受资助，直到1966年与1967年媒体调查揭露其资金来源（Iber, 2017; Saunders, 2000）。一经曝光，公众对秘密欺骗的愤怒便严重损害了机构公信力，即便其中部分艺术作品得以流传下来。作为美国公共外交近半个世纪的制度依托，美国新闻署[USIA]于1999年被撤销，其文化与交流职能并入国务院，既无独立章程，亦无宪法保护（Cull, 2008）。Mariano Martín Zamorano详细记录了Joseph Nye的软实力话语如何促使各国政府将文化视为战略资产而非人类共享领域，从而将交流扭曲为文化工具化（Zamorano, 2016）。

在每一个案例中，教训都是相同的。

缺乏法律法典化的文化交流，往往受制于一时的政治算计。当被视为有用时，它便获得制度支持。当被视为多余时，它便遭到裁撤。当由情报机构秘密操纵时，它便丧失公信力。法律法典化能够防止上述三种后果。本书所提出的法律条款受第CXXIII条或第CXXXV条锁定保护，不得被删除或修改文本，这两条延续了第CII条的锁定机制。凡经法典化者，皆能长存。凡未法典化者，终究脆弱。

其次，文化交流直接关乎国家安全。同理心与制度反馈循环[已于第1章为国际与文化各章所引入]刻画了一套双向公民引擎：跨境同理心为保护性文化法律凝聚公众支持，而受保护的交流则进一步孕育出更多同理心。在拥核国家之间，本书将情感文化威慑作为相互确保摧毁之外的第二道心理屏障，其经验基础扎根于自下而上的公众舆论制约（Kertzer & Zeitzoff, 2017）、群体间同理心研究（Cikara et al., 2011）以及历史公共外交研究（Ang et al., 2015; Cull, 2008; Saunders, 2000; Rivera, 2015）；在非核国家之间，同一机制则充当持久的和平公民支柱。安全保障扎根于法律。三总统一致同意[第XIX条]扎根于法律。危

机限制[第II条]扎根于法律。既然情感文化威慑守护着存续，那么文化开放便要求具备同等的宪法持久性。

第三，国际先例证实，文化合作架构在立法上是可实施的。欧洲联盟通过了一项将文化纳入其对外关系的正式战略，确立了三项原则：互利、尊重文化多样性，以及互补性与辅助性原则（European Commission, 2016）。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制定了社会文化共同体蓝图，其中包含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产业发展、人文交流以及通过文化合作缩小发展差距的规定（ASEAN, 2016）。非洲联盟通过了《非洲文化复兴宪章》，确认非洲文化遗产是政治团结与经济发展的基础，承诺成员国保护文化遗产、推广非洲语言、支持艺术创作，并将文化作为和平与发展的工具（African Union, 2006）。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通过2005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重申各国在其领土内采取措施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的主权权利（Singh, 2010; UNESCO, 2005）。

Model	Character	Principles	What the Articles of Cultural Diplomacy take from it
European Union [strategy for international cultural relations, 2016]	Legalistic	Three principles: mutual benefit, respect for cultural diversity, complementarity and subsidiarity	Institutional specificity
ASEAN [Socio-Cultural Community Blueprint, 2016]	Consensus based, nonbinding, gradualist	Heritage preservation, cultural industry, people to people contact	Respect for diverse governance traditions
African Union [Charter for African Cultural Renaissance, 2006]	Declarative, aspirational	Cultural renaissance, African languages, artistic creation, culture as an instrument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The declarative constitutional register
UNESCO [2005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	Normative convention	The sovereign right of states to adopt measures that protect and promote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	Normative standing for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
What the four precedents show: each writes cultural cooperation into a formal instrument. What they leave open: none makes its instrument permanent. The proposed Jasutopian articles add that permanence.			

图 4.2. 国际先例：文化合作模式

三大洲。四种制度模式。各自适应于不同的治理传统。但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同一件事：国际文化合作可以被写入正式文书。这四种模式无一使其文书具有永久性，而永久性正是本章条款所增添的内容。尚待解决的并非文化交流是否应当编纂为法律，而是如何编纂。读者将会发现，下文按照原著的宪制语体为Jasutopian国家[或领土]起草的七项条款，正是这一问题的答案。



IV. 三项设计原则

在列举条款本身之前，必须先阐明三项设计原则。这是因为这些条款并非任意制定的法律条文，而是深层设计逻辑的体现，这一逻辑将它们与原有的102项条款以及本书所提出的复合体系紧密相连。

真实性准则。将Jasutopianism自身的基本原则延伸至国际文化关系，可得出一条关于投入要素的支配性规则。文化作品必须先凭艺术水准获得成功，方能产生真正的情感文化认同；凡被受众视为国家宣传的歌曲或电影，便会丧失拉近群体间距离所需的人性真实感[正如冷战时期受众对1958年莫斯科的Van Cliburn或地下流传的西方摇滚唱片所作出的反应，人们将其视为艺术家，而非国家使节]。Jasutopianism在国内经济生活中也执行着完全相同的规则。其地位升级制度将公民真实的努力

引导为生产性贡献，因为公民的地位升级“完全依据其工作表现的质量”，且该表现“不以人格特质为依据”（Rodriguez, 2021, Art. IX）。被迫的或作秀式的服从会侵蚀这一制度。“真实”一词在同一规则下统摄着两重含义：真实的文化作品是为艺术目的而非外交指令创作的，而真实的公民贡献则是公民在第XXXVIII条法定基础之外通过自主选择的职业所从事的劳动[Jasutopianism明确指出该条“既非‘免费劳动’，亦非奴役”（Rodriguez, 2021, Argument XI）]。在这两个领域中，经过操纵的投入都会导致失败。本书将这一共同约束命名为真实性准则。

跨境文化人文化需要真实的文化产品[本章将该约束写入宪法法律，使任何未来政府均不得将其作为谈判筹码加以让渡]。一部作为国家信息传达有效但在艺术上失败的电影，作为人文化的工具亦告失败。文化自由大会的历史记录印证了这一规律：在西欧，它因放大了自主的艺术声音而引发共鸣；但在拉丁美洲，其杂志*Cuadernos*将外部意识形态议程强加于当地知识分子，因而陷入困境（Iber, 2017; Saunders, 2000）。Tim Rivera通过英国文化协会的制度史，梳理了文化关系[以保持一臂距离的方式支持艺术作品的有机流通]与国家主导的文化外交之间的运作边界（Rivera, 2015）。在真实性准则之下，公共支持旨在消除交流壁垒，并严格依据艺术水准资助创作者，而绝不干预内容塑造；其中，情感文化认同始终是任何政府部门都无法指挥的自发副产品。一旦受众察觉到的是宣传而非真正的艺术表达，认知怀疑便会压倒情感认知同理心通路（Decety, 2012; Cikara et al., 2011）。

机构分离。这些条款所提议的文化交流委员会在宪法上独立于情报机构、军队及所有行政部门。本书明确致力于公开透明。这是因为向出资供养它的公民隐瞒的文化项目，无法接受公民的审计[违反永恒相对论中关于社会问责的概念IV]，也是因为历史先例记录了秘密运作的确切代价。通过CCF进行的秘密操纵，在其资助内幕曝光的那一刻便毒害了信任（Saunders, 2000; Iber, 2017）。相比之下，冷战时期公开赞助的爵士乐巡演之所以取得成功，恰恰是因为音乐家们在没有国家脚本的情况下公开演出（Cull, 2008）。Simon Mark认为，当具备制度完整性时，文化外交[一国对其海外文化存在提供的支持]对国际关系所能发挥的作用，远超各政府部门通常的认知（Mark, 2009）。伙伴国之间的合作需要可核查的信任，而信任无法在秘密情报操纵下存续。这种分离必须载入宪法文本而非行政命令，并受第CXXIII条锁定。

对等互惠。文化交流绝非文化投射。有效的跨境互动应当承认对方国家既有的文化身份，而非企图将其覆盖。历史上的公共外交鲜明地印证了这一反差。范·克莱本以精湛技艺演奏柴可夫斯基作品打动莫斯科听众，致敬俄罗斯音乐传统；纽约爱乐乐团于2008年在平壤演奏《阿里郎》打动听众，致敬朝鲜半岛文化记忆，尽管此后双边官方关系依然维持在有限水平。相反，CCF在拉丁美洲的行动之所以受挫，正是因为其将欧洲冷战框架强加于怀有不同历史关切的受众之上 (Iber, 2017)。Jasutopianism的多样性哲学在规范层面上得出了完全相同的准则："只有当所有多元文化在Jasutopian社会中一致承认并接受这样一种哲学，即除自身文化之外还存在不止一种文化生活方式时，它们才能共同存在" (Rodriguez, 2021, Philosophy of Diversity)。对等互惠原则约束Jasutopian国家在制度上以与其本国文化作品传播同等的地位，欢迎并支持民众获取外国文化作品。

V. 文化外交条款

以下七项条款 [第CIII条至第CIX条] 规范 Jasutopian 国家 [或领土] 内的国际文化交流。这些条款是作为现有102项法律条款的延伸而起草的，采用原著的宪法体例。它们填补了本章所指出的结构性空白：即 Jasutopianism 法律法典中对国际文化交流的缺失。每项条款均印出其条文，仅条文部分被提议作为法律；紧随其后的"立法理由"则为评注。

第**CIII**条。国际文化交流是 Jasutopian 国家受保护的活动。受限于第CVIII条与第CXVI条，Jasutopian 社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限制公民创作、传播、接收或接触源自其他国家的文化产品的能力，除非依据第III条与第V条限制公民自身言论、媒体和新闻出版的理由：即某文化产品使 Jasutopian 公民的生命处于紧迫危险之中，或者未经完整正当法律程序而不公正地诽谤 Jasutopian 公民或非公民居民的声誉或品格，或者传播没有可独立核实且非匿名来源的新闻。为保护生命而实施的限制必须符合第III条所设定的紧迫危险标准，并在司法权面前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程度；其中，基于另外两项理由中的任何一项所作的限制，也必须达到同等程度的证明。文化产品包括但不限于：音乐、电影、文学、视觉艺术、舞蹈、戏剧，以及任何传达特定民族的文化身份、价值观或生活经历的艺术表达形式等。各国之间文化产品的自由流通被承认为和

平架构的组成部分，并且在两个均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被承认为威慑架构的组成部分。

立法理由。通过同理心与制度反馈循环运作的情感文化认同，取决于文化产品能否真正跨越国界触及公民。审查制度极少能彻底消除非正式传播，但法定限制会减少广泛接触，并削弱对外交政策精英自下而上的约束 (Kertzer & Zeitzoff, 2017)；本条旨在消除国内壁垒，而非迫使公民规避国家禁令。本条所保障的是双边互动中的国内半程。允许输入并获取外国文化表达，既能抑制Jasutopian国家自身诉诸武力的倾向，也能促进对等互惠；至于Jasutopian文化作品的对外输出，则受第CVI条支持并受第CVII条管辖，绝无单方面保证，因为任何国内法均无法约束外国主权者。第III条未规定明确的举证责任；此处确立的标准直接源自Jasutopianism的预防性措施，其中，任何与立国原则相抵触的例外情形，均须“在法庭上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Rodriguez, 2021, Precautionary Measure)。第CVIII条尊重外国版权，对未经授权的复制行为加以规制，但不阻碍合法获取；而第CXVI条 [第5章] 规制的是平台行为，而非公民的文化获取。

第**CIV**条。文化交流委员会将由法律设立 [由参议院提出法案并经公民议院表决通过]，作为独立的政府机构，独立于且不隶属于情报部门、军队或任何行政机关。其委员将由参议院从正在执业的文化专业人士中提名，每项提名均须经公民议院表决确认。委员任期六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任何委员均不得担任或在获提名前六年内担任过行政权、军队或情报部门的职务。委员仅可通过弹劾程序，经由治理三权条款规定的途径予以免职。参议院可对委员会的行为展开调查，由此产生的任何措施均将提交公民议院表决。委员会的职责是通过制度基础设施、研究、艺术资助和外交便利化支持国际文化交流；其中，明确禁止委员会指导、控制或影响任何文化产品的内容。委员会将组建第CVI条所述的评审小组。

立法理由。文化表达的真实性是文化交流机制的前提条件。这是因为隐蔽国家指导的历史证据 [文化自由大会由中央情报局创立并秘密资助、文化项目被工具化用于情报目的，以及该资助曝光后导致的公信力丧失（Saunders, 2000）] 表明，制度力量介入文化产品的内容会腐蚀其本应保护的交流。委员会旨在促进文化合作而非文化投射。合作需要

制度独立性。独立性需要将其以宪法形式法典化。该条款明确指明了委员会的遴选者和免职者，因为若无此规定，任命权将归属于三总统，三总统负责任命所有“本法典未另行规定任命方式”的官员并统帅军队（Rodriguez, 2021，治理三权条款，第IV条）。委员的任期及其限制与第CI条赋予参议员的规定相同，免职则遵循 Jasutopianism 已经确立的弹劾途径 [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表决开启审理，或经法院批准的公民请愿]。

第**CV**条。文化交流委员会将维护一份关于所有国际文化交流项目、资助、驻留计划和机构合作伙伴关系的公共登记册。受 Jasutopian 政府支持的任何文化交流活动均不得秘密进行。该登记册将向每位公民开放查阅；依据该规定，每位公民均有权完整阅读该登记册，并通过它审查文化交流委员会的各项活动。

立法理由。这一透明度要求的目的有二。第一，防止文化交流被情报部门制度性俘获；依据该原则，秘密文化行动已被本章所作出的公开透明决定所排除 [第IV节]。第二，为参议院和公民议院提供所需的信息：供参议院对委员会的行为展开调查，并供公民议院对由此产生的任何措施进行表决。查阅权是一项新的权利，本条创设了该权利。第LXXXV条至第LXXXVIII条所确立的 Jasutopianism 国民身份记录系统 [在论证VIII中有所阐释] 会记录每一笔交易并向国家政府报告；但它并未赋予公民阅读政府记录的权利。

第**CVI**条。Jasutopian 政府将拨付资源 [由立法权通过标准预算程序确定]，用于 Jasutopian 文化产品的保护、推广与国际传播。这些资源将由文化交流委员会负责管理。资源分配决策将优先考虑艺术水准，由正在执业的艺术家、音乐家、电影制作人、作家或其他文化专业人士组成的公民评审小组予以评定；依据该规定，任何政府官员、军官或情报官员均不得在此类小组中任职。

立法理由。艺术价值居于首位，政治宣传终归失效。唯有当受众将文化作品体验为未经刻意编排的艺术时，作品方能激发情感文化认同；若一部为传递外交讯息而拼凑的作品在艺术上归于失败，则其作为跨境人文化工具亦将彻底失灵。正如范·克莱本在莫斯科演奏柴可夫斯基以及纽约爱乐乐团在平壤演奏《阿里郎》所展现的那样，纯粹的艺术

造诣跨越紧张边界打动了听众。艺术价值绝非点缀，而是整个机制得以成立的核心条件。

第CVII条。国际文化交流将遵循互惠原则进行。Jasutopian 国家[或领土] 不得以压制、取代或贬低他国文化表达的方式，将自身文化投射到其他国家之上。映照是指承认并反映特定国家自身所珍视的特质；投射是指将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强加于另一国家。互惠意味着 Jasutopian 国家将积极寻求接收并接触其他国家的文化产品，并为此提供与其传播本国文化产品同等的制度性支持。话虽如此，任何 Jasutopian 政府实体均不得强迫或强制公民消费来自任何特定国家的文化产品。

立法理由。镜像映照建立同理心，单向投射滋生怨怼。这条界线将真实的跨境交流与文化帝国主义彻底区分开来，因为唯有公众的自发接纳，方能使情感与认知同理心路径毫无阻碍地运行；依据真实性准则，公民可自由选择所要接触的作品，而委员会仅负责扫除障碍，绝不强迫消费任何作品。

国际先例为互惠原则提供了依据。欧洲联盟的国际文化关系战略将互利确立为一项治理原则（European Commission, 2016）。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蓝图在协商一致、互不干涉与文化多元主义的基础上构建文化合作（ASEAN, 2016）。非洲联盟的《非洲文化复兴宪章》要求各成员国致力于开展相互文化互动，以此作为政治团结的基础（African Union, 200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重申各国享有在其领土上采取措施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的主权权利，并要求缔约方为此加强合作（Singh, 2010; UNESCO, 2005）。在有一点上，本章各条款与该《公约》有所不同。该《公约》为各国保留的措施包括在“国内领土上现有的全部文化活动、产品和服务中，为本国文化活动、产品和服务提供机会”（UNESCO, 2005, Art. 6）；而第CIII条不允许采取任何限制公民接收国外作品以偏袒本国作品的措施，因为该机制正是通过触达民众的作品发挥作用的，且Jasutopian国家是依据第CVI条通过扶持来保护本国文化表现形式的。这四种在三大洲独立发展起来的制度模式表明，相互互动可以作为一项结构性原则写入正式法律文件，而不仅仅是一种外交偏好。第CVII条在Jasutopianism的宪法架构中将这一原则法典化。

第**CVIII**条。源自其他国家的文化产品所享有的版权保护，将在Jasutopian国家[或领土]内按照适用于本国文化产品的同等标准予以尊重和执行[参见确立80年公有领域门槛的第XCV条]。进入公有领域的文化产品将继续保持免费开放获取，用于教育、文化与艺术目的。任何政府实体均不得限制获取源自其他国家的公有领域文化产品；本着这一精神，绝不允许文化交流的制度性基础设施对其本应保护的交流本身设置障碍。必须维护该机制的完整性，使其高于行政便利。

立法理由。本条将同理心与制度反馈循环锚定于合法获取这一环节：跨境文化人文化要求公民能够真正触及外国艺术作品。版权保护确保创作者因其作品获得应得的认可，从而维系持续的艺术产出 [国内创作者及外国权利人所获认可的具体非货币形式，详见第VI节]。80年的公有领域门槛则确保年代更为久远的作品继续作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而普遍可及，这与第XCV条保持一致。



第**CIX**条。在国际紧张局势、冲突或正式宣告的危机[即第I、II与IV条中的术语；国家危机由行政权依据第XVI条宣告]时期，各国之间文化产品的自由流动不得暂停。在此类时期，只有在第CIII条允许的理由之下，且经排除合理怀疑予以证明后，方可对特定的文化产品加以限制。在国家危机期间，其中，第XVI条中止司法权的行使，该项认定将

由立法权依据第XVI条的危机程序作出，每次仅针对单一产品，且司法权应在危机结束之后对每一项此类认定进行审查。在危机期间，文化产品的自由流动享有第XVI条赋予第I条与第IV条的同等地位：任何法律均不得予以剥夺。

立法理由。当外交紧张局势达到顶峰时，情感文化威慑最为迫切。这是因为危机期间持续的文化接触能够维系抑制局势升级的心理屏障 (Kertzer & Zeitzoff, 2017; Cikara et al., 2011)。在危机中中止文化交流，恰恰削弱了防止政治紧张滑向大规模暴力的制约力量。在对峙期间暂停文化交流，无异于在最危险的时刻解除威慑保障。第II条禁止制定限制三大立国原则的法律，“除非处于正式宣告的危机时期” (Rodriguez, 2021, Art. II)，而第XVI条允许立法权制定危机法规，但须设定“对第I条及第IV条的严格推翻性例外” (Rodriguez, 2021, Art. XVI)。第CIX条赋予文化交流与第I条及第IV条完全相同的危机法律地位，从而增补第XVI条而不改动其任何措辞。第XVI条规定的危机表决门槛维持不变，即参议院五分之四多数、公民议院百分之四十多数，以及行政权的一致批准。

历史先例印证了危机期间公众文化依恋的持久韧性。冷战期间，苏联对西方音乐的禁令归于失败；听众将摇滚乐录音压制在废弃的医用胶片上，并在禁令之下传抄磁带。在2001年至2002年印巴核对峙期间，巴基斯坦于2002年2月封禁了印度电视频道，但到2003年8月，由于观众因无法收看这些频道而纷纷退订，巴基斯坦有线电视运营商以全国性罢工相威胁，要求恢复播出相关频道 (Al Jazeera, 2003)。同样，在美中战略竞争加剧期间，美国用户强烈抵制旨在封禁TikTok [第5章专栏5.1所探讨的由外国设计的短视频平台] 的立法举措；尽管最高法院于2025年1月维持了该项法案，公众的依恋情绪仍推迟了执法进程，并促使最终结果转向2026年1月的剥离与合资出售安排，而非彻底关停。在上述任何事件中，国家禁令均未能消解公众的文化参与。Jasutopian政府绝不应在最需要跨境人文化的时刻重蹈禁止文化交流的覆辙。

原法典中有一句话需要在第CIX条之外作出正式的宪法澄清，而非仅作非正式评注。Jasutopianism第IV条即使在正式宣告的危机时期亦禁止针对公民、非公民居民、战俘或无国籍人士设立“任何形式的集中营或拘留营”，并宣告：“Jasutopian国家在战争时期不活捉任何战时敌

人” (Rodriguez, 2021, Art. IV)。未经法典化的解释性注释既无法约束未来的军事指挥官，也无法满足国际人道法的审查要求。鉴于第CII条锁定了第I条至第CII条的文本使其不得进行文字修改，本卷根据第XCVI条通过正式宪法增补，将第IV条具有约束力的操作性义务编纂入典，并在拟议法典末尾将其编号为第CXXIV条，从而使第CIII条至第CXXIII条得以保留其确切顺位：

第**CXXIV**条。不俘虏与投降准则。[兹此郑重宣告]，第IV条关于Jasutopian国家在战时不得活捉任何战敌的宣告，应严格解释并执行为宪法层面对于俘获、拘留以及维持战俘羁押设施的禁止，而绝不得解释或执行为拒绝留活口或杀害已放下武器之战斗人员的授权或命令。凡投降之敌方战斗人员，或因负伤及解除武装而丧失战斗能力之敌方战斗人员，均应在不加伤害的前提下予以接纳、解除武装、依据三大立国原则提供必要医疗照护，并迅速解除Jasutopian管辖而予以释放，其方式可为经核实的移交至中立第三方国家或公认的国际人道主义机构，或经由交战线直接假释遣返。任何行政权官员，以及武装部队的任何指挥官或成员，均不得下达或服从处决投降或丧失战斗能力之战斗人员的命令；其中，任何违反本条之行为均构成受司法权审理的严重罪行，即便在正式宣告的战争或国家危机期间亦不得克减。

法理依据。第IV条禁止针对包括战俘在内的所有人群设立集中营和羁押营。这一解释是从第IV条本身读出的。其第一句禁止为战俘设立羁押营，因此该条知道敌人可能活着落入本国之手。其第三句指明谁被接纳进入本国[难民，经由合法审查程序]，而这两句之间的那一句则指明谁不被接纳。在这样的上下文中解读，“不活捉任何战时敌人”意味着不在本国境内为敌方战斗人员提供羁押之所。它并不命令任何杀戮。若有一种解读作此命令，便会使第IV条与生活这一立国原则以及本书自身对死刑的拒绝[第XXXIV条]相抵触，并且会命令自1907年以来战争法所禁止的事情，即宣布不留活口(Hague Regulations, 1907, Art. 23)。Jasutopianism赋予参议院“在一切立法分歧中，就一切词语或含义界定事项”的“最终发言权”(Rodriguez, 2021，治理三权条款，第I条第XXVII款)；第CXXIV条正是这一发言权，并已经全部三权通过。它所写下的准则同样是古已有之的法律：凡战俘无法撤离时，应在采取一切可行的预防措施保障其安全的情况下予以释放，而《日内瓦第三公约》规定了宣誓释放以及在中立国收容(Protocol I, 1977, Art. 41; Geneva Convention

III, 1949, Arts. 21 及 109 至 111)。鉴于第CII条锁定了第I条至第CII条的文本使其不得更改，第CXXIV条依据第XCVI条通过正式的宪法增补程序阐明了第IV条的执行义务。将第IV条、第CIX条与第CXXIV条合并解读，三者确立了一项连贯统一的法律标准：敌方战斗人员在投降后既不被监禁也不被处决，敌方民众既不被切断文化交流也不被非人化。

六、设计逻辑

全部七项文化外交条款[第CIII条至第CIX条]连同作为阐明条款的第CXXIV条，遵循着同一宪法设计逻辑，将其与原有的102条条款及本卷的国际架构联系起来。

持久性。与原有条款一样，这些规定在结构上旨在实现宪法的长久存续。第CII条规定："任何法律条款[I-CII]在整体获得通过后，均不得从本文件中删除或更改"（Rodriguez, 2021, Art. CII）。按其自身措辞，该文本锁定机制保护第I条至第CII条，而新增条款则通过第XCVI条规定的立法程序[参议院、公民议院、行政权与司法权]纳入法典，从而通过增补而非删改来填补法律空白。第CXXIII条[第8章]将该文本锁定延伸至拟议增补条款[第CIII条至第CXXIV条]，第CXXXV条[第12章]则将其延伸至第CXXV条至第CXXXV条，而严格限定的宪法替代议定书[第1、7、13章]则明确将第IV条与第CXXIII条归类为不可克减的核心保障。同理心与制度反馈循环依赖于制度的持久性。缺乏宪法庇护的同理心在动员历史积怨的政治行动者面前依然脆弱；而缺乏公民同理心的宪法庇护，一旦公众丧失维护开放的意愿便会遭到侵蚀。法典化由此保护该循环免受短期政治算计的侵害。

与原**102**项条款的整合。这些拟议条款并非孤立存在。它们在多个节点上与原法典相衔接。

拟议条款	与原条款的衔接	衔接的功能
CIII（受保护的文化交流）	第III条（言论自由）、第V条（新闻自由）	文化交流获得与言论及新闻同等的宪法保护
CIV（文化交流委员会）	第CI条（参议员任期与任期限制）、治理三权条款（参议院、公民议院、弹劾）	该委员会由Jasutopianism业已确立的机构与程序进行提名、确认及罢免

拟议条款	与原条款的衔接	衔接的功能
CV（公共登记簿）	第LXXXV至LXXXVIII条（国民身份记录系统，详见论点VIII）	记录系统为政府记录交易；登记簿则增设了原条款中所没有的每位公民的查阅权
CVI（艺术价值分配）	第LV至LXX条（公民全国民主商业委员会）	文化专业人士治理文化资源分配，如同企业主治理商业监管
CVII（互惠）	第IX条（地位升级中不得歧视）	不歧视原则从国内对待公民延伸至国际对待不同文化
CVIII（版权）	第XCV条（80年公有领域）	国际版权与现行国内版权规定相协调
CIX（危机存续）	第XVI条（立法权的危机法律）、第I条与第IV条（危机期间绝不剥夺）	文化交流获得第I条与第IV条所享有的危机地位

无货币条件下的资源配置。这些条款论及在一个没有货币的国家中的资助、预算程序以及创作者的收益，而每一个词汇的含义均取自Jasutopianism业已确立的制度安排。原书规定军种“以季度政府资助的形式获得资源”（Rodriguez, 2021, Argument X），并且规定“除非依据法律作出的拨款”，否则不得从公共储备中提取任何资源（Rodriguez, 2021, Articles of the Three Authorities of Governance, Art. II）。因此，第CIV条与第CVI条项下的资助是指对资源、设施与时间的分配：即作品所需的材料、工作室、舞台与乐器，以及如同所有劳动一样计入艺术家劳动并为其赚取地位等级积分的工作时长[第XI条]。预算则是指立法权依法对该等资源作出的拨款。第CVIII条项下创作者的收益，属于论点VIII就每笔经记录的交易赋予企业主与雇员的那类积分，该积分可转化为地位等级积分；本书将此项积分延伸至作品的创作者，每当作品的交易被记录时即予计入。至于期望以货币获得报酬的外国权利持有人，其报酬支付方式与论点II中Jasutopian企业向外国企业支付其所供货物或服务的方式一致：依据条约或合同，以无货币成本提供的劳动力[即分支商业伙伴关系]或服务予以支付。原书已将公民“免费获取”外国企业“产品或服务”列为此类交换的目标之一，而本书将其适用于文化作品；其中，外国版权与订阅通过交换而非购买取得。该交换自过渡期第2年起即可施行[第6章]。

与情感文化威慑的兼容性。全部七项文化外交条款均在Jasutopianism的宪法序列中保护有机的跨境文化人文化机制，同时明确排除秘密的国家培植行为[第IV节阐明了理由]。由于情感文化认同取决于外国作品切实触及公民，第CIII条在与言论和新闻自由完全同等的宪法位阶上保护此种获取权。由于需要真实的艺术，第CVI条规定由同行艺术水准评审小组分配资助，而第CIV条则切断委员会与情报机构的联系。由于维系公众信任的是相互承认而非单向投射，第CVII条将对等原则法典化。由于外交摩擦期间的持续接触最为关键，第CIX条禁止在危机期间中止适用。这些规定按顺序编号为第CIII条至第CIX条[并以阐明条款第CXXIV条作为法典收尾]，将情感文化威慑锚定于具有约束力的法律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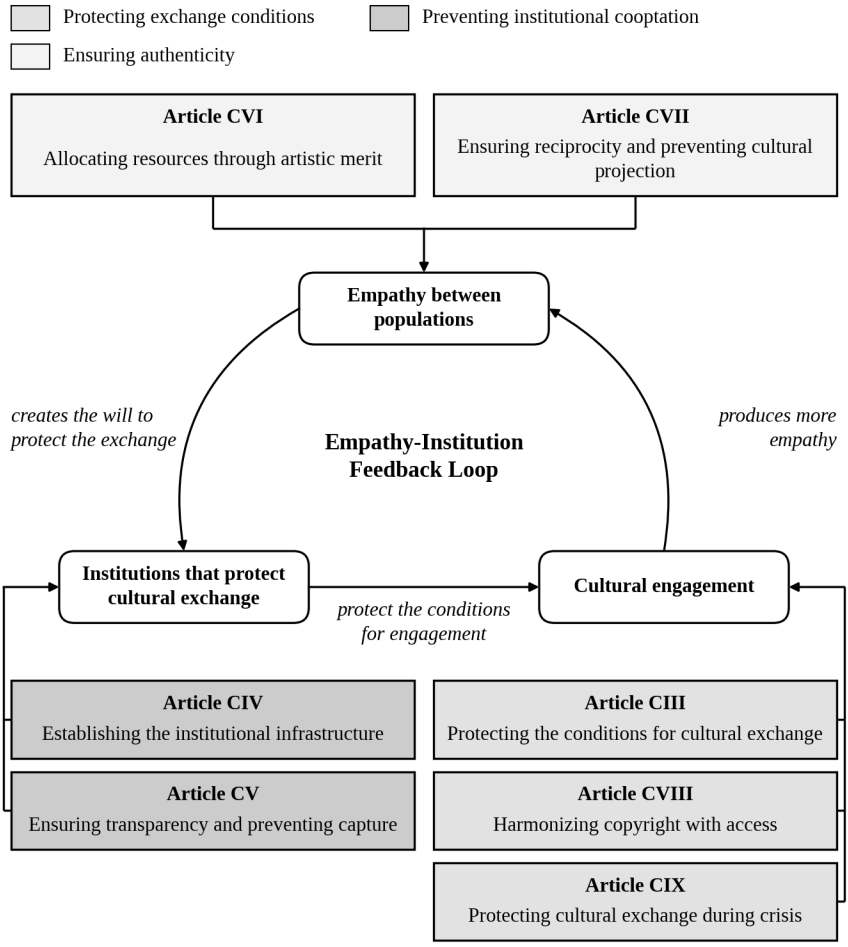


图 4.3. 文化外交条款：内在逻辑

七、作为宪法原则的真实性准则

真实性准则值得专节探讨。它不仅仅是一种设计偏好，而是这些条款旨在保护的机制所必需的结构性要件。

文化外交中的真实性问题已被记录为一个长期存在的难题。Zamorano指出，软实力话语在将文化影响力呈现为治国方略工具的同时，也助长了文化生产的工具化：将艺术家、音乐人、电影制作人与作家视为外交政策的代理人，而非自主的创作者（Zamorano, 2016）。Ang、Isar与Mar主张，文化外交必须为真诚的接触而非战略性的信息传

递开辟“关系空间”，因为接触本身能够建立相互理解，而战略算计则会腐蚀这种理解（Ang et al., 2015）。Rivera记录了英国文化协会如何正是通过在运作上独立于国王陛下政府来维持机构公信力；保持一臂距离的自主性并非奢侈品，而是使该机构保持有效运作的必要条件（Rivera, 2015）。

实证心理学从另一角度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关于情感认知同理心路径的研究表明，共情关怀与观点采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感知到的真实性以及非强迫的情感投入（Decety, 2012; Batson, 2011; Hoffman, 2000; Cikara et al., 2011）。资金来源本身影响甚微，一旦被察觉存在操纵，同理心便会瞬间消弭。将一首歌曲或一部电影视为真诚创作结晶的受众，会体验到情感文化认同并拉近外群体距离；而察觉到秘密部门宣传信息的受众，则会立即触发认知抵触，从而将同理心完全拒之门外；真实性准则绝非空洞的修辞，这是因为机构对艺术内容的干预恰恰摧毁了其声称要捍卫的人文化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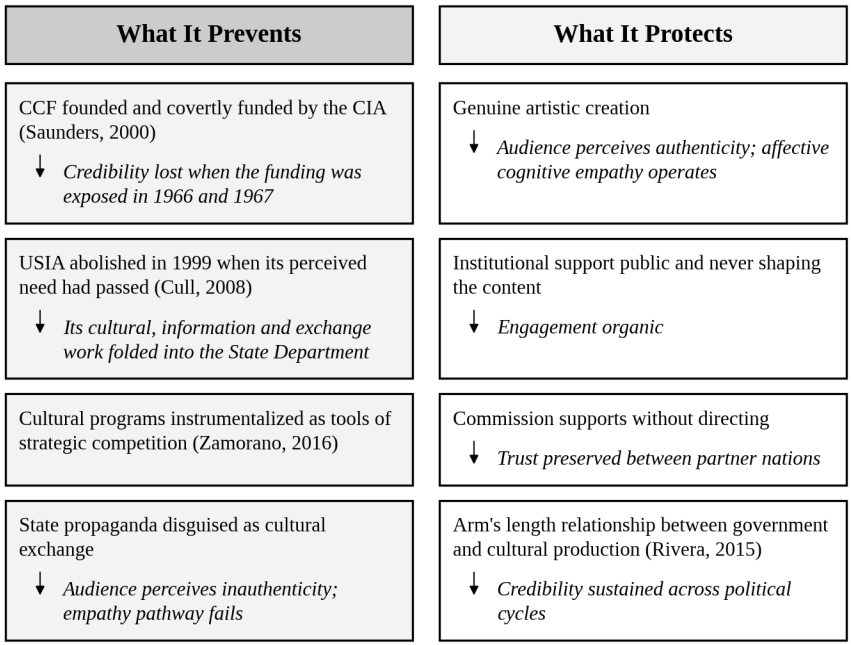


图 **4.4.** 真实性准则：其所防范之弊与所保护之基

八、缺口所需与条款所予

第1章为本卷的国际与文化架构引入了同理心与制度反馈循环。第2章通过多分辨率人文化与永恒相对论概念III扩展了其认知与情感基础。第3章记录了公民信任与公正制度之间的国内互惠关系。在跨越国界的层面上，该循环形成了一个相互强化的闭环：跨境同理心为保护性文化法律建立政治支持，保护性法律庇护真实的文化接触，而持续的接触又进一步拓宽跨境同理心。

这需要三个组成部分。第一，一项跨越国界连接民众的人文化机制：以情感认知同理心研究为基础，通过真实的音乐、电影、文学与表演运作的跨境文化人文化（Decety, 2012; Batson, 2011; Cikara et al., 2011; Kertzer & Zeitzoff, 2017）。第二，一套能够庇护这种开放性的持久宪制体系：Jasutopianism的法律条款、治理三权以及第CII条的文本锁定。第三，一座将跨境文化开放嵌入国内宪法的明确法律桥梁。第CIII条至第CIX条[连同阐明条款第CXXIV条]正提供了这座桥梁。

缺少这些条款，法典便仍不完整。

情感文化认同能够降低群体间敌意。Jasutopianism保护国内自由与制度完整性。然而，原有的102条条款中没有任何规定将这两部分连接起来，使得跨境文化获取暴露在政府更迭的影响之下，既缺乏独立委员会，又缺乏双边对等，也缺乏危机存续能力。七项文化外交条款弥合了这一缺口，而第CXXIV条则使第IV条的不俘虏义务无可争议。

这些条款干脆利落地实现了上述目标。国内主权完整无损，艺术自由在真实性准则之下继续受宪法庇护，且第I条至第CII条的字句未改动分毫。

IX. 从条文迈向数字治理

建构已经展开。

本章梳理了Jasutopianism在国际法层面的空白，阐明了支持宪法持久性的三项论据，确立了三项设计规则[真实性准则、制度分离与对等原则]，起草了第CIII条至第CIX条以及阐明条款第CXXIV条，并逐一

核验了其与原有102条条款之间的每一项结构性关联。横跨三大洲的条约先例证实了运作可行性；宪法法典化则赋予其持久性。

第5章直面下一个缺口。原法典于2021年发布，当时由算法驱动的常驻数字平台尚未重塑日常文化生活，因此法典缺乏数字平台法。七项数字文化互动条款[第CX条至第CXVI条]，辅以针对合格数字交易的具有可执行性的反刷量定义，将全部三项设计规则直接引入数字领域。

第CIII条至第CXVI条共同为同理心与制度反馈循环提供了法律基础。

建构仍在继续。

参考文献（第4章）

African Union. (2006). *Charter for African cultural renaissance*. African Union.

Al Jazeera. (2003, August 23). *Pakistani cable strike over TV ban*.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03/8/23/pakistani-cable-strike-over-tv-ban

Ang, I., Isar, Y. R., & Mar, P. (2015). Cultural diplomacy: Beyo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21*(4), 365-381.

ASEAN. (2016). *ASEAN socio-cultural community blueprint 2025*. ASEAN Secretariat.

Batson, C. D. (2011). *Altruism in huma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ikara, M., Bruneau, E. G., & Saxe, R. R. (2011). Us and them: Intergroup failures of empathy.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3), 149-153.

Cull, N. J. (2008).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 1945-198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ecety, J. (Ed.). (2012). *Empathy: From bench to bedside*. MIT Press.

European Commission. (2016). *Towards an EU strategy for international cultural relations*. JOIN(2016) 29 final. 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

Geneva Convention III. (1949). *Geneva Convention relative to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of war*, 12 August 1949, 75 U.N.T.S. 135.

Hague Regulations. (1907). *Regulations concerning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war on land*, annexed to Convention (IV) respecting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war on land, The Hague, 18 October 1907.

Hoffman, M. L. (2000). *Empathy and moral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for caring and jus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ber, P. (2017, June 11). The spy who funded me: Revisiting 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the-spy-who-funded-me-revisiting-the-congress-for-cultural-freedom/

Kertzer, J. D., & Zeitzoff, T. (2017). A bottom up theory of public opinion about foreign polic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1*(3), 543-558.

Mark, S. (2009). *A greater role for cultural diplomacy* (Discussion Papers in Diplomacy No. 114).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ingendael'.

Protocol I. (1977). *Protocol additional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s of 12 August 1949, and relating to the protection of victims of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s*, 8 June 1977, 1125 U.N.T.S. 3.

Rivera, T. (2015). *Distinguishing cultural relations from cultural diplomacy: The British Council's relationship with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CPD Perspectives on Public Diplomacy, Paper 1). Figueroa Press.

Rodriguez, J. (2021). *Jasutopianism*. [Self-published].

Saunders, F. S. (2000). *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The New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9)

Singh, J. P. (2010).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Creating norms for a complex world*. Routledge.

UNESCO. (2005).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 https://www.unesco.org/en/legal-affairs/convention-protection-and-promotion-diversity-cultural-expressions

Zamorano, M. M. (2016). Reframing cultural diplomacy: The instrumentalization of culture under the soft power theory. *Culture Unbound*, *8*(2), 165-186.

第5章：数字治理：栖居平台时代的条款



I. 体系建构的延续

第4章提出了七项文化外交条款[第CIII条至第CIX条]以及澄清性的第CXXIV条。这些条款在Jasutopian国内治理与跨境文化人文化之间架起了宪法桥梁。它们保护国际文化交流。它们将文化交流委员会设立为与情报机构分离的独立机构。它们将真实性准则编纂为具有约束力的宪法标准。它们强制规定各国文化关系须遵循双边互惠原则。它们要求文化交流在外交危机期间仍须持续进行。这些条款以原著的宪法体裁起草，并承载第CXXIII条所赋予的持久性锁定机制，将第CII条的效力延伸至新法典。

它们尚不足够。

2021年Jasutopianism问世之时，音乐、电影、文学、视觉艺术、戏剧与舞蹈在跨境文化传播中占据主导地位。创作者完成一部独立作品；海外受众通过传统分发渠道接收这一成品。在平台治理学术研究中，分发成品文化作品的平台主要作为传导管道而非日常公民栖居地运作（Van Dijck, Poell, & De Waal, 2018; Gillespie, 2018）。本书将此类渠

道称为“受推崇平台”，并将其所传播的独立作品称为“受推崇文化产品”，借此将其与结构截然不同的另一类数字基础设施直接区分开来。

格局已然转变。

自2021年以来，另一类独立的制度形态已成为日常文化生活的主要场域：栖居型数字平台。公民并非每周仅在其中浅尝一次文化。他们每日栖居于其中。本书直接借鉴平台社会理论（Van Dijck et al., 2018）、内容审核研究（Gillespie, 2018）、平台化政治经济学分析（Rahman & Thelen, 2019）以及数据殖民主义理论（Couldry & Mejias, 2019），将栖居型平台界定为一种互动式数字环境，其中，特定的用户通过持续的习惯性参与来创造、分享、辩论并策展文化身份。接触不再是偶发性的；它是递归的、算法驱动的，并与自我表达本身紧密交织。短视频信息流、互动视频网络、社交即时通讯场域以及参与式创作者空间体现了这一类别的当代形态，不过未来的任何读者皆可将其替换为特定的人群彼时所栖居的任何互动网络。由于栖居型平台在集中网络效应与行为数据提取的同时中介社会身份，因此它们需要专门的宪法条文加以规范。

普通成文法会随势漂移。宪法则稳固长存。鉴于普通监管法规容易屈服于企业游说与党派控制权的更迭，而栖居型网络却持续跨越国界重组日常公民生活，本章提出七项数字文化互动条款[第CX条至第CXVI条]，并辅以具有可执行力的合格数字交易界定以及用于非货币对外结算的主权清算中介机构，从而将Jasutopianism的法律架构永久延伸至栖居型平台时代。

II. 时间缺口

这一制度空白必须被清晰陈述。其确切形态决定了相应的法律救济方案。

Jasutopianism的102项法律条款规范了起草之时所能辨识的公民生活之每一主要领域。就业。教育。刑事司法。商业。公民身份。民主程序。媒体核查。住房。军事监督。宪法持久性。第4章将该法典延伸至跨境文化外交领域。然而，在原有的102项条款中[亦不包括第CIII条至

第CIX条]，没有任何一条规范着如今跨境文化生活主要依托其流转的互动数字平台。

这是一个时间缺口，而非哲学缺口。

Jasutopianism的根本原则无需修改即可触及数字生活。自由、生活与繁荣对网络社交环境的约束力，一如对实体街道般直接。第III条的言论自由规定涵盖数字表达；第V条的信息来源核查规则涵盖数字新闻报道。第LXXXV条至第LXXXVIII条所确立的国民身份记录系统[详见论证VIII]记录着特定的国家或领土内的每一笔经济交易，这本身即已预设了数字账本上的制度透明度。宪法根基业已完备。只是针对平台的专项条款尚未撰写而已。

平台学术研究阐明了为何这一时间滞后蕴含极高的制度风险。Van Dijck et al. (2018) 指出，连接性平台通过数据化、商品化与算法筛选的私人架构，重组了核心公共价值[新闻传播、公民社群、审美趣味与集体认同]。Gillespie (2018) 论证了内容策展与审核乃是平台之所以为平台的构成性要素，绝非中立的技术管道。Rahman 与 Thelen (2019) 追踪了平台企业如何将网络效应转化为持久的基础设施权力，而 Couldry 与 Mejias (2019) 则将持续的行为数据攫取界定为一种结构性的剥夺形式。与受推崇的分发渠道[即特定的公民定期串流播放专辑或阅读翻译小说之处]相比，栖居型平台不断积累着持续的日常互动，其中，用户自身的创意产出与社会关系均栖居于算法策展的信息流之中。这种差异并不仅仅在于登录停留的分钟数。它是结构性的。当一国人口栖居于外国所有的平台之上时，对该数字栖居地的依附便会与国家数据主权直接发生碰撞，从而产生普通电信法规在起草之时从未打算解决的治理张力。

专栏 5.1：历史参考案例

美国围绕 TikTok 的争议提供了一个精炼的历史参考案例，说明对栖居型平台的依附如何与国家主权法律发生碰撞。这款短视频应用自2017年面向国际推出以来，在Jasutopianism于2021年出版后的数年间实现了大规模的日常普及，其将外国公司所有权与根据个人观看模式精准校准的算法信息流筛选机制结合在一起。联邦当局先是于2020年通过行政命令、继而于2024年通过联邦成文法，以行为数据收集及对国内公民的算法影响为由，试图迫使其剥离资产或予以禁止。2025年1月17日，

美国最高法院在 *TikTok Inc. v. Garland* (2025) 一案中维持了2024年法案的合宪性。然而，即便未能推翻司法权威，民众的依附感依然塑造了最终的实际解决方案。整个2025年期间，行政命令多次推迟执法，与此同时谈判朝着重组而非彻底移除的方向推进，最终于2026年1月23日将美国国内业务移交予 TikTok USDS Joint Venture LLC，其中，外国母公司 ByteDance 保留了略低于20%的少数股权。这一事件作为跨越未来各代平台的制度教训历久弥新：一旦某国人口栖居于外国设计的数字环境中，粗暴禁止便会激起强烈的公众抵制，而规范透明度、操纵、数据驻留以及对等准入的宪法规则，则能够在不切断公民文化生活的前提下约束平台的行为。

任何为二十一世纪编纂的治理架构若遗漏数字平台，便是自甘沦于过时。这七项条款正是为此填补了这一空白。



III. 为何数字平台需要宪法层级的治理

数字平台理应获得宪法层级的治理[而不仅仅是监管层面的关注]这一命题，乍看之下或许显得小题大做。世界各国政府皆通过普通立法对平台加以规制。欧盟《数字服务法》对透明度与内容审核提出了要求；澳大利亚《新闻媒体议价准则》规范了平台与新闻出版商之间的经

济关系；印度《信息技术规则》则规制了其国内数字空间中的内容。若普通监管已然足够，那么将其编纂入宪法似乎便属多余。

以下三项论证阐明了为何在Jasutopian体系内仅仅依靠普通监管并不足够。

第一，平台权力具有结构性。

K. Sabeel Rahman与Kathleen Thelen已经证明，平台公司代表的不仅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更是资本主义自身的结构性转型。平台权力通过以下三重路径集聚：网络效应[更多用户吸引更多用户，从而形成极少有新进入者能在缺乏公共支持的情况下跨越的准入壁垒]、数据优势[更多数据促成更精准的预测，进而在平台与用户之间制造信息不对称]以及基础设施控制[平台自身成为市场本身，而非仅仅是市场内的单一参与者](Rahman & Thelen, 2019)。这种结构性权力与传统企业的市场力量存在本质差异。传统垄断控制的是某一种产品或服务，而平台垄断控制的则是整类人类活动赖以发生的基础设施。普通监管应对的是偶发性的市场失灵，宪法编纂应对的则是结构性转型。如果平台已经重构了文化交流的经济逻辑[而现有证据表明它们确实如此]，那么治理上的回应就必须与这种转型的结构性本质相匹配。普通立法在政治算计发生变化时可以被废除；而宪法条款[依据延展第CII条锁定效力的第CXXIII条]则不可废除。美国新闻署（USIA）的教训于此同样适用：若将平台治理交由普通立法处理，一旦政治意愿发生转移，该治理框架便会被拆解，正如USIA在1999年因外界认为不再需要文化交流而遭裁撤一样(Cull, 2008)。

第二，算法不透明违反了Jasutopianism哲学架构的一项基础原则。

永恒相对论概念IV认为，社会问责源于理解。当公民能够追溯制度决策的信息历史时，问责便成为可能，而问责会造就一种状态，在其中，“国家拥有最高的人均真相”，并“因此拥有最纯粹的自由形式”(Rodriguez, 2021, TER, Concept IV)。Frank Pasquale记录了支配内容推荐、信用评分、声誉评估与信息流动的算法系统如何以他所称的“黑箱”[其输入、逻辑和输出对其所影响的人群均不透明的系统]形式运作(Pasquale, 2015)。黑箱算法恰恰是TER概念IV的对立面。如果公民无法

理解决定哪些文化产品触达他们的系统[以何种顺序、何种侧重以及经由何种筛选标准]，那么TER所要求的问责便无从实现。当介导文化互动的系统不透明时，催生人文化[概念III]与问责[概念IV]的信息追溯便无法发生。因此，在Jasutopianism之内，算法透明并非一项监管偏好，而是源于该治理体系自身哲学根基的宪法要求。

第三，数据榨取构成了对三大立国原则的结构性侵犯。

Nick Couldry与Ulises Mejias提出了“数据殖民主义”这一概念[即当代科技平台对人类行为数据的榨取在结构上与历史上的殖民主义相类似的论点]。这两个过程都是从对榨取毫无实质发言权的民众那里攫取资源，并将其转化为服务于遥远精英阶层的资产(Couldry & Mejias, 2019)。这种结构上的对应极为精确：当行为在未经知情同意的情况下遭到监控时，自由便受到减损；当注意力被商品化并被操纵以供商业榨取时，生活质量便会下降；当民众文化互动所创造的价值被外国股东攫取而非共享时，繁荣便遭到掠夺。每一项侵犯都对应着三大立国原则之一，而第II条保护这些原则免受在正式宣告的危机之外任何限制它们的法律的侵害。因此，Jasutopianism法典中的数据主权条款并非关于数据存储的技术性规章，而是扎根于该治理体系自身根本承诺的数字时代反殖民立法。

IV. 经济基础

前述论证确立了数字平台为何需要宪法层级的治理，但尚未解释为何Jasutopianism的平台治理路径有别于当前正在实施或已提出的每一种传统监管模式。这一差异在于经济制度。

传统的平台监管是在既有的货币经济体系之内运作的。欧盟《数字服务法》对依然受广告收入与数据变现驱动的平台施加了透明度与内容审核要求。美国拟议的各项监管方案处理数据隐私问题，却丝毫未触动数据榨取的激励结构。Robert Deibert提出了一种“克制”模式[对政府与企业均不得利用数字基础设施从事之行为施以法律与技术限制]，承认平台与国家同样对数字自由构成威胁(Deibert, 2020)。Terry Flew与Fiona Martin则记录了不同政治体制下从自律、共同监管到国家直接监督的监管路径光谱(Flew & Martin, 2022)。所有这些路径都存在一个共同的局限。

它们试图从经济体系外部约束监控资本主义，却听任经济体系本身保持不变。Gorwa (2024)记录了由此导致的政治后果：平台治理沦为与一个恰恰奖励被监管行为的经济体系之间永无休止的谈判。

Jasutopianism改变了经济体系本身。

在地位升级制度下[Jasutopianism，第XXXV条至第XLVIII条]，货币被一种以地位为基础的资本积累体系所取代。公民通过对Jasutopian共同体做出贡献来赢得地位，而地位决定了其获取资源与特权的资格。由于不存在货币化的广告产业，因而不存在广告收入市场；由于资本积累源于经证实的贡献而非货币投资，因而不存在通过投资回报实现的风险资本积累；又因为在没有货币的体系中行为数据无法换钱出售，因而不存在数据变现的激励。

监控资本主义的货币驱动力在Jasutopianism的经济架构中并不存在。有两项限定将这一论断界定在其真实的适用范围之内。首先，该论断适用于Jasutopian经济体内部的平台，而公民栖居最多的平台却归境外所有并由境外广告付费，因此它们榨取注意力与数据的激励并未受到地位升级的影响；下文提出的条款主要是为此类平台而设。其次，这一制度消除的是广告收入，而非所有激励。Jasutopianism依据企业记录的“交易数量”来衡量企业主的经营绩效(Rodriguez, 2021, Art. IX)，因此一个能留住公民反复访问的本国平台依然能使其运营者获益，且行为数据依然保留着其用于监控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并不需要货币。第CXII条与第CXIV条正是为应对这些留存问题而设。

Shoshana Zuboff将监控资本主义界定为一种新型经济逻辑：在未经实质同意的情况下榨取个人行为数据，通过机器智能加以处理，并将其作为预测产品出售给希望预判和影响人类行为的商业客户(Zuboff, 2019)。Nick Srnicek则按经济逻辑对平台进行了分类：广告平台[将用户注意力与数据变现]、云平台[出租计算基础设施]、产品平台[按需制造]、精益平台[最小化资产所有权]以及工业平台[连接生产者](Srnicek, 2017)。在地位升级制度下，第一类也是最强大的类别[广告平台]在Jasutopian经济体内部没有任何营收模式。在Jasutopian经济体内部，催生监控资本主义的广告逻辑是由经济体系自身予以消除的。不是通过监管，而是通过制度设计。

Trebor Scholz提出了平台合作主义[由在平台上创造价值的人共同拥有并治理的平台]，作为公司制平台所有权的替代方案。他确定了十项原则：集体所有权、体面薪酬与收入保障、透明度、数据与用户身份的可携带性、免受专断行为侵害、离线权、参与设计决策的权利、集体算法问责制、劳动者保护以及拒绝过度监控(Scholz, 2016)。现实中已有相关案例，其成效参差不齐。由艺术家、员工及其顾问共同拥有的图库摄影合作社Stocksy至今仍在运营；而合作制交易平台Fairmondo以及由音乐人拥有的流媒体服务Resonate (Scholz & Schneider, 2017)则均已关闭。这些案例表明，平台合作社在货币经济中能够运作，但难以维系。而在Jasutopianism的经济体系中，平台合作主义并非与货币资本主义的主导激励结构艰难抗衡的替代品，它是以地位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中数字平台组织的自然形态。从用户身上榨取广告收入的激励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有向共同体做出贡献的激励，以及地位等级积分仍会赋予的对用户参与度的吸引力，后者将由第CXII条予以规范。

这一区分至关重要，读者必须牢记在心，方能理解下文各项条款。

数字文化互动条款并非打在一个激励监控的经济体系上的监管补丁，而是嵌入在一个消除了监控之货币激励的经济体系中的宪法条款。这些条款规范两类事务：其一，在Jasutopian经济体之外依然受货币驱动力支配的外国平台；其二，在该经济体内部消除广告收入之后所留存的问题，即地位等级积分仍会赋予的对用户参与度的吸引力，以及透明度、文化主权、互惠与民主监督等议题。这些是治理问题，而非对此等情形的市场纠偏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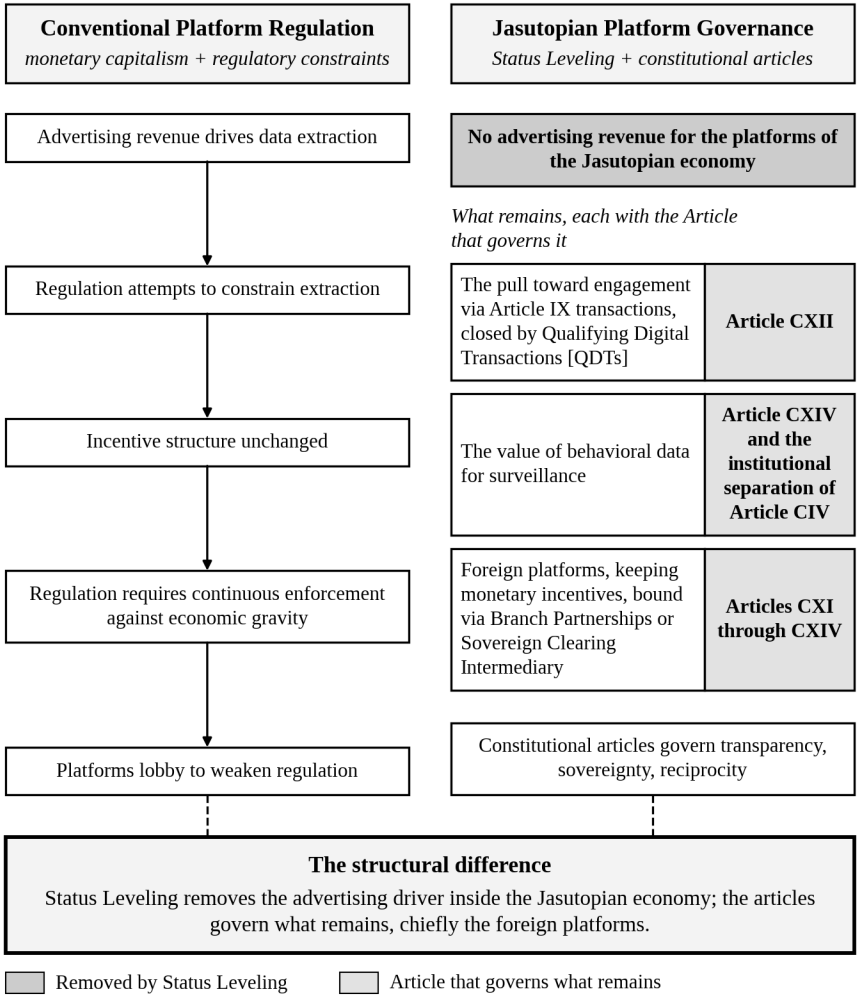


图 **5.1.** 经济基础：地位升级消除了什么与保留了什么

V. 数字文化互动条款

以下条款[第CX条至第CXVI条]规范Jasutopian国家[或地区]境内的数字平台。这些条款系作为现行102条法律条款及前述文化外交条款[第CIII条至第CIX条]的延伸而起草，旨在填补第二节所指出的时间空白，即在栖居型平台成为文化交流主要载体之前起草的法典中缺乏对数字平台的治理。每项条款均印出其条文规定，唯有条文部分被提议作为法律；随后的“理由”则为评注。

持久的治理立足于两个相辅相成的锚点：历久弥新的人类同理心能力与根深蒂固的宪法性法律。经过同行评审的心理学研究证实，跨越社会界限的情感共享、观点采择以及道德关切能力，是人类跨代际发展中反复呈现的固有特征 (Decety, 2012; Batson, 2011)。宪法固着则增添了制度性锚点：第CII条宣告，原有的第I条至第CII条在通过后永不得删除或改写 (Rodriguez, 2021, Art. CII)，而第CXXIII条将该文本锁定延伸至第CIII条至第CXXIV条。两者结合，便产生了一种任一锚点单独都无法实现的特性；其中，同时依托人类同理心社会性与永久性法律的体系，能够抵御足以单独击碎任一保护机制的冲击，因为怀有敌意的政府或许会限制交流，但人类的好奇心依然长存；两极分化的公众或许会冷落一项既定成文法，直至公民参与再度将其唤醒。本卷将这一双重防线命名为持久性架构，并在第8章追溯其自我执行结构，在第11章阐述其制度惯性，在第13章剖析其跨层级冗余机制。

制度信任研究与比较数字审查案例表明，同理心与制度反馈循环同样会逆向运转。Rothstein (2005) 证实，社会信任在结构上极易受到制度背叛的损害：一旦公平、普适的公共规则遭到拆解或被党派控制所俘获，公民便会下调自身预期，合作随之崩解为防御性的不信任，而政治行为体在拆解进一步保障措施时所面临的阻力也会随之减弱。比较案例印证了一旦法律保护失效，跨境文化开放度会以多快的速度遭到侵蚀。俄罗斯于2014年退出“未来领袖交流项目”（Future Leaders Exchange），颁布了将外国公民组织定性为“不受欢迎组织”的2015年法令，并扩大了国家对外国数字平台的过滤；在2025年5月印度与巴基斯坦危机期间，印度监管机构指令流媒体服务下架巴基斯坦制作的电影、音乐、剧集与播客。抽去真实文化接触的法律庇护，持续的群体间接触便会萎缩；在国家审查下压缩接触，显著的历史积怨便会加剧；而一旦这些积怨固化，民众便会转而支持对昔日邻邦筑起更深层的数字壁垒。反馈机制是双向运转的。宪法保护的存在，正是为了在这一下行螺旋加速之前将其遏止。

第**CX**条。在Jasutopian国家[或地区]境内运营或可供Jasutopian公民访问的数字平台，出于治理目的应划分为两类。栖居型平台是指公民通过持续、习惯性的互动在其中创造、分享和消费内容的平台，该平台作为形成与表达文化身份的社会环境而发挥作用[此类平台的示例包括社交媒体平台、视频分享平台以及互动数字社区等]。仰慕型平台是指公

民在其中消费他人创作的文化产品而无需持续主动互动的平台，该平台作为文化产品的分发渠道而非社会环境发挥作用[此类平台的示例包括音乐流媒体服务、电影发行平台、数字书店及类似服务]。这两类平台均受第CIII条[将国际文化交流作为受保护活动]的保护。第CXIV条规范上述任一类别的所有数字平台，第CXI条规范在Jasutopian国家[或地区]境内运营的所有此类平台。栖居型平台还进一步受第CXII、CXIII、CXV及CXVI条的规范。

理由。这一分类并非任意而为。Van Dijck et al. (2018)已经表明，中介重要社会功能[新闻、教育、社区形成、政治话语]的平台在结构上不同于仅分发文化产品而不中介社会生活的平台。这一区分属于治理功能层面：栖居型平台引发了身份形成与文化主权问题，而仰慕型平台引发此类问题的程度要小得多。透明度与数据则是另一回事。音乐流媒体服务或数字书店同样会筛选并排序向每位用户展示的内容，也同样会记录每位用户收听或阅读的内容，因此第CXI条与第CXIV条的立法理据对其完全适用。故而这两项条款适用于所有数字平台，而两类平台之间的区分仅适用于针对作为社会环境的平台所撰写的条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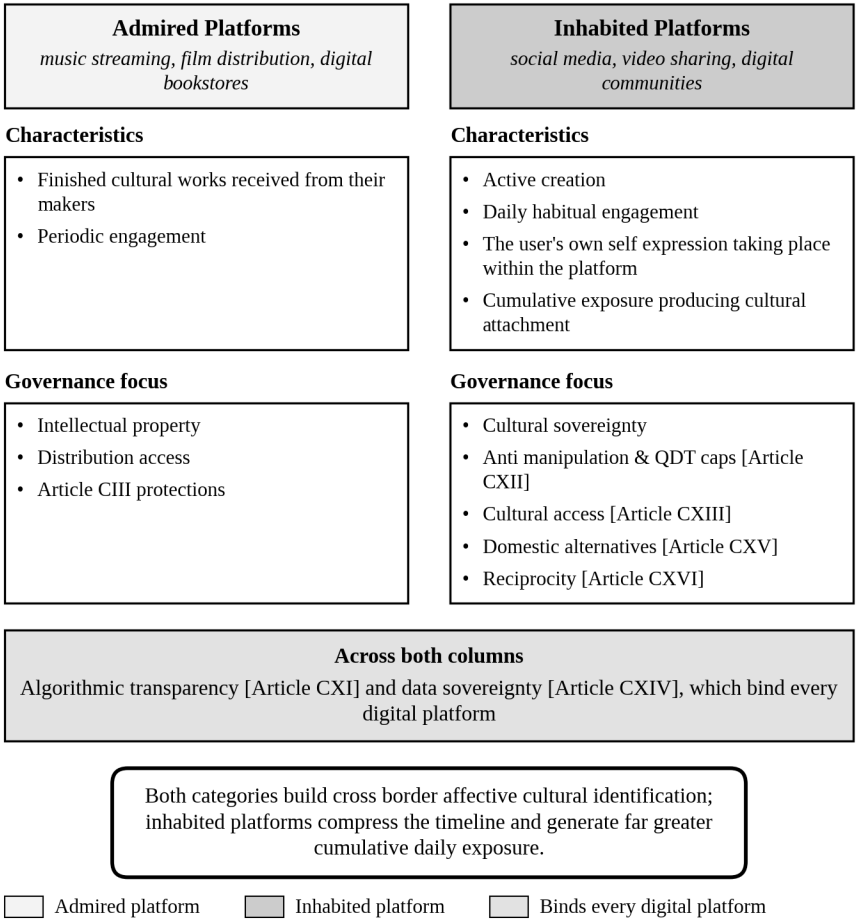


图 5.2. 栖居型平台与仰慕型平台对比：治理含义

第CXI条。在Jasutopian国家[或地区]境内运营的数字平台，无论栖居型抑或仰慕型，均须以每位公民均能清晰获取并理解的方式，向其用户披露以下信息：第一，用于向用户筛选、排序或推荐内容的算法系统；第二，从用户处收集的个人数据类别；第三，个人数据的使用目的；第四，与之共享个人数据的任何实体；第五，规范何种内容被允许以及何种内容被移除的内容审核政策。该披露应以文化交流委员会征询立法权意见后确定的标准化格式提供。文化交流委员会应监督本条及第CXII条至第CXIV条的遵守情况，并将涉嫌违规的行为移交司法权，唯有司法权有权作出认定。一旦认定违规，司法权应命令运营者在规定期限内纠正该做法。若命令未获遵守，本土运营者将面临地位等级积分扣

除，并在极限情形下被吊销营业执照；外国运营者则面临对其在Jasutopian国家开展业务协议[其借以开展业务的分支商业伙伴关系以及向其支付报酬的资源交换]施加限制条件，并在极限情形下予以中止；其中，中止协议须经公民议院批准。第CXI条至第CXIV条项下的一切救济措施均仅作用于运营者本身，任何救济措施均不得限制公民本人获取平台所承载的文化产品。

法理依据。本条的宗旨明确而精准。算法策展并非中立。它决定了哪些文化作品、以何种顺序触达哪些公民。倘若跨境文化人文化取决于与域外创作作品的真实相遇 [正如第4章所确立并由第CIII条至第CIX条所法典化的那样]，那么公民就必须能够检视介导这一相遇的算法规则。Pasquale 对算法黑箱的分析表明，不透明的排序系统阻断了民主问责所需的信息追溯 (Pasquale, 2015)。TER 概念 IV 确立了问责源于可追溯信息的原则。算法内容筛选是一项塑造公共文化的制度性决策；该过程中的不透明性直接违背了 Jasutopianism 的宪法前提。披露义务对鉴赏型平台与栖居型平台同等具有约束力，这是因为流媒体目录对听众接下来听到的内容进行排序，正如交互式信息流对观众看到的内容进行排序一样。执法权保持严格分离：文化交流委员会负责监督合规情况并移交涉嫌违规案件，而唯有司法权方能作出裁决，从而确保扶持文化交流的机构绝不自任法官。国内运营方通过扣减地位等级乃至吊销营业许可来承担责任 [将第XXXIII条规定的法院裁定扣分处罚延伸至商业许可领域]，而外国运营方则通过其运营协议承担责任 [即下文所述的论证 II 项下的双边分支商业伙伴关系或主权清算中介机构结算机制]。

第**CXII**条。在Jasutopian国家[或地区]境内运营的任何栖居型数字平台，均不得将个人行为数据[包括但不限于浏览历史、互动模式、情绪反应及生物特征数据]用于以将汲取置于任何用户真实利益之上的方式操纵用户互动。算法策展[即协助用户发现其真正珍视的文化产品]是被允许且受保护的。算法操纵[即利用心理脆弱性以最大化互动指标从而实现汲取]是被禁止的。某项具体算法实践究竟构成策展还是操纵，应由司法权依据该实践是服务于用户的真实文化利益还是服务于从用户注意力中汲取价值的标准作出认定。本条依第CXI条的规定予以执行。

法理依据。这一区分需要精确的技术根基。在货币资本主义体制下，将策展与操纵剥离始终以失败告终，因为广告收入直接为企业捕获

注意力买单 (Zuboff, 2019)。地位升级制度废除了国内广告市场。然而，零货币并不意味着零钻营。由于第IX条通过记录在案的交易来为商业绩效评分 (Rodriguez, 2021, Art. IX)，国内平台运营方仍可能为了收割地位等级积分而追逐强迫性刷屏、愤怒情绪触发或自动播放留存率，与此同时，外国平台则在境外完好保留其货币化广告引擎。第CXII条封堵了这两条路径，将公民注意力锚定于自由、繁荣以及 TER 概念 IV 的可追溯问责制之中，使任何一时的议会多数都不得将公民自主权交易出去；紧接下文，四项可强制执行的规则彻底堵住国内刷量漏洞，并清晰界定外国易货清算机制。

合格数字交易：第CXII条反刷量细则

一位严谨的宪法经济学家会对第IX条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国内平台通过记录在案的交易来提升其运营方的地位等级，那么什么能阻止运营方刷出数以百万计的琐碎点击来虚增记录？除非法律界定何种行为构成有效交易，否则无物可阻。古德哈特定律（Goodhart's Law）警示我们，一旦原始计数本身成为目标，运营方就会扭曲产品设计以虚增计数，而非服务公民。为彻底杜绝地位等级刷量行为，司法权与文化交流委员会应联合强制执行四项技术标准，以界定第CXII条项下的合格数字交易 **[QDTs]**：

1. 遥测数据排除规则。被动信号与微交互行为 [页面展示、自动播放启动、滚动深度探测脉冲、算法信息流刷新、表态点击、推送通知打开等] 在法律上被严格归类为界面遥测数据。此类数据在国民身份记录系统内不具有任何交易权重，亦不为任何平台运营方产生任何地位等级积分。

2. 月度活跃公民单元上限。在每个30天周期内，国内栖居型平台就每位经核验的独立公民最多仅可获得一次合格数字交易。唯有当该公民达到基准自愿参与门槛 [主动内容创作、直接的点对点通信，或有意识地以非自动播放方式检索文化或信息类作品] 时，该项单月唯一积分方能触发。在同一月份内将该同一名公民滞留在无限信息流中额外长达100小时，所产生的额外地位等级积分为零，从而在结构上切断地位等级晋升与停留时长最大化之间的关联。

3. 经审计的追溯性效用乘数。每季度一次，独立的指标审计委员会 [依第6章设立] 在各栖居型平台的活跃公民中开展匿名分层抽样调查，提出一项标准化的追溯性效用问题：在平台上花费的时间是否服务于公民真实的文化、公民生活或创造性目的。依据这些经核验的回复，该委员会计算出界定于闭区间 0 至 1.5 内的追溯性效用乘数 Up，并将各平台的月度原始 QDT 总量乘以 Up。任何得分低于 0.5 的平台在该季度均获得零地位等级晋升；此外，该分数还将依第CXI条自动触发文化交流委员会的案件移交，由司法权依第CXII条启动正式的操纵行为审查。

4. 外国平台易货结算机制。拒绝建立双边劳动力与资源分支商业伙伴关系 [论证 II] 的外资平台，既无需被排除在外，也无需以本国货币支付报酬。相反，此类平台可通过依论证 II 设立的主权清算中介机构在 Jasutopian 司法管辖区内运营；其中，该中介机构将可出口的 Jasutopian 资源信用或经核验的工程与算力服务打包，用以结算国际平台许可对价，从而避免将货币重新引入国内家庭生活。

这四项规则为国内平台运营方仅留下一条通往更高地位等级的狭窄路径：打造令公民自愿重访且事后判定物有所值的数字空间。标题党毫无收益。自动播放循环毫无收益。停留时长陷阱毫无收益。唯有真实的文化与公民服务方能通过季度审计。

第**CXIII**条。栖居型数字平台必须使公民能够获取来自其他国家的文化产品，不得基于国家来源、政治关系或国家间外交地位实施算法限制。特定的平台不得基于任何国家与Jasutopian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外交关系，压制、降权或限制来自该国的文化产品的可见度，除非某项具体内容系依据第CIII条所允许的理由受到限制且按该条要求得以证实[或者在国家危机中，依第CIX条的规定作出认定]。本条依第CXI条的规定予以执行。

法理依据。本条将第CIX条的危机耐受标准延伸至数字基础设施领域。平台绝不得充当文化禁运的隐蔽工具。情感文化认同取决于与外国创作作品之间持续、不受阻断的相遇。通过算法将另一国家的音乐、电影或文学作品埋没，所造成的隔绝效果与以正式成文法予以查禁完全相同，只是公众可见度更低而已。第CXIII条所禁止的是排斥性后果本

身，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禁令。这是因为，恰恰是在外交争端诱使官员切断联系之际，同理心与制度反馈循环正需要不间断的文化接触；在紧张局势下压制外国表达，会在克制最为关键的时刻加速相互去人化。本条唯一允许的限制措施与第CIII条完全对应，从而使私营平台与国家自身受制于同一宪法上限。



第**CXIV**条。Jasutopian公民通过与数字平台互动所产生的数据，应存储于Jasutopian国家[或地区]的主权领土内，或经双边协议认定提供同等法律保护的司法管辖区内，除非公民已就将其本人数据转移至另一司法管辖区作出明确、知情且可撤回的同意。当公民撤回该同意时，平台应停止转移，将已转移的数据退回至Jasutopian国家或同等司法管辖区内存储或予以删除，并向该公民确认已完成上述操作。本条对每一数字平台均具约束力，无论其归Jasutopian国家境内所有抑或境外所有。本条依第CXI条的规定予以执行。

理由。本条处理前述条款所引发的一项张力。文化交流[第CIII条以及第CX条至第CXIII条所保护的内容]需要与外国所有的平台进行跨境互动。数据主权[三大立国原则所要求的内容]则要求公民的行为数据不被外国实体剥削。解决之道在于，文化交流受到保护，但通过该交流产生的行为数据仍处于Jasutopian国家的法律管辖之下。Couldry与

Mejias已经表明，未经有意义同意而汲取个人数据，在结构上类似于历史上的殖民主义[由遥远的精英阶层侵占某一群体的资源以实现自身致富](Couldry & Mejias, 2019)。因此，Jasutopianism法律架构中的数据主权具有反殖民性质。当公民的行为数据[由其文化互动产生的资源，对其注意力、兴趣、社会联结及创意表达的记录]在未经公民知情且可撤回同意的情况下被汲取以使外国实体致富时，三大立国原则即遭到违背。本条确保文化互动的自由不会导致面临数据剥削的脆弱性。同意是唯一的例外，且仅属于公民本人：任何政府间协议及任何服务条款均不得代公民作出同意，而被撤回的同意亦及于已经转移的数据。

第**CXV**条。Jasutopian政府将支持能够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本国栖居型数字平台的发展。这些平台将由公民个人与企业[而非政府直接]通过文化交流委员会的制度支持机制[如拨款、基础设施供给、研究支持等]进行开发。这些平台须受前述所有条款的约束。

立法理由。本条的目的在于确保Jasutopian公民在数字文化交流方面不会仅仅依赖外国所有的平台。文化主权要求具备本国的替代方案。这并非因为外国平台受到禁止[事实并非如此；第CIII条保护获取各国文化产品的权利，而第CX条至第CXIV条则对在Jasutopian国家境内运营的外国平台加以规范]。而是因为将文化交流基础设施寄托于外国平台，会造成治理必须予以应对的结构性脆弱性。Laura DeNardis已经表明，关于互联网架构的技术决策[域名系统、加密标准、路由协议、服务器位置]本质上属于政治决策，关乎谁控制信息流动、谁能够监视通信，以及谁的价值观被嵌入技术标准之中(DeNardis, 2014)。如果开展文化交流所依托的平台由外国实体所有、设计并在技术上控制，那么这些实体便对Jasutopian国家境内的文化互动条件行使了事实上的治理权。本国平台提供了一种能够维护文化交流基础设施主权的替代方案。公共支持正是使其得以触及用户的关键所在。网络效应所筑起的壁垒[第III节]，主要在于新平台在漫长时期内因用户过少而难以留住后续用户的阶段，而在货币经济体中，新进入者唯有依靠其所能筹集到的资本方能熬过这一阶段。在地位升级制度下，本国平台的建设者如同所有劳动一样，通过其劳动赚取计入地位等级的积分[第XI条]，因此这一阶段不会耗费他们赖以维持生计的任何东西，并且委员会会提供服务器、设施与研究支持，否则平台在这一阶段便会因资源匮乏而夭折[在没有货币的国家中，拨款即是对资源、设施与时间的分配：第4章第VI节]。支持并不保

证本国平台必然会赢得本国公民的青睐，但它消除了其无法尝试的障碍。话虽如此，本国平台的发展不得通过限制外国平台来实现。限制会缩减文化交流，支持则会扩大文化交流。本条规定的是支持，而非对此加以限制。

第**CXVI**条。规范Jasutopian国家[或领土]与其他国家之间数字文化交流的国际协定，将由行政权[依据标准条约程序并经立法权同意]本着数字文化互惠原则进行谈判。数字文化互惠意味着两国公民在遵守同等透明度与数据保护标准的前提下，对彼此的栖居型数字平台享有同等访问权。若任何国家限制其公民访问Jasutopian数字平台，则Jasutopian政府将通过谈判以消除此类限制，而非对本国公民施加对等限制。唯有在司法权认定特定国家的平台构成监视、行为操纵或文化帝国主义的工具[即第CVII条所界定的：投射而非映照]时，文化交流委员会方可建议采取超出第CXI条至第CXIV条所规定之透明度与数据保护要求的措施，且此类措施须经公民议院批准方可生效。每一项此类措施均仅约束相关平台的行为[其数据的收集、存储与传输，其推荐系统，以及其在Jasutopian国家开展业务的协议条款]，而绝不限制公民获取这些平台所承载的文化产品。

立法理由。其原则在于，限制任何公民获取外国文化产品都会削减威慑机制所需的文化交流；其中，每一次谈判的目标都是扩大访问渠道，而非加以限制。本条所允许的措施约束平台的行为，而绝不限制公民的访问权，从而使受本条约束的第CIII条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毫发无损。公民议院的批准是一项保障机制。它防止行政部门在未经民主授权的情况下限制数字文化交流，同时也防止文化交流委员会超越其职权范围。委员会负责支持文化交流并监督第CXI条至第CXIV条规定的义务之履行。它不限制交流。唯有民主机构[公民议院]方可授权采取进一步措施，且仅得在本条所界定的特定条件下行使此项授权。

六、设计逻辑

上述拟议的七项条款[第CX条至第CXVI条]将第4章确立的三项设计原则，连同其条款所承载的持久性与危机耐受性这两项特质，延伸至数字领域，并增设了一项数字领域所独需的原则。

持久性。正如文化外交条款一样，数字文化互动条款依据第CXXIII条被设计为具有持久性，该条将第CII条的锁定机制延伸至此。若数字平台治理能够经由立法法案予以中止，那么在政治上感到不便的时期，文化交流的技术基础设施便可能遭到拆解。美国新闻署于1999年被撤销[在冷战结束且外界认为不再需要文化互动之后]表明，缺乏宪法保护的制度性基础设施极易受制于不断变化的政治盘算(Cull, 2008)。平台治理需要与文化外交同等的宪法持久性。

制度分离。文化交流委员会[依据第CIV条设立]负责监督平台对第CXI条至第CXIV条的遵守情况，并将涉嫌违规的行为移交司法权，由司法权单独作出认定[第CXI条]。该委员会独立于情报机构、军队与行政部门之外。这一原则在数字领域至关重要。将平台数据用于监视目的的诱惑，在结构上大于将文化外交用于情报目的的诱惑。通过数字文化互动所产生的数据[浏览模式、互动历史、社交关联、内容创作、情绪反应]，恰恰是情报机构最为看重的数据。制度分离能够防止文化互动基础设施转化为监视基础设施。

真实性保护。第CXII条将算法策展与算法操纵相分离，把真实性准则[编纂于第CIV条]直接纳入数字架构之中。正如第CIV条禁止文化交流委员会引导创作内容，第CXII条及其合格数字交易规范亦禁止平台操控注意力指标或以人为制造的强迫感取代自愿兴趣。其法律依据植根于“自由与繁荣”原则下的公民自主权，以及TER概念IV下的可追溯问责制。Tarleton Gillespie已证明，内容审核构成了数字平台之所以为数字平台的本质属性，而非事后的外部附加物(Gillespie, 2018)。由于推荐算法在日常连续的规模上放大曝光度，任何能够深化自愿文化发现的设计也可能将注意力扭曲为成瘾；因此，宪法性规则直接规制这一架构边界，而非将平台视为中立的传输通道。

互惠性。第CXVI条将数字文化互惠确立为国际数字互动的指导原则。这将第CVII条的互惠要求从模拟领域延伸至数字领域。该原则本身并未改变：文化交流不是文化投射，其目标是双向准入，而非单向主导。数字维度增添了一项模拟维度所不曾提出的复杂性：在一个国家设计的平台，会将其国家的文化预设嵌入推荐算法、界面设计与内容审核政策之中。数字领域的互惠不仅要求双向准入，更要求在介导文化互动的系统方面实现双向透明。

危机耐受性。第CXIII条将第CIX条的危机耐受性标准直接引入数字基础设施。平台绝不得充当隐蔽的文化禁运工具。这正是外交风暴期间保持实体交流畅通的数字镜像，因为当官员面临升级事态的巨大压力时，跨境文化人文化恰恰发挥着最强的克制作用；而在对峙期间通过算法掩埋外国创作作品，会在最迫切需要克制之时打破防止相互非人化的公民制衡机制。

基础设施治理。此项原则属于新增内容。第4章的条款中并未出现该原则，因为文化交流的模拟媒介领域并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引发基础设施治理问题。第CXV条通过支持本国替代方案来应对对外资平台的结构性依赖。DeNardis的研究表明，若不关注决定平台能做什么与不能做什么的技术基础设施，仅靠平台层面的治理是不充分的(DeNardis, 2014)。相关条款通过确保Jasutopian公民能够使用本国治理的平台基础设施来解决这一问题，同时在第CX条至第CXIV条的保护下维持公民对外国平台的访问[外国平台获得报酬的交换机制规定于第4章第VI节及上文所述的主权清算中介机构之下]。其核心原则在于，对文化交流条件的主权要求对承载该交流的基础设施同样拥有主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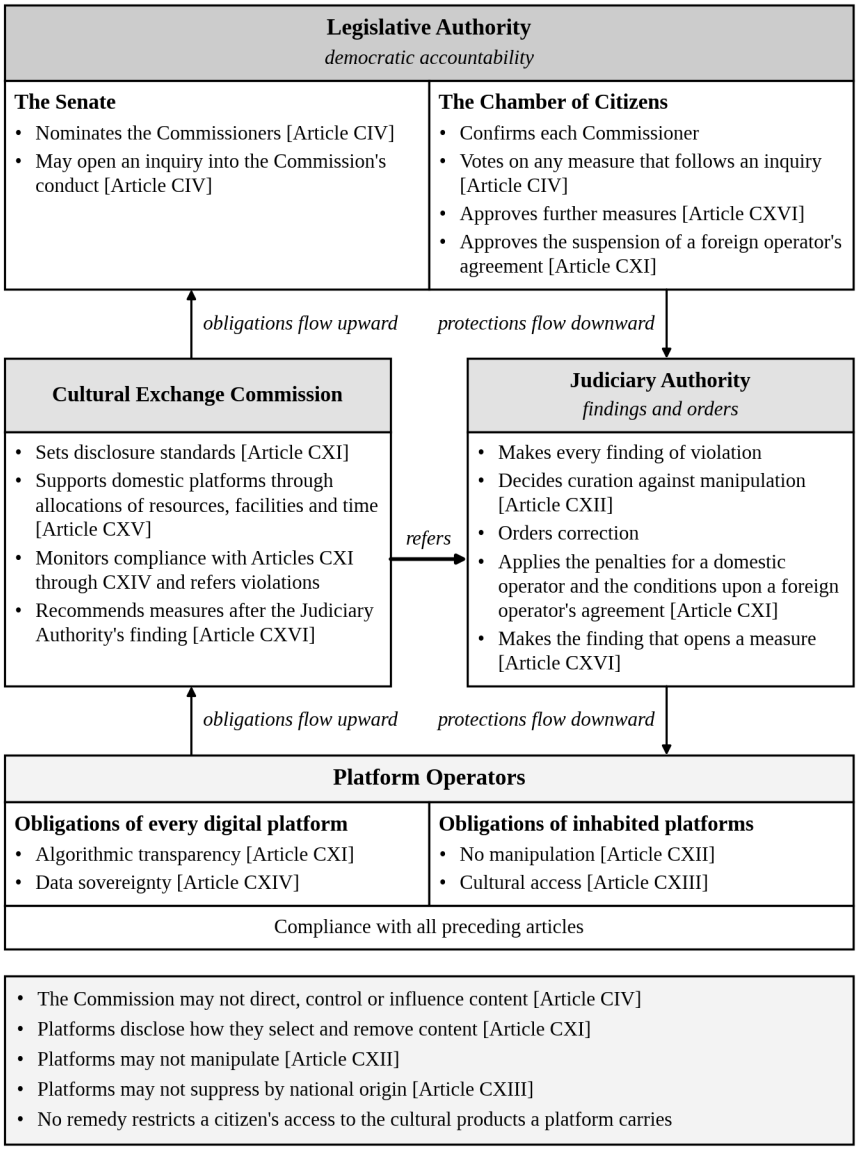


图 **5.3.** 平台治理架构：三层结构

VII. 组合架构所完成的体系

本章弥合了第1章对Jasutopianism进行审视时所指出的第二项结构性缺口：在常驻型平台成为公民与文化生活的日常场域之前起草的法典中，缺乏关于数字平台的法律规定。如今，七条数字文化互动条款[第

CX条至第CXVI条]与第CIII条至第CIX条并立。这些条款区分了常驻型平台与观赏型平台，强制要求算法透明，通过可执行的合格数字交易禁止注意力操纵，在外交危机期间保护跨境文化准入，将数据主权编入法典，在不封禁外国网络的前提下支持本国替代方案，并要求在国际条约中确立数字文化互惠。每一项规定均建立在经过同行评审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涵盖平台权力、监视资本主义、数据殖民主义、算法不透明性、平台合作主义以及互联网治理等领域。

连同第4章的文化外交条款，这十四项条款[第CIII条至第CXVI条]共同构成了同理心与制度反馈循环的文化与数字层级。跨境文化人文化如今在已完成的创作作品与日常数字栖息地两个维度上均获得了明确的宪法庇护。真实性得到守护。利益俘获受到阻断。互惠原则具有约束力。持久性阻止党派性的废除，而危机耐受性则在外交摩擦达到顶峰时依然保持跨境文化渠道畅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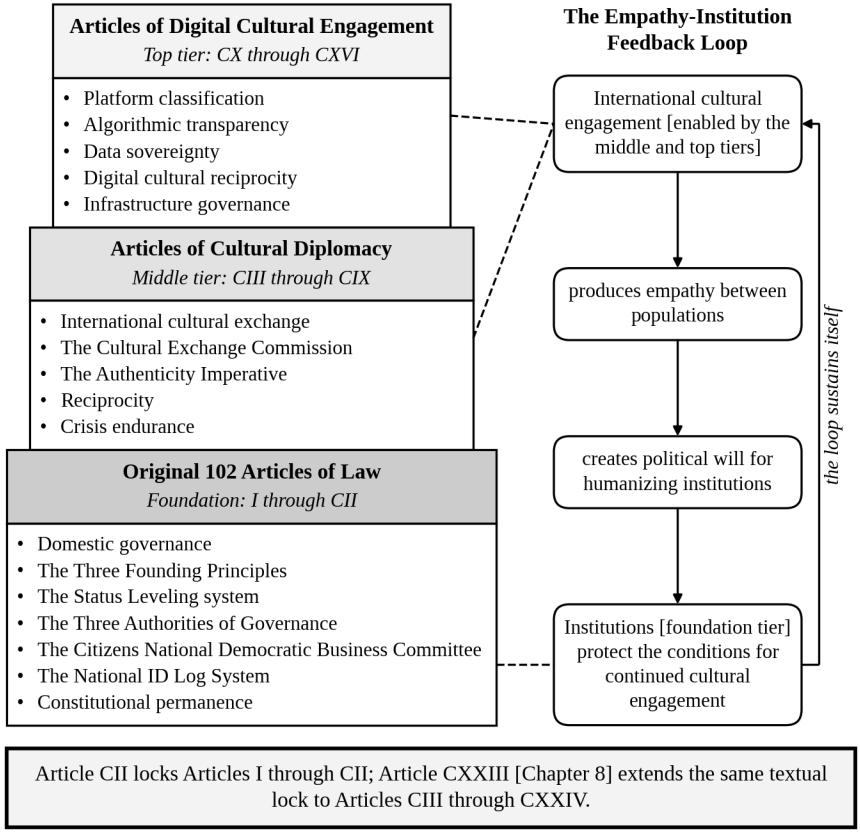


图 **5.4.** 第5章之后的法律架构：第I条至第CXVI条

这一缺口至此弥合。

Jasutopianism提供了102条国内法律条款。第4章与第5章现已增补了十四项条款，涵盖国际文化外交[第CIII条至第CIX条]与数字平台治理[第CX条至第CXVI条]，并辅以阐明不俘虏原则的第CXXIV条。文化与数字层面的制度建构至此完备。

接下来的内容则是可操作性检验。第6章构建了十年过渡蓝图，并结合制宪前零阶段与三级清算过渡机制，在每一步均设定了可衡量的里程碑与失败标准。第7章确立了预注册预测、证伪条件以及宪法替代议定书，使每一项制度主张均须经受可验证的实证审查，而非流于修辞。两章的体例亦据此有所区分：第6章规定必须建设与验证的内容，而第7章则具体说明何种实证记录将会证伪其中的每一项机制。

文化与数字层级已然完成。可操作性检验即将展开。

参考文献（第5章）

Batson, C. D. (2011). *Altruism in huma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uldry, N., & Mejias, U. A. (2019). *The costs of connection: How data is colonizing human life and appropriating it for capitalis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ull, N. J. (2008).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 1945-198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ecety, J. (Ed.). (2012). *Empathy: From bench to bedside*. MIT Press.

Deibert, R. J. (2020). *Reset: Reclaiming the internet for civil society*. House of Anansi Press.

DeNardis, L. (2014). *The global war for internet governa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Flew, T., & Martin, F. R. (Eds.). (2022). *Digital platform regulation: Global perspectives on internet governance*. Palgrave Macmillan.

Gillespie, T. (2018). *Custodians of the internet: Platforms, content moderation, and the hidden decisions that shape social media*. Yale University Press.

Gorwa, R. (2024). *The politics of platform regulation: How governments shape online content moder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squale, F. (2015). *The black box society: The secret algorithms that control money and inform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ahman, K. S., & Thelen, K. (2019). The rise of the platform business model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wenty-first-century capitalism. *Politics & Society*, *47*(2), 177-204.

Rodriguez, J. (2021). *Jasutopianism*. [Self-published].

Rothstein, B. (2005). *Social traps and the problem of tru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cholz, T. (2016). *Platform cooperativism: Challenging the corporate sharing economy*. Rosa Luxemburg Foundation.

Scholz, T., & Schneider, N. (Eds.). (2017). *Ours to hack and to own: The rise of platform cooperativism, a new vision for the future of work and a fairer internet*. OR Books.

Srnicek, N. (2017). *Platform capitalism*. Polity Press.

TikTok Inc. v. Garland, 604 U.S. ___ (2025). https://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24pdf/24-656_ca7d.pdf

Van Dijck, J., Poell, T., & De Waal, M. (2018). *The platform society: Public values in a connective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Zuboff, S. (2019).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 PublicAffairs.

第6章：过渡蓝图：第1年至第10年



I. 从架构到实施

前五章构建了 Jasutopianism 的核心法律与哲学架构。第1章通过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的三项标准对 Jasutopianism 进行了审视，识别出十项结构性缺口。第2章结合信息论、系统论、复杂性科学以及经同行评审的同理心研究中的同构对应关系，扩展了永恒相对论。第3章提供了实证案例研究以及四项应对高技能人才外流的国内反制机制。第4章与第5章提出了规范国际文化外交与数字平台的14条法律条款 [第 CIII 条至第 CXVI 条]，并配套提出了关于不俘虏的第 CXXIV 条澄清条款。至此已起草117条条款，第8章还将提出7条环境条款，第12章另有11条 [使整部法典达到135条]。13项正式指标。以永恒相对论为哲学基础。以合作治理为实证根基。

架构并非实施。

Jasutopianism 认识到了这一点。论点 VII [从一个已建立且人口处于不同年龄与工作经验水平的国家过渡到地位等级非货币化的 Jasutopian 国家] 为首届三总统制提出了一项四年过渡计划。该计划在操

作上切实可行。它明确了第1年的核心任务 [地位等级定级考试、国民ID 与资源记录系统配发、非货币制度建立、标准级住房建设、基本资源发放]。它明确了第2年的核心任务 [资源估值调查、基本商业建设、国际商业关系]。它将第3年确定为向非公民开放入境的节点 [工作签证与入籍路径]。它将第4年确定为下一届三总统制的筹备期 [对首届任期的评估、通过新建立的投票系统实现民主更新]。

该计划描述了必须发生什么，却未规定如何衡量其是否正在成功推进。

这正是《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所填补的空白。

本章将过渡期从四年延长至十年。在每个阶段，成功与否均采用 Jasutopianism 自身的十三项指标进行衡量，并辅以本卷新增的工具。在每个阶段，失败条件均予以明确界定，从而使治理体系为其自身评估提供标准。该延伸规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奠基 [第1年至第4年]。本阶段重申了 Jasutopianism 的论点 VII，并增加了衡量的精确性。Jasutopianism 的里程碑保持不变。衡量标准为本卷新增，同时本卷在其旁增设了自身的里程碑 [建国奠基、指标审计委员会、首份环境报告]。

第二阶段：评估 [第5年]。本阶段在 Jasutopianism 中尚无先例。这是一次正式的巩固评估，在此期间将对当时所有可用指标进行评估，以确定奠基阶段是否已经建立起一个有效运转的体系。

第三阶段：成熟 [第6年至第10年]。本阶段将过渡拓展至国际文化互动、制度深化与民主更新。它将国内过渡与文化外交条款 [第4章] 以及数字文化互动条款 [第5章] 衔接起来。最终，它将以一场关于随后十年发展方向的民主投票作结。

10年并不足以完成全部建设，本蓝图也从未声称如此。第3章记录了北欧普惠保障制度历经半个世纪的政治博弈才得以建成，爱沙尼亚的数字政务也耗费了约25年；结构性的国家建设往往跨越数十年展开。此处详述的10年构成正式的宪法过渡期 [其中，各项制度在这10年间得以颁布、核验与更新]，其前为制宪前零阶段 [通过地方层级模块化试点在国内培育绝对多数支持]，其后为跨越数十年的巩固期 [第10年为第11年

至第20年指明方向，第7章则在第20年与第25年检验实施绩效]。即便在第1年内，向免费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法律切换也无需引发供应链断崖。Jasutopianism 会立即为家庭提供缓冲 [自第1日起免费供应基本生活必需品、保障房主与租户的居住连续性、在数字记录完成前保留纸质备援方案，以及为期6个月的消费货币逐步退出期 (Rodriguez, 2021, Argument VII)]，而本章进一步增设跨越第1年至第3年的三级过渡清算架构，使工业供应链与对外贸易得以借此平稳调整而不致遭受冲击。

学术文献为这些阶段提供了精确的术语。安德烈亚斯·舍德勒（Andreas Schedler）区分了消极巩固 [阻止制度崩溃] 与积极巩固 [深化民主质量] (Schedler, 1998)。将这一划分直接应用于处于过渡中的国家，可清晰对应全部三个阶段：奠基阶段 [第1年至第4年] 确立各项制度并运行三级清算桥梁；评估阶段 [第5年] 依据四道严格的经审计关卡检验消极巩固成效；成熟阶段 [第6年至第10年] 则在推进对外文化条约之前，通过深化国内公民能力来追求积极巩固。这里并非盲目借用概念。Schedler 的理论恰如其分地命名了直接内嵌于这项10年规划中的运行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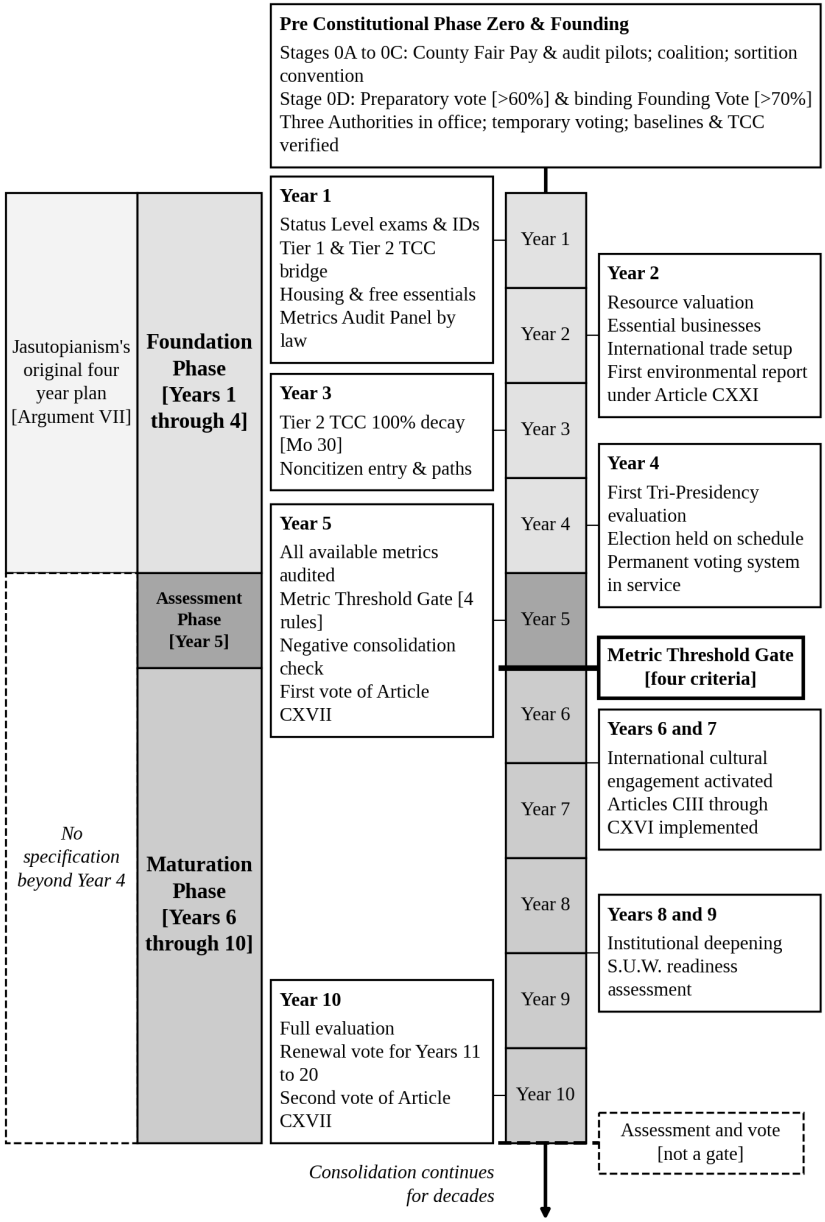


图 **6.1.** 十年过渡时间线：三个阶段

II. 第一阶段：奠基，第1年至第4年

Jasutopianism 的论点 VII 从操作层面描述了这一过渡。此处完整重述该计划，并加入《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所增添的衡量精确性。Jasutopianism 的任何要素均未改变，而每一项要素都变得可衡量。

制宪前零阶段：迈向立宪投票

在第1日之前，存在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任何国家如何才能获得70%的民众绝对多数支持，以颁布一部尚未经过检验的宪法？自发性的集体转向纯属幻想。本蓝图直接立足于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 2010）的“缝隙式制度建设”、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 2010a）的多中心实验，以及博·罗思坦（Bo Rothstein, 2005）关于公正制度供给与普遍社会信任之间实证关联的研究，在立宪投票之前置入一个分为四个阶段的制宪前零阶段，该阶段完全在现行货币法律框架内运行：

1. **0A**阶段：市县级示范试点 **[立宪前10至5年]**。 地方辖区在现行货币秩序内实施模块化且在法律上兼容的改革：县级公平薪酬方程 [第10章]、由抽签产生的指标审计委员会对地方公共记录进行审计、按城市细分的贫困与犯罪报告制度，以及在自愿参与的企业之间对第12章调度信号进行的影子运行。公民先在本地测试具体制度组件。国家宏观经济稳定保持不受影响。

2. **0B**阶段：经核验绩效联盟 **[立宪前5至2年]**。 来自试点市县的独立纵向数据记录到地方物质匮乏程度的可衡量下降，并伴随着制度信任的提升 (Rothstein, 2005)，从而将抽象的宪法设计转化为经过审计的公民实绩记录，进而在实证结果而非党派演说的基础上，凝聚起持久的跨党派改革联盟。

3. **0C**阶段：抽签制宪大会 **[立宪前2年至1年]**。 遵循公民制宪议会已被证明的先例 [爱尔兰与冰岛]，由随机抽签产生的全国大会与宪法学家及经济统计学家协同工作，起草并公布第1日前所需的全部操作附表：各国特定的1至Z地位等级分档、各州及领地住房界定标准，以及经过核验的10年期城市犯罪与贫困基线。任何事项均不作临时拼凑。

4. **0D**阶段：两阶段绝对多数批准 **[立宪前最后12个月]**。 两轮投票确立合法性。首先，一项以超过60%赞成票通过的预备性全民公投，授权开展全面基线审计、筹建临时投票机制并完成过渡清算信用准备；12个月后，待独立审计机构公开公布每一项经核验的基线与附表，公民即进行具有约束力的立宪投票，以超过70%的赞成票通过并借此颁布整部宪法典。

零阶段使第1日具备完备的启动条件。没有任何账簿从空白开始，没有任何选票在盲目中投下。由于地方公平薪酬试点、经独立审计的地方匮乏率下降、公开发布的抽签附表以及分步两轮投票批准门槛，早在任何国家货币秩序退场之前就将未经检验的理论转化为可观察的公民实绩记录，公民们得以带着经核验的基线、经受过检验的抽签监督机制以及业已凭实绩赢得的绝对多数支持迈入第1日；随后，三项立宪行动与衡量锚点就此开启奠基阶段。

建国奠基。Jasutopianism 将第一年各项规定的起算时间定为“一个 Jasutopian 国家宣告成立之时”，并预期第一年的选举“很可能会使用国内明确设立的临时投票系统，直到正式的投票系统程序和投票站点投入运行” (Rodriguez, 2021, 论点 VII)。它并未确定法律条款通过的日期、治理三权就职的日期，也未确定永久投票系统必须投入使用的年份。《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确定了这三项日期与时限，且每一项均配有衡量标准。

1. 法律条款获得通过。 在公民依据0D阶段以其自身直接投票、以超过70%赞成票整体通过法律条款之日，即宣告该国成立。
   Jasutopianism 未对该次投票设定多数票比例；该数字为本卷自行设定的门槛，与第11章关于联邦的第3道关卡相对应。其衡量指标为该次投票公开公布的计票结果。第1年自该日起算，且自该日起任何条款均不得废除或修改 [第 CII 条锁定第 I 条至第 CII 条，第 CXXIII 条锁定第 CIII 条至第 CXXIV 条，第 CXXXV 条锁定第 CXXV 条至第 CXXXV 条，惟受第7章详述的严格宪法替代议定书约束]。

2. 治理三权就职履新。 首届三总统与首届参议院于第1年的最初几周内通过临时投票系统选举产生，随后由三总统任命终极法院法官 [《治理三权条款》第 IV 条]。其衡量指标为：在新国家的首部法

律送交司法权裁决之前，所有席位均已补齐，且所有就职宣誓均已记录在案。

3. 投票系统分两步建立。临时投票系统承担建国投票、首次选举、第4年之前到期的每一次选举，以及公民议院自第一项法案起的每一次表决。其衡量标准为投票率，此处对其作一次性界定并贯穿全卷使用该含义：年内至少就公民议院一项法案投出选票的合资格公民 [即每名年满18周岁且无重罪记录的公民，正如 Jasutopianism 所规定的议院席位资格] 所占的比例。该指标自第1年起开始衡量。永久系统自第2年起建设，其衡量标准为在第4年选举中的实际使用。

制宪前零阶段确立了首个国家如何在国内凝聚起这一立宪绝对多数；第 IV 节则在文化与治理传导路径下，阐述巩固后的国内信任如何继而有序推进跨国界的国际文化与制度互动。

指标审计委员会。 政府不能被容许自行评分。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 增设了一个立于政府与其自身统计数据之间的机构：指标审计委员会，该委员会于第1年依法设立 [奠基阶段的一项里程碑]，并独立于治理三权之外。其公民成员从全国每个州或其他大型领地市镇各通过抽签产生250名，从《全国公民普查名录》中抽取，任期5年且仅限一届，均不得在任何治理机构中任职；他们与统计学家以及受邀来自国外的观察员共同履职。每5年重新抽签组建一届新委员会，且每位成员均须比照陪审员标准接受利益冲突防范审查。公民成员自行遴选统计学家并邀请外部观察员；治理三权中的任何人均不得任命或罢免委员会成员。第8章提出的两项条款明确提及该委员会 [第 CXVIII 条与第 CXXI 条]，从而使法典本身即要求设立该机构。该委员会有权查阅国民身份记录系统的原始记录。所有指标在公布前均须经其核验，下文所述的各项基线亦须经其核验，并由其通过匿名抽样开展第7章引入的治理合法性指数 [G.L.I.] 信任度与满意度调查。未经核验的数据一概无效：不得据此认定任何里程碑已经达成，也不得据此认定任何关卡已经通过。各项门槛同样预先固定。本蓝图各道关卡与失败条件的每一项门槛，均在过渡开始前即明文载于本书之中，绝不留待接受检验的政府自行设定；仅中期环境目标于日后在第 CXVII 条首次表决时以法律形式加以确定 [第 III 节]。

各项基准。在检视首个里程碑之前，须先确定三项参照基准。第一项是犯罪率与贫困率的前 Jasutopian 基准：对每座城市而言，取过渡前十年间该城市自身年度数据的均值与标准差，数据源自该国此前的犯罪与贫困统计资料 [各城市绝不合并取平均值]。就犯罪率而言，高于该均值一个标准差为目标线，高于该均值两个标准差为失败线。就贫困率而言，目标即是基准本身，使任何城市均不高于其先前水平。按百分比解读，一座城市的 C.P.I. [城市贫困指数] 是指在所检视时期 [即全年，或本章按季度检视时的该季度] 内的任何时间点曾缺少第 I 条所列一项或多项基本资源的居民占比，该数据取自记录系统并由委员会核实。第二项参照基准是生产基准：即最后一个完整货币年度的实物产出，按实物单位记录四个类别 [粮食、能源、以竣工并维护的住宅计量的住房，以及医疗、教育、供水与公用事业等基本服务]。第三项参照基准是每项指标的首次测量值，本节末尾的表格列出了各自对应的年份。

第1年：制度确立

Jasutopianism 为第1年确定了五项同步推进的行动：地位等级定级 [通过全国标准化考试、可证明的过往工作经历以及第一年的工作时数与交易记录]、国民 ID 与资源记录系统部署、通过为期六个月的货币逐步退出建立非货币制度、标准级住房建设，以及自 Jasutopian 国家宣告成立之时起向全体公民发放基本资源 (Rodriguez, 2021, 论点 VII)。

《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为每一项行动均增添了衡量标准。

地位等级定级。Jasutopianism 将首次地位等级建立在三项要素的共同基础之上：定级考试、可证明的过往工作量，以及第一年内完成的工作时数与交易记录 (Rodriguez, 2021, 论点 VII)。该考试面向每一位希望获得更高地位等级机会的公民开放，且无论公民是否参加考试，全体公民均会获得定级。考试组织期为六个月，并在下半年设有补考窗口。第1年的成功与否以获得正式地位等级定级的适龄劳动人口百分比来衡量。目标是在第1年末实现85%的定级率。其余15% [偏远地区公民、过往工作记录仍在核查中的公民、正在参加补考流程的公民] 可在不损害制度运行的前提下于第2年第一季度完成安置。其衡量工具为 S.O.L.P.C.N. [全国指数化公民人均生活水准]，该指数直接追踪公民在

各地位等级之间的分布情况。若因已定级公民人数不足而导致 S.O.L.P.C.N. 在第1年末无法计算，则奠基阶段已滞后于计划进度。失败条件非常明确：若至第1年末获得地位等级定级的适龄劳动公民少于60%，则表明定级基础设施 [考场及工作记录核查能力] 不足，必须在继续推进前加以扩充。

国民 **ID** 与资源记录系统。Jasutopianism 承认，“在国民 ID 与资源记录系统技术建立之前，公民将可选择在其雇主处建立地位等级纸质记录” (Rodriguez, 2021, 论点 VII)。《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具体规定了从纸质到数字化的过渡。目标是在第1年末实现70%的数字化国民 ID 覆盖率，并对所有在职公民实现纸质或数字形式的100%覆盖。其衡量工具为记录系统自身的交易数据：以数字化方式记录的交易笔数相对于估算总交易量的比例。若至第1年末记录系统所记录的交易量少于估算总交易量的50%，则必须延长部署时间表，并由立法权批准追加基础设施投资。

非货币体系的建立与三级过渡清算架构。Jasutopianism从第1天起即保障免费的基本资源供应，同时为个人所持货币开辟为期6个月的消费消耗窗口期，用于购买非必需零售商品、土地或外国投入品（Rodriguez, 2021，论点VII）。家庭零售能够迅速完成过渡，这是因为第I条直接涵盖了日常必需品。复杂的工业供应链若在一夜之间切换，则难免面临投入品瓶颈的风险。为协调论点VII关于第1天起的消费者保障与第3章关于工业制度转型需分阶段有序推进的研究结论，本蓝图引入跨越第1年至第3年的三级过渡清算架构：

1. 第**1**级 **[**第**1**天至第**6**个月：基本需求与消费层**]**。根据第I条，食物、饮用水、标准级住房、公用事业、衣物、医疗保健及教育立即实现非货币化。个人现金余额遵循论点VII规定的6个月逐步退出窗口期，仅用于非必需零售消费。第1年的目标是使第1级消费及基本需求交换中的非货币交易占比达到至少90%，并在第1年结束前公布首次I.O. [创新机会] 评分；若第1年末第1级非货币占比低于65%，则表明消费者过渡已陷入停滞，立法权必须立即批准纠偏性清算支持。

2. 第**2**级 **[**第**6**个月至第**30**个月：国内工业与企业对企业供应链层**]**。中间工业网络 [制造工厂、区域货运物流、专用零部件等] 通过双账本

过渡清算信用 **[TCC]** 清算多层供应商合同，并严格记录于国民身份记录系统内。TCC不计利息，不得跨周期囤积，且在法律上不可转让至私人家庭账户。在第2年完成资源估值调查 [测绘社会必要性X与资源稀缺性Y] 且国内重要企业趋于稳定的同时，企业使用TCC结算中间供应商余额。至第30个月，一旦实物资源分配计划经指标审计委员会核验无误，所有剩余TCC余额将自动按100%衰减清零。第2级每一步均受可量化里程碑约束：第1年末企业对企业非货币清算占比至少达到50%，第2年末至少达到80%，至第30个月全经济体非货币占比至少达到95%。

3. 第**3**级 **[**第**2**年至第**4**年：对外贸易接口**]**。与货币体系伙伴之间的跨境贸易仅通过主权清算账户及论点II分支商业伙伴关系进行清算，并与国内家庭账户完全隔离，从而确保外国货币永不回流至国内零售流通领域。

这一三级过渡桥梁完整保留了论点VII关于第1天起的公民保障。家庭可立即免费获得基本生活必需品。工业供应商则获得审慎设定的30个月零息清算期，以便平稳过渡至经审计的实物资源分配体系，而不致导致工厂、医院或国家货运干线因此崩溃。

标准级住房建设。Jasutopianism 承认，住房建设“理所当然会持续到首任三总统任期之后”（Rodriguez, 2021，论点 VII）。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 设定了一项中期目标：在第1年末前，各州与领地必须确立标准级住房的正式定义并启动建设。衡量工具是由各州或领地政府编制的住房开工报告。关联指标为 C.P.I.[城市贫困指数]，该指标在城市层面追踪贫困状况。若任何城市在第1年期间报告 C.P.I. 上升，则表明住房转型正在制造困境而非缓解困境，纠正措施为向该城市的住房计划额外分配资源。

基本资源分发。Jasutopianism 宣告：“自 Jasutopian 国家宣布成立之时起，所有基本食物、饮用水、标准级住房、公用事业及教育将向所有 Jasutopian 公民免费提供”（Rodriguez, 2021，论点 VII）。这是最紧迫也最关键的承诺。若公民未能获得基本资源，整个转型便会丧失合法性。衡量工具为 C.P.I. 与 S.O.L.P.C.N. 的结合。目标是第1年的任何季度中，没有任何城市的 C.P.I. 超过其 Jasutopian 前基准。Bo Rothstein 已经证明，制度可信度源于公平对待的经验：当公民感知到制度兑现其承诺

时，普遍的社会信任便会形成（Rothstein, 2005）。基本资源保障不仅是一项经济规定，更是整个转型期的信任构建机制。

第2年：经济架构

Jasutopianism 为第2年确定了三项行动：各州与领地的资源估值、基本企业的建设以及国际商业关系的建立。

资源估值。各州与领地应对其原始资源与已加工资源持有量进行勘查，并向国家政府报告。随后，立法权依据论点 I 中提供的公式确定相对资源价值。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 规定了衡量指标：D.P.P.[Domestic Product Production，国内产品生产] 指标，用于衡量总生产产出。至第2年末，必须能够计算出首个 D.P.P. 数值。这一首次测量值将作为此后每一次 D.P.P. 读数的参照点。它并非产出本身的参照点，因为货币退出流通后首次计算的 D.P.P. 会将第1年和第2年期间产出的任何下降包含在内。产出需对照生产基准加以判读，且下限已预先设定：至第2年末，任何基本生产类别均不得低于该基准的 90%。若无法计算 D.P.P.[因为资源估值过程尚未完成]，或任何类别低于其下限，则表明经济架构尚未正常运转。

基本企业建设。Jasutopianism 描述了政府通过地位等级激励与土地赠与来招募公民志愿者创办基本企业的做法。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 规定了衡量指标：N.N.R.[Net National Resources，国家净资源] 指标，该指标核算进口与出口。至第2年末，N.N.R. 必须呈现正向或稳定轨迹。下降的 N.N.R. 将表明国内企业基础设施未能满足基本需求，需要超过出口量的外国资源进口。I.N.R.[Innovative Norm Rate，创新规范率] 应当在第2年前开始产生数据，表明产品正在通过登记为具备创新平台的岗位被创造出来。在首批基本企业中，Jasutopianism 点名了“完善投票软硬件的开发”（Rodriguez, 2021，论点 VII）。永久性投票系统正是在此建成，以供第4年的选举使用。

国际商业关系。Jasutopianism 描述了“分支商业伙伴关系”以及外国企业主在记录系统中使用非公民商业卡的做法。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 规定：至第2年末，应与外国正式达成至少三项双边贸易协定，每项协定均采用记录系统结构进行交易追踪。这些协定在企业层面规范贸易：即 Jasutopian 企业与外国企业之间交换劳动力与资源[正如

Jasutopianism 论点 II 所描述的]，并通过记录系统加以记录。此类协定可与任何有意愿的国家签订。它们处于第11章所规定的四阶段路径之外，且并非其第二阶段；后者指国家之间的共享资源协定，以及在文化交流已铺平道路的国家之间开展的联合基础设施建设。N.R.O.[National Resource Output，国家资源输出] 与 N.R.I.[National Resource Input，国家资源输入] 指标追踪这些国际流动。Roland Paris 曾论证，过早自由化[即在制度基础设施建立之前开放政治与经济体系]会破坏脆弱转型的稳定（Paris, 2004）。Jasutopianism 将企业建立置于国际接触之前的直觉安排，与 Paris 的模型相吻合：其分支商业伙伴关系出现在“Jasutopian 企业已经建立并继续建立之后”，且书中说明在 Jasutopia 第三年“可能有也可能没有机会”建立此类关系（Rodriguez, 2021，论点 VII）。在第2年末前达成三项协定的目标是本卷自身提出的，而第2年里程碑通过一项条件保留了 2021 年文本的顺序：只要任何基本生产类别仍低于其第2年下限，或者在记录系统能够记录与外国企业的交易之前，便不得正式签署任何协定；若该条件在第2年末尚未满足，目标将顺延至第3年。

首份环境报告。第2年包含一项本卷自身设定的里程碑。环境合作条款[即第8章提议的条款 CXVII 至 CXXIII]自该制度建立之日起施行，蓝图在其三个阶段中各为其设定了一项里程碑，其中第一项即落在此处：依据条款 CXXI 编制的第1份年度环境报告于第2年末前发布。该报告确定了该条款所列四项指标[人均碳排放、生物多样性、氮磷负荷、淡水使用]的初始读数。此后每一项读数均与其进行比较。

第3年：向世界开放

Jasutopianism 将第3年确定为开放非公民入境之年，工作签证与公民身份路径于此时正式确立。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 规定：U.A.O.R.[Utopian Advancement Opportunity Rating，乌托邦进步机会评级] 量表应当在第3年前产生其首个正式评分。U.A.O.R. 衡量维系一个乌托邦社会的先决条件[互联网接入、自然资源可得性、以及与三大立国原则的制度一致性]。开放非公民入境的门槛在此固定，而不交由受测政府自行裁量：Jasutopianism 词汇表所列全部三项先决条件均须成立，且各自达到既定水平。互联网接入覆盖至少 95% 的公民；第2年的资源勘查已经完成且 N.N.R. 保持稳定或上升[词汇表要求具备“特定数量的自然资源”]；三大立国原则已经落实[词汇表的第三项先决条件]，

具体界定为没有任何法律条款被中止。若三项中有任何一项不成立，则应推迟开放非公民入境。Samuel Huntington 曾指明第三波民主化的五项成因：威权政体的合法性危机、经济与社会发展、天主教会的角色转变、美国、欧洲共同体和苏联等外部行动者的政策，以及一国转型对其他国家产生的滚雪球效应（Huntington, 1991）。他所列举的因素将一国内部条件与来自外部的力量结合在一起，而第3年正是本蓝图将国家向外部开放的年份。在第3年开放边境的决定，应当以 U.A.O.R. 评估确认为前提，即国内体系已足够稳定，能够在不引发失稳的情况下接纳新成员。

N.A.A.C.G.A.[Number of Assisted Allied Countries in Global Advancement，全球进步中受援盟国数量] 指标在第3年变得具有相关性。该指标衡量一个 Jasutopian 国家正在援助的国家数量。在第3年，应当确立初始测量值：即使计数为零也具有信息价值[它意味着该体系尚未做好开展国际援助的准备]。至第4年，目标是至少有一个受援国。

第4年：民主更新

Jasutopianism 将第4年确定为下届三总统制的筹备之年。这是对首届任期的评估，也是使用完全建成的投票系统举行的首次正式选举。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 增加了一项关键规定：第4年评估必须使用当时所有可用的指标，而非主观印象。至第4年，十三项指标中已有十一项到位；T.A.R.[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Rate，技术进步率] 在第5年首次测量，S.O.L.P.C.I.G.[Standard of Living Per Citizen Indexed Globally，全球指数化公民人均生活水平] 在第6年首次计算。第4年评估并非第5年评估[后者是一项正式的巩固评估]。它是民主评估[即由公民决定现任三总统是否应当继续连任]。

Francis Fukuyama 曾论证，政治发展需要三项可以不同顺序发展的要素：国家能力、法治以及民主问责（Fukuyama, 2014）。至第4年，Jasutopian 体系必须至少展现出以下要素：

1. 国家能力：基本资源保障正在兑现。S.O.L.P.C.N. 显示出跨地位等级的分布。D.P.P. 可计算且保持稳定或增长，且没有任何基本生产类别低于生产基准的 90%。

2. 法治：法律条款正在得到执行。目标是没有任何城市的 N.C.I.[城市犯罪指数] 高出 Jasutopian 前基准超过一个标准差[即目标线]；仅当某城市超出两个标准差的失败线时，该要素才被视为缺失。

3. 民主问责：公民议院正在运作。公民正在就立法进行投票。永久性投票系统已投入选举使用。若尚未投入使用，则选举仍依第一年的临时投票系统按期举行，因为条款 CI 将三总统的任期固定为四年。

若三项要素中有任何一项缺失，则转型尚未完成，第5年评估也将反映这一情况。

此后对某项指标的每一次比较，均相对于其首次测量值进行判读，各指标首次测量年份见下表[两项城市指数同时也对照其 Jasutopian 前基准进行判读]。

指标	首次测量
S.O.L.P.C.N.、C.P.I.、N.C.I.、I.O.	第1年
D.P.P.、N.N.R.、I.N.R.、N.R.O.、N.R.I.	第2年
U.A.O.R.、N.A.A.C.G.A.	第3年
T.A.R.	第5年
S.O.L.P.C.I.G.	第6年

Metric	Foundation Phase				Assessment Phase	Maturation Phase
	Year 1	Year 2	Year 3	Year 4	Year 5	Years 6 through 10
The thirteen metrics						
S.O.L.P.C.N.	**Year 1**	85% placement target				S.O.L.P.C.I.G. first computed in Year 6. International metrics [N.A.A.C.G.A., S.O.L.P.C.I.G.] emphasized. Positive consolidation targets for all domestic metrics, each read against its first measurement.
S.O.L.P.C.I.G.						
D.P.P.	**Year 2**	First measurement				
I.O.	**Year 1**	First measurement				
I.N.R.	**Year 2**	First data				
N.R.O.	**Year 2**	Three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at the level of business				
N.R.I.						
N.N.R.	**Year 2**	Positive trajectory				
T.A.R.	**Year 5**	First measurement				
U.A.O.R.	**Year 3**	First score; three preconditions met before noncitizen entry				
N.A.A.C.G.A.	**Year 3**	First count				
N.C.I.	**Year 1**	First reading				
	Year 4	First target test: target line one standard deviation above baseline, failure line two				
C.P.I.	**Year 1**	No city above its baseline				
Instruments added						
Nonmonetary share	**Year 1**	Tier 1 ≥ 90% [fail < 65%]; Tier 2 B2B ≥ 50%				
	Year 2	Tier 2 B2B ≥ 80%				
	Year 3	≥ 95% economy wide [Month 30 TCC decay]				
Production baseline	**Year 2**	No category under 90%				
	Year 5	Gate: every category at or above the baseline				
Voting rate	**Year 1**	Measured from Year 1				Below 30% for two consecutive years is a failure condition
	Year 5	Gate: at or above 30%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of Article CXXI	**Year 2**	First annual report; Bi* shares fixed				Second vote of Article CXVII in Year 10
	Year 5	Interim targets fixed by the first vote of Article CXVII				
Every metric then available	**Year 4**	All three Fukuyama components assessed				
	Year 5	Formally evaluated; Metric Threshold Gate applied				

图 **6.2.** 里程碑矩阵：按年份划分的指标



III. 第二阶段：评估，第5年

第5年在 Jasutopianism 中并无先例。这是本章对 Jasutopian 转型方案的贡献。

第5年的目的是判定消极巩固是否已经实现。Juan Linz 与 Alfred Stepan 曾论证，当民主成为“城中唯一的游戏”，即没有任何主要政治行动者质疑该制度本身的合法性时，民主便实现了巩固（Linz & Stepan, 1996）。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 采纳并调整了这一标准。当满足以下条件时，Jasutopian 体系即已实现消极巩固：

1. 未发生制度逆转。地位升级制度尚未被货币取代。三总统尚未将权力集中于单一行政首脑。公民议院正在运作，且公民正在参与投票：最近一个完整年度的投票率处于或高于 30%。

2. 基本资源保障得以维持。没有任何城市高于其先前的贫困水平：在第5年评估时，没有任何城市的 C.P.I. 超过其 Jasutopian 前基准。

3. 经济体系正处于或高于其先前产出水平。每项基本生产类别均处于或高于生产基准。D.P.P. 已连续至少两个季度保持稳定或增长。至少 90% 的公民持有带有正常运转之记录系统档案的地位等级。经济架构不仅在维持生存，而且正在发挥功能。

4. 法治正在运行。没有任何城市的 N.C.I. 超过其 Jasutopian 前基准两个标准差以上。法律条款正在得到执行，且没有任何条款因行政行动而被中止或违反。司法权保持独立。

这四项标准共同构成第5年的指标阈值门槛。若四项标准全部满足，转型便进入成熟阶段。若有任一标准未获满足，该体系将在推进之前进入一段纠正期[见下文第 V 节所述]。

评估使用当时所有可用的指标。至第5年，十三项指标中已有十二项到位：T.A.R. 在该年首次测量，而 S.O.L.P.C.I.G. 则在第6年首次计算。

第5年评估由立法权依据经指标审计委员会核查的数据予以发布。该评估向公众公开。Jasutopianism 的国民身份记录系统[即论点 VIII 所阐释的条款 LXXXV 至 LXXXVIII]记录每一笔交易并向国家政府报告，但并未赋予公民查阅这些记录的权利。本卷在制定新法律的领域中增设了公民查阅权[即用于文化交流登记簿的条款 CV，以及用于环境数据的条款 CXVIII]，并将同一原则延伸至各项指标：所有指标数据一经委员会核查，即向公民公布。评估的合法性既取决于该项核查，也取决于其透明度。倘若政府独自评估自身的转型进程，该评估便无异于自我标榜，而单纯公布数据亦无法改变这一点，因为阅读已公布数字的公民只能核对算术计算，却无法核查该数字的生成过程。委员会正是弥合了这一缺口[第 II 节]，从而无需任何公民仅凭信任去接受政府对此作出的宣称。

Linz与Stepan提出了巩固民主的五项条件：自由的公民社会、自主的政治社会、法治、可用的国家官僚机构以及制度化的经济社会（Linz & Stepan, 1996）。第5年指标门槛关卡的四项标准可以映射到这五项条件。本表为评注性质：其本身不设门槛，每一行均指向承担该项检验的关卡标准。

Linz与Stepan条件	关卡标准	标准检验内容
自由的公民社会	标准1	公民正在使用公民议院：投票率达到或超过30%

Linz与Stepan条件	关卡标准	标准检验内容
自主的政治社会	标准1与标准4	三总统未集权揽权，且没有任何法律条款被行政行为中止或违反
法治	标准4	没有任何城市的N.C.I.高于其失败线；司法权保持独立
可用的国家官僚机构	标准2与标准3	基本资源抵达每座城市；至少90%的公民持有地位等级且拥有正常运作的记录系统记录
制度化的经济社会	标准3	基本生产达到或高于生产基线；D.P.P.连续两个季度保持稳定或增长

话虽如此，第5年评估不仅是一道关卡，同时也是一项诊断。该制度可能已满足部分标准而未满足其余标准。评估将识别哪些标准已获满足、哪些尚未满足，以及需要采取何种纠正措施。满足四项标准中三项的制度，与满足四项中一项的制度处于不同境地。应对措施必须相称。

还有一项表决与该评估并行，但不构成其关卡标准。第CXVII条[于第8章提出]的首次五年期表决在第5年举行：基于参议院提出的一项法案，公民议院就向可再生能源过渡的时间表进行表决，且同一表决以法律形式确定第CXX条的研究比例以及第CXXI条的中期目标[最终目标载于该条款本身：在第CXVII条所规定的二十五年过渡期结束前，使各项指标均处于该国的国家份额之内]。这是评估阶段的环境里程碑。

IV. 第三阶段：成熟期，第6年至第10年

若第5年评估确认已实现消极巩固[或纠正措施已弥补所识别的缺口]，过渡即进入成熟阶段。该阶段有两项目标：深化国内制度[积极巩固]以及参与国际体系[文化交流及迈向世界超国家联盟的第一步]。

第6年与第7年：国际文化互动

文化外交条款[第CIII条至第CIX条，于第4章提出]与数字文化互动条款[第CX条至第CXVI条，于第5章提出]为国际文化互动提供了法律框架。第6年与第7年正是该框架投入运作的时期。

国内巩固与国际开放遵循严格的先后顺序。本书将这一排序规则命名为文化与治理传导路径。首先，国内制度必须实现可核查的物质公平、经审计的透明度以及不断提升的社会信任[零阶段与第1年至第5年](Rothstein, 2005)。其次，一旦消极巩固在第5年得以稳固，国家便依据第CIII条至第CXVI条启动正式的双边文化交流协议[第6年与第7年]。第三，持续而真实的文化接触将在数年间建立跨境情感认同与相互熟悉，从而为更深层次的多边治理合作奠定基础[第8年至第10年及第11章]。这一顺序是结构性的，而非任意裁量的。一个仍在艰难提供国内基本生活保障的国家，无法令人信服地提出国际制度伙伴关系；相反，一个已经巩固、且其公民在国内切身感受到公正制度的国家，则能够对外开放文化渠道，而不会由此引发国内动荡。

文化与治理传导路径还在同理心与制度反馈循环之外规定了一个独特的因果步骤。反馈循环解释了一旦交流开始运作，跨境相互同理心如何强化公众对保护文化开放的支持；而该传导路径则阐述了本书关于制度合作的排序假说：经核查的国内合法性必须居于首位，跨境文化人文化居于其次，联合国际治理的政治意愿居于第三。在每一个阶段，文化协议都先于治理倡议。

第**6**年里程碑：

1. 文化交流委员会[第CIV条]依法律正式设立[由参议院提出法案，经公民议院表决通过]，作为一个独立机构，与情报部门及行政机关相分离。其委员由参议院提名，并经公民议院表决确认。

2. 依据第CVII条的互惠要求，与一个有意愿的国家签署首份双边文化交流协议。

3. 真实性准则[第CIV条]投入运作：委员会的职责是支持文化交流，而非指导其内容。

4. 首次计算S.O.L.P.C.I.G.[全球指数化公民人均生活水平]，建立全球比较基线。

5. 指标审计委员会为第9年的同理心与制度反馈循环测试抽取匿名样本，并对其进行首次调查。

第7年里程碑：

1. 至少有三份双边文化交流协议处于运作状态。

2. 数字文化互动条款[第CX条至第CXVI条]适用于至少一个在Jasutopian管辖范围内运作的有人参与平台。平台透明度要求[第CXI条]正在得到执行：委员会监督合规情况，并将涉嫌违规情形移交司法权，由司法权独自作出裁断。数据主权条款[第CXIV条]投入运作。

3. N.A.A.C.G.A.指标显示至少有两个受援助的盟国[高于第4年的一项目标]。

4. 相对于第5年的首次测量，T.A.R.[技术进步率]在与三大立国原则相关的领域展现出可衡量的进展。

第6年与第7年的失败条件并非缺乏文化互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外国参与的意愿]，而是缺乏制度准备。若到第7年文化交流委员会仍未设立、文化外交条款尚未正式转化为可操作法规，或尚未启动任何双边协议，则成熟阶段已陷入停滞。纠正措施是启动一段延长评估期[重复第5年诊断]，以识别停滞究竟源于制度内部[Jasutopian制度尚未就绪]还是外部因素[外国缺乏意愿]。唯有前者处于该制度的控制范围之内。

第8年与第9年：制度深化与S.U.W.就绪度

第8年与第9年代表了积极巩固最深化的阶段。该制度不仅仅是在维持存续，也不仅仅是在开展国际互动，而是在不断深化。

同理心与制度反馈循环在一个决定性节点上将跨境同理心转化为民主授权。与邻国人民建立了真实情感文化认同的民众，其政治偏好与处于孤立、去人性化状态下的选民群体截然不同。在Jasutopianism的立法设计中，公民议院[其中，任何普通法案均需获得超过55%的所投票数方可通过]将这些偏好直接转化为法律；因此，人文化的选民将会否决切断文化开放的报复性措施，从而强化最初维系该同理心的法律保障。同理心塑造选民偏好，直接投票巩固保护性法律，而保护性法律又进一步拓宽跨境接触。

第**8**年里程碑：

1. 全部十三项指标均能定期生成可靠数据。测量基础设施已臻成熟。

2. S.O.L.P.C.N.显示出向上流动性：公民在地位等级中的晋升速率表明激励结构正在发挥作用。目标是自第1年定位以来，至少有40%的公民至少晋升了一个地位等级。

3. D.P.P.相对于第2年的首次测量有所增长。经济并未停滞。

4. I.O.与I.N.R.显示出活跃的创新：新产品、新企业与新解决方案正从Jasutopian经济架构内部不断涌现。

5. 在本蓝图的第8年评估中再次对U.A.O.R.进行正式评估，作为该国在深化第11章所规定的第一阶段工作之前自身的就绪度检验。U.A.O.R.是衡量一个社会能否履行维持与发展乌托邦制度所需职能的量表（Rodriguez, 2021, 术语表）。到了第8年，核心问题在于最终开展联邦工作的先决条件是否正在累积。

第**9**年里程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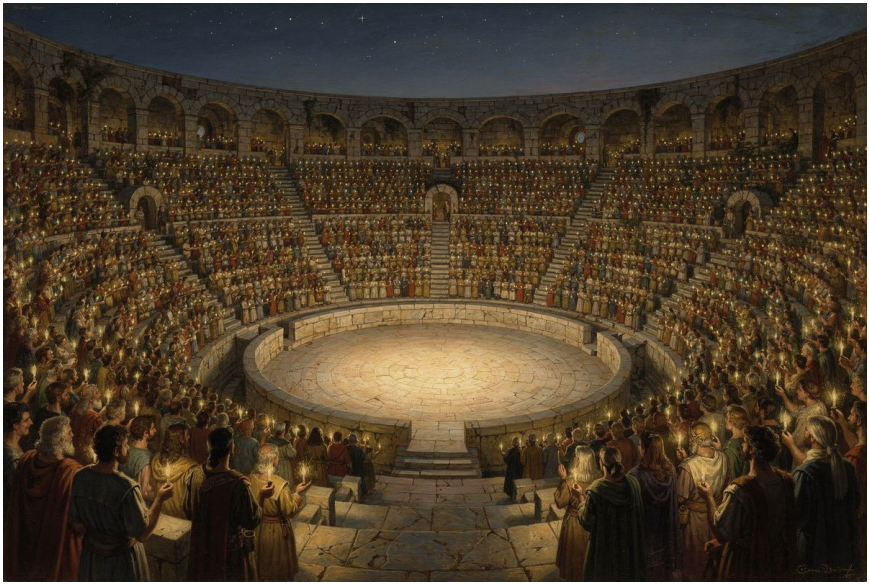
1. 若评估显示取得进展，则可与在第6年和第7年签署文化交流协议的国家开展非正式探索性接触。此类接触不将第11章的路径推进至第一阶段之外。它们并非治理提案，而是对深化合作共同利益的探索。这一区分至关重要。Elinor Ostrom发现，多中心治理[不同尺度上的多个重叠决策中心]在管理复杂系统方面优于单中心替代方案（Ostrom, 2010a）。S.U.W.并非一开始即作为世界政府而存在。它起初是由不同制度构成的在三大立国原则下仅治理四个领域的多中心邦联[第11章列明了这些领域，并指明了该联盟日后得以成为Jasutopianism论点XVIII所描述之单一国家的条件]。第9年的探索性讨论应当识别哪些合作领域具备可行性，而非提出一项单一完整的整合方案。

2. 在文化互动与对更深入国际合作的支持之间的关系中，应当能够观察到同理心与制度反馈循环。指标审计委员会通过匿名样本对此进行检验：于第6年和第9年对同一批受访者进行两次调查，且任何公民的文化消费记录均不与其投票记录相连接。单一时间点的比较无法证明任何问题。本就对他国持开放态度的公民既会寻求外

国文化产品，也会赞成合作，因此检验的对象是同一批受访者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若对外国文化产品互动增加的受访者群体中，对合作的支持度上升幅度大于互动未增加的群体，则结果与该循环相符。证伪结果已预先明确：若未出现此类差异，则该循环的第一环节[互动产生支持]在该国未能通过检验，该结果将作为反驳该循环的证据予以公布。

3. 相对于首次测量，N.C.I.与C.P.I.应当显示出长期改善。国内制度不仅保持稳定，而且正在持续改善。

第8年和第9年的失败条件是停滞。如果十三项指标届时保持持平[既未改善也未恶化]，则该制度已达到消极巩固，同时未能实现积极巩固。随后将自动启动结构性审查：立法权与公民议院共同行动，识别哪些制度机制陷入停滞，并提出宪法增补案[即依据第XCVI条以增补方式提出，同时保持受第CII条约束的第I条至第CII条、受第CXXIII条约束的第CIII条至第CXXIV条以及受第CXXXV条约束的第CXXV条至第CXXXV条完整不变；若某项机制随后在两个评估周期内持续在经验上被证伪，第7章规定了严格的宪法替代议定书]。吉列尔莫·奥唐奈、菲利普·施密特和劳伦斯·怀特黑德记录指出，治理转型涉及不确定性、权变选择和临时性调整(O'Donnell et al., 1986)。在宪法边界内进行调整并非软弱。这是制度的成熟。



第10年：民主更新

第10年是整个进程的顶点。民众运用该制度自身提供的民主机制，即公民议院，对整个过渡历程进行评估。

第10年评估绝非关于放弃宪法秩序的全民公投。原第I条至第CII条依据第CII条在文本上保持锁定，第CIII条至第CXXIV条依据第CXXIII条在文本上保持锁定，第CXXV条至第CXXXV条依据第CXXXV条在文本上保持锁定。此次投票决定下一个十年的发展轨迹。这是通过标准立法路径进行的民主更新：参议院起草三项法案，公民议院对每项法案分别进行表决。

第10年流程：

1. 立法权基于指标审计委员会核实的数据，运用全部十三项指标及本卷新增的工具，发布一份完整的十年评估报告。该评估将与各项指标的首次测量、生产基线、第5年评估及第8年评估进行对比。每一项指标的演变轨迹均予公开。

2. 公民议院就该评估展开辩论。公民可充分获取经核实的指标数据。

3. 参议院根据评估结果起草三项法案，公民议院逐一对其进行表决[法案获得超过55%的投票方可通过]：

第一项法案确认Jasutopian制度正在按设计运作。[对制度表现的评估] 若该法案未获通过，没有任何法律条款会随之失效。随后将启动强制性审查：参议院必须识别失效的机制，并向公民议院提交纠正性条款，依照第XCVI条的标准程序予以增补。

第二项法案确定国际互动应当深化、维持现有水平还是予以缩减。[第11年至第20年的方向] 参议院每次仅将一种方向付诸表决；在其中一项获得通过之前，互动维持在现有水平。

第三项法案增补填补首个十年间所识别空白所需的任何新法律条款。[宪法发展]

4. 每项获得通过的法案都遵循每部法律的既定程序。法案须呈交三总统签署[公民议院以80%或以上多数票可推翻否决]，并提交司法权审查其是否符合三大立国原则。经此程序通过的即为法律，并决定下一个十年的方向。

5. 第CXVII条规定的第二次五年期表决于同年举行[第8章]。这是成熟阶段的环境里程碑。

第10年表决是一项民主机制，民众借此将制度的方向掌握在自己手中。它并不重启立国根基，因为公民在通过法律条款时已通过自身投票将其确定；它将首届三总统制所建构的体系，转化为由民众主导的体系。Schedler、Larry Diamond 与 Marc Plattner 曾指出，自我约束型国家[即能够控制自身权力集中倾向的国家]是新兴民主国家面临的核心挑战(Schedler et al., 1999)。第10年的民主更新正是 Jasutopian 制度在过渡层面的自我约束机制。该制度不仅在于运行，更在于在结构层面上接受民主评估，以其自身指标作为民众就此作出判断的证据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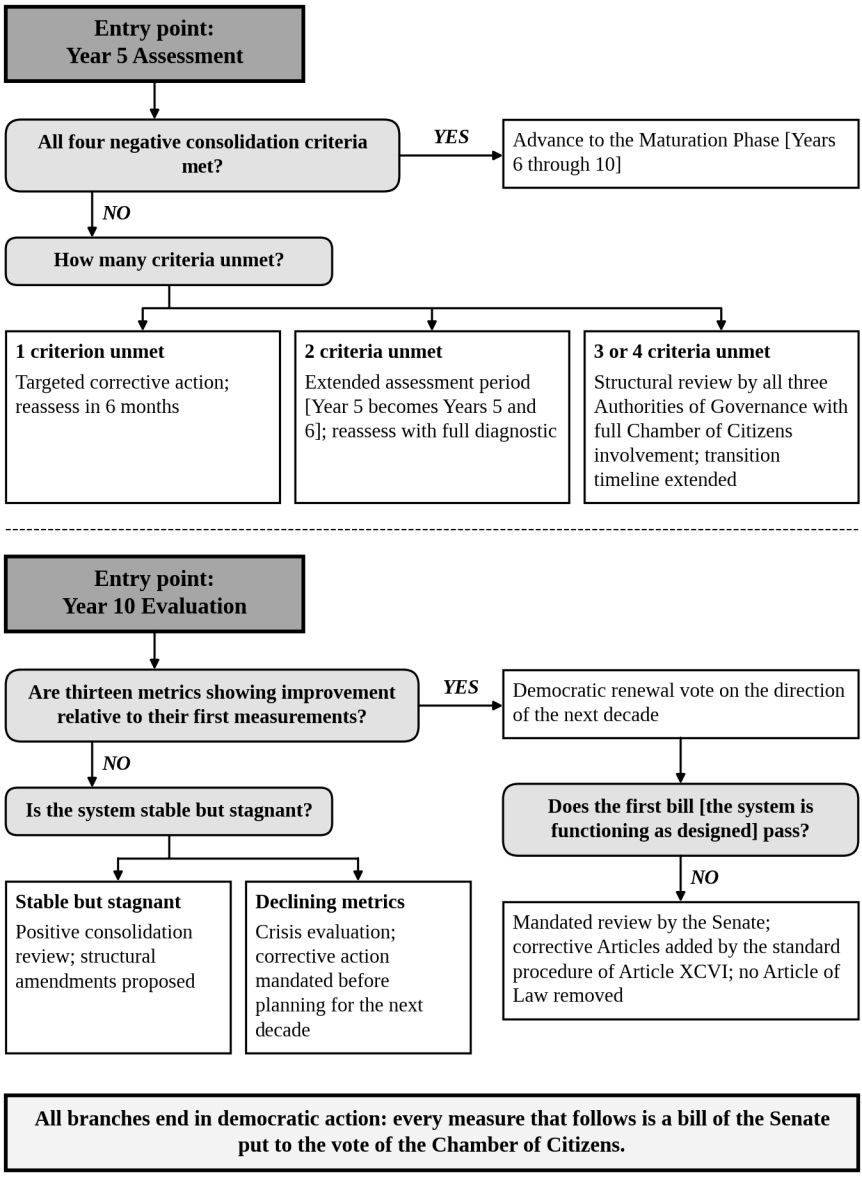


图 6.3. 失败架构：决策树

V. 失败条件

一个无法明确界定自身失败条件的治理体系，便不能声称具备学术上的严谨性。Jasutopianism 曾承认，“过渡阶段将是三总统职权面临

的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Rodriguez, 2021, Argument VII)，但未具体说明何种情形构成失败。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 对此做出了明确界定。

失败条件按阶段划分。

奠基阶段失败情形（第1年至第4年）

失败条件	指标	阈值	纠正措施
地位等级安置停滞	S.O.L.P.C.N.	第1年末安置比例低于60%	扩充安置基础设施；将安置窗口期延长至第2年
基本资源未送达	C.P.I.	任何城市的 C.P.I. 连续 >2 个季度超出前 Jasutopian 基线 >1 个标准差	紧急资源调配；立法权展开调查
第1级消费端逐步退出未完成	第1级非货币化份额	到第1年末，第1级消费及必需品交易的非货币化比例低于65%	授权紧急零售清算支持；扩大记录系统登记范围
第2级工业清算滞后	第2级B2B非货币化份额	第1年低于50%，第2年低于80%，或第30个月全经济体低于95%	审计供应链瓶颈；在TCC衰减前重新校准实物分配计划
住房建设未能动工	州/领地报告	第1年末开始建设的州低于50%	联邦协调指令；资源重新配置
经济架构未发挥作用	D.P.P.	第2年末 D.P.P. 仍无法计算	延长奠基阶段；推迟第3年里程碑
基本生产下滑	生产基线	第2年末任何类别低于基线的90%	将资源与劳动力重新配置至该类别；推迟非公民入境直至达到下限
首份环境报告未发布	第CXXI条所列指标	第2年末仍无报告	由立法权下达附期限的指令；起始读数须在第5年表决前经指标审计委员会核验

失败条件	指标	阈值	纠正措施
犯罪率超出基线	N.C.I.	任何城市的 N.C.I. 超出前 Jasutopian 水平 >2 个标准差	重新配置安全资源；司法权审查
民主制度未投入运行	公民议院	第4年时永久投票系统仍未正常运行	第4年选举按期采用第一年的临时投票系统[或凭第VII条规定的投票 I.D. 卡以纸质选票方式]举行，同时完成永久系统的建设

评估阶段失败情形（第5年）

第5年的失败条件即第三节中规定的四项消极巩固标准。若有任何标准未获满足，应对措施与未满足标准的数量成比例：

1项未达标：采取有针对性的纠正措施；六个月后重新评估

2项未达标：延长评估期；全面诊断

3项或**4**项未达标：由治理三权在公民议院全面参与下共同进行结构性审查

第5年还有一项失败条件独立于上述门槛之外。若第CXVII条规定的首次表决在第5年末仍未举行，则第CXX条的研究百分比及第CXXI条的中期目标将仍未确定。纠正措施为：参议院立即将该法案提交公民议院表决，并将该项延误记入评估档案。

成熟阶段失败情形（第6年至第10年）

失败条件	指标	阈值	纠正措施
文化交流委员会尚未设立	制度性指标	第7年时仍无投入运行的委员会	延长评估期[重复第5年诊断]；若原因为内部因素，由立法权下达附期限的指令
国际互动停滞	N.A.A.C.G.A.	截至第8年，受援助盟国数量为零	评估失败源于内部还是外部；若属内部原因，则进行制度改革

失败条件	指标	阈值	纠正措施
公民流动停滞	S.O.L.P.C.N.	截至第8年，晋升过地位等级的公民比例低于20%	激励结构审查；地位升级校准
创新下滑	I.O. + I.N.R.	两项指标连续4个及以上季度下降	经济政策审查；创业激励改革
经济停滞	D.P.P.	第5年之后，D.P.P.连续2年及以上持平或下降	由公民全国民主商业委员会进行结构性经济审查
民主疏离	公民议院	连续2年及以上投票率低于30%	民主参与倡议；投票系统可及性审查
第二次环境投票未举行	第CXVII条	截至第10年底仍未举行投票	参议院立即将该法案提交公民议院；该延迟情况记入第10年评估

曼瑟·奥尔森表明，集体行动困境[搭便车行为，即即便集体参与有益，个人弃权仍属理性的逻辑]是民主制度所固有的问题(Olson, 1965)。特定的Jasutopian公民可能会盘算，其个人的一票无关紧要。如果有足够多的公民作出这种盘算，直接民主机制就会失效。公民议院30%的投票率门槛并非源自奥尔森的理论。它是本书自行选定的最低标准，预先设定且并非推导自任何研究。Jasutopianism并不以奖励回应公民的这种盘算，因为地位等级“是在生活中通过工作表现和教育表现获得的”(Rodriguez, 2021，《社会组织条款》)，投票本身并不获得积分。它以投票的直接效力[公民直接就法案本身投票，而非选举代表]、计票的透明度[Jasutopianism为选举规定的投票系统允许每位公民在公共档案库中核查自己的一票是否已被记录，而同样的核查机制亦可用于公民议院的表决]，以及当制度兑现其承诺时所滋生的信任(Rothstein, 2005)来作出回应。30%的门槛旨在检验这一设计是否有效。低于该门槛的投票率在本书中始终以同一种方式解读：它是一项呼吁采取纠正行动的警示，且唯有与第二项征兆共同出现时，方能作为反驳该设计的证据[第7章]。

	Jasutopianism, Argument VII	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 Chapter 6
Phase Zero	Assumes founding majority already exists **Gap** *No adoption pathway specified.*	**NEW, Pre Constitutional Adoption** Stage 0A municipal Fair Pay & audit pilots; 0B verified coalition; 0C sortition convention [1 to Z brackets, baselines]; 0D two stage ratification [>60%, >70%].
Year 1	Status Level exams, National IDs, 6 month monetary phase out, housing, essentials **Gap** *No measurement criteria or B2B clearing bridge.*	Same milestones, plus: Metrics Audit Panel; Tier 1 ≥ 90% [fail < 65%]; Tier 2 TCC B2B bridge [≥ 50%]; S.O.L.P.C.N. 85% target; C.P.I. baseline monitoring; I.O. first measurement.
Year 2	Resource valuation, essential businesses, international trade **Gap** *No success metrics.*	Same milestones, plus: Tier 2 B2B ≥ 80%; Tier 3 ring fenced foreign clearing; D.P.P. first measurement; production ≥ 90% baseline; N.N.R. trajectory; I.N.R. first data; first Bi* environmental report.
Year 3	Noncitizen entry **Gap** *No precondition assessment.*	Same milestones, plus: ≥ 95% economy wide nonmonetary share & 100% TCC decay at Month 30; U.A.O.R. three preconditions; N.A.A.C.G.A. first count.
Year 4	Tri-Presidency evaluation **Gap** *No formal evaluation structure; nothing specified beyond Year 4.*	Same milestones, plus: Fukuyama three component evaluation; every metric then available assessed; election held on schedule.
Year 5		**NEW, Formal Assessment Phase** Negative consolidation determination; Metric Threshold Gate of four criteria; Linz and Stepan's five conditions mapped as commentary; T.A.R. first measurement; first vote of Article CXVII.
Years 6 and 7		**NEW,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ngagement** Cultural Exchange Commission operational; Articles CIII through CXVI implemented; S.O.L.P.C.I.G. first computation.
Years 8 and 9		**NEW, Institutional Deepening** S.U.W. readiness assessment; all metrics mature; polycentric governance exploration.
Year 10		**NEW, Democratic Renewal** Complete ten year assessment verified by the Metrics Audit Panel; Senate bills voted by the Chamber of Citizens on the direction of the next decade; second vote of Article CXVII.

图 **6.4.** 从Jasutopianism到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过渡规范对比

VI. 蓝图与合并体系

上述过渡蓝图将Jasutopianism的四年计划扩展为十年实施计划，并具备原计划所欠缺的三项特质。

第一，可衡量性。大多数里程碑至少与Jasutopianism十三项指标中的一项相关联；其余里程碑则与本书新增的某项工具挂钩，或者在其属于制度性事件的情况下对照公共记录加以核查。过渡期并非凭印象评估，而是依据数据评估。国民身份记录系统[第LXXXV条至第LXXXVIII条，详见论点VIII]为这种衡量提供了基础设施。系统自身的交易记录经指标审计委员会核实后作为指标数据向公民公布，由此成为其自身评估的工具。

第二，失败条件。在每一个阶段，蓝图都明确规定了何种情况表明失败以及可采取何种纠正行动。一个不会失败的治理体系无法学习。一个不明确规定自身失败条件的治理体系是在要求公民盲目信任。上述提出的失败条件并非穷尽无遗，而是最低限度。任何公民都可以利用公开的指标数据，识别出更多的失败条件。这正是公民议院的宗旨所在：将民众的集体判断运用于任何个人[以及任何文件]都无法预先预见的问题。读者应当注意，这一机制并非装饰品；它是该体系用以识别蓝图作者未能预见之失败条件的主要工具。

第三，民主更新。第10年的投票使过渡期从由首届三总统制执行的计划，转变为由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的民众所主导的计划。道格拉斯·诺斯指出，制度会产生路径依赖：一旦确立，便会约束未来的选择(North, 1990)。保罗·皮尔逊将这一分析专门拓展至民主制度，表明在形成时期作出的制度选择会产生递增报酬，从而使逆转变得越来越昂贵(Pierson, 2000)。十年蓝图正是这一形成时期。第10年的民主更新，则是民众决定首个十年所开辟的路径将在第11年至第20年间如何延续下去的时刻。

这一过渡并不止步于第10年。在经历过初期岁月的公民的民主意志引导下，它迈入第二个十年。制宪前零阶段奠定了授权基础；三级清算桥梁承载经济度过了第1年至第3年；完整的十年蓝图核验了每一个里程碑。连同原有的102项条款、十五项文化、数字及澄清性条款[第4章和第5章]、后文的七项环境条款[第8章]、弥合经济与政治权力缺口的十

一项条款[第12章]、扩展后的 TER [第2章]以及实证案例[第3章]，该法典共涵盖135项条款，专为实现其跨越数十年的巩固而设计。

接下来是对这一架构的检验。第7章将提供各项预测与证伪条件[即何种情况会证明该制度存在谬误，且所用标准足够明确以供独立验证]。行文语域由此转换。本章已规定必须构建什么以及按何种顺序构建。下一章将追问，何种情况会证明这种构建实属徒劳。这种转换是有意为之的。一个能够规定自身构建方式却无法说明自身如何被反驳的体系，并非治理方案，而是一条信仰信条。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并不要求信仰，它要求证据。

参考文献（第6章）

Fukuyama, F. (2014).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Huntington, S. P.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Linz, J. J., & Stepan, A.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North, D.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Donnell, G., Schmitter, P. C., & Whitehead, L. (Eds.). (1986).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4 vol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Olson, M.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strom, E. (2010a). Beyond markets and states: Polycentric governance of complex economic syste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3), 641-672.

Paris, R. (2004). *At war's end: Building peace after civil conflic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ierson, P. (2000).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4*(2), 251-267.

Rodriguez, J. (2021). *Jasutopianism*. [Self-published].

Rothstein, B. (2005). *Social traps and the problem of tru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chedler, A. (1998). What is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9*(2), 91-107.

Schedler, A., Diamond, L., & Plattner, M. F. (Eds.). (1999). *The self-restraining state: Power and accountability in new democracie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Wright, E. O. (2010).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Verso.

第7章：预测、证伪与智识诚实



I. 从规范到预测

前一章明确规定了必须构建的内容。该过渡蓝图逐年、逐项指标地确定了实施 Jasutopian 治理十年计划的里程碑、衡量标准与失败条件。其论述语体属于操作层面。所探讨的问题也具有实操性：必须发生什么，按何种顺序发生，以及我们如何判断其正在发生？

本章提出了一个不同的问题。

问题不在于过渡能否得到管控，而在于该制度一旦建成，是否会产生其所宣称的结果。论述语体从操作层面转向分析层面。研究方法从规范转向预测。评判标准从“该蓝图是否合理？”转向“该理论是否可检验？”。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指出，科学命题的根本特征不在于其能够被证实，而在于其能够被证伪 (Popper, 1963)。一个与所有可能观察结果都相容的命题并非经验命题，而是同义反复。一个未界定在何种条件下承认失败的治理体系，并非治理方案，而是信仰承诺。Jasutopianism 并未规定证伪条件。按照惯例，这是规范性政治著述的体

裁特征：《美国宪法》并未规定何种情况会证明其错误，罗尔斯（Rawls）的《正义论》未作此规定，马克思（Marx）的《资本论》亦然。缺乏证伪条件并不会使 Jasutopianism 在其所属体裁内存在缺陷，但使其作为一项可检验的治理方案不够完整。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 补全了这一环。

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拓展了波普尔的模型，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的概念，即一系列具有共同硬核及辅助性假说保护带的相互关联的理论 (Lakatos, 1978)。如果一个研究纲领能够产生随后得到证实的新颖预测，它就是“进步的”；如果它退缩到特设性修改之中以保护其硬核免遭反驳，它就是“退化的”。这一区分至关重要。一个对每一次失败都以解释“为何该失败实际上不算数”来应对的治理体系，正是退化的体系。而一个预先规定何为失败并使自身接受该标准检验的治理体系，则完成了进步的纲领所必须迈出的第一步；至于它是否真正具有进步性，则由其预测的最终命运在事后加以判定。

预注册制度弥合了这一方法论鸿沟。本章直接借鉴 Popper (1963) 的可证伪性标准、Lakatos (1978) 的科学研究纲领标准、Sartori (1970) 的抽象阶梯、Goertz (2006) 的三层次概念操作化、Collier (2011) 的过程追踪检验，以及 Przeworski et al. (2000) 的比较治理设计，将 Jasutopianism 的五项核心制度主张置于正式的实证检验之下。规范性宪法文本宣告应当成立的原则；而预注册的实证研究则在实施启动之前便明确列出确切的工具、时间跨度、比较基准与失败门槛。每一项主张均同时锚定于 Jasutopianism 自身的指标，以及由独立指标审计委员会核验的非货币外部指标，从而在结果显现后不留任何重新界定失败的余地。下文列明五项预测，五项证伪条件亦紧随其旁。

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 将 Jasutopianism 定位为一个将自身置于反驳检验之下的研究纲领。若其预测得到证实，它便符合拉卡托斯意义上的“进步的”纲领。下文提出的五项预测均属新颖主张；它们预测了尚未被观察到的具体结果[因为目前尚不存在 Jasutopian 国家]。五项证伪条件则规定了何种观察结果将推翻这些主张。该体系预先向世人说明，它接受何种情况作为对自身的反驳。

认识论的底线正在于此：任何治理方案在声称自己超越单纯愿景之前，都必须满足这一作为智识诚实最低门槛的要求。一个无法规定自

身失败标准的治理体系，是在要求其公民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盲目信任。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 并不要求信任。它要求证据，并明确指出了何种证据足以证明其错误。

II. 方法论架构

为一个尚未付诸实施的治理体系制定可检验的预测，需要一套将抽象治理主张转化为可衡量指标的方法论。社会科学在七十年间发展出了这套方法论，第7章运用了其中的五项工具。

抽象阶梯。乔瓦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 1970）指出，比较政治学中的大多数错误源自于在错误的抽象层级上使用概念。诸如“地位升级将激励生产性劳动”这样的主张，作为哲学陈述是有意义的，但作为经验预测却不可检验；它既未界定“激励”的含义，也未说明“生产性劳动”以何种标准衡量，亦未指明以何种比较基线界定成功。萨托利的阶梯从抽象[概念]迈向具体[可衡量的指标]，本章中的每一项预测均在阶梯的每一个层级上加以陈述，从而使所预测的内容不存在任何歧义。

三层级操作化。加里·戈尔茨（Gary Goertz, 2006）将概念转化为测量的过程系统化为三个层级：基础层级[概念本身，例如“经济生产力”]、次级层级[概念的维度，例如“劳动力活跃度”、“产出”、“创新率”]以及指标层级[可衡量的变量，例如劳动力活跃率与人均产出]。下文的每一项预测均在这三个层级上完成操作化。

过程追踪证据类型。戴维·科利尔（David Collier, 2011）在案例内因果分析中识别出四类证据。“风中草芥”（straw-in-the-wind）是指与假说一致但不足以证实它的证据；它具有提示性，而非决定性。“铁环检验”（hoop test）是指假说必须“穿过”方能维持其成立可能性的证据：必要但不充分。“确凿证据”（smoking gun）是指一旦发现即具强有力证明效力的证据：充分但不必要。“双重决定性”（doubly decisive）检验则是既必要又充分的决定性证据。第3章呈现了七项案例研究。本章结合此处引入的另外两个案例[基于公地的对等生产与瑞士联邦委员会]，采用科利尔的类型学对这些证据进行重新归类，以展示每项预测目前已具备何种类型的证据，以及尚需何种进一步证据。

比较治理方法论。亚当·普热沃尔斯基（Adam Przeworski）与迈克尔·阿尔瓦雷斯（Michael Alvarez）、何塞·安东尼奥·谢布布（José Antonio Cheibub）及费尔南多·利蒙吉（Fernando Limongi）在一项关于政治制度与经济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中 (Przeworski et al., 2000)，展示了如何为治理体系构建可检验的预测：明确规定治理变量、可衡量的指标、比较基线以及时间跨度。他们的研究涵盖了1950年至1990年间的135个国家，探讨的核心问题是政体的存续及其经济绩效。尽管目前尚不存在 Jasutopian 国家，该方法仍适用于 Jasutopianism，因为比较基线可以利用现有制度的数据加以界定。

定性研究标准。詹姆斯·马奥尼（James Mahoney, 2010）指出，定性研究已发展出一套严谨的标准，该标准虽不同于金、基奥汉与维尔巴（King, Keohane, and Verba, 1994）所确立的定量范式，但并不逊色于后者：过程追踪[追踪因果机制]、集合论方法[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以及比较历史分析[跨案例的结构化比较]。由于 Jasutopianism 尚未付诸实施，无法通过大样本定量数据进行检验。但它可以借助马奥尼所阐述的定性方法加以评估，而第3章中按照科利尔证据类型加以结构化整理的案例研究证据，正构成了此类评估。

Prediction and abstract claim	Concept level [Sartori]	Secondary level [Goertz]: dimensions	Indicator level [Goertz]: measurable variables
	Time horizon	**Comparison baseline [Przeworski]**	**Process tracing evidence [Collier]**
One. Status Leveling will motivate productive work without monetary incentive within one generation	Productivity under nonmonetary incentives	Workforce activity rate; output; voluntary contribution	Workforce activity rate; output per worker; voluntary contribution [added by this book]; the I.O. and the I.N.R. as internal trend measures
	25 year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bout 60 to 75%] and output per worker in OECD countries at comparable development levels	Hoop tests: Kibbutzim, Nordic. Straw-in-the-wind: commons-based peer production, Mondragon, time banking
Two. Innovation rates will stand within the range of monetary system baselines	Innovation capacity of a status based economy	Physical energy productivity; physical material & labor productivity; frontier open science output	Dual Physical Innovation Benchmark [ΔEp per GJ, ΔMp per DMC tonne & labor hour]; open science citations; T.A.R. & I.N.R. as internal diagnostics
	20 years	IEA and OECD Green Growth physical productivity databases; at or above 25th percentile of comparable OECD economies	Hoop test: Nordic. Straw in the wind: open source software, Estonia
Three. Governance stability will hold	Institutional durability under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Leadership transition smoothness;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output; crisis response	Tenure continuity of the Tri-Presidents; the Chamber of Citizens voting rate; the N.C.I.; the deadlock indicator
	Two Tri-Presidency cycles [8 years]	The Polity5 record of regime durability; voting rate at or above 30%; the N.C.I. within two standard deviations of its pre-Jasutopian baseline	Hoop tests: Swiss Federal Council, Nordic. Straw-in-the-wind: Rojava
Four. Poverty will decline below five percent	Material deprivation under Article I's guarantee	Resource poverty; capability deprivation; comparative wellbeing	The C.P.I. of every city; the national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rate [Alkire and Foster]
	25 years	The European Union's severe material and social deprivation rate [6.4% in 2024]; the Bhutan GNH Index, a nonmonetary comparison	Hoop test: Nordic. Straw-in-the-wind: Bhutan GNH, time banking
Five. Democratic legitimacy will hold over time	Public support for the governance system	Voting rates; trust indicators; satisfaction surveys	The G.L.I. [voting rate, trust, satisfaction]; the U.A.O.R. as covariate; the Empathy-Institution Feedback Loop metric as supplement
	From Year 10; formal assessment every fifth year	The country's own Year 10 readings of the trust and satisfaction parts of the G.L.I.	Straw-in-the-wind: Rothstein's Nordic mechanism, Estonia, Rojava

图 **7.1.** 预测架构：三层级下的五项预测



III. 预测一：地位升级将激励生产性劳动

抽象主张。地位升级[即公民通过贡献而非货币报酬获得物质与社会分化待遇的制度]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在没有货币激励的情况下激励生产性劳动。在本预测中，一代人界定为自 Jasutopian 国家建立之日起的二十五年。

操作性定义。“生产性劳动”通过戈尔茨的三个层级加以操作化。在基础层级，该概念是指非货币激励下的生产力。在次级层级，它分解为三个维度：劳动力活跃率[处于工作年龄的公民中积极做出贡献者所占的百分比]、产出[在职公民是否以足够数量生产出符合功能标准的商品与服务]以及自愿贡献[公民的工作时长是否超出法律为其所属年龄组设定的强制最低工时]。在指标层级，每个维度均有其对应衡量标准，且这三项均为本书新增的工具：劳动力活跃率[该年度内有劳动记录的适龄工作公民占比]、人均产出[每位在职公民的实物产出]以及自愿贡献[有记录的劳动时长超出其所属年龄组强制最低工时的公民占比，该最低工时由 Jasutopianism 第 XXXVIII 条及第 XLI 至 XLV 条规定]。I.O.[创新机会（Innovative Opportunity）]指标追踪公民享有创新自由的潜力，I.N.R.[创新规范率（Innovative Norm Rate）]指标衡量通过登记为拥有创新平台的岗位所创造的产品总数，二者均作为内部趋势衡量指标予

以保留。这两项均位列 Jasutopianism 的十三项指标之中，并界定于其术语表内 (Rodriguez, 2021)；由于没有其他国家报告这些指标，因此它们不参与比较。

时间跨度。自建国之日起二十五年。这是完全在 Jasutopian 制度下接受教育的第一代人达到工作年龄的时期。本预测并非认为地位升级会立即激励生产性劳动[过渡期涉及已习惯于货币激励的公民]，而是认为它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形成稳定且持久的生产性贡献模式。

比较基线。遵循普热沃尔斯基（Przeworski）等人的方法论，比较基线为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货币经济民主国家的劳动力活跃率与人均产出。具体而言：OECD 的劳动参与率[约占适龄工作人口的60%至75%]以及同一批国家的人均产出[正如 Jasutopianism 术语表针对 D.P.P. 所规定的那样，相对于各国自身的生产总产出进行比较]。自愿贡献在货币经济中没有对应物，既不进入基线，也不纳入证伪条件。本预测认为，一个 Jasutopian 国家在建立二十五年后，在这两项指标上都将处于或高于该基线，或者虽低于该基线但正呈收敛趋势。

现有证据。第3章的案例研究在采用科利尔的类型学重新归类后，提供了初步的过程追踪数据。

基布兹的经验证据构成一项铁环检验。Abramitzky (2008) 证明，当生活水平堪比外部选择且共同承诺坚固时，非货币的公社制度安排得以存续；而 Abramitzky (2011) 则追踪了侵蚀此类安排的确切压力。绝对平均分配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一旦外部货币薪酬攀升，它便缺乏任何留住高技能公民的制度性手段。地位升级正是专为跨越这一铁环而构建，通过在非货币法典内部对贡献予以差异化奖赏，并辅以第3章第III节B的四项国内人才流失反制机制[主权生产资本配置、稀缺加权地位乘数、固定任期国际轮换，以及归属与重返留任分类账]加以强化。然而，制度设计绝非实证观察。由于地位等级无法像私人货币那样跨境流通，这四项留任机制在已建立的国家中是否果真能够留住稀缺人才，仍是一个有待检验的实证问题，而这正是预测一的劳动者人均产出检验所直接衡量的内容。

基于公地的对等生产证据构成了风中草芥。尤查·本克勒（Yochai Benkler, 2006）记录表明，网络化信息生产[开源软件、维基百科、协作

平台]通过非货币动机[社会认可、内在满足感、社群地位]创造了有价值的物品。这一模式与“地位升级能够激励生产性劳动”的预测相一致，因为地位升级同样具有非货币认可的结构性特征。话虽如此，该证据仍属提示性而非决定性的：基于公地的对等生产仅在特定领域[边际成本较低的信息产品]中运作，尚未作为一般经济体系经受检验。

北欧的创新证据构成了第二项铁环检验。艾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en, 1990）将北欧国家归类为去商品化程度最高的福利国家[即公民在生计上对市场依赖程度最低的国家]，希尔森（Hilson, 2008）追溯了其模式在1945年后的演变历程；但二者均未衡量创新。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对此进行了衡量，瑞典、芬兰与丹麦均位列该指数前十[具体数据见预测二]。北欧案例表明，广泛的福利供给本身并不会摧毁创新动力。Jasutopian 制度向每一位做出贡献的公民保障基本生活必需品，因而必须穿过这一铁环：如果广泛的供给摧毁了创新，该预测便会失败。北欧的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这一铁环的适用范围较窄：北欧国家仍以货币支付工资与利润，因此其记录并未说明当货币激励被移除后会发生什么，而这正是正在接受检验的核心主张。

第3章中的另外两个案例对本预测而言属于风中草芥。蒙德拉贡（Mondragon）合作社在民主治理与压缩薪酬差距的条件下维持了生产性劳动的持续运转；它们以货币支付报酬，这限制了该发现的推论范围。时间银行展示了按贡献而非按价格赋予价值的模式，它在社区尺度上运行，但始终与货币经济并行，而非取而代之。

证伪条件。若在一个已实施的 Jasutopian 国家中，第25年时核实上述两项条件同时成立[即劳动力活跃率或劳动者人均产出低于 OECD 比较基准，且其差距在过去五年间未能收窄]，则预测一将在所检验的地位升级参数设定下被实证证伪，从而证实非货币激励的现有校准未能达到维持一个正常运转的经济体所需的生产率门槛。

该检验具有双重性与前瞻性。它要求既存在水平上的缺口，又出现连续五年停滞的趋势。一个虽低于基准但正在稳步趋同的国家属于进度滞后，而非被证伪；而一个低于基准且在五年内毫无趋同迹象的国家，则为依据第IX节进行制度再校准或运作替代提供了直接的实证依据。

IV. 预测二：创新率将处于货币制度基线范围之内

抽象主张。一个已实施的 Jasutopian 经济体将在建国后二十年内，在相当的发展水平上产生处于货币经济民主国家实证区间内的技术与生产创新[在物理效率提升方面达到或高于第25百分位，或稳步收窄任何差距]。此处的创新涵盖工程突破、能量转换效率、材料利用率以及前沿科学发现。

操作性定义。在 Goertz 的基本层面上，是非货币地位经济体的创新能力。在次级层面上，该能力划分为物理能源生产率、物理材料与劳动生产率，以及前沿开放科学产出。在指标层面上，Jasutopianism 的内部指标[T.A.R.，即追踪支撑三大立国原则的能源载体系统与科学能力的技术进步率；以及 I.N.R.，即追踪已注册创新平台产出的创新规范率]严格保持为国内内部趋势诊断工具；将国内 I.N.R. 计数与 OECD 货币专利申请量相比较，会招致苹果与橘子般的类比失真，因为专利计数追踪的是商业知识产权防御而非物理进步。为在无任何货币换算的情况下跨越不同经济体系清晰地衡量创新，本卷确立了一项双重物理创新基准，并配以一项外部开放科学核验：

1. 物理能源生产率增长 **[ΔEp]**。跨越四项核心工业篮子的每吉焦 [GJ] 一次能源投入标准化物理产出的年化五年滚动增长率：

$$\Delta Ep = (1 / n) \sum [\ (\text{物理产出}(k) / GJ(t) - \text{物理产出}(k) / GJ(t-1)) \div (\text{物理产出}(k) / GJ(t-1))\ ]$$

其衡量涵盖每单位钢铁和混凝土的千瓦时数、农业中单位能源投入的热量与营养产出、交通运输中每兆焦 [MJ] 的客运公里数，以及标准级住房每平方米的热效率。

2. 物理材料与劳动生产率增长 **[ΔMp]**。在同等制造业、能源业和建筑业部门中，每公吨国内物质消费 [DMC] 及每记录工时的年化物理产出。

3. 外部开放科学核验 **[补充指标]**。在国际索引期刊上发表的经同行评审的科学和工程出版物（按每 100,000 名居民计算）[按领域加权引用影响力评估]，为前沿知识创造提供经外部评审的非货币核验。

时间跨度。二十年。创新动态的显现早于整代劳动力的完全更替：T.A.R. 于第5年发布其首个经核验的读数[第6章]，从而在第20年时能够提供十五年的国内实测轨迹，以及 ΔEp 与 ΔMp 的十年移动平均值。

比较基准。可比 OECD 经济体的年度物理能源效率与多要素物理生产率记录，均通过国际能源署的《能源终端用途与效率指标》（*Energy End Uses and Efficiency Indicators*）(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26) 与 OECD 的《绿色增长指标》（*Green Growth Indicators*）生产率数据系列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n.d.) 公开发布。所有计量单位均为物理单位[千兆焦耳、兆焦耳、公吨、已记录劳动工时、同行评审论文]。货币汇率绝不进入算术运算。以国内生产总值占比衡量的货币研发支出被完全省略，这是因为非货币经济不记录任何货币支出；全球创新指数仅作为背景实证参照保留于下文，而不作为正式的证伪检验指标。

现有证据。北欧的创新数据构成一项圈套检验（hoop test）。其中三个北欧国家将OECD中最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与位列世界前十的创新率结合在一起：在全球创新指数中，瑞典在2023年至2026年的每一版中均位居第二，芬兰和丹麦也始终保持在前十名之内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2024, 2026)。倘若广泛的社会保障会摧毁创新激励，北欧国家本应表现欠佳，但事实并非如此。本预测必须通过这一圈套检验，而此处的圈套与预测一同样狭窄：这些国家均为货币经济体。

开源软件的证据构成一项风向标检验（straw-in-the-wind）。Benkler (2006) 记录指出，开源软件运动[程序员在没有直接货币报酬的情况下贡献代码，其动力源自声誉、内在兴趣以及社区地位]所产出的软件，在许多领域达到甚至超越了专有替代方案[Linux、Apache、Firefox、Python等支撑绝大多数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工具]。这一证据具有启发性，因为它表明在一个产出质量可被客观衡量的领域中，公开共享的协作能够产生创新。然而该证据并无决定性：Benkler 的描述已不再适用于该运动的旗舰项目，因为超过80%的Linux内核开发工作是由领薪开发者完成的 (Corbet & Kroah-Hartman, 2016)。这一案例表明公开共享的工作可以媲美专有工作，但已不再能证明此类工作是无偿进行的。

爱沙尼亚的证据构成一项风向标检验。一个小国在大约二十五年内几乎从零开始建成了数字政府[第3章]，这表明公共机构能够产出高水平的创新；但它所能证明的也仅止于此，因为爱沙尼亚的经济属于货币经济。

证伪条件。如果在已实施的 Jasutopian 国家建立二十年后，同时出现以下情况：(a) 国内 T.A.R. 相对于其第5年基准有所下降，且 (b) 该国在 ΔEp 与 ΔMp 两项指标上的十年移动平均值均低于可比 OECD 经济体的第25百分位数，且在过去五年内未见差距缩小，则预测二在经验上即告证伪。若上述两项经核验的条件同时成立，则所检验的地位升级参数设定便未能维持创新型经济所需的物理生产率增长与技术风险承担能力。

该检验为联合检验。任一单项失灵仅构成经审计的诊断性警示；两项同时出现方可在所检验的校准参数下确立正式证伪。将底线设定在第25百分位数体现了审慎的克制：一个新建立的非货币经济体在其最初二十年内无需立即超越全球前沿水平，但它必须保持可测量的物理效率进步，而非停滞并落后于相应的货币经济同行。

V. 预测三：治理稳定性将得以维持

抽象主张。三总统制度[由三位地位平等的行政首脑构成，须达成一致同意方可行权，受参议院弹劾或经法院批准的公民请愿弹劾之约束，并受公民议院推翻否决权之制约]将产生稳定且问责的治理：在每届任期结束时依宪完成权力移交、不发生政权更迭、公民持续使用公民议院、犯罪率维持在原先水平附近，且不出现行政僵局。

操作性定义。在基础层面，该概念指Jasutopianism治理结构下的制度持久性。在次级层面，它分解为三个维度：领导层过渡的平稳性[权力移交是否在不引发宪政危机的情况下完成]、立法与行政产出[由参议院起草并由公民议院表决的法案，以及依法要求三总统作出的决策，是否以符合正常运作的民主制之比率得以完成]，以及危机应对[治理体系能否有效应对外部冲击、经济动荡、自然灾害与安全威胁而不致宪政崩溃]。在指标层面，可衡量的变量包括：三总统的任期连续性[该制度是否产生定期、依宪的权力移交，且不发生下文基线所界定的政权更迭]、公民议院的投票率[公民是否在使用这一直接民主机制；第6章界

定了该比率]、N.C.I.[城市犯罪指数，作为治理稳定性的代理指标，因为处于危机中的体制会导致犯罪率上升]，以及僵局指标[法律要求三总统在一年内作出的各项决策中，即对已通过法案的签署或否决、法定任命以及年度资源分配，未能在法定期限前达成的比例]。依第CXXVIII条[第12章]采取的每项默认规则，均在僵局指标中计为未在法定期限前达成的决定。第二维度的立法部分与第三维度即危机应对均无各自独立的指标；僵局指标仅衡量行政部分，而证伪条件则依托于上述四项指标。在Jasutopianism的十三项指标中，仅N.C.I. 位列其中；其余各项均为本书增设的测量工具。

时间跨度。两个三总统制周期，在Jasutopianism的四年任期制下即为八年。治理稳定性无法仅在单一任期后加以评估；它至少需要一次成功的权力移交，并证明该制度在创始者离任后仍能存续。

比较基线。Polity5数据集，该数据集采用21分制对各国政体类型进行评分[从极度专制的-10到高度民主的+10] (Marshall & Gurr, 2020)。该评分反映一国拥有何种政体，而非其稳定程度；关于稳定性的比较指标是持久度，即同一数据集所记录的一国政体在不发生政权更迭[三年内评分变动三分或以上]的情况下存续的年数。本预测主张，历经两个三总统制周期，一个Jasutopian国家每次都将依宪移交权力，不会发生上述意义上的政权更迭，将投票率维持在30%或以上，在大多数城市中将N.C.I. 保持在Jasutopian实施前基线[定义见第6章]的两个标准差范围之内，并通过下述僵局检验。

现有证据。罗贾瓦（Rojava）的证据构成一项风向标检验。Knapp、Flach与Ayboga (2016) 记录显示，罗贾瓦的共同主席制[每个职位均须设一男一女两位共同主席]在持续武装冲突下得以运转，这是对治理稳定性最为极端的考验。这一证据具有启发性但无决定性：罗贾瓦的制度不同于三总统模式[设两位共同主席而非三位，且性别由制度强制规定而非经选举产生]。该制度自2012年起建立，在战火中运行至2026年；当年在达成一项与叙利亚政府的一体化协议后，北叙利亚和东叙利亚自治行政区于8月宣布解散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2026)。该案例仍然表明共享行政职务能够在最严酷的条件下运转；而其终结则说明该项制度安排从未在和平时期经受过检验。

瑞士的合议制行政机构构成一项圈套检验。瑞士联邦委员会[一个由七名成员组成、共享行政权力的合议机构，其主席职务每年轮换]自1848年以来一直不间断地运作。瑞士案例是一个存续至今的范例：它证明由多人共同执掌的行政治理可以长期保持稳定，而非必然如此。同样秉持集体行政权力原则的Jasutopian三总统制必须通过这一圈套检验：倘若合议制行政机构在结构上天生不稳定，瑞士体系早就崩溃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两者之间仍存在一项差异：瑞士联邦委员会依多数意见处理政务 (Swiss Federal Chancellery, 2012)，而三总统若未取得3/3全票通过，则不得作出任何行政决定[第XIX条]。瑞士的记录并未涉及一致同意规则下的僵局问题，而这正是设立僵局指标所要检验的内容。

北欧的证据构成第二项圈套检验。倘若广泛的社会保障会动摇提供保障的政府，北欧民主国家早就会显现出这种征兆；在截至2018年的Polity5记录中，丹麦、芬兰、挪威与瑞典均保持了七十年以上未发生政权更迭[冰岛未被纳入该数据集] (Marshall & Gurr, 2020)。这一圈套所检验的是社会保障在货币经济体中是否与稳定政府兼容，而非检验三总统制本身。

Mancur Olson (1965) 指出了威胁所有直接民主机制的集体行动困境：即便集体参与是有益的，理性个人仍可能选择弃权，因为单张选票的个体影响力微乎其微。针对Olson的这一预言，本书依托于Jasutopianism所提供的三项激励措施，其中无一是对投票的报酬[投票不获得任何地位等级，地位等级仅依据工作与教育授予]：选票的直接效力[在公民议院中，公民直接就法案本身进行投票，任何法案非经超过55%的赞成票不得通过，而80%的赞成票即可推翻否决]、透明度[Jasutopianism为选举规定的投票系统允许公民对照公开档案核查自己的选票是否按所投意向准确记录，同一核查机制亦可用于公民议院的表决]，以及在人们亲眼看到前两项切实运作时所滋生的信任。证伪条件[见下文]中设定的30%投票率门槛，正是为了检验这些激励措施是否足够。该门槛把一年中至少就一项法案投票的公民计算在内[第6章]，而唯一一个每年数次将法律交由公民表决的国家表明了这一衡量标准可以期待什么：在日内瓦州的选民登记册中，每次投票都弃权的公民不到十分之一，而偶尔投票者占选民总数的三分之二到五分之四(Goldberg & Sciarini, 2021)。

证伪条件。如果在已实施的 Jasutopian 国家跨越两个三总统制周期内，出现以下四项经核验条件中的任意一项：(a) 未能发生合宪的权力交接，或该国依据 Polity5 标准被记录为发生政体更迭；(b) 公民议院的投票率连续两年降至 30% 以下，同时治理合法性指数[G.L.I.，见下文第 VII 节]中的信任度与满意度读数在完全相同的年份里持续下降；(c) 多数城市的 N.C.I. 高出其十年基准两个标准差以上；或 (d) 僵局指标连续两年超过十分之一，或任何单一必要行政决策停滞超过九十天，则预测三在所检验的宪法规则下即告经验性证伪，从而证明现行的行政一致同意与直接立法校准机制未能确保持久政府所需的稳定性与问责性。

条件（a）检验权力移交机制。条件（b）在本书选定的门槛上，针对Olson集体行动分析所预言的弃权现象检验直接民主机制；单独的低投票率仅构成警示而非驳倒，因为心满意足的公民可能会减少投票，唯有与第二项迹象同时出现时，它才构成证伪。条件（c）检验体制的实际运作；治理不稳定表现为犯罪率上升，而N.C.I. 为此提供了测量工具。条件（d）检验一致同意规则本身：无法达成一致的三位行政首脑会使法定决策悬而未决，而僵局指标正是对这些未决事项进行统计。

VI. 预测四：贫困率将降至百分之五以下

抽象主张。在Jasutopian治理体系中，其中，第I条向所有做出贡献的公民保障免费的基本资源[食物、衣物、饮用水、教育、医疗保健、标准级住房及公用事业]，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每座城市乃至全国整体的贫困水平[逐城以城市贫困指数 C.P.I. 衡量，并以全国多维贫困率衡量]都将降至5%以下。

操作性定义。在基础层面，该概念指第I条保障框架下的物质匮乏。在次级层面，它分解为三个维度：资源贫困[公民是否能够获得基本商品与服务]、能力匮乏[依照Amartya Sen的能力方法，公民是否能够实现基本功能，即健康、教育、行动自由与公民发声]，以及比较福祉[Jasutopian国家的物质生活水平是否与处于相似发展水平的国家相当或超越之]。在指标层面，主要变量是C.P.I.[城市贫困指数]，该指数在城市层面上追踪贫困状况并提供逐城分布数据[依据Jasutopianism的明确要求，不将各城市平均合并]。Jasutopianism的术语表未对该指数设定单位；本书将其解读为百分比，即某座城市居民在一年中任何时候未能获

得第I条所述一项或多项基本资源的比例，该数据取自国民身份记录系统，并由指标审计委员会[第6章设立的独立于治理三权的机构]予以核验。第二个变量用于衡量能力匮乏，即采用Alkire与Foster的方法计算的全国多维贫困率。比较福祉则通过将这两项数据与其他国家的匮乏率并列对比来加以解读。

时间跨度。二十五年，即一代人的时间。本预测认为，第I条的保障、地位升级制度基于贡献的资源分配，以及过渡计划[第6章]期间建成的基础设施三者结合，将使每座城市的C.P.I. 以及与之相伴的全国多维贫困率均降至5%以下。

比较基线。以实物形式统计的匮乏，进行同类比较。C.P.I. 统计的是未能获得基本生活资料的人口，因此其比较基准为欧盟的严重物质与社会匮乏率[即在十三项指标中无力负担七项或以上的人口比例]，该比率2024年在欧盟范围内为6.4%，而成员国中的最低水平接近2% (Eurostat, 2025)。相对收入贫困属于不同维度的衡量标准，并不作为比较基准：在OECD国家中，约有11%的人口生活在低于本国收入中位数一半的水平下[2021年为11.4%] (OECD, 2024)，而一个国家完全可能在收入依然不平等的情况下消除物质匮乏。不丹的GNH体系提供了一项非货币比较参照：Ura、Alkire、Zangmo与Wangdi (2012) 运用Alkire-Foster多维测量方法制定了GNH指数，该方法在九个领域内界定了充足性门槛。本预测主张，Jasutopian国家将使每座城市的C.P.I. 降至5%以下，同时全国多维贫困率亦降至5%以下。

现有证据。北欧的贫困数据构成一项圈套检验。在发达国家中提供最为广泛的普惠社会保障的北欧国家，其相对收入贫困率在丹麦、芬兰和冰岛仅为5%至7% (OECD, 2024)，在挪威约为8% (OECD, n.d.)，而OECD平均水平约为11%。Jasutopian体制无需经济状况调查即向每位做出贡献的公民保障免费的基本资源，因此必须通过这一圈套检验：倘若广泛的保障仍使贫困维持原状，本预测便会落空，而北欧的数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话虽如此，北欧案例是在货币经济体中运行的，其贫困是相对于收入中位数来界定的；而在基本资源获得保障、且贫困以绝对匮乏而非相对收入来衡量的Jasutopian体制下，面临的则是截然不同的测量境况。

不丹的充足性证据构成一项风向标检验。GNH指数在个人于九个领域中的六个领域达到充足标准时即将其计为幸福；依此衡量，尽管不丹的人均GDP较低，2010年仍有41%的不丹人达到幸福标准，2022年这一比例升至48% (Ura et al., 2012, 2023)。对于处于该标准线以下的人群，该指数能够显示其究竟在哪些领域欠缺充足性。这表明非货币测量体系能够比基于收入的指标更精准地识别并定位匮乏所在。该证据具有启发性但无决定性：不丹的体制运行于截然不同的文化与经济背景之中，且GNH体系尚未在后工业经济体中接受过检验。

时间银行（time banking）是又一项风向标检验。无货币交换已将那些被货币经济边缘化的人们重新吸纳回社区生活之中[第3章]；它是在货币经济体身旁的社区尺度上做到这一点的。

Kate Raworth (2017) 提出了“甜甜圈”（doughnut）模型，这一可视化模型以内环代表社会基础[人类福祉的最低标准]，以外环代表生态上限[地球边界]。每座城市的C.P.I. 将降至5%以下这一预测，正是断言Jasutopian国家将使几乎所有公民都处于社会基础之上。Raworth的甜甜圈模型提供了一个直观的证伪结构：如果公民依然停留在社会底线之下，该体制便未能实现其最基本的承诺。

证伪条件。如果在已实施Jasutopian制度的国家建立二十五年后，两项经核实的门槛中任何一项被突破[即任何单一城市的C.P.I.达到或高于5%，或全国多维贫困率达到或高于5%]，则预测四即告在经验上被证伪，且不因呈现下降趋势而给予任何豁免，从而证明第I条下所检验的分配机制未能将物质匮乏降低至宪法所要求的最低标准。

5%的门槛并非武断设定。它在两方面均极为严苛：它适用于每一座城市而非全国平均水平，且低于欧盟严重物质与社会匮乏的平均比率[2024年为6.4%]，尽管高于最低的国家比率[接近2%]。如果第I条承诺向每一位做出贡献的公民保障基本生活资料的 Jasutopianism，却无法将其每一座城市的匮乏率控制在5%以下（即低于一个货币经济体联盟的平均线），那么其机制本身[而不仅仅是实施过程]便值得怀疑。

VII. 预测五：民主合法性将随时间推移而保持稳固

抽象主张。公众对Jasutopian治理的支持[以本卷引入的复合合法性衡量工具治理合法性指数 (G.L.I.) 进行衡量]将随时间推移而保持稳定，而非遭到侵蚀。

操作性定义。在基础层面上，该概念是指公众对治理体系的支持。在次级层面上，它可分解为三个维度：投票率[公民是否积极参与民主机制]、信任指标[公民是否对体系的公正性、能力及回应性表示信心]以及满意度调查[公民是否反馈该体系正在兑现其承诺]。在指标层面上，主要变量是治理合法性指数[G.L.I.]，这是本卷引入的复合衡量工具，恰好将上述三个维度操作化：公民议院投票率、制度信任指标以及公民满意度调查。信任与满意度部分由指标审计委员会通过匿名抽样进行调查，并由立法权依据该委员会核实的数据公布该指数。这三个部分既逐项单独报告，也合并报告，因为该预测是通过其中两项对照第三项来进行检验的。作为Jasutopianism前提条件量表的U.A.O.R.[乌托邦进步机会评级]充当背景协变量，而非合法性衡量指标本身：一个前提条件遭到侵蚀的社会很可能会出现合法性受侵蚀的情况，但这两个工具衡量的是不同的事物。一项补充指标是同理心与制度反馈循环指标[如果其已作为测量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被操作化]。

时间跨度。自第1年起持续测量，并在第5年[第6章，评估阶段]、第10年[民主更新投票]以及此后每五年进行一次正式评估。该预测针对G.L.I.中的信任与满意度部分作出陈述：在第10年之后的每一次五年评估中，这两项指标均将保持在或高于其第10年的水平[在两次评估之间的危机期间出现暂时下降属于预期之内]。

比较基准。该国自身的记录：经指标审计委员会核实的G.L.I.信任与满意度部分的第10年读数。世界价值观调查与欧洲晴雨表数据集在数十年间衡量了数十个国家的政府信任度与民主满意度，它们提供了可将上述读数与其他民主国家并置对照的背景参照，但它们不构成检验的任何组成部分。

现有证据。Bo Rothstein (2005) 揭示了本预测所依赖的精确机制：普惠性福利制度能够产生社会信任。当公民感知到该体系正在兑现承诺时[基本资源确实得到提供，治理结构确实承担问责，地位等级的晋升

确实基于贡献]，他们便会对该体系建立信任。这种信任会强化参与，参与又会巩固体系，体系进而进一步巩固信任。Rothstein 机制是预测五的一项风向标证据，且颇具说服力：它指明了从供给到信任的因果路径，并展示了该路径在北欧国家中的运作。北欧项目具有普惠性与无条件性，且在货币经济体内运作，而第I条的保障以做出贡献为条件，且地位等级对基本生活资料之外的事物进行分级；该因果路径在这些条件下是否同样奏效，正是本预测所要检验的内容。

爱沙尼亚的数字参与证据构成了另一项风向标证据。Heller (2017) 记录了爱沙尼亚的数字治理基础设施如何促成了高度的公民参与：数字政府服务几乎全面普及、电子投票广泛使用，以及公众对系统透明度的高度信任。这一发现与以下预测一致：治理透明度[Jasutopianism 的国民身份记录系统会记录每一笔交易；本书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经核实数据的公开发布以及公民的查阅权]能够产生信任。该证据具有启发性：不过爱沙尼亚的系统运作于货币经济体和传统民主结构之中，因此能否直接推及 Jasutopianism 尚不确定。

罗贾瓦（Rojava）的证据是第三项风向标证据。从公社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政府，在14年的战争中依靠其社区的参与持续运转[第3章]。该体系于2026年因并入叙利亚国家而终结，未能证明这种参与在和平时期是否能够延续。

Norbert Wiener (1948) 将本预测所体现的控制论原理形式化：向其组成部分提供准确信息的反馈系统具有自我修正能力。Jasutopian 体系包含这样一种修正循环[即指标与问责的循环，第2章中的问责与同理心之桥]：制度产生的结果由 Jasutopianism 的指标以及本书新增的工具加以测量，数据经指标审计委员会核实后向公众发布，透明度产生理解[永恒相对论的概念IV]，理解产生问责，而问责推动制度改进。修正循环使系统维持在既定准星之上；它并不承诺无止境的上升。关于合法性将保持稳固的预测，本质上即预测这一修正循环将按设计正常运行。

证伪条件。如果在已实施该制度的国家中，第10年之后的任何时期内，经核实的G.L.I.信任与满意度读数连续五年出现下降[表明存在结构性侵蚀而非短期危机波动]，且在同样的这五年内，公民议院投票率连续两年低于30%，则预测五即告在经验上被证伪，从而证明所检验的透明度与问责校准未能维持其长期民主合法性。

这一双重条件[信任与满意度下降且投票率低]是刻意设计的。其两个分支相互独立：第一项仅根据指数中的信任与满意度部分来判读，从而避免对投票率进行重复计算。单纯的信任与满意度下降可能源于外部因素[国际危机、自然灾害]，未必表明治理模式出现结构性失败。单纯的投票率下降可能源于满意而非幻灭[感到满意的公民可能减少投票，这是成熟民主国家中已被记录的现象]；无论在此处还是在预测三中，低投票率都只是警示，绝不单独构成反驳。唯有两者同时出现，才表明存在结构性失败：公民既不信任该体系[信任与满意度下降]，也不参与其中[投票率低于30%]。低于第10年水平但尚未达到上述条件的读数，同样只是一种警示，而非反驳。

Prediction	Measured by	Time horizon	Falsified if
One. Status Leveling will motivate productive work	The workforce activity rate and output per worker, each against the same measure in OECD countries at comparable development levels	25 years	Either measure stands below the OECD level and the gap has not narrowed over the last five years
Two. Innovation rates will stand within the range of monetary system baselines	Dual Physical Innovation Benchmark [ΔEp and ΔMp against IEA and OECD databases], open science citations, and domestic T.A.R. trend	20 years	Domestic T.A.R. declines from Year 5 baseline AND 10 year trailing averages on both ΔEp and ΔMp fall below 25th percentile of comparable OECD economies without narrowing over 5 years
Three. Governance stability will hold	Transfers of power and the Polity5 record of regime change; the voting rate, read with the trust and satisfaction parts of the G.L.I.; the N.C.I.; the deadlock indicator	Two Tri-Presidency cycles [8 years]	Any one holds: (a) a constitutional transfer of power fails or a regime change occurs; (b) the voting rate stands below 30% for two consecutive years while trust and satisfaction fall in those years; (c) the N.C.I. exceeds its pre-Jasutopian baseline by more than two standard deviations in a majority of cities; (d) the deadlock indicator stands above one tenth in two consecutive years, or any single required decision stays blocked for more than ninety days
Four. Poverty will decline below five percent	The C.P.I. of every city and the national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rate	25 years	Any city's C.P.I. or the national rate stands at or above 5%; a declining trend earns no exemption
Five. Democratic legitimacy will hold over time	The trust and satisfaction parts of the G.L.I., surveyed by the Metrics Audit Panel through anonymous samples, and the voting rate	From Year 10 onward, read each year; formal assessment every fifth year	Trust and satisfaction fall for five consecutive years and, within those years, the voting rate stands below 30% for two consecutive years

图 **7.2.** 证伪条件：何种情况将证明该制度存在错误

VIII. 证据架构

上述五项预测面向未来：它们描述了制度按设计运转时将会出现的结果。来自第3章的案例研究证据则面向过去：它们描述了在与 Jasutopianism 具有共同结构特征的制度中已经发生的结果。本节依据 Collier (2011) 的过程追踪法对现有证据进行分类，从而将两者连接起来。

	Prediction				
	1. Status Leveling → productive work	**2. Innovation → within the range of baselines**	**3. Governance stability**	**4. Poverty → below 5%**	**5. Democratic legitimacy → holds**
Mondragon	**Straw-in-the-wind [1]**	*[no relevant evidence]*	*[no relevant evidence]*	*[no relevant evidence]*	*[no relevant evidence]*
Kibbutzim	**Hoop test [2]**	*[no relevant evidence]*	*[no relevant evidence]*	*[no relevant evidence]*	*[no relevant evidence]*
Nordic	**Hoop test [3]**	**Hoop test [6]**	**Hoop test [9]**	**Hoop test [12]**	**Straw-in-the-wind [15]**
Bhutan GNH	*[no relevant evidence]*	*[no relevant evidence]*	*[no relevant evidence]*	**Straw-in-the-wind [13]**	*[no relevant evidence]*
Time banking	**Straw-in-the-wind [4]**	*[no relevant evidence]*	*[no relevant evidence]*	**Straw-in-the-wind [14]**	*[no relevant evidence]*
Estonia	*[no relevant evidence]*	**Straw-in-the-wind [7]**	*[no relevant evidence]*	*[no relevant evidence]*	**Straw-in-the-wind [16]**
Rojava	*[no relevant evidence]*	*[no relevant evidence]*	**Straw-in-the-wind [10]**	*[no relevant evidence]*	**Straw-in-the-wind [17]**
Commons-based peer production	**Straw-in-the-wind [5]**	**Straw-in-the-wind [8]**	*[no relevant evidence]*	*[no relevant evidence]*	*[no relevant evidence]*
Swiss Federal Council	*[no relevant evidence]*	*[no relevant evidence]*	**Hoop test [11]**	*[no relevant evidence]*	*[no relevant evidence]*

Darker tint: hoop test. Lighter tint: straw-in-the-wind. No cell is classified as a smoking gun or as doubly decisive.

[1]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compressed pay maintain productivity; monetary context limits transferability.

[2] Equal sharing is sustainable under specific conditions; Status Leveling is designed to counter the identified failure mode.

[3] Extensive provision does not by itself destroy the incentive to innovate; monetary context limits transferability.

[4] Contribution based value assignment functions at community scale, beside a monetary economy.

[5] Nonmonetary motivation produces valuable output in specific domains.

[6] Extensive provision is compatible with high innovation; monetary context limits transferability.

[7] A small state built its digital government from almost nothing within about twenty five years; monetary economy.

[8] In open source software, openly shared work matches or exceeds proprietary alternatives in information goods; most Linux kernel development is paid work.

[9] Denmark, Finland, Norway and Sweden each show more than seventy years without a regime change; monetary context limits transferability.

[10] Copresidency functioned under war from 2012 until the administration was dissolved in 2026; never tested in peace.

[11] A collegial executive of several members stable for more than 170 years; one surviving example, deciding by majority and not by unanimity.

[12] Extensive provision goes with relative income poverty of 5 to 8% against an OECD average of about 11%; a different measure from the C.P.I.

[13] Nonmonetary measurement identifies who lacks sufficiency and in which domains.

[14] Community level nonmonetary exchange reduces social exclusion.

[15] Rothstein's mechanism: universal provision generates trust; causal mechanism identified in monetary democracies with unconditional programs.

[16] Digital transparency goes with high citizen engagement; monetary economy.

[17] Government built from the commune upward kept the participation of its communities through war; ended in 2026 before any test in peace.

图 **7.3.** 证据架构：作为过程追踪数据的案例研究

证据架构中所呈现出的格局颇具启发性。没有任何一项预测拥有“双重决定性”检验（即兼具必要性和充分性的证据），也没有任何一项拥有“确凿铁证”。这种缺失是在意料之中的。没有任何现有制度是

Jasutopianism，而足以证实关于一个 Jasutopian 国家预测的证据，只能来自 Jasutopian 制度本身。现有证据所提供的是一个由圆环检验和风向标证据构成的证据网络，这些证据使上述预测具有合理可信性，但尚未使其成为确定无疑的结论。基布兹的数据并未证明地位升级必然奏效；它证明的是，导致基布兹衰退的特定机制，正是地位升级被设计用来抗衡的机制。北欧的数据并未证明 Jasutopian 供给必将产生信任；它表明的是，从供给到信任的因果路径在供给具有普惠性与无条件性的货币民主国家中确然运作。这些案例支撑了相邻近的机制[普惠供给、替代性指标、数字记录、直接发声]。国家尺度上的分级非货币交换尚无先例，而这正是预测一所要检验的对象。

James Mahoney (2010) 曾论证，定性研究通过累积多项各自独立获取的证据来生成因果知识；这些证据单项来看均不具决定性，但其综合分量足以支撑因果推论。上文所呈现的证据架构正是这种累积性论证。上述预测并未得到证明，但它们因那些至少证明了与其所依赖机制最为接近的机制具有可行性的证据，而获得了合理可信性。

读者将会注意到，必须坚守这项评估在知识上的诚实。Philip Tetlock (2005) 的研究表明，专家对政治事件的预测在平均意义上仅略胜于随机猜测，而且依据单一宏大理论进行推理的专家，比汲取多种理念的专家更为过度自信且准确性更低。上述五项预测既足够具体以便接受检验，又足够节制从而具备可信度。它们并不声称 Jasutopianism 将造就一个乌托邦；它们主张的是，特定且可测量的结果将在特定时间跨度内出现，而特定且可测量的失败则将构成反驳。

IX. 预测被证伪后的后续程序：增补与宪法替代议定书

不具法律后果的证伪门槛不过是徒具形式。第CII条锁定了法典文本：“本文件一经全文通过，任何法律条款[I-CII]均不得从中删除或修改”(Rodriguez, 2021)，而第CXXIII条[第8章]将该项完全相同的文本锁定效力延伸至第CIII条至第CXXIV条，第CXXXV条[第12章]亦将其延伸至第CXXV条至第CXXXV条。学院派政治学家就文本持久性恰当地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如果一项经验性的经济或程序机制在实践中确实失效，文本的不可变性是否会将公民永远困在一条失灵的规则之中？答案是否定的。为在完整保留第CII条历史文本的同时，为波普尔式与拉卡

托斯式研究纲领提供严谨的宪法退出机制，本卷确立了一套双层制度回应机制，将增补校准与通过第XCVI条增设的狭义宪法替代议定书**[**上位法操作性凌驾**]**结合起来。

第一层证伪回应：增补校准。当独立指标审计委员会核实的数据首次确立某项预先登记的证伪门槛已被突破时，须严格依序执行以下三个步骤。第一，立法权公开公布该委员会的认定结果，毫不文过饰非地将该预测记录为在经验上已被证伪。第二，参议院开展公开诊断审查，指明具体失效的参数或程序。第三，参议院依照第XCVI条的标准立法路径[经参议院通过、公民议院批准、行政权签署以及司法权一致性审查]起草纠正性条款，以重新校准1至Z级地位等级的级差、交易权重、行政时间表或监督程序，同时保持每一项既有条款的文本原封不动。

第**2**层证伪回应：宪法替代议定书**[**上位法操作性凌驾**]**。如果参数校准失败怎么办？文本不可变性与操作性替代在法律上截然不同。该议定书的依据是位阶，而绝非时间上的先后。Jasutopianism把三大立国原则确立为“高于一切法律的最高秩序”(Rodriguez, 2021)，因此，一项经核实的数据两度表明其运作与自由、生活或繁荣相悖的机制，须让位于这些原则；操作性替代条款只是这一认定得以生效的形式，而在两项同等位阶的条款之间，仍以较早的文本为准[第CXXXV条]。第I条至第CII条、第CIII条至第CXXIV条或第CXXV条至第CXXXV条中的任何条款均绝不从宪法文本中删除、改写或抹除。然而，如果一项已被证伪的经济、行政或程序机制在连续两个评估周期内仍处于经验上被证伪的状态，则当且仅当以下全部五项累积条件均获满足时，依据第XCVI条附于法典末尾的一项操作性替代条款可合法中止或修改该先前程序性或经济性条款的操作性执行：

1. 经核实的证伪触发要件。独立指标审计委员会公布经核实的认定结果，确立本章某项预先登记的经验性证伪门槛已在连续两个评估周期内被突破。

2. 强制诊断期。参议院开展为期十二个月的公开诊断调查，以区分参数校准误差与结构性机制失灵。

3. 立法绝对多数。该操作性替代条款须经参议院三分之二绝对多数[即参加投票参议员的67%]通过。

4. 立国级民众授权。公民议院以超过70%的所投选票批准该操作性替代条款，与第6章所确立的立国投票门槛相匹配。

5. 不可克减的核心审查。司法权认证其完全符合三大立国原则[自由、生活、繁荣]。核心权利与持久性保障[第I、III、IV、V、IX、XII、XIV、CII、CXXIII及CXXXV条，连同澄清性第CXXIV条]兹宣告为永久不可克减；操作性替代严格限于已被证伪的经济、行政或程序机制，绝不得触及核心人权或其文本保存。

这一宪法层面的区分界限清晰。任何证伪检验都不会将三大立国原则置于受审之地；实证检验仅评判运行机制本身。退化的研究纲领会编造借口，以使失灵的规则免遭驳斥。而在此处，经核实的失败将被录入永久公共记录，第1层级允许通过增补进行迅速校准，第2层级则在某项经济或行政机制于连续周期内持续失效时，提供一种立国层级的民主覆决机制，同时使宪法记录中的每一个原始字句保持完整无损。



X. 认识论的转型

Jasutopianism是一部规范性的治理专著。它提出了一套制度。它论证该制度是可取的、完备的且内部自洽的。它并不预测该制度会产生何种结果，也未指明何种结果会证明其错误。这并非缺陷。这是西方传

统中每一部宪法文件、每一种社会契约理论以及每一份政治宣言所共有的体裁特征。

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改变了Jasutopianism的认识论地位。五项预测明确指出了该制度声称将会发生的情况。五项证伪条件明确指出了何种情况将证明这些主张是错误的。证据架构通过严谨的过程追踪方法论，将这些预测与现有的实证数据连接起来。方法论架构确保每一项预测都在从哲学主张到可衡量指标的每一个抽象层级上得到表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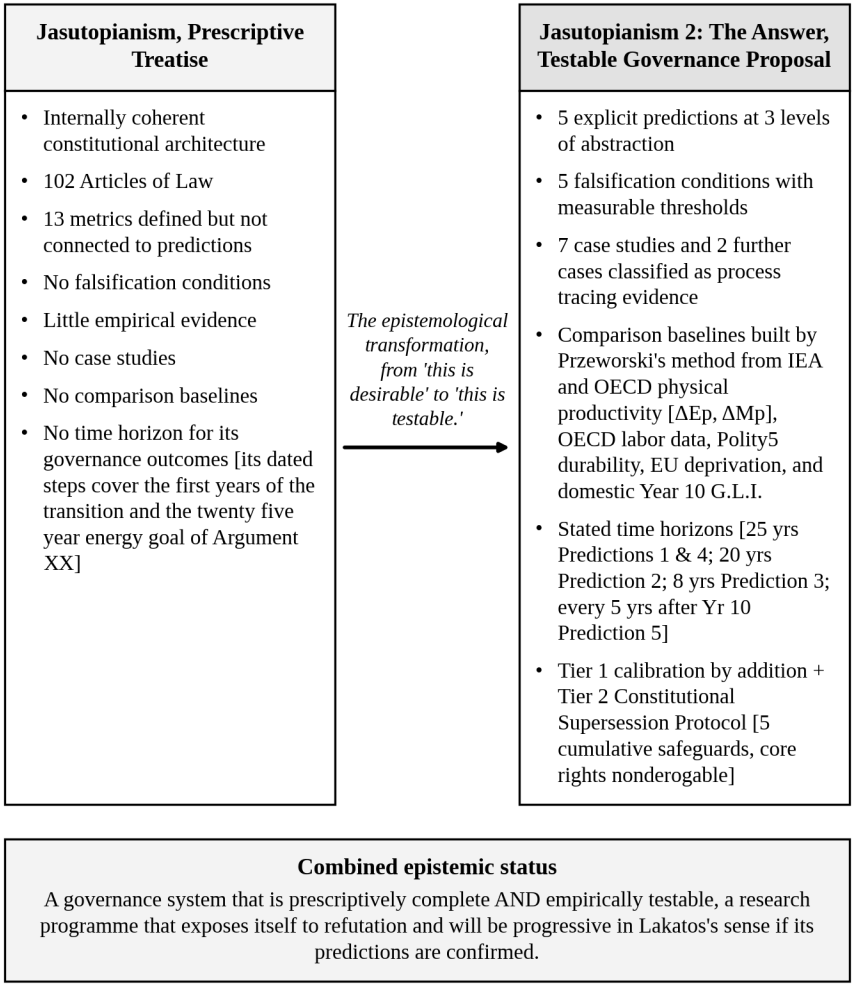


图 7.4. 从规范到预测：认识论转型

这项变革是对 Jasutopianism 的补充，而非对其予以稀释。原始条款在文本上保持永久不变；经核实的证伪首先触发第1层级的增补校准，唯有在满足五项累积保障条件且连续出现失败周期的情况下，才会针对非核心的程序性或经济机制触发第2层级的运行层面替代[见上文第IX节]。三大立国原则被宣告为规范性承诺而非经验性假说，无论任何指标报告何种结果，均屹立不变。永恒相对论提供了将透明制度与上述原则相联结的认知理据；即便该理论被驳倒，该理据虽将随之坍塌，原则仍将长存。过渡蓝图依然是一项操作性规划，而非预言。

这些预测与证伪条件所提供的是问责制。一个援引法律条款、三大立国原则以及过渡蓝图却不参照可衡量结果的 Jasutopian 政府，是在 Jasutopianism 具有规定性与愿景性的认知架构内运作。而一个对照上文规定的基准来监测劳动力活动率、T.A.R.、ΔEp、ΔMp、C.P.I.、N.C.I. 与 G.L.I.，并在指标审计委员会核实后向每一位公民公布这些数据的 Jasutopian 政府，则是在《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具有可检验性与可问责性的认知架构内运作。

这一区分至关重要，因为问责制需要明确性。一个声称自己正在“取得成功”却不指明成功标准的政府是无法被评估的。而一个在劳动力活动率达到或高于同等发展水平 OECD 国家、每个城市的 C.P.I. 均低于 5%，且 G.L.I. 的信任度与满意度读数达到或高于第10年水平时才宣称成功的政府，则是可以被评估的：由其公民评估，由其盟友评估，也由国际社会评估。Jasutopianism 的各项指标以及本书所增补的各项工具，与上述五项预测相连，并与各项比较基准相接，共同为这一评估提供了证据基础架构。

Lakatos (1978) 区分了使自身“免疫”于批评的理论[即通过添加特设性修正来搪塞失败]与将自身暴露于批评之下的理论[即通过提出可能为假的新颖预测]。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的五项预测是新颖的；它们尚未经过检验，因为目前尚不存在Jasutopian国家。证伪条件是明确的；它们指明了何种情况将构成失败。证据架构是透明的；它如实承认现有证据支持什么，以及不支持什么。

这就是认识论的底线。不是确定性。不是绝对证明。而是坦诚地承认，一个治理体系的主张能够以足够的精确性加以陈述，从而使世人能够判定其真伪。

接下来的一章将再次转换视角。第8章以第1章至第7章所阐明、使之具备可检验性并置于证伪条件之下的治理架构为基础，探讨该架构如何与其所运行的这颗行星发生互动。环境合作并非Jasutopian制度的事后补充；它是该制度的三大支柱[军事、文化与治理]以最具体、最紧迫的形式汇合的领域。

参考文献（第7章）

Abramitzky, R. (2008). The limits of equality: Insights from the Israeli kibbutz.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3*(3), 1111-1159.

Abramitzky, R. (2011). Lessons from the kibbutz on the equality-incentives trade-off.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5*(1), 185-208.

Benkler, Y. (2006). *The wealth of networks: How social production transforms markets and freedom*. Yale University Press.

Collier, D. (2011). Understanding process tracing.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44*(4), 823-830.

Corbet, J., & Kroah-Hartman, G. (2016). *Linux kernel development: How fast it is going, who is doing it, what they are doing and who is sponsoring the work* (25th anniversary ed.). The Linux Foundation.

Esping-Andersen, G.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urostat. (2025, September 15). *Severe material & social deprivation rate in EU: 6.4%*. 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products-eurostat-news/w/ddn-20250915-1

Goertz, G. (2006). *Social science concepts: A user's guid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oldberg, A. C., & Sciarini, P. (2021). Voter turnout in direct democracy: A joint analysis of individual, referendum and community factor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https://doi.org/10.1111/1475-6765.12493

Heller, N. (2017, December 11). Estonia, the digital republic. *The New Yorker*.

Hilson, M. (2008). *The Nordic model: Scandinavia since 1945*. Reaktion Books.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26). *Energy end uses and efficiency indicators* [Data set]. https://www.iea.org/data-and-statistics/data-product/energy-end-uses-and-efficiency-indicators

King, G., Keohane, R. O., & Verba, S. (1994).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napp, M., Flach, A., & Ayboga, E. (2016). *Revolution in Rojava: Democratic autonomy and women's liberation in Syrian Kurdistan* (J. Biehl, Trans.). Pluto Press.

Lakatos, I. (1978).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1, J. Worrall & G. Currie, E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honey, J. (2010). After KKV: The new methodolog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World Politics, 62*(1), 120-147.

Marshall, M. G., & Gurr, T. R. (2020). *Polity5: Political regime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itions, 1800-2018* [Data set and users' manual]. 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

OECD. (n.d.). *Income distribution database* [Data set]. Retrieved November 15, 2026, from https://sdmx.oecd.org/public/rest/data/OECD.WISE.INE,DSD_WISE_IDD@DF_IDD,1.0

OECD. (2024). *Society at a glance 2024: OECD social indicators*. OECD Publishing. https://doi.org/10.1787/918d8db3-en

Olson, M.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n.d.). *Green growth indicators* [Data set]. OECD Data Explorer. https://data-explorer.oecd.org/

Popper, K. R. (1963).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Routledge & Kegan Paul.

Przeworski, A., Alvarez, M. E., Cheibub, J. A., & Limongi, F. (2000).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 1950-199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aworth, K. (2017). *Doughnut economics: Seven ways to think like a 21st-century economist*.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Rodriguez, J. (2021). *Jasutopianism*. [Self-published].

Rothstein, B. (2005). *Social traps and the problem of tru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rtori, G. (1970). 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4*(4), 1033-1053.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2026, November 2). *Syria: November 2026 monthly forecast*. https://www.securitycouncilreport.org/monthly-forecast/2026-11/syria-97.php

Swiss Federal Chancellery. (2012). *The Swiss Confederation: A brief guide 2012* (34th ed.). https://www.bk.admin.ch/dam/en/sd-web/Nx0UCaULEqje/der_bund_kurz_erklaert2012-barrierefrei.pdf

Tetlock, P. E. (2005). *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 How good is it? How can we know?*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Ura, K., Alkire, S., Zangmo, T., & Wangdi, K. (2012). *An extensive analysis of GNH index*. Centre for Bhutan Studies.

Ura, K., Alkire, S., Wangdi, K., & Zangmo, T. (2023). *GNH 2022*. Centre for Bhutan and GNH Studies.

Wiener, N. (1948). *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 Technology Press; John Wiley & Sons.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2024, September 26).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4: Switzerland, Sweden, US, Singapore, UK top ranking; China, Türkiye, India, Viet Nam, Philippines among fastest 10-year risers; dark clouds for innovation investments* [Press release]. https://www.wipo.int/pressroom/en/articles/2024/article_0013.html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2026, September 29). *WIPO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6: Switzerland, Sweden, US, Republic of Korea and Singapore top ranking; AI reshaping innovation investments as deep science startups top $7.6 trillion* [Press release]. https://www.wipo.int/pressroom/en/articles/2026/article_0014.html

第8章：作为第三大支柱的环境合作



I. 从预测到行星参与

前一章将该制度置于证伪检验之下。五项预测、五项失败条件、五组与可测量基准相连的指标。问题在于什么能够证明Jasutopianism是错误的。

在上述每一项预测之下，都是地球本身。

问题已不再是该制度是否会失败。问题在于该制度能否保护其赖以运作的地球；在这里，本卷再次作出规定，而第7章作出的是预测。

Jasutopianism直接探讨了这一问题。论点XX提出了一项为期25年的100%可再生能源计划，通过部署在水星上的先进太阳能电池板技术，并经由微波或激光束中继链向地球进行无线能量传输 (Rodriguez, 2021)。该计划明确规定了材料 [可耐受7460华氏度高温的HfC0.5N0.35陶瓷，以及用于太阳能电池的SR CEPLA聚酰亚胺塑料]、传输机制 [水星与地球之间的卫星中继链]、政策时间表 [在十年内培训工程师，在二十年内更新国家基础设施，在二十五年内逐步淘汰不可再生资源]，以

及立法计划 [在过渡期的最后五年禁止新增不可再生资源制造]。其技术雄心非同寻常，其政策具体性在治理方案中亦属罕见。

话虽如此，Jasutopianism仅将这一环境愿景作为一项建议提出，而没有任何法律条款涉及环境问题。论点XX未援引任何条款 [第I条至第CII条]，也未援引该书中的任何其他论点。该书确曾在其他部分将可再生能源纳入其制度之中：论点IX将“一个有效运转的100%可再生资源国家”列为其最终状态，而T.A.R.则衡量更高效能源载体系统的发展状况 (Rodriguez, 2021)。然而，没有任何条款赋予该环境政策以法律的制度性约束力。

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补足了这一联系。本章将环境合作与全球和平的三大支柱 [详见第III节的推导] 联系起来，并结合Jasutopianism出版以来发展形成的科学背景对论点XX加以更新。本章以Jasutopianism的宪法语体提出了七项新的环境合作条款 [第CXVII条至第CXXIII条]，从而将法典扩展至环境治理领域，其正式程度一如第CIII条至第CIX条涵盖文化外交、第CX条至第CXVI条涵盖数字治理。其结果是一个使环境管护不再仅仅是愿景而成为法律义务、不再仅仅是政策偏好而成为宪法授权的Jasutopian制度。

II. 行星背景

Jasutopianism出版于2021年。此后数年中，科学界对行星环境系统的认识不断深化。这些进展并未削弱论点XX，反而强化了其前提的紧迫性。

Rockström et al. (2009) 确定了人类得以安全运行的九项行星边界。按Steffen et al. (2015) 后来赋予的名称，它们分别是气候变化、生物圈完整性、土地系统变化、生物地球化学流动 [氮循环与磷循环]、海洋酸化、淡水利用、大气气溶胶加载、平流层臭氧消耗以及新型实体 [化学污染与塑料]。在该研究发表之时，已有三项边界遭到突破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速率以及氮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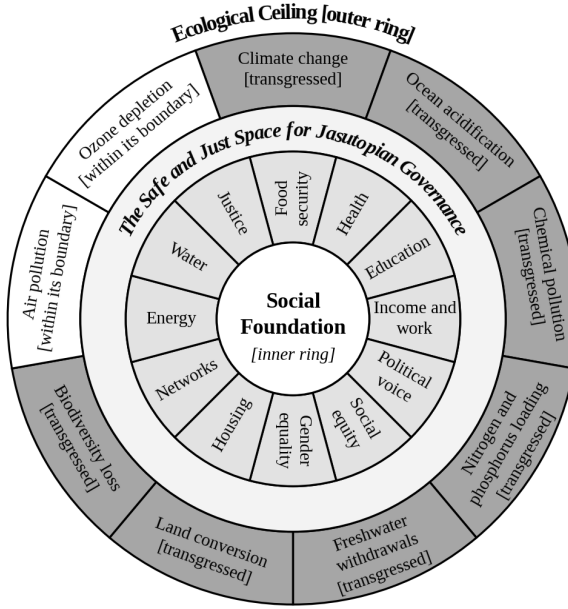
Steffen et al. (2015) 对这些边界进行了更新与量化，其结果更为严峻。到那时，九项边界中已有四项遭到突破：气候变化、生物圈完整性、土地系统变化以及生物地球化学流动。此后，Persson et al. (2022)

评估认为新型实体边界也已被突破，使总数增至九项中的五项。Richardson et al. (2023) 统计为六项，新增了淡水利用；而2025年9月的《行星健康检查》（Planetary Health Check）发现，随着海洋酸化越过其边界，九项中已有七项遭到突破 (Sakschewski et al., 2025)。其余两项，即大气气溶胶加载与平流层臭氧消耗，仍处于其边界之内。这一演变方向高度一致，且其轨迹正在加速。

这对治理的启示是直接而明确的。任何声称能够保障其公民长期繁荣的制度，都必须应对使这种繁荣成为可能的行星边界。一个Jasutopian国家若在实现三大立国原则 [自由、生活与繁荣] 的同时突破了生态上限，便处于自相矛盾的运作之中：摧毁未来繁荣所需环境条件的繁荣，按Jasutopianism的定义并非繁荣，而是伪装成进步的消耗。

Stern (2007) 精确地确立了这一经济学论据。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不作为的成本每年相当于全球产出的5%至20%，而采取行动的成本约为1%。按Stern的评估，气候变化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市场失灵”。这一表述对于Jasutopianism的经济批判至关重要。倘若如此规模的市场失灵在货币资本主义内部都可能发生，那么一种不以货币为资源定价的制度 [正如Jasutopianism的地位升级所主张的那样]，在结构上便可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来应对这些问题。其原因在于结构本身：在货币资本主义中驱动环境掠夺的利润激励并不存在于Jasutopian经济体之中；Jasutopian国家中的企业受地位等级晋升的激励，而非受从自然资源中攫取最大货币回报的驱动。

Raworth (2017) 提出了将环境极限与社会供给联系起来的概念模型。“甜甜圈”（doughnut）是一个具有两重边界的可视化模型：生态上限 [来自Rockström与Steffen的行星边界] 与社会基础 [人类福祉的最低标准]。在Raworth的模型中，经济学的目标是在甜甜圈之内运行：即在满足所有社会需求的同时不突破任何生态边界。Raworth所称的社会基础对应于Jasutopianism的三大立国原则，而生态上限则对应于行星边界。



Dark: transgressed, as the Planetary Health Check of September 2025 reports them

Unshaded: within its boundary

The Ecological Ceiling is audited against each country's Consumption and Biophysical Adjusted National Share [Bi].*

Social foundation [inner ring]	Jasutopian equivalent
Food security	Article I free essential resources
Health	Article I free healthcare
Education	Article I free education
Income and work	Status Leveling system
Political voice	Chamber of Citizens and direct democratic voting
Social equity	Three Founding Principles
Gender equality	Articles VIII and IX [universal franchise; nondiscriminatory Status Leveling]
Housing	Article I standard level housing
Networks	Articles LXXXV through LXXXVIII National ID Log System [explained in Argument VIII]
Energy	Article CXVII renewable energy mandate, with the plan of Argument XX as its long range aim
Water	Article I free water
Justice	Three Authorities of Governance

图 **8.1.** 甜甜圈约束：社会基础与生态上限。Jasutopian治理必须在甜甜圈之内运行，在满足三大立国原则所构成的“社会基础”的同时，不突破由行星边界所构成的“生态上限”。甜甜圈并非一项建议，而是任何治理制度都必须在其内部运作的物理约束。

甜甜圈模型提供了一项具体的环境证伪检验。如果一个Jasutopian国家跌破社会基础线[经由S.O.L.P.C.N.、D.P.P.及C.P.I.审计]，则治理便辜负了其公民。由于地球边界作为全球总量运行，单个国家极少独自越界，生态合规性必须依据科学上站得住脚的国家配额来解读，而非粗略的按人头平均计算。因此，第CXXI条确立了消费与生物物理调整后国家份额 **[Bi*]**，由独立的指标审计委员会每年通过基于消费的核算、热气候标准化以及当地流域补给限额加以核查。倘若一个已实施该制度的Jasutopian国家在第CXVII条规定的二十五年过渡期结束时，在第CXXI条的任何指标上仍超出其经审计的Bi*，该国即处于不符合地球限额的状态。甜甜圈模型直接与第7章的五项预先登记的证伪条件并列。



III. 环境合作与三大支柱

仅靠文化永远无法阻止战争。仅靠军事威胁永远无法缔造和平。本卷从Jasutopianism的第一性原理、第2章的认识论和平论题与多分辨率人文化，以及第4章的文化外交条款原生建构出发，构建了一套名为全球和平三大支柱的独立安全架构。每一根支柱都弥补了另外两根支柱所留下的漏洞。恐惧能约束行动却无法改变敌意；同理心能软化敌意，但若无永久性法律加以保护便仍处于暴露之中；国内改革消除了利润驱

动的扩张主义，但若无跨境人文化与共同安全维系，仍将面临外部竞争。

在拥核国家双边关系中，持久和平依赖于三大支柱的同时运行：第一支柱 **[**物理与军事威慑**]**，通过相互确保摧毁以及相互依存的环境与安全保障来实现[一旦各国依据第11章加入世界超国家联盟，该机制即在成员国之间退役]；第二支柱 **[**情感文化威慑与跨境文化人文化**]**，以实证方式植根于自下而上的公众舆论约束 (Kertzer & Zeitzoff, 2017)、群体间同理心鸿沟的缩小 (Cikara, Bruneau, & Saxe, 2011) 以及情感认知同理心研究 (Decety, 2012; Batson, 2011)；以及第三支柱 **[**结构与经济威慑**]**，通过国内治理改革[地位升级、三大立国原则以及依据第XIX条须经三总统全体一致的军事同意]来消除引发战争的资源掠夺与利润动机。在核竞争对手之间，任何单一支柱都不足以维系和平。任何两根支柱的组合亦不足够。在非核国家之间，和平直接依托于第二支柱与第三支柱，而第一支柱在拥核国家加入S.U.W.后即在其相互间永久退役[第11章]。

这三大支柱需要一个共同的运行场域。如果地球边界发生不可逆转的崩溃，物理威慑、情感文化威慑以及国内宪法改革都将失去维系文明的生物圈。由于三大支柱在不同的尺度上发挥作用[国家间的安全保障、民众间的跨境文化人文化，以及特定国家或领土内部的结构性治理改革]，生态限额迫使所有尺度同时进行协调 (Ostrom, 2010b)。环境合作并非第四根支柱。它是三大支柱汇聚其中的运行领域。

《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具体阐明了每一根支柱如何在一部统一的宪法法典内部参与环境合作。

军事支柱：环境安全

Homer-Dixon (1999) 分析了环境稀缺与暴力冲突之间的因果路径。三种类型的环境稀缺会引发政治动荡：供给诱致型稀缺 [资源枯竭]、需求诱致型稀缺 [人口增长超出资源承载力]，以及结构性稀缺 [即便总供给充足但资源分配不均]。通过对三大洲五个案例的研究 [恰帕斯、加沙、南非、巴基斯坦、卢旺达]，Homer-Dixon证明了环境稀缺会通过可识别的因果机制促使国家失败、叛乱和族群暴力。

这一军事关联仍属间接性质，必须予以清晰陈述。Homer Dixon的案例记录的是国家内部的国内暴力而非国家间的核战争；至于拥核国家内部或其邻境的严重生态不稳定性是否会提高国家间冲突升级的风险，在本卷中是一项明确的分析性假说，而非已获定论的发现。资源争夺与跨境气候流离失所助长了群体间敌意并激化了历史宿怨，而这正是跨境文化人文化所力求平息的根源。一个只管辖武装力量却忽视生态稀缺的安全架构是不完整的；这是因为资源崩溃会成倍放大相互确保摧毁机制所必须遏制的危机压力。

Jasutopianism的军事架构 [论点X；第XIX条，规定采取军事行动须经三总统一致同意] 旨在防止单方面侵略。环境合作延伸了这一原则：在环境生存上相互依赖的国家，只要这种依赖是相互的，在结构上就不太可能相互发动军事冲突。当依赖呈双向运行且任何一方都无法在不遭受同等损失的情况下切断对方时，依赖便具有约束力；单向的依赖则是一种弱点，较强的一方可能会利用它进行胁迫。联合环境项目所创造的相互依赖并不等同于MAD所创造的相互依赖，但它通过一种相容的机制发挥作用：当侵略方在环境资源、共享研究或合作基础设施方面依赖于目标方时，侵略的代价便会上升。

文化支柱：共享的行星认同

第2章跨越经过同行评审的认识论、认知心理学与情感心理学推导出了多分辨率人文化，而第4章则将跨境文化人文化编纂为宪法法律。持续接触真实的创意作品与共同的公民事业能够激发情感共鸣与观点采择 (Decety, 2012; Batson, 2011)，缩小群体间的同理心鸿沟 (Cikara et al., 2011)，并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转变大众公共态度，从而对外交政策精英形成约束 (Kertzer & Zeitzoff, 2017)。在核竞争对手之间，这种情感文化威慑在物理威慑之外竖起了一道心理屏障；在非核邻国之间，它则建构起长期和平所需的公民信任。

与论点XX的可再生能源项目相结合，生态合作将该文化人文化机制延伸为共同星球认同：即通过联合地球管护所培育出的切身公民认知，使每一个群体都认识到全人类共享同一大气层、同一海洋系统与同一物理生物圈。在此，共同的生态事业与音乐、电影及文学并列，作为人类共同的参照点。共同的危险并不会自动使各群体团结起来。稀缺既

可能使群体团结，也同样容易导致群体分裂 (Homer Dixon, 1999)，因此，共同星球认同严格而言是本卷对于互惠合作项目能够从共同脆弱性中培育出何种成果的预期，而绝非仅仅由危险本身自动产生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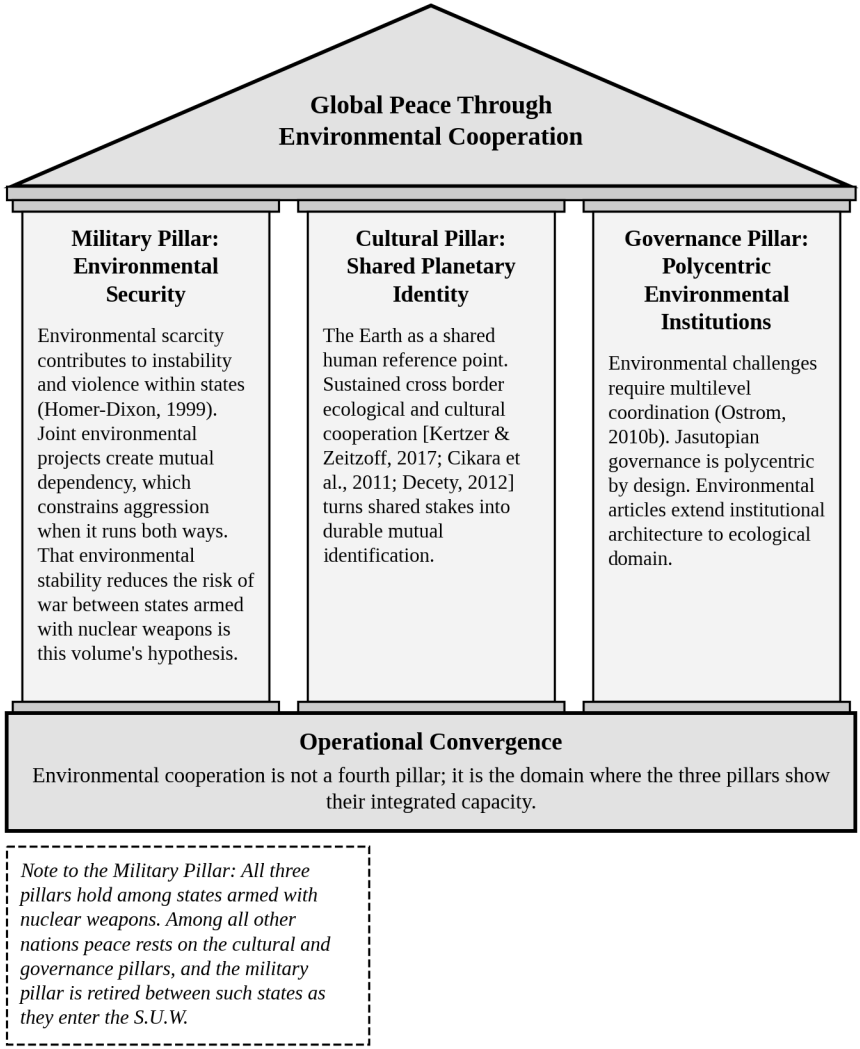


图 8.2. 作为三大支柱运作领域的环境合作

Dryzek (2013) 确立了这样一个论断：环境政治是关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各种相互竞争的话语之间的博弈。生存主义、普罗米修斯主义、行政理性主义、经济理性主义、可持续发展、生态现代化、民主实用主

义以及绿色激进主义 [绿色意识与绿色政治] 相互争夺政治影响力。每一种话语都以不同的方式界定环境挑战，并提出不同的制度应对方案。

Jasutopianism对这一话语竞争的贡献是具体的。Jasutopian环境话语既非生存主义[该立场假定灾难不可避免]，亦非普罗米修斯主义[该立场假定技术无需治理改革即可解决一切问题]。它可被称为结构性环境主义：这一立场认为，环境问题是由货币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激励所产生的[包括驱动资源开采的逐利动机、阻碍长期投资的短期规划视野，以及使污染在个体层面变得理性的环境成本外部化]，而纠正这些结构性激励[通过地位升级、通过非货币经济组织形式、通过由公民议院投票立法确立的长期规划]，正是最有效的环境政策。

论点XX即是典范。Jasutopianism提议在水星建造太阳能电池板，并非因为太阳能是一种潮流，而是基于其一并阐明的两项理由："主动应对全球气候危机，并使Jasutopian国家实现能源独立，从而减少政府所承受的外国政治压力"（Rodriguez, 2021）。其动机是结构性的：对外国不可再生资源的依赖可能是单向的，而单向依赖会造成地缘政治脆弱性。其解决方案亦是结构性的：这是一项为期25年的国家工程，需要高度协调的长期投资，而受季度利润目标与选举周期驱动的货币经济体无法维系此类投资。围绕地位等级晋升而非货币回报组织起来的Jasutopian经济体，能够承诺实施一项为期25年的基础设施工程，因为其激励结构不会惩罚长期投资。耗费十年时间接受可再生能源转型培训的工程师，在这十年间始终在提升其地位等级；他们的生计并不依赖于私营雇主的季度营收预期。

治理支柱：多中心环境制度

Ostrom (2010b) 表明，在应对跨越管辖边界、影响不同规模群体且需要地方与全球同时协调的环境挑战时，多中心制度优于单中心、自上而下的方法。多中心制度拥有多个在不同尺度上运作且相互重叠的决策中心，其中没有任何单一中心对其他中心拥有绝对权威。

Jasutopian制度在设计上即是多中心的。治理三权将权力分配给行政[三总统]、立法[参议院与公民议院]及司法职能，并由公民议院就政策决策提供直接民主参与。这种内部多中心性可直接延伸至环境治理：影响单一市镇的环境决策在市镇层面作出；影响全国的决策在国家层面

由立法权作出，由参议院提案并由公民议院表决；影响多个国家的决策则通过第11章提出的S.U.W.架构作出。

Biermann (2014) 指出，现有的国际环境制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以及《生物多样性公约》]并不足够，因为它们是针对各自孤立的环境问题而设计的，而非针对行星边界科学所揭示的相互关联的“地球系统”。Biermann提议设立世界环境组织，并改革连接地方、国家与全球尺度的治理网络。Jasutopian制度的多中心架构恰恰提供了这种多尺度治理能力；Biermann作为改革所提出的构想，Jasutopianism自根基之初便将其纳入了自身的宪制结构。

延伸Jasutopianism的国际原则，可得出一种先文化、后条约的一体化次序：文化优先一体化[其操作细节见第11章]。双边伙伴首先构建跨境文化人文化；相互合作的伙伴继而聚合成由联合环境与经济机构构成的密集网络；最终，论点XVIII的正式联邦方案对长期公民信任自下而上早已建成之成果予以确认。外交予以正式化，文化先行铺垫。第IX节清晰阐述了这四个依次推进的阶段。

Victor (2011)直指《京都议定书》，证明了普遍性、自上而下的气候条约缘何屡屡陷入停滞。他转而提出一种“积木构建”策略：由立场坚定的国家组成小规模集团，启动具有约束力的务实协议，并通过经核验的履约表现逐步向外扩展。文化优先一体化正遵循这一精确架构：第一，情感文化认同率先促成双边生态伙伴关系；第二，双边伙伴关系编织成多边网络；第三，经过核验的网络为最终的联邦建设奠定所需的制度准备。

IV. 作为文化优先一体化实践的联合环境项目

文化优先一体化认为，持久的超国家联邦生长于持续的跨境人文化，而非自上而下的外交峰会。这一进程由四个顺序阶段支配[编号见第IX节]：互惠的文化交流建立相互人文化，人文化开启双边合作，双边合作积累为共享制度网络，而网络则为自愿联邦做好准备。

环境合作正是这一推进序列最切实的试验场。联合生态基础设施项目在长达数十年的周期内将伙伴国家紧密联结在一起。一项双边可再

生能源合资项目[例如论点XX下的联合高效太阳能工程或电网互联]需要同时依托四大共享支柱：

第一，共享研究。来自两国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在材料科学、能源存储与电网架构领域展开日常协作。围绕共同的物理问题携手工作，与创意艺术一道发挥着持续跨境人文化交流的作用，通过日常专业协作而非部长级辞令拉近群体之间的距离。

第二，共享基础设施。跨越国界的能源输送系统会缔造物质层面的相互依存。一条将水星太阳能输送至多国接收站的卫星中继链，会使这些国家相互依存，且唯有当这种依存呈双向运作时方能产生约束力：没有任何单一伙伴独自掌控整条链路，而中断对一国的能源供应将扰乱面向所有国家的输电网络。

第三，共享治理。联合环境项目需要制度协调：由谁决定输电优先顺序、如何解决争端、当一国能源需求与另一国发生冲突时如何处置。这些制度问题正是S.U.W.旨在大规模解答的治理问题。环境合作则为此提供了演练场。

第四，共享认同。共同运营水星可再生能源系统[或更切近地，共同开发陆基太阳能、风能或核聚变基础设施]的两个国家，拥有一个双方民众都能产生认同的共同项目。该项目在本书所赋予的延伸意义上成为一种文化产品：“这是我们共同建成的”这一实证，会产生与共享音乐、电影或技术相同的联结心理。

自我维系的设计为国内法与跨境交流同时奠定了根基。公众对真实音乐、艺术与共享科学事业的需求在数百万独立公民之间自发运行，无需中央持续严密监管；与此同时，Jasutopianism的宪法设计[三大立国原则、地位升级以及透明的国民身份记录]在不依赖任何单一贤明统治者的情况下，校准国内公民问责。任何依赖单一领袖、单一政党或单一顺境十年的架构，在构造上均必然脆弱；持久性架构的这一自我维系侧面消除了对外部强制力的依赖。

Barrett (2003)考察了超过300项国际环境条约，并确立了一条毫不妥协的准则：持久的协议必须具备自我执行力[对每一签署方均具有个体理性，在整体上具有集体理性，且被普遍视为公平]。这一标准直接锚定了第CXXIII条，要求每一项双边环境协定均须将透明义务与切实

的共同收益[共享能源产能、开放技术研究、联合基础设施]相匹配，从而使履约成为各国自身的理性选择。

Falkner (2016)分析了《巴黎协定》如何依托“软互惠”，其中，领先国家采纳宏大的生态承诺，寄望于同类国家予以对等响应，同时警示未能兑现的承诺会迅速侵蚀公信力。软互惠清晰地映射了双向情感文化认同。当一个Jasutopian国家公开达成其经审计的可再生能源里程碑时，伙伴国公众看到的是切实成果而非空洞演说；当两个伙伴国家共同对等响应宏大的生态目标时，相互之间的公民压力使其持续推进落实的激励倍增。

V. Jasutopianism的环境经济学

Jasutopianism的经济结构与环境治理之间的关联并非偶然，而是结构性的。

正如 Stern (2007) 所记录的，货币资本主义通过市场失灵导致环境破坏：污染成本被外部化[由公众、子孙后代以及生态系统承担，而非由排污企业承担]，保育收益被分散化[由全体民众共享，而非由个体行为者独得]，且投资时间视野被压缩[包括季度盈利周期、选举周期以及使未来损害的价值低于当下利润的贴现率]。这些并非货币资本主义的偶然特征，而是围绕货币回报组织经济活动的激励结构所必然导致的后果。

Jasutopianism的经济结构通过制度设计而非单纯规制，逐一化解了上述每一项失灵。

当企业无需支付货币成本时，外部化的获利便大为减少。在Jasutopian经济体中，企业无法通过将污染外部化来“省钱”，因为根本无钱可省；不过企业仍可能通过倾倒废物来节省人力与资源，因此法律必须触及这一残余收益。企业主的地位等级通过工作绩效得以提升，该绩效由“交易数量及其他可证明的客观经验数据”加以衡量（Rodriguez, 2021，第IX条），而第CXX条将该企业公开的环境记录纳入上述数据之中，从而使损害社区的污染行为拉低企业主的评估绩效。该激励结构使污染在Jasutopian制度内部在个体层面成为非理性的选择。

保育收益通过共享制度予以回馈，而非任其分散耗散。在货币经济体中，保护共有物品[洁净空气、流域或渔业资源]的公民几乎无法独自获取任何收益，因为收益会扩散至所有呼吸该空气或饮用该河水之人。在Jasutopian经济体中，公民的保育行为本身并不赚取地位等级积分，因为公民“纯粹依据其工作绩效的质量”进行地位升级（Rodriguez, 2021，第IX条），别无他途。相反，该收益通过环境条款得以回馈：社区的各项指标受到测定并公开[第CXXI条]，立法权须对未达标之情形负责，而以保育或环境研究为本职工作的公民则凭此工作获得晋升[第CXX条]。

投资时间视野经由宪制授权得以延长。第I条保障所有做出贡献的公民免费获得基本资源。这一保障要求资源具有长期可得性。公民通过公民议院直接对政策进行表决，而公民议院在跨代保护资源可得性的政策上具有切身利益。Jasutopian国家的选举周期不会产生货币民主制下的短视视野，因为三总统是在三大立国原则之下为国家服务，而非在寻求短期回报的资金捐赠者压力下行事。

Nordhaus (2013) 将气候变化刻画为一座“气候赌场”，人类正在其中拿行星系统作赌注，承担着无人能充分预知后果的风险。这一隐喻点出了风险所在；而支持Jasutopianism的论据则在于贴现机制。在货币经济体中，将在数十年后降临的损害会以货币进行贴现，致使五十年后承担的损失在今日的权重低于当下获取的利润，二者由此被相互权衡折算。在不对未来损害进行货币贴现的制度中，未来损害便不会被拿来与当下利润相交易，Jasutopian国家因此将行星边界视为不可逾越的限度，而非待价而沽的价格。两者之差在于所提问题之根本不同：货币资本主义追问的是“我们能承受多少气候损害？”，而Jasutopian治理追问的则是“我们如何防止气候损害发生？”

诚实而言，必须作出一项直白的保留说明。消除货币利润绝不会消除物理层面的生态压力。依据第I条开展的全国标准级住房建设、由国内产品生产[D.P.P.]追踪的工业扩张以及普及性的物质供应，依然会在庞大的物理规模上消耗钢材、水泥、土地、水资源与能源；其中，追求更高产出或交易数量的商业经营者仍可能为节省工时与材料而在生态合规上偷工减料。这一物理现实正是第CXX条授权规定[将每一持证企业

经审计的排放、排污与废弃物记录直接嵌入决定地位等级晋升的客观工作绩效指标之中]构成一项结构性必需而非可有可无装饰的根本原因。

VI. 环境合作条款

以下条款将Jasutopianism的法典延伸至环境治理领域。其编号为第CXVII条至第CXXIII条，紧承第5章所确立的数字文化互动条款[第CX条至第CXVI条]。这些条款采用Jasutopianism的宪制语体起草，并与Jasutopianism第I条至第CII条所确立的原则，以及第4章和第5章所提出的文化与数字条款保持一致。

第CXVII条 环境强制令。

[兹此郑重宣告]，Jasutopian国家须受强制规定，自Jasutopian制度确立之日起二十五年内，通过任何可再生能源方式实现向可再生能源的全面转型。[这包括但不限于]研发先进太阳能技术、开展太空采集太阳能无线传输研究、培养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工程师与技术工人，以及逐步淘汰不可再生能源；其中，转型期的最后五年应禁止新建依赖不可再生资源的基础设施。自制度确立之日起每隔五年，参议院须向公民议院提交一项关于转型时间表的法案，以评估进展并授权作出调整；在第五年进行的首次此类表决之法案，须以法律形式确定第CXX条规定的最低百分比及第CXXI条规定的阶段性目标。任何调整均不得将总转型期延长至三十年以上，除非由参议院提出法案并在公民议院获得所投选票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

立法理由。本条强制规定结果，同时保持路径开放。Jasutopianism论点XX曾在同样的二十五年期限内提出过一条路径[在水星上部署超级太阳能电池板，并通过中继卫星链将其能源输送回地球]；第VIII节的先例支持在该期限内于地球上完成转型，而水星计划仍作为国家研究的远期目标，而非强制必经路径。所投选票的三分之二这一门槛，是本条与第CXXII条专门针对各自情形所设定的，区别于公民议院通过其他法案所需的百分之五十五以上多数（Rodriguez, 2021，《治理三权条款》第I条）。三分之二多数仅用于通过此类法案，并不足以推翻否决权：若三总统行使否决权，公民议院须依推翻其他任何否决之程序，以百分之八十或以上的赞成票推翻该否决，而在正式宣战时期（Rodriguez, 2021，《治理三权条款》第I条）或国家危机时期

（Rodriguez, 2021，第XVI条）则须达到百分之九十。该三分之二门槛在国家危机时期同样适用：Jasutopianism第XVI条降低了危机时期其他法案的通过门槛，但并不降低本条所设之门槛。第6章将此五年期表决纳入其蓝图，首次在第5年，第二次在第10年。

第**CXVIII**条 环境透明。

[兹此郑重宣告]，Jasutopian国家收集的所有环境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大气排放、水质、土壤退化、生物多样性指标及能源消耗，均须以所有公民均可获取的格式，通过国民身份记录系统[第LXXXV条至第LXXXVIII条]予以公布。任何环境数据均不得被列为机密、加以限制或向公众隐瞒。每位公民均有权获取并核查所有环境数据，并有权就已公布的数据向指标审计委员会提出质疑；该委员会系在环境指标公布前对其进行核查的独立机构。

立法理由。Jasutopianism的国民身份记录系统[第LXXXV条至第LXXXVIII条，详见论点VIII]记录每一笔交易并向国家政府报告，但并未赋予公民查阅这些记录的权利。本条针对环境数据创设了该项权利。这是因为环境问责制与经济问责制一样，均要求被治理者能够获取治理决策所依据的数据。

第**CXIX**条 多中心环境治理。

[兹此郑重宣告]，Jasutopian国家境内的环境治理在结构上应采用多中心体制。仅影响单一市镇或领地的环境决策，应在市镇或领地层级通过符合治理三权的地方民主程序作出。影响全国的环境决策，应在国家层级由立法权就参议院提出并由公民议院表决的法案作出。影响多个国家的环境决策[在适用情况下，于世界超国家联盟之内]，应通过该联盟的治理机制作出；在此结构之下，任何单一治理层级均不得对环境政策享有排他性权力。环境决策权在各层级之间的分配，应遵循由能够胜任应对该环境挑战范围的最低治理层级作出决策之原则。

立法理由。本条应用了Ostrom (2010b)的研究结论，即多中心体制比单一中心更能妥善处理跨越管辖边界的问题[第III节]。在国家层级，本条保留了Jasutopianism的立法次序，由参议院创制法律并由公民议院对其进行表决；联盟的治理则是第11章所阐述的结构。

第**CXX**条 共享环境研究。

[兹此宣告]，Jasutopian国家应将其国家研究能力的最低比例[按I.O.与T.A.R.指标衡量]投入环境科学、可再生能源技术与生态修复；该比例应在第CXVII条首次五年期表决时由法律确定，并在其后每次表决时予以审查。依本条开展的研究应向全体公民以及所有加入双边或多边环境合作协议的国家公开提供。任何环境研究均不得因军事目的而被列为机密；就此而言，环境知识属于共享资源的原则应受宪法保护。服务于环境研究项目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应凭借其对环境知识的贡献获得地位等级晋升；激励结构应保证环境研究获得与任何其他形式生产性贡献同等的回报。每一持证企业的环境记录[其依第CXVIII条公布的排放、排污与废弃物记录]，应列为评估其所有者工作绩效的客观经验数据之一。

立法理由。I.O.与T.A.R.属于Jasutopianism的衡量体系，该体系在序言的国家层级与全球层级部分中有所提及，并在术语表中予以界定，其中T.A.R.已追踪“更高效的能源载体系统”之研发(Rodriguez, 2021, Glossary)。最后一句确立了污染在地位等级中的位置：Jasutopianism第IX条依据通过“可证明的客观经验数据”衡量的工作绩效对公民进行等级评定，而企业的环境记录正属于此类数据。公民在此类工作之外的节约行为不产生任何积分[第V节]。

第**CXXI**条 环境指标。

[兹此郑重宣告] Jasutopianism测量体系中的十三项指标[S.O.L.P.C.N., D.P.P., I.O., I.N.R., T.A.R., U.A.O.R., N.C.I., C.P.I., &c.] 应以环境指标予以补充，由独立的指标审计委员会每年依据消费与生物物理调整后国家份额 **[Bi*]** 核查国家表现，而非采用未经调整的按人头平均分配。至少应每年测算并公布四个生态领域 [首份经审计的报告应于第2年年底前发布]：相对于调整后气候边界的碳排放量、相对于生物圈完整性的生物多样性指标、相对于生物地球化学流的氮磷负荷，以及相对于流域安全限值的本地蓝水提取量。每一项Bi*上限均须遵循三项技术规则：第一，通过多区域投入产出 [MRIO] 追踪实行基于消费的核算**[CBA]**，其中特定国家的经审计碳、养分以及隐含土地与水足迹等于国内生产加上隐含进口减去隐含出口 [Fi,cons = Fi,prod + Fi,imports − Fi,exports]；第二，在能源与碳转型份额上采用有界气候热力系数

[αi]，限定在0.85至1.15之间并在全球范围内归一化，使人口加权总和等于全球人口 [∑ αi Popi = Popglobal]，依据经核实的采暖度日与制冷度日 [HDD + CDD] 气象数据计算；第三，实行流域尺度淡水边界，将国内每一条河流域的年度蓝水取水量限制在经核实的本地可再生淡水补给量（经旱季生态流量需求调整后）的25%至40%或以下。在第CXVII条规定的二十五年过渡期结束前，每一项经审计的指标均须处于该国的Bi*上限之内。五年期阶段性基准应在首次第CXVII条表决时制定，并在随后的每次表决中进行审查；每当有经审计的目标未能达成，参议院必须在十二个月内向公民议院提交具有约束力的纠正计划。

立法理由。 按人均平分行星边界既违背物理规律，也有失公允。在纯生产核算制下，出口太阳能电池板或风力涡轮机的Jasutopian国家 [论点XVIII] 会承担外国去碳化的碳成本，而高污染国家仅凭将重工业转移至海外即可操纵其评分；MRIO消费核算 [Fi,cons = Fi,prod + Fi,imports − Fi,exports] 彻底消除了这两种扭曲。同样，极北严冬与赤道酷暑带来了非自由裁量的生存能源需求，有界热力乘数αi [0.85至1.15] 对此予以考量，而不会使全球碳预算增加哪怕一吨。最后，水资源无法像碳排放许可那样跨洲交易：水文压力存在于各个独立河流域内部，因此Richardson等人 (2023) 的流域尺度补给量与旱季生态流量标准直接规制淡水取用。这些经审计的Bi*限值与Jasutopianism的十三项国内指标相结合，使Raworth的甜甜圈约束 [第二节] 得以可操作化落实。

第**CXXII**条 代际环境义务。

[本节兹此宣告] Jasutopian国家应承认对后代负有明确的法律义务。环境政策的评估不仅应依据其即时影响，还应依据其在至少五十年时间跨度内的预期影响，这与三大立国原则所蕴含的代际承诺相一致。应通过法律 [由参议院提出法案，经公民议院表决] 设立环境未来委员会，授权其评估所有重大政策决定的长期环境后果并公开披露这些评估报告。该委员会委员由参议院从身为执业环境科学家的公民中提名，每项提名均须经公民议院表决确认，任期六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任何委员在获提名之前六年及任职期间均不得担任行政权机关、军队或情报部门的职务，且仅可通过《治理三权条款》规定的弹劾程序予以免职；该委员会应独立于任何行政部门，且不隶属于任何行政部门。凡经环境未来委员会认定将在五十年内增加该国对任何行星边界贡献的政策，除

非经参议院提出法案并在公民议院获得所投选票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否则一律不得采纳。

立法理由。 该保障条款将预防性原则写入宪法。其触发条件是该国自身对某项边界的贡献，因为边界是一项全球总量，单一国家极少单独跨越，而多项边界目前已被跨越 [第二节]。该委员会的产生方式仿照第CIV条产生文化交流委员会的方式，因为若无此项规定，其任命权将归于三总统，由其任命所有“本法典未另作任命规定的”官员 (Rodriguez, 2021, Articles of the Three Authorities of Governance, Art. IV)。三分之二正是第CXVII条亦采用的门槛；每一项行政决定本已要求的三总统一致同意 [第XIX条] 在此毫无增益，故不予重复。与第CXVII条相同，三分之二票通过法案但并不推翻否决权，公民议院须以80%或以上的赞成票方能推翻否决，在正式宣战期间 (Rodriguez, 2021, Articles of the Three Authorities of Governance, Art. I) 或国家危机期间 (Rodriguez, 2021, Art. XVI) 则须达到90%。在国家危机期间，三分之二的门槛同样保持不变：Jasutopianism第XVI条降低了此类时期其他法案的通过门槛，但并未降低本条的门槛。

第**CXXIII**条 环境合作与超国家联盟。

[兹此宣告] Jasutopian国家之间的环境合作 [以及世界超国家联盟内Jasutopian国家与非Jasutopian伙伴国之间的环境合作] 应在自我执行、温和互惠与互利共赢的原则下运作。双边环境条约应确定可衡量的目标、公开核查机制、附条件的互惠收益 [联合研究、清洁能源流通、共同基础设施]，以及符合治理三权的争端解决机制。编号第CIII条至第CXXIV条的任何法律条款一经通过，永不得予以删除或修改条文，从而将第CII条的永久文本锁定延伸至本卷新增的每一条款；后续条款可依第XCVI条的标准程序制定，而对经实证证伪的程序性或经济性条款的任何操作性替代，均应完全依照第7章严格的五条件宪法替代议定书进行，其中第CXXIII条本身处于永久不可克减的地位。

立法理由。 环境合作是统一全球和平三大支柱 [第三节] 的可操作领域：联合生态行动既保护了行星极限，又检验了跨境制度，同时以水到渠成的副产品形式开启了自然的文化相识。本条款将第CIII条至第CIX条 [第4章]、第CX条至第CXVI条 [第5章]、第CXVII条至第CXXIII条 [第8章] 以及澄清性的第CXXIV条 [第4章第五节] 联结为一部共124条

的连贯宪法法典。其附条件的互惠收益满足了Barrett (2003) 的自我执行规则 [第四节]，而其文本锁定则在配合第7章不可克减核心审查的同时，维护了永久性的制度延续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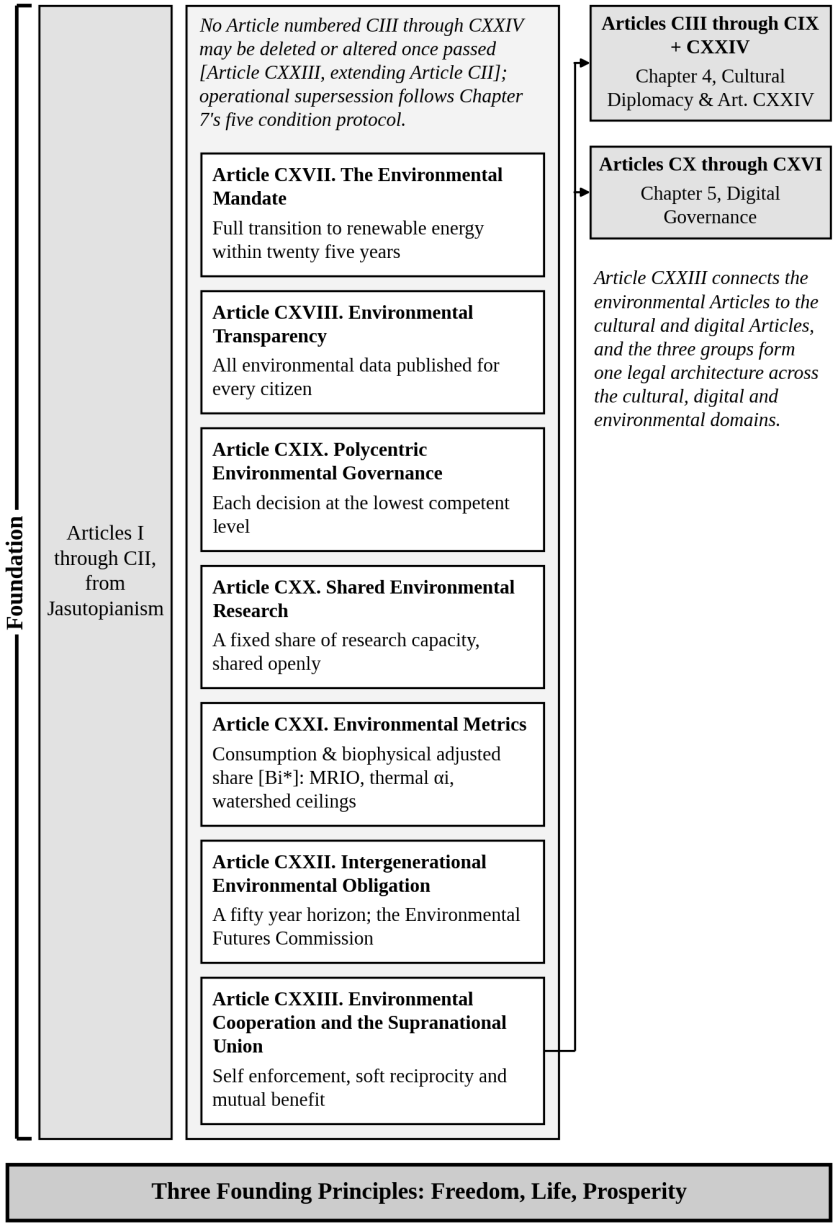


图 **8.3.** 环境合作条款：制度架构。环境合作条款完善了整个法律架构。Jasutopianism奠定了宪法基础。第4章和第5章增加了文化治理与数字治理。第8章增加了环境治理。整部法典现已涵盖国内、文化、数字和环境领域，是一套专为21世纪条件设计的法律体系。

VII. 话语维度：跨国界备受推崇的环境成就

Dryzek (2013) 提出了九种环境话语：生存主义、普罗米修斯主义、行政理性主义、民主实用主义、经济理性主义、可持续发展、生态现代化，以及绿色激进主义的两种话语，即绿色意识与绿色政治。每一种话语都以不同的方式界定环境挑战。生存主义者认为，如果不进行根本性变革，灾难将不可避免。普罗米修斯主义者认为，人类的聪明才智无需结构性变革即可解决环境问题。行政理性主义者信任现有制度框架内的专家管理。民主实用主义者则寻求通过公开审议达成共同解决方案。

Jasutopianism的环境话语并不完全归属于Dryzek的任何一类。它认同生存主义的紧迫感 [行星边界是真实存在的，且部分边界已被逾越]，但摒弃生存主义的宿命论 [Jasutopian制度正是为纠正结构性成因而设计的]。它认同生态现代化对技术解决方案的信心 [论点XX的水星太阳能电池板技术]，但摒弃生态现代化关于现有经济结构能够提供这些解决方案的假设 [地位升级制度取代了驱动环境剥削的逐利动机]。它认同民主实用主义对直接公民治理的承诺 [公民议院]，但将公民声音嵌入一套宪法结构之中 [环境合作条款]，从而约束哪怕是民主多数派对行星边界所能施加的影响。

这种话语绝非作为国家宣传而刻意制造。外国公众能够检视、评估并赞赏的是可验证的生态成就：一个Jasutopian国家达成清洁能源里程碑、公开审计经消费调整的行星限值，并将五十年的代际义务锁定于宪法之中。根据真实性准则 [第4章]，国家按学术与实绩资助科研工作并消除开放交流的障碍，同时让每一种人性化效应完全自然流露、不加编排。当某项生态成就通过自主的科学家、电影人和工程师传及邻近民众时，它之所以能激发情感层面的文化认同，严格来说正是因为它呼应了每个家庭本就珍视的价值 [洁净的空气、安全的水源、宜居的土地，以及孩子可期可居的未来] (Decety, 2012; Batson, 2011; Cikara et al., 2011)。

生态成就能够顺畅地跨越国界传播，因为行星生存具有普遍性。能源独立与经核实的流域管护在每一种语言和政治传统中都浅显直白、不言自明；其中，凡持续合作围绕共同生态利害将民众联结在一起之处，这份赞赏便会自然生长为共同行星认同。

VIII. 更新Jasutopianism的环境愿景

Jasutopianism的论点XX发表于2021年。此后，科学技术背景不断发展。核心愿景依然成立，而支撑这一愿景的背景已经进一步增强。

“超级太阳能电池板”构想提出将先进太阳能电池板部署在水星上，以地球上无法企及的量级捕获太阳能，随后通过卫星中继链无线传输该能源。其材料科学 [HfC0.5N0.35陶瓷、SR CEPLA聚酰亚胺塑料]与传输技术 [微波与激光束] 均引自2018年至2021年的文献。自那时起，无线能量传输取得了进一步突破。2023年，加州理工学院的MAPLE实验在轨道上发射微波能量，并将一束能量瞄准地球，其校园内的接收器成功探测到该信号，这是人类首次实现此类探测。自2020年以来，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一直在轨道上测试太阳能发电卫星硬件；2022年，欧洲航天局批准了关于天基太阳能发电的SOLARIS研究。在太空中收集太阳能并将其传回地球（Jasutopianism的计划正是其中最为长远的形态），目前正在美国和欧洲积极推进研究；而在水星表面进行收集本身仍是一项远期目标。

话虽如此，时间表问题仍需正视。向100%可再生能源的25年转型颇具雄心，但在国家能源政策中并非没有先例。风电在丹麦电力结构中的占比从2000年的约十分之一增长到2020年的半数以上。自2015年以来的多数年份里，哥斯达黎加约98%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尽管一场干旱使其占比在2024年降至约86%。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1.5°C路径规划到2050年由可再生能源供应全球约90%的电力。这些先例均发生在地表且聚焦于电力领域，它们证明只要具备坚定的政治承诺与持续投资，地球上在二十五年内完成转型是可行的。它们并不能说明水星计划的情况，该计划的时间表尚未经过检验；正因如此，第CXVII条强制要求通过任何可再生途径实现结果，同时将论点XX保留为一项远期目标。

关键差异在于治理机制。在货币经济体中，可再生能源转型受制于激励结构：化石燃料企业抵制转型，因为其货币回报依赖于持续开采；民选官员抵制转型，因为化石燃料行业在关键选区提供竞选资金和就业岗位；消费者抵制转型，因为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的前期成本高于继续消费化石燃料 [尽管依据Stern (2007) 的研究，其长期成本更低]。这些制约中的每一项都是货币体系的产物，而非技术或物理学上的限制。

Jasutopian经济体消除了上述每一项制约。其中不存在需要维护货币利润的化石燃料企业 [企业存在是为了做出贡献，而非掠夺性开采]。不存在用于影响政策的竞选捐款 [三总统并非通过金钱化竞选产生]。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的前期成本亦不由个体消费者通过更高的价格来承担 [包括能源在内的基本资源均通过第I条保障予以提供]。在货币经济体中拖慢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制约因素，是这些经济体的结构性特征；而在Jasutopian经济体中，它们根本不存在。

IX. 环境合作与通往S.U.W.之路

第11章规定了世界超国家联盟的完整运作模式。本章则确立推动该路径的生态引擎。

其中的逻辑十分明了。政治联邦要求民众接受跨国界的共享超国家决策，这是国际政治中最艰难的一步。文化优先一体化预测，持续的跨境文化人性化能够在正式条约达成之前在心理上为民众做好准备：已经将邻国民众视为平等同类的公民，会将共同制度视作务实合作，而非外来强加。

文化优先一体化依次跨越四个阶段展开。第一阶段建立跨境文化人性化：与真实创作作品及公民生活的持续接触不断缩减外群体距离，直至伙伴国民众彼此认同为平等同伴。第二阶段启动务实双边合作：获得民众支持的伙伴国开展彼此绝不会托付给敌手的联合实体项目。第三阶段形成多边制度网络：双边协议逐步累积为多中心治理集群。第四阶段将联邦正式化：超国家制度将公民信任与共享基础设施自下而上已经建成的成果予以法典化。第11章将这四个阶段直接转化为四个设有准入关口的阶段 [文化一体化、经济合作、制度协调、政治联邦]，在四个列举领域 [行星环境管护、数字基础设施、文化交流协调与共同安全] 之上建立起邦联体系。

生态协作是检验这一四阶段路径最锐利的试金石。联合环境条约作为第二阶段的工具，在伙伴国通过关口1后随即开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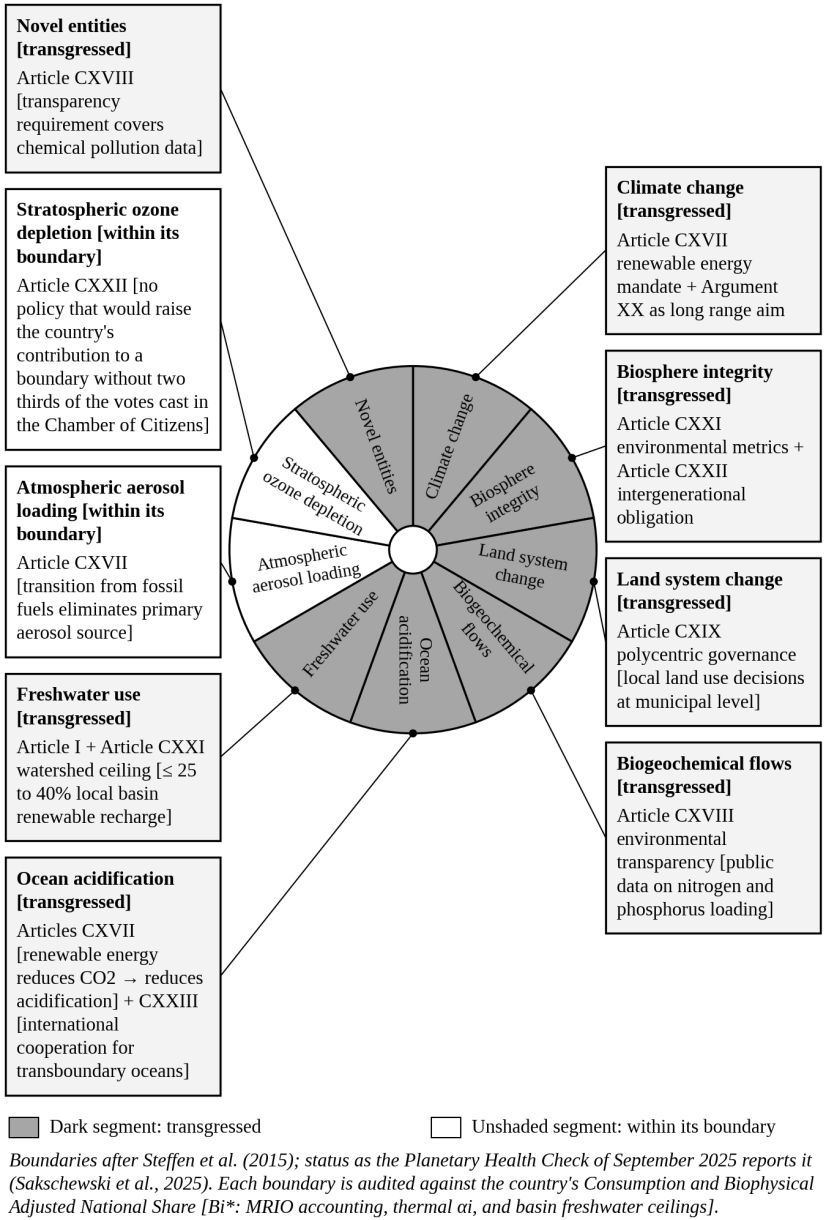
第一步：双边环境协议。已通过关口1的两个国家 [两个Jasutopian国家，或一个Jasutopian国家与一个非Jasutopian伙伴国] 同意就特定环境项目开展合作：共享可再生能源开发、联合气候适应、跨界生态系统管

理。依据第CXVIII条，该协议要求制度协调、联合研究以及透明报告。

第二步：多边环境网络。双边协议不断累积。一个与六个伙伴国签有环境合作协议的Jasutopian国家会形成一个网络，一旦满足所需的关口1饱和度与非敌对门槛，该网络便依据第11章的绝对多数加入规则扩展为一个联盟。该网络需要超越双边协调的治理结构：共享环境指标[第CXXI条]、争端解决机制、集体目标设定。这些治理结构正是S.U.W.日后将予以正式化的超国家制度的雏形。

第三步：环境治理作为S.U.W.的先例。为多边环境合作而发展起来的治理结构，成为更广泛超国家治理的范本。如果六个国家能够通过多中心治理 [第CXIX条] 协调环境政策，它们就能通过同一套制度架构协调联盟将要治理的其他领域 [数字基础设施、文化交流、共同安全架构]。环境治理验证了这一构想；S.U.W.则将其加以拓展。

第四步：S.U.W.作为行星尺度的环境治理机制。S.U.W.一旦建立，便为行星尺度的环境治理提供了制度能力：管理全球公域 [大气层、海洋、生物多样性]、跨大洲协调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以及通过民主问责而非自上而下的管制来确保行星边界的合规性。



Boundaries after Steffen et al. (2015); status as the Planetary Health Check of September 2025 reports it (Sakschewski et al., 2025). Each boundary is audited against the country's Consumption and Biophysical Adjusted National Share [Bi: MRIO accounting, thermal αi, and basin freshwater ceilings].*

图 8.4. 行星边界与Jasutopian应对方案。每一项行星边界都对应有一项Jasutopian治理工具。该体系并非旨在通过单一政策应对环境挑战，而是通过整合性的宪法架构来加以应对。



X. 作为共同遗产的地球

Jasutopianism宣告，三大立国原则是自由、生活与繁荣。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补充道：这些原则在一颗行星上运行。这颗行星不是背景；它是基质。在一个再也无法维持人类生命的生态系统中，自由毫无意义。在一个超越了生物系统运行边界的大气环境中，生活毫无意义。在一个已经耗尽未来繁荣所依赖资源的经济体中，繁荣毫无意义。

环境合作绝非次要的政策附录。它是生物物理场域，其中，自由、生活与繁荣直面不可协商的物理边界。每一座城市都必须达到社会基础标准；每一个国家经济体都必须在各项行星界限内，于其经审计的消费与生物物理调整后国家份额 [Bi*] 之内运行。Raworth的甜甜圈界定了这一安全运行空间。行星健康测量数据显示，由季度利润榨取所驱动的货币经济体正在不断突破这些界限。

Jasutopianism在环境治理方面的结构性优势并非偶然。它们是其经济设计的必然结果。一个围绕地位等级晋升而非货币回报组织起来的制度，能够致力于25年期的基础设施项目。一个通过国民身份记录系统记录每一笔交易、且其第CXVIII条赋予每位公民查阅环境记录权利的制度，无法隐瞒环境数据。一个通过公民议院实行直接民主投票的制

度，赋予了每位公民在环境政策上的发言权。一个拥有宪法环境条款[第CXVII条至第CXXIII条] 的制度，使环境治理成为一项法律义务而非政治选项。

这七项条款构成了宪法法典国际三元架构的最后部分。第CIII条至第CIX条确立了文化外交。第CX条至第CXVI条规制数字平台。第CXVII条至第CXXIII条确立了行星环境管护，并辅以关于不俘虏的澄清性第CXXIV条。与Jasutopianism原有的102条条款相结合，完整的宪法法典共包含124条条款，涵盖国内治理、文化开放、数字主权、人道主义克制与生态界限。该法典准确回应了二十一世纪任何持久国家所面临的具体制度现实。

接下来的章节将目光从行星转向生活在其上的人民。一个将地球视为对抗性群体共同遗产的治理体系，必须决定在其自身疆界之内承认什么，其中，一个国家境内既有的语言正是这一问题的首要且最艰难的考验。第9章将探讨这一议题。此后规模问题将再度回归：在Jasutopianism的第XVIII论点中所宣告的世界超国家联盟需要一套可操作的机制，而第11章提供了这一机制。

参考文献（第8章）

Barrett, S. (2003). *Environment and statecraft: The strategy of environmental treaty-mak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tson, C. D. (2011). *Altruism in huma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iermann, F. (2014). *Earth system governance: World politics in the Anthropocene*. MIT Press.

Cikara, M., Bruneau, E. G., & Saxe, R. R. (2011). Us and them: Intergroup failures of empathy.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3), 149-153.

Decety, J. (Ed.). (2012). *Empathy: From bench to bedside*. MIT Press.

Dryzek, J. S. (2013). *The politics of the earth: Environmental discourses* (3r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alkner, R. (2016). The Paris Agreement and the new logic of international climate polit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 92*(5), 1107-1125.

Homer-Dixon, T. F. (1999). *Environment, scarcity, and viol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ertzer, J. D., & Zeitzoff, T. (2017). A bottom up theory of public opinion about foreign polic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1*(3), 543-558.

Nordhaus, W. D. (2013). *The climate casino: Risk, uncertainty, and economics for a warming world*. Yale University Press.

Ostrom, E. (2010b). Polycentric systems for coping with collective action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4), 550-557.

Persson, L., Carney Almroth, B. M., Collins, C. D., Cornell, S., de Wit, C. A., Diamond, M. L., Fantke, P., Hassellöv, M., MacLeod, M., Ryberg, M. W., Søgaard Jørgensen, P., Villarrubia-Gómez, P., Wang, Z., & Hauschild, M. Z. (2022). Outside the safe operating space of the planetary boundary for novel entities.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56*(3), 1510-1521.

Raworth, K. (2017). *Doughnut economics: Seven ways to think like a 21st-century economist*.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Richardson, K., Steffen, W., Lucht, W., Bendtsen, J., Cornell, S. E., Donges, J. F., Drüke, M., Fetzer, I., Bala, G., von Bloh, W., Feulner, G., Fiedler, S., Gerten, D., Gleeson, T., Hofmann, M., Huiskamp, W., Kummu, M., Mohan, C., Nogués-Bravo, D., ... Rockström, J. (2023). Earth beyond six of nine planetary boundaries. *Science Advances*, *9*(37), eadh2458.

Rockström, J., Steffen, W., Noone, K., Persson, Å., Chapin, F. S., III, Lambin, E. F., Lenton, T. M., Scheffer, M., Folke, C., Schellnhuber, H. J., Nykvist, B., de Wit, C. A., Hughes, T., van der Leeuw, S., Rodhe, H., Sörlin, S., Snyder, P. K., Costanza, R., Svedin, U., ... Foley, J. A. (2009). A safe operating space for humanity. *Nature*, *461*(7263), 472-475.

Rodriguez, J. (2021). *Jasutopianism*. [Self-published].

Sakschewski, B., Caesar, L., Andersen, L., Bechthold, M., Bergfeld, L., Beusen, A., Billing, M., Bodirsky, B. L., Botsyun, S., Dennis, D., Donges, J. F., Dou, X., Eriksson, A., Fetzer, I., Gerten, D., Häyhä, T., Hebden, S., Heckmann, T., Heilemann, A., ... Rockström, J. (2025). *Planetary health check 2025: A scientific assessment of the state of the planet*. Potsdam Institute for Climate Impact Research. https://doi.org/10.48485/pik.2025.017

Steffen, W., Richardson, K., Rockström, J., Cornell, S. E., Fetzer, I., Bennett, E. M., Biggs, R., Carpenter, S. R., de Vries, W., de Wit, C. A., Folke, C., Gerten, D., Heinke, J., Mace, G. M., Persson, L. M., Ramanathan, V., Reyers, B., & Sörlin, S. (2015). Planetary boundaries: Guiding human development on a changing planet. *Science*, *347*(6223), 1259855.

Stern, N. (2007).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The Stern Revie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ictor, D. G. (2011). *Global warming gridlock: Creating more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protecting the plane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第9章：强制推行单一语言同化抑或正式承认现存语言



本人，即本书作者，正式反对以单一国语对现存语言[特定国家人民在当今所使用的语言]实施强制同化。这是因为母语承载着使用者的文化、身份认同与先祖渊源；其中，以政令强行剥夺其母语，便是剥夺其尊严，以及其在统治他们的国家面前进行自我代表的正当能力。

上一章已将环境合作确立为全球和平三大支柱交汇的运作领域，其中，地球本身成为了敌对族群能够共同承认的共有遗产。七项环境合作条款[第CXVII条至第CXXIII条]将法典延伸至行星领域。

本章提出了一个不同的问题。

问题不在于特定国家与其他国家共享什么。问题在于一个国家在其内部承认什么。

一个拥有不止一种语言的国家，便承载着不止一种关于其人民如何形成的记忆，而它必须就这一事实作出抉择。两类答案主导着这场争论。抹除与承认[第三类方案，即中立通用语，将在第III节中探讨]。本章审视这两种路径各自的逻辑[即在一个业已拥有既定语言的国家或地

理陆块上强制推行单一语言同化，以及与之相对的正式承认现存语言，其中，任何作为相关公民十分之一以上人口之母语的语言均位列其官方语言之列]，并将这两种答案置于立国之同意逻辑、经文记载、比较政治记录以及人类历来所进行的最长久治理实验的检验之下。

I. 同意不能在无法理解的语言中给予

没有任何治理工具比承诺更为古老，亦没有任何承诺能够约束无法理解其条款的一方。一项令受其管辖者无法理解的法律并非契约。它只是敕令。这一学说在实质上渊源古老，在形式上则属近代早期：合法的政治权威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而同意则是基于同意方能够审视之条款所行使的理性行为 (Locke, 1689/1980)；当代权利学术研究已据此推导出语言层面的推论，其中，无法阅读国家语言的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只存在于该公民无从阅读的纸面之上 (de Varennes, 1996)。那么，不妨考量一个特定的现代国家，其立国法令宣告治理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且缺乏正当代表权的统治即属暴政。其宪法以立国多数族群的语言写成[特定时代的民族主义官员往往会以一句话诵出这一事实作为证据]。将这句轻巧断语与该立国法令相对照，矛盾便浮出水面。同意乃是一种理解行为，其中，无法领会法律语言的公民，便无法在实质意义上对该法律给予同意。以被代表者所陌生的语言进行的代表，不过是名义上的代表。现在，不妨赋予这一假设以其全部的分量。假设该国三分之一的领土并非得自奠基帝国，而是得自第二个帝国，其中，当地公民在立国之邦存在之前数个世纪里便一直使用着第二种语言。在任何国界划过那片土地之前，他们的血脉便已世居其上；世世代代以来，他们的公民身份一直完整而合法。那么，倘若国家以立国法令之名强迫这些公民放弃其母语，该国便颠倒了它所声称捍卫的法令。语言即是文化。剥夺数千万合法公民的语言并将此行径称为自由，绝非自由；那是以自由之辞藻实施的压迫，且违背了该国的立国原则。



II. 巴别塔划定了各方立场

每个时代都会催生某种全面统一的工程，而每一项此类工程都声称划一即是力量。最古老的记述与最新的科学一致表明，这一论断恰恰本末倒置。《创世记》11:7记载，上帝变乱了统一民众的单一语言并将其分散至各地，借以确立世界诸语系，作为对人类集体傲慢的制衡。细读之下，这段经文已将这场争论中的两种立场分别归于其恰当的归属者。将一种统一语言强加于所有民族，乃是人的工程，亦是狂妄自大的工程；语言的多样性则是神圣的矫正，是对高度集中的人类权力所设下的刻意限度。话虽如此，这一矫正限制的是权力，而非智慧。分散的人类所掌握的集体威力不及统一的人类，然而各个民族以自身母语进行思辨，却能产生其他民族无从企及的认知，其中，降低了高塔高度的多样性，很可能反而增进了世界的智慧。语言学经由实证路径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每一种语言都是一座不可替代的档案库，积淀着人类关于世界的知识，而一种语言的消亡，意味着人类这一物种永远无法完全挽回的认知损失 (Nettle & Romaine, 2000)。

特定国家若着手以强力重新统一语言，它并非在纠正巴别塔的分散。它是在重建那座高塔。

III. 两条道路，以及何者造就凝聚力

国家的维系，依赖于其人民愿意共同维系的意愿。此种意愿系赢得而来，绝非号令可得。归属感的架构决定了特定国家在代际更迭中不断累积的是忠诚，还是怨恨。

摆在具有双重帝国遗产的特定国家面前的，有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强制同化。国家宣告立国语言至高无上，并着手消灭第二种语言。第二条道路是正式承认。国家承认其公民承袭自两条历史脉络[此外还有来自其他迁徙浪潮的较小支流等]，并赋予任何作为相关公民十分之一以上人口之母语的语言以官方地位[即第X节所命名并界定的界线]。

本章的核心主张在于，比较政治记录的整体分量倾向于第二条道路：从长远来看，它能够造就更强的凝聚力，而第一条道路所产生的后果则与其所承诺的背道而驰。此处系将该记录作为诸案例的权衡加以解读，而非视作绝对证明。Stepan、Linz 与 Yadav (2011) 的研究表明，正式承认内部语言与身份认同的多民族民主国家，能够塑造出多元而互补的身份认同，其中，对内部族群的自豪感与对更大国家的忠诚感同步提升；反之，在原本具有可比性的国家中，将单一民族模子强加于多元人口的政策，却催生了极端分化且相互敌对的身份认同。关于各国语言体制的研究得出了相辅相成的结论：语言权力的分配乃是一种制度选择[集中于某一群体的语言、由多种语言共享，或通过一种共同媒介加以中立化]，而那种认为多语并存注定导致国家陷入贫困与分裂的陈旧观念在实证数据面前站不住脚，其中，即便最具异质性的国家也拥有将多样性加以规范并实现繁荣的制度工具 (Liu, 2015)。这是因为忠诚并非由抹除所造就，团结亦非由单一的起源叙事所制造，其中，为了编织一个整洁的故事，整整一个族群的全部历史都被归入奠基帝国的谱系之下；以虚假账目换取的凝聚力，不过是向未来借取的贷款，且其利息将不断累积。被允许在忠于国家的同时为自身传统感到自豪的公民，会将两者一并奉献给国家；而被勒令在二者之间择一的公民，则会怨恨这一命令，且这种怨恨将在代际之间以复利累积。那么，倘若特定国家仍执意选择第一条道路，按上述记录的分量而言，它所选择的便是通往自身分裂的更快之路。它并未注销账单，只不过推迟了催收之时。这一问题关

乎享有完整法律地位的公民；它与任何关于移民的争论完全无关，后者属于边境法范畴，而非语言问题。

关于语言体制的研究在这两条道路之外还列举了其他选择，它们同样值得正面回应。国家可以确立一种中立的通用语，该语言并非境内任何社群的母语，并以这一媒介治理全体公民[即上述研究中的第三种体制]；或者，国家也可以保留单一官方语言，同时不压制任何其他语言。这两种做法都不会消灭第二种语言，因而都回应了抹除的指控。然而，两者都未能回应第I节所提出的指控。中立媒介要求每位公民使用习得语言作出同意，从而使法律无从以任何家庭厨房里的日常言语触及那间厨房；而不压制其他语言的单一官方语言，依然令数千万民众在一种并非他们所选择的语言下接受治理。承认之所以优于上述两种方案，原因正在于此：它是唯一能让具备一定规模的社群[第IV节]以自身母语阅读自身法律的道路，与此同时，一种共同媒介仍可在其旁借由公民的自发使用而自由生长。

IV. 规模在政治开始之前便已作出决断

一个民族使用何种语言，是在厨房与摇篮中决定的，而非在立法机构中决定的。立法机构所能决定的，仅仅是企图违背这一事实将伴随多少苦难。高度现代主义治国方略的历史记录印证了这一局限：自上而下将民众习俗加以标准化的宏大规划，终将败于其视而不见的地方性知识，且规划越宏大，失败便越惨重（Scott, 1998）。一两百万人的语言少数群体与数千万人的语言社群之间，存在着本质之别，而非仅仅是程度之差，其中，该国境内的这一社群规模堪比该语言发源国的总人口。如此量级的人口，绝非在宾客到来之前便可扫入地毯角落藏匿起来的存在。它以自己的语言出版印刷、广播传播、布道宣讲、养育子女并安葬祖辈。没有任何执法机器能够触及每一间厨房。

历史业已在民族所能遭遇的最严苛条件，即全面征服之下，进行过这场实验。西班牙帝国彻底征服了印加帝国，瓦解了其国家政权，并统治这片土地达三个世纪之久。克丘亚语，即被征服者的语言，在征服开始五个世纪后的今天，仍在这片同样的土地上为数百万人所使用。学术研究更凸显了其中的讽刺意味：征服王室本身在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一直以被征服者的语言实施治理与布道；当王室巡察官何塞·安东

尼奥·德·阿雷切（José Antonio de Areche）最终于1781年限制其使用时[即在1780年代安第斯大起义之后的镇压行动中]，这项禁令因缺乏任何足以强制执行的机构而告失败，时至今日，该语言仍是横跨六个国家的八百至一千二百万人的母语 (Hornberger & Coronel-Molina, 2004; Mannheim, 1991)。既然彻底的帝国征服尚且未能消灭战败者的语言，那么一个受自身法律约束的现代国家，在试图消灭其数千万本国公民的语言时，同样很可能归于失败。现代国家确实掌握着一项王室昔日所缺乏的工具，即第VII节所论及的学校，而本章并不主张学校教育无法逐渐消磨一种小语种；本章的主张更为审慎，即一种由数千万人所讲、所印、所播、所宣讲的语言，不太可能被一个自身法律禁止其动用征服般暴力的国家所消灭。此类企图只会教会这些公民将国家视为对手。针对这一企图所必需的压迫性制度而爆发的反噬，其所损耗的凝聚力，将远远超出人们幻想以单一语言所换得的凝聚力。

V. 伫立门前的联盟

人类凭借两种通货结成联盟，即所秉持的价值观与所展现的外部标识，而每一场政治运动都会[往往不自知地]选择优先承兑哪一种通货。一旦审视价值观，这种不自洽便进一步加深。在符合此种描述的特定国家中，从信仰、家庭与传统的每一项尺度衡量，使用第二种语言的公民与试图同化他们的那场运动之间的契合度，都要高于他们与该运动反对者之间的契合度。

天然的联盟正伫立门前。然而该运动却将其拒之门外，这正是部落主义的运作机制：它按标识而非按价值观加以归类，其中，在部落式的算计里，标识[语言]压倒了实质内容[价值观]。关于分裂社会的比较研究记录了这一选择的代价：即便跨越界线的各方在价值观与利益上高度一致，政治冲突依然沿着先赋性界线分化排列，且这种归类排序即便有损于其中每一方的物质利益，仍持续存在 (Horowitz, 1985)。一场政治运动若仅仅因为其价值观上最亲近的盟友向同一位上帝祈祷时所使用的语言不同，便将他们推开，这并非提出了一个论点。这是犯下了一个错误。这一错误与该运动自身所宣称的宗旨，在逻辑上并不自洽。

VI. 戴着眼罩的民族主义

民族总是选择性地记忆，这并非民族的缺陷，而是其制造过程本身。关于民族主义的奠基性分析曾直言不讳地指出：遗忘乃是一个民族得以建构的必要条件，其中，每一个国家拼合过程中的多元起源与暴力行径，都必须从该民族自我讲述的故事中被删改抹去 (Renan, 1882/1990)；而民族本身正是一个围绕共同印刷方言组建起来的想象的共同体，这恰恰解释了为何在民族主义者眼中，第二种方言被解读为一个敌对民族，而非第二份历史遗产 (Anderson, 2006)。因此，具有双重遗产的特定国家的民族主义往往戴着眼罩，其中，它只铭记脱离第一帝国的那一半历史[那场著名的起义，以及其中耳熟能详的英雄人物]，却遗忘了那些从未经历过这段历史的行省。此类国家的诸多完整行省[一片接近其国土面积三分之一的疆域]，并非通过立国起义加入联邦，而是经由条约、购地以及与第二帝国的战争并入版图。在该国划定其疆界之前的数个世纪里，当地民众便一直在这片土地上使用着第二种语言。无论是 Renan 还是 Anderson，都未曾规定一个民族必须仅以单一语言讲述其故事。二人所描述的乃是一个共享的故事，而共享的故事完全可以用两种语言来讲述，将第二段历史纳入其中，而非将其删改抹去。当被遗忘者人数寥寥或星散四方时，遗忘或许能够造就一个民族；然而，当第二段历史属于数以千万计以自身母语出版印刷、广播传播、布道宣讲并养育子女的民众时[第IV节]，那被遗忘的一半人能读懂其中的缺漏，且他们铭记在心。

只记得父母一方的民族主义并非爱国主义。那是披着国旗的失忆症。单一语言的强制令便建立于此之上，这正是为何在戴着眼罩的人看来，这项政令顺理成章，而在未戴眼罩的人看来，它无异于抹除。

VII. 被教授单一历史的双重国族

谁编写教科书，谁便书写公民。

课程体系是一个国家按年度剂量施予的记忆，而这些剂量既可以承载全部遗产，也可以只承载其中一半。这种盲视本身就有一套课程体系。关于集体回忆的研究揭示了这种施予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国家通过学校教育植入图式叙事模板，即单一的故事框架，公民终其一生都在复述这些框架，却从未意识到它们其实是一种选择 (Wertsch, 2002)。一个

由两大帝国拼合而成的特定国家，往往只教授其中之一，其中，学校讲述多数群体的建国故事，而对剩余三分之一领土的取得几乎缄口不言，那片土地上的人民当初并入该国时，本是在截然不同的王权之下使用着截然不同的语言。该国三分之二渊源于第一段历史；三分之一渊源于第二段历史 [暂且不论从第三个强权购得的一片人烟稀少之地]。从其版图首次拼合成型之时起，该国便是一个双元国家。然而，出身于第二段历史的孩子坐在教室里，所接受的故事中却没有其祖先的身影，而当这个孩子长大成人后，便会遭到另一些公民指责为归属感不足，那些指责者从未被教导过，归属之路本也可以经由另一扇门进入。这是因为一部伪造的单一渊源史并不会缔造团结；它所制造的正是它宣称要防止的分裂。特定时代的官员之所以回避语言问题，正是因为课程体系从未赋予他们提出这一问题的语汇。在这一假设情境中，甚至还存在一片岛屿领地，其中，几乎全部人口都使用第二种语言，而单一语言的强制令一抵达其海岸，便沦为荒谬。

VIII. 账簿，而非语言

政府首先而且最根本的是义务的持守者，其所履行义务的总和便是其全部合法性；当特定的政府不再履行其所欠负的义务时，这种失职不会坦诚地自我宣告，而是会去寻找一件伪装的外衣。语言并非此类特定国家陷入困顿的原因。原因在于义务：例如债务，那些以多数群体语言许下而又以同一语言违背的承诺，以及统治阶层历经数代累积下来的义务，其中，没有任何法律强制要求每年实现收支平衡。八个世纪的财政史表明，这一规律在各种形态的国家中反复重演：违背自身义务的政府会陷入漫长的危机周期，其中，信心一旦破裂，唯有历经数代方能恢复 (Reinhart & Rogoff, 2009)，而承受这种重压的共同体则会以骇人的必然性去寻找一个被标记的少数群体，将失败归咎于其身 (Girard, 1986)。当政府无法兑现其所作承诺时，部落主义便对其大有用处，这是一种古老的工具：将公民的愤怒引向某种标识 [一种语言、一种传承、一条边界]，从而使账簿免遭审视。在债务之下，潜藏着延续百年的积习，即重效率轻品质、重速度轻美感，最初是为了逐利，其次则是为了以足够快的速度实现工业化，以免遭到赶超。货币体系在每一个决策节点上都在奖赏这种选择。这种选择层层叠加，同时催生了债务与丑陋。而立法

管制那些在造成这两者方面干系最小之人的语言，绝无可能修复其中任何一项。



IX. 罗马回应同化论者，方向恰恰相反

帝国是人类在治理领域开展过的历时最久的实验，而其中存续时间最长的帝国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留下了数据。在重复这一论点之前，这些证据值得细加审读。

在一切论述的尽头，罗马以同化论者自己援引的例证回应了他们，而且这一回应指向的正是与他们意图相反的方向。罗马以两种语言施政。拉丁语主导西方；希腊语主导东方。帝国从未将拉丁语强加于希腊语半壁江山，其中，东方的行政、商业与经文圣典均在完整的罗马权威之下以希腊语通行运作。古典学研究在这一点上毫不含糊。罗马在希腊语东方从未推行过语言同化政策，这两种语言在帝国的数个世纪里并行运作 (Adams, 2003)。至五世纪时，东方政府在正式法律中保留拉丁语，同时以希腊语面向其臣民，作为一个希腊语罗马帝国屹立于世，完整且不间断地延续着罗马的身份认同 (Millar, 2006)。帝国在此种状态下延续了数个世纪，横跨彼此分隔的陆块，从未要求任何单一语言将其维系一体。而当拉丁语西方陷落之时，希腊语东方 [仍是同一个帝国，只

是使用着自己的语言] 又延续了一千年之久。倘若罗马曾试图在那片地理疆域内推行单一的强制语言，它极有可能遭遇第IV节所描述的抵抗，且其历史记录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尝试会使帝国存续得更为长久。

同化论者所援引的例证，其所指方向恰恰与其意图相悖。古代世界最为庞大的国家之一数百年来使其两种语言并行并存，从未将其中一种强加于另一种语言的使用者。单个案例无法证明承认会带来凝聚力，此处也并非将罗马当作这种证明提出；它表明的是，一个拥有两种语言的国家无须强制同化便能存续数个世纪，而最常被引用的帝国统一典范，并非单一强制语言的例证。

X. 承认门槛

一项学说唯有在制度能够承载之时，方能成为法律。上述九节针对一个假设国家论证了这一理据；一个 Jasutopian 国家仍须就这一问题作出决断，而它的决断方式与决定其他每一项法律的方式并无二致。

参议院提出承认法，并以百分之五十一的票数通过并提交公民议院；公民议院随后就此进行表决，该法案唯有获得超过百分之五十五的赞成票方可在该院通过 [《治理三权条款》，第I条] (Rodriguez, 2021)。该法依照第XCVI条为每一项法案规定的标准程序，经由全部治理三权予以增订；而所有法律均须送交司法权作出裁断，司法权会对照三大立国原则对其进行审查 [同一条款第V条]。承认法属于普通法律，不受第CII条与第CXXIII条施加于《法律条款》的锁定机制约束，因此它自带保障条款：该法规定，即便某种语言在随后的统计中落于门槛线以下，仍保留其业已获得的地位，且唯有按照其制定时的同等程序，即经由参议院提出法案并交付公民表决，方可予以变更。

该法将其规则命名为承认门槛：凡作为超过十分之一公民之母语的语言，即为官方语言。这条门槛线就全国范围、为国家政府而划定，并在每一个州或领地内、为该州或领地自身的政府再次划定。在全国范围内不足十分之一、而在某一州或领地内超过十分之一的语言，即在该州或领地内具有官方地位 [第VII节中的岛屿领地即以其人民所使用的语言实施自治]。统计对象为公民，每人均依其本人所申报的母语计入。

本书将该统计设定为每十年进行一次，纳入 Jasutopianism 所命名的全国公民普查 (Rodriguez, 2021)，并由第6章的指标审计委员会予以核验。

官方地位是国家的一项义务，而非赋予某种语言的荣誉。国家须以每一种官方语言提供法律、公民议院的选票、法院的诉讼程序、公立学校教育，以及《法律条款》第I条所规定的基本服务。在门槛线以下，这一义务有所收窄，但并未消失：每一位母语占比低于十分之一的公民，仍有权以其所能理解的语言 [通过笔译与口译] 获得法律、选票及基本服务，尽管该公民的语言并不享有官方地位。这正是将第I节的同意论据适用于每一位公民。一部公民无法阅读的法律，对该公民而言便是一道敕令，无论该公民的语言为数千万人所共用，抑或仅通行于单个村落。

那么，为何是十分之一？这条门槛线出于实践，而非原则。原则在于同意，这是每一位公民都应享有的，亦为门槛线以下的保障所确保；这条门槛线所标示的，仅仅是一个共同体的语言亦须成为国家工作语言 [第IV节] 的规模界限，从而使其使用者得以用该语言接受治理，而不仅仅是通过翻译向其转达。

第11章将这一问题向外延伸。由诸多民族共同构成的联邦，首先而且最根本的是多语言的，其中，此处所确立的承认学说是第11章将作具体规定的超国家公民议院的前提条件。世界超国家联盟 [S.U.W.] 以两种方式承载这一学说：各成员国在其本国疆界之内适用承认门槛 [第11章第3道关卡的一项条件]，且联盟以成员国中每一种具有官方地位的语言颁布其法律，以及向公民发布的指令。国界之内的承认在先。联邦承继于此。

在探讨联邦之前，单一国家内部仍留有一个问题，而这一问题属于保留其货币的国家。下一章将着手探讨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第9章）

Adams, J. N. (2003). *Bilingualism and the Latin langu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erson, B. (2006).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 ed.). Verso.

de Varennes, F. (1996). *Language, minorities and human rights*. Martinus Nijhoff.

Girard, R. (1986). *The scapegoat* (Y. Freccero, Tran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Hornberger, N. H., & Coronel-Molina, S. M. (2004). Quechua language shift, maintenance, and revitalization in the Andes: The case for language plann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004*(167), 9-67.

Horowitz, D. L. (1985).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iu, A. H. (2015). *Standardizing diversit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nguage regime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Locke, J. (1980). *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 (C. B. Macpherson, Ed.). Hackett Publishing.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689)

Mannheim, B. (1991). *The language of the Inka since the European invasi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Millar, F. (2006). *A Greek Roman Empire: Power and belief under Theodosius II (408-45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Nettle, D., & Romaine, S. (2000). *Vanishing voices: The extinction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einhart, C. M., & Rogoff, K. S. (2009). *This time is different: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enan, E. (1990). What is a nation? (M. Thom, Trans.). In H. K. Bhabha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pp. 8-22). Routledg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82)

Rodriguez, J. (2021). *Jasutopianism*. [Self-published].

Scott, J. C. (1998).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Yale University Press.

Stepan, A., Linz, J. J., & Yadav, Y. (2011). *Crafting state-nations: India and other multinational democraci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Wertsch, J. V. (2002). *Voices of collective remember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第10章：若特定的国家继续沿用货币制度：逐县消除不公平薪酬的方程



前一章探讨了语言问题，并作出了回答：特定的国家若境内业已存在既定语言，应当正式承认其既有语言，其中，任何作为超过十分之一公民母语的语言，均应位列该国官方语言之中[承认门槛]。那一章所问的是，一个国家在其内部承认什么。

本章所问的是，一个国家在其内部支付什么。

Jasutopianism 通过改变货币形态来回答生计问题：以地位等级取代纸币与数字货币，且其法律条款第I条保障向每一位做出贡献的公民免费提供七项基本资源[食品、饮用水、教育、衣物、医疗保健、标准级住房及公用事业] (Rodriguez, 2021, Art. I)。并非每个国家都会走上这条道路。没有哪个国家能在一日之内走上这条道路。特定的国家在阅读这些篇章之后，或许仍会保留其货币制度，而在该国工作的公民同样理应得到一个答案。

本章的答案是一项方程与三项法律。该方程逐县计算，因为生活成本是一项地方事实，而非全国性事实。这些法律规定，在具约束力的

双锚规则[现场办公与混合办公适用工作地点所在县，远程办公适用居住地所在县]之下，向劳动者支付低于七项基本资源成本的薪酬即属违法。低于该成本的薪酬在本书篇章中有一个名称。不公平薪酬。

I. 保留货币制度的国家

实行货币制度的国家欠劳动者什么，而 Jasutopian 国家则是直接给予的？同样的七项资源，只是经由另一条路径。第I条以实物形式直接交付这些资源；货币制度则交付工资，交由劳动者自行购买。这项义务并不因路径不同而改变。倘若该工资无法按对该岗位具有约束力的县薪酬线购得这七项资源，那么货币制度就在其自称肩负的唯一任务上辜负了该劳动者。

本章将这种失职命名为不公平薪酬：即在扣除法律强制规定的每一项扣款之后，使在职者所得薪酬处于或低于具约束力的县公平薪酬线所设定的七项基本资源月度成本的薪酬。这一术语系审慎择定。收入不平等是学界业已界定的衡量指标[整体人口中的收入分布跨度]，本章不予讨论。第7章已用直白的语言阐明了二者的区别，即一个国家可以在收入仍不平等的情况下消除匮乏；第3章则将地位等级的分布跨度描述为一种受规范的不平等，其证据将其界定在基布兹公社中逐渐瓦解的均等分享与1990年代蒙德拉贡所维持的约六比一的跨度之间。本章的方程消除底端。它并不削平顶端。

不公平薪酬亦非对劳动者的评判，因为本卷认为，进取之愿在公民身上与在国家身上并无二致，有所区别的只是引导这一愿望的制度设计。整整一个月的劳动若换不来一个月的生计，那是设计的过错。绝非付出这份劳动之人的过错。

这一原则比本书更为古老。亚当·斯密在1776年写道：“一个人必须始终靠自己的劳动为生，他的工资至少必须足以维持其生计”(Smith, 1776/1976, Book I, Chapter VIII)。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3年美国《全国工业复兴法》正式成为法律的当天主张，“任何依赖向劳动者支付低于生活工资而存续的企业，都没有权利在这个国家继续存在”，并将生活工资界定为“高于仅能勉强维持生存的水平”(Roosevelt, 1933)。这两项论述所缺乏的，乃是一项度量标准。没有数字的原则只是一种情怀，而雇主不会为情怀支付报酬。

II. 为何以县为单位

全国平均值遮蔽了劳动者。同一国家内，一个县某处住宅的租金可能是另一个县同类住宅租金的三倍，一份足以在后一县维持一个家庭生计的工资，在前一县却无法做到。由国家政府或州政府划定的单一标准线，按其构造而言，对其所管辖的大多数地区必然是错误的。对某些地方过高。对其余地方过低。

这是因为，决定一份工资是否充足的各项成本[首当其冲便是房租]是在地方市场中形成的，并作为地方账单予以支付，而县则是大多数国家业已具备预算、居民登记记录及立法权力的最小政府单位；不设县的国家可将“县”一词理解为与其最接近的对应行政单位[区、市、府等]。第6章将同样的推理应用于贫困本身，其中，城市贫困指数逐城读取，绝不将各城市合并取平均。

因此，应由县自行宣告其生活成本，而非由其上级的国家代为宣告。该成本每年宣告一次。话虽如此，自主宣告也是一种诱惑：特定的县或许希望将成本报低以宽待本地雇主，或将成本报高以取悦选民。本卷业已构建了补救机制。第6章设立了指标审计委员会[由抽签选出并像陪审员一样接受利益冲突审查的公民组成，在每项指标公布前予以核验]，实行货币制度的国家可以借鉴这一设计，而无需照搬其余制度：由本县公民经抽签组成、任期固定的专门机构，在宣告生效之前对其进行核验。

III. 公平薪酬线

这项宣告为每个县生成一个数字。本章将其命名为公平薪酬线[Ladult，在语境明确处简写为　L]：即按该县价格计算，一名成年人一个月所需第I条七项基本资源的成本。将其写作总和，其中每个字母代表一项资源的月度成本[H 代表标准级住房，U 代表公用事业，W 代表饮用水，F 代表食品，C 代表衣物，M 代表医疗保健，E 代表教育]：

$$\mathbf{L = H + U + W + F + C + M + E}$$

在各雇主之间保持 Ladult 的统一，能够干脆利落地阻断家庭雇用偏见。一旦由成文法规定向为人父母者支付更高薪酬，雇主便会立刻回避雇用父母。将家庭规模与薪酬体系分离，可以彻底消除基于家庭状况

的招聘歧视；与此同时，第VII节设立了一项直接的按县指数化的国家被抚养人津贴，由国家财政直接向负有抚养责任的家庭发放，从而确保单亲父母绝不会因单一成人底线而跌破基本生存线。

该薪酬线是对成本的核算，而非对舒适程度的主观判断。它不包含储蓄、旅行或休闲的余量，本章亦不宣称薪酬仅比该线高出一枚硬币的劳动者便能过上优渥生活；本章仅断言，薪酬低于该线的劳动者，无法在该县依靠这份工作维持生活。

四项规则使该薪酬线臻于完备。

第一项规则是，薪酬按扣款后的实得额衡量。与该薪酬线相对照的是实得薪酬[即扣除法律强制规定的全部扣款之后所剩余的金额]，因为劳动者买面包所凭的是实际到手的钱，而非纸面承诺的数额；任何高于该线的金额均符合法律规定，其中，该线即为界限，法律只要求没有任何劳动者停留在其上或位于其下。

第二项规则是按比例折算。将该薪酬线除以全职月工作时长，即得出小时薪酬线，工作时长较少的劳动者每工作一小时都理应获得该标准费率。就单个劳动者而言，其中 p 代表当月实得薪酬，h 代表当月实际工作小时数，T 代表全职月工作小时数，全部法律要求可归结为一行式子：

$$p > L \times (h \div T)$$

第三项规则是双锚反歧视规则**[**工作地点与远程对等**]**。纯粹按居住地适用的规则会引发严重的通勤扭曲：高成本辖区[例如每月 3,136 美元的纽约县]的雇主将立刻获得财务动因，排斥本地居民而转聘从生活成本更低的县[例如每月 1,470 美元的尼亚加拉县]往返通勤的人员。两项明确的法定锚点彻底封堵了这一扭曲。第一，对于现场办公与混合办公劳动者[每月有 40% 或以上的工作时长实际在雇主场所履行的劳动者]，具有约束力的底线是工作地点所在县**[Lwork]**的公平薪酬线；从事同一现场岗位的每一名劳动者均享有完全相同的法定底线，从而彻底终结排斥本地居民的招聘偏见。第二，对于完全远程办公劳动者[每月现场工作时长不足 40% 的劳动者]，具有约束力的底线是 居住地所在县**[Lres]**的公平薪酬线，并辅以法定禁令，禁止在无需到场履职的远程招聘启事中按居住地所在县划定排斥红线。第三，根据国家义务1[第VII

节]，雇主的工作地点所在县严格依劳动实际发生的实体街道地址确定，绝不以其公司注册文件为准。

第四项规则是，该薪酬线保护每一名处于劳动年龄的合法劳动者[自该国法定最低工作年龄至养老金年龄]，无论其是否为公民，正如第I条本身亦适用于合法许可的做出贡献的非公民。不存在任何例外。不论行业，亦不论规模。领取小费的劳动者、学徒、达到法定工作年龄的未成年人、慈善机构雇员、主要为单一付款方工作的承包人员：每一人皆应获得高于该线的薪酬。唯有自雇人士置身其外，因他们并无可供约束的雇主。

IV. 公平薪酬方程

方程的一侧载明一县在职居民所获得的薪酬。另一侧载明其按等价尺度折算的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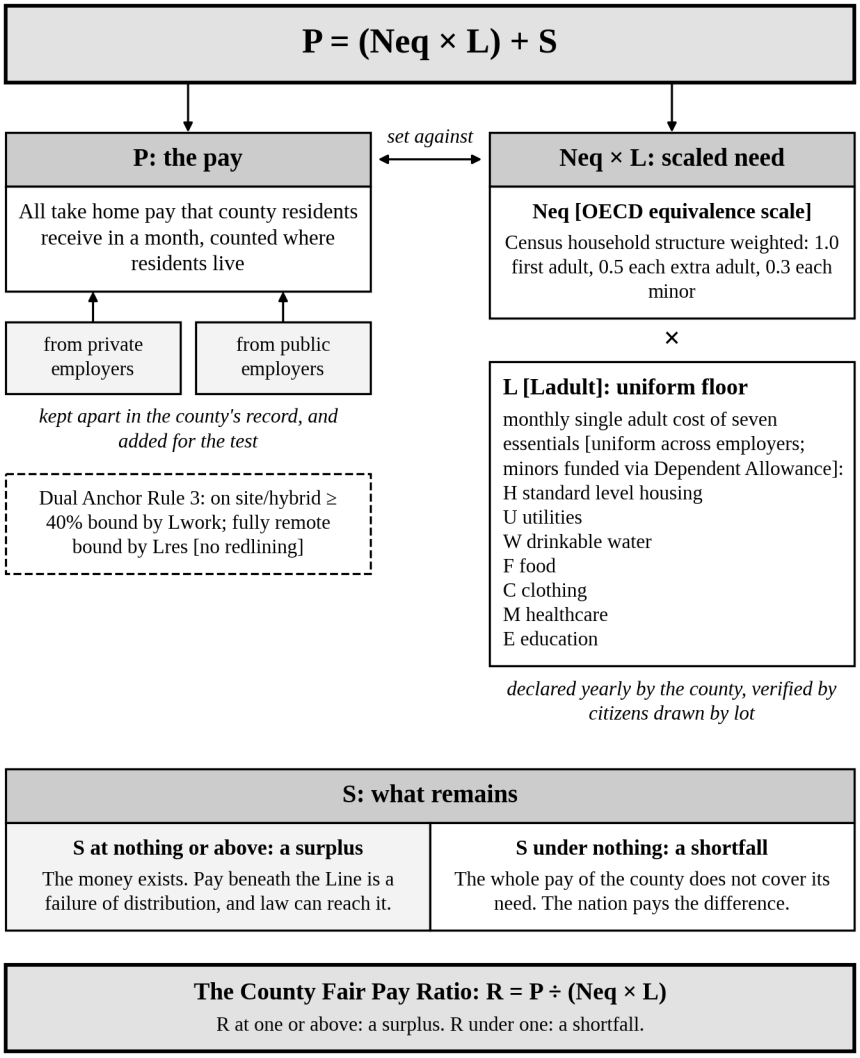
设 P 代表特定的县的居民在一个月内从私营雇主与公共雇主处获得的全部实得薪酬[县级记录将这两项总额分列记载，并在检验时合并相加]。P 仅计算薪酬本身：雇主用于清偿其他负债的资金[租金、原材料、债务、税款]不计入该总和。若将每一名居民都按独居成年人计算，就会在合租比例高或多代同堂的县高估总体住房与公用事业需求；反之，若忽略儿童，则会低估家庭抚养义务。因此，在县级审计中，设 Neq 代表按**OECD** 修正等价尺度加权计算的该县人口普查家庭人口数：每户住宅中的首位成年人权重为1.0，同住该住宅的其余每名成年人权重为0.5，每名受抚养未成年人权重为0.3 (Hagenaars, de Vos, & Zaidi, 1994; OECD, 2013)。设 L 代表该县经核验的公平薪酬线[Ladult]。于是，公平薪酬方程可表述为：

$$\mathbf{P = (Neq \times L) + S}$$

Neq 乘以 L 衡量按等价尺度折算的县级需求。S 为剩余盈余，且 S 可以小于零。县公平薪酬比率将这一确切的平衡关系表达为一个数字，即总薪酬除以按等价尺度折算的需求：

$$\mathbf{R = P \div (Neq \times L)}$$

比率等于或高于一即确立存在盈余；比率低于一即确立存在缺口。雇主仍须严格依照统一的 Ladult 薪酬线向每一名劳动者支付薪酬[以防止家庭歧视]，而县级审计则依据真实的人口普查住宅结构计算 Neq，从而使县级缺口反映真实的地方承载能力，而非家庭构成的统计假象。



The invented county of this chapter: Neq = 100,000; L = 2,400; need 240 million; pay 360 million [300 private, 60 public]; S = 120 million; R = 1.5.

图 **10.1.** 公平薪酬方程。一侧载明一县劳动年龄居民从私营雇主与公共雇主处获得的薪酬。另一侧载明其按 OECD 等价尺度折算的需求：即以七项基本资源的公平薪酬线为基准加权计算的家庭结构需求。凡薪酬超过需求之处，资金便客观存在，而低于该线的薪酬乃是分配上的失职。

该方程中的两项取舍皆属刻意为之。薪酬按居民居住地统计，而家庭构成则直接依据人口普查住宅数据加权计算，因此方程两侧所刻画的完全是同一居民群体；此外，每一名劳动年龄居民[无论就业与否]及

每一名受抚养未成年人均计入 Neq，因为任何县都不能仅仅因为尚无企业雇用该公民，便免除对其生存需求的考量。

试设想一个虚构的县，其经核验的家庭结构得出 100,000 个 OECD 等价单位[Neq]，其抽签公民小组核定的月度薪酬线为 2,400 本币[其中住房 1,200、公用事业 200、用水 50、食品 350、衣物 100、医疗保健 400、教育 100]。每月按等价尺度折算的需求等于 240 百万。如果居民获得 360 百万的实得薪酬[私营部门 300 百万，公共部门 60 百万]，那么盈余等于 120 百万，且 R 等于 1.5。每月 160 小时的全职工作时长则确立了 15 的时薪底线。

1.5的比率证明了什么？证明资金客观存在。该县雇主每个月实际支出的薪酬总额，已经比将每一名劳动年龄居民（包括无业居民在内）都置于该薪酬线水平所需的成本还多出一半。该县一名薪酬低于该线的劳动者，并非匮乏的受害者，该劳动者乃是分配的受害者，而分配正是法律所能触及的领域。

这便是该方程的全部逻辑。也正因如此，在评判任何单一雇主之前，必须先核算全县总和。总和即证明。法律即由此而生的必然结果。盈余本身不受干预：在该薪酬线之上，薪酬仍可按技能、按努力及按风险有所差异，正如第3章所允许的受规范的不平等那样。

V. 雇主检验

同样的算术逻辑直接适用于每一家雇主，并经精算修正，以确保资本密集型企业绝不致因设备损耗或合法经营债务遭到忽视而崩塌。就特定的雇主而言，令雇主精算支付能力 **[M*]**取代原始营收减去非薪酬支出：

$$\mathbf{M^* = Rev - C_{nonpay} - \Delta cap - I_{debt} - \pi_{min}}$$

其中，Rev 为营业总收入，Cnonpay 涵盖经核验的非薪酬经营成本，Δcap 为经核验的实物资本折旧与维护费用[严格以法定标准表为上限]，Idebt 为经核验的生产性经营贷款或资本贷款的合同还本付息额[明确排除为股东分红、股票回购或举债企业并购而举借的债务]，而 πmin 为有上限的资本留存回报余量[以经核验的实际投入实物权益为基数，按国家主权债券收益率加250个基点指数化核定]。利润留在 M* 之内。

股息留在 M* 之内。股票回购与超额高管薪酬同样留在 M* 之内，依法受薪酬合规义务约束。将 M* 直接与 D 相对照，D 即为按实际工作时长、依每名劳动者具约束力的双锚薪酬线支付全部劳动者薪酬的总成本：

D = 对该雇主名下每一名劳动者的 **L × (h ÷ T)** 求和

高管薪酬与每一名一线劳动者的薪酬一并计入工资总额。凡 M* 大于或等于 D 之处，该企业具备支付能力；凡 M* 低于 D 之处，该企业仅凭其当前利润空间则无法支付。

可能出现三种认定结果。

若某雇主名下每一名劳动者的薪酬均高于该薪酬线，即视为通过检验。此外别无他求。

若某雇主的精算支付能力 M* 足以覆盖 D，却依然向任何劳动者支付低于该薪酬线的薪酬，则属于有能力支付却拒绝支付。这一选择即为不公平薪酬。成文法给予十二个月的合规期，其中，企业必须先行从自身工资总额内部提升低于底线的薪酬[倘若算术结果要求如此，则削减顶层高管薪酬]，此后方可主张经营困难。

当雇主精算支付能力 M* 低于 D 时，该雇主无法在无援助的情况下完成支付。棘手情形需要的是制度工程，绝非毁灭。若独立社区企业[雇用50名或以下全职等效员工]即便在将企业主与高管薪酬上限设定于 3 × L 或以下之后仍未通过测试，则由第VII节规定的国家小企业工资桥梁与统筹薪酬抵免以国家资金介入支持，而不会将过渡成本转嫁给私营竞争对手；任何在十二个月后[或在其三十六个月桥梁期届满后]仍无法达到该底线的无存续能力企业或掠夺性企业，均属非法经营，并将在停业前九十天启动第VII节的政府劳动者过渡服务，使劳动者绝不就此独自承担资不抵债的后果。

十二个月的期限并非任意设定。这是因为十二个月恰好是县级宣告的一个完整周期：雇主获得了一条经核验的公平薪酬线从发布至下一次发布之间的全部存续期，用以重新安排其薪酬基金，如此一来，任何雇主皆不得辩称该数值在其尚在核算之际便已发生变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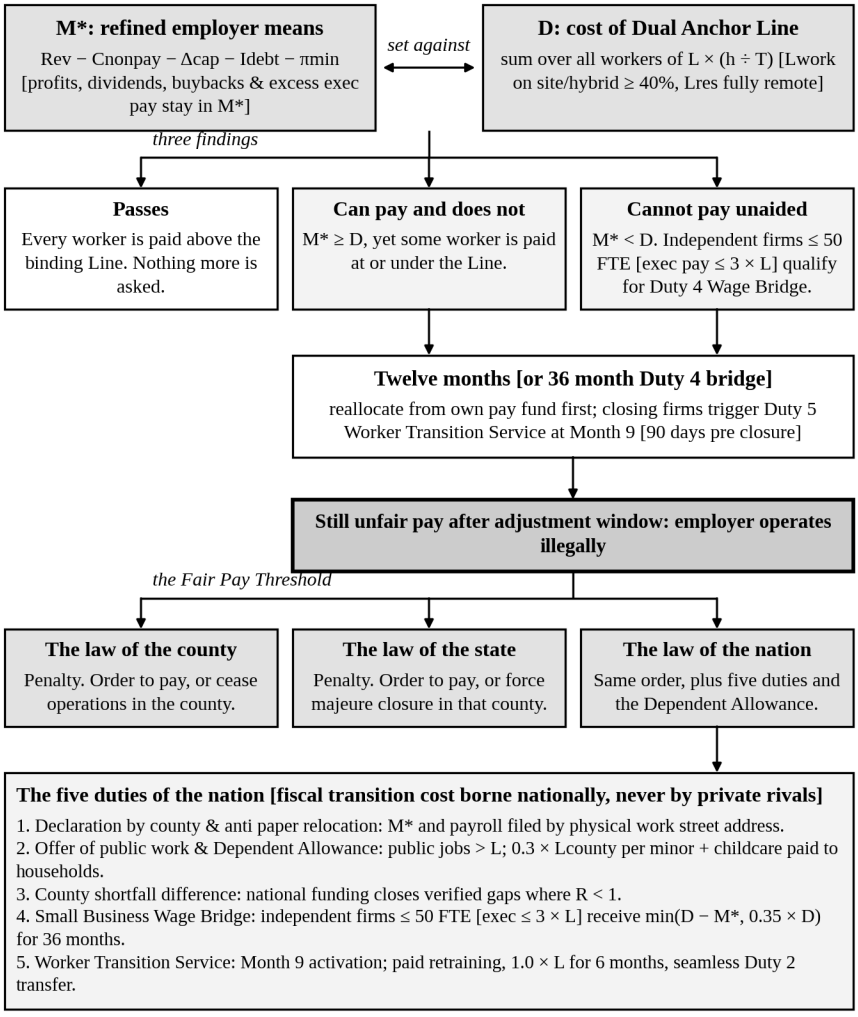


图 **10.2.** 雇主测试与三部法律。将雇主精算支付能力 M* 与 D（按每位劳动者各自的双锚线支付薪酬的成本）进行比对。具备支付能力的企业有十二个月时间重新配置薪酬；经审计低于 M* 的小型企业获得国家统筹薪酬抵免；停业企业将在县级、州级与国家级执行令并行运作的同时，触发第9个月的劳动者过渡服务。

第二项认定结果并不罕见，其背后的经济学机制亦已有实证衡量：当少数雇主雇用了地方市场中的绝大多数劳动者时，他们便掌握了将薪酬压低至多雇主市场所能产生水平之下的权力。一项针对美国8000余个地方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发现，按照该国监管当局适用于企业并购的标准，平均而言各地方市场呈现高度集中，且集中度越高之处，招聘标

示工资越低 (Azar et al., 2022)。这种权力在地方层面形成，亦可在地方层面予以回应。

VI. 真实国家中的方程解读

这笔资金在现实中是否确实存在，抑或仅存在于虚构之县？这一问题可置于某一货币国家的公开统计数据中加以检验。下文的解读系一项例证，由本书依据美国的公开统计资料汇编而成，并非任何县自身的正式宣告。

薪酬指各县家庭在十二个月内于扣除各项扣缴前所获得的工资与薪金收入，涵盖私营与公共部门薪酬 (U.S. Census Bureau, 2026)。劳动年龄居民指居住于家庭中的18至64岁人口。该年龄组系公开数据中最接近法定劳动年龄与退休金领取年龄的区间，同时排除了军营、监狱与集体宿舍中的人口，因其居住者并无可在等式另一侧计入的家庭薪酬。公平薪酬线由两项来源构建：就住房、公用事业与用水而言，采用该县自身一居室住宅含公用事业费用的租金中位数；就居家采购食品、衣着、医疗保健与教育而言，采用2024年全国单人家庭的年均支出，即每年9352美元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25)。

在该国3144个县及县级同等行政区中，有3139个公布了全部数据。汇总观之，其劳动年龄居民获得的薪酬总额为10.9万亿美元，对应需求为4.7万亿美元：比率为2.3。有四个县的比率低于1，涵盖所统计的1.97亿（197百万）居民中的14761人。当从薪酬中扣除该国每位雇员所承担的工资税扣缴[占薪酬的7.65%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n.d.)]后，则有十一个县的比率低于1。

同样的数据表明，公平薪酬线为何应当归属于县而非州。仅在纽约州一州之内，一居室含公用事业费用的月租金中位数在尼亚加拉县为691美元，而在纽约县则高达2357美元，其中，前者的例证性公平薪酬线为1470美元，后者则为3136美元；若为整个纽约州划定一条统一标准线，对前一县而言必失之过高，对后一县而言则失之过低。

作为该国人口最多的县，洛杉矶县揭示了盈余背后所掩盖的现实。其一居室含公用事业费用的月租金中位数为1724美元，从而将例证性公平薪酬线定为每月2503美元。该县620万（6.2百万）名劳动年龄居

民按此公平薪酬线每年需要1850亿（185个十亿）美元，而实际获得3350亿（335个十亿）美元，比率为1.8。然而，在全年全职工作的居民中，仍有456926人[超过其中的八分之一]年收入低于30000美元，在尚未扣除任何一笔扣缴之前便已低于公平薪酬线。该县并不缺乏资金。它缺乏的是法律。

南达科他州的奥格拉拉拉科塔县则呈现了另一种情形。该县7402名劳动年龄居民按每月1363美元的例证性公平薪酬线计算，每年需要1.21亿（121百万）美元[该县未单独公布一居室租金，故采用其全部住宅租金的中位数]，而其实际所得为1.12亿（112百万）美元：比率为0.92，缺口约1000万（10百万）美元。该县规模较小，其统计数据带有较大的误差幅度[约占其薪酬总额的五分之一]。这一解读是一项信号，而非最终定论。然而其指向已足够明晰。在此，全体雇主所支付的工资总和尚不及基本需求，县域内部的任何再分配皆无法弥合全县总薪酬本身尚且无法覆盖的缺口。

上述解读均取自税费扣缴前的数据；在各县完整的 OECD 等价尺度微观数据制表完成之前，均将每位劳动年龄成年人单独核算，作为保守的单身成年人上限；对七项资源中的四项采用了全国均值；且仅计入家庭居住人口。各县经核验的年度宣告将以经审计的地方实际数据取代每一项近似估算。

VII. 三部法律

唯有当制度足以承载一项学说时，该学说方能成为法律。本章所论之国乃任何仍保留本国货币的当代国家；其并不具备 Jasutopianism 的任何非货币制度，而是通过三个层级的普通成文法来落实公平薪酬门槛。在该项共同门槛之下，任何雇主[无论私营抑或公共部门]均不得向任何劳动者支付等于或低于该劳动者具约束力的双锚公平薪酬线[现场办公与混合办公劳动者适用 Lwork，完全远程办公劳动者适用 Lres]且按工作时长成比例折算后的实得薪酬。

为何需要三部法律，而非一部？各层级皆握有其他层级所欠缺之能力。县级了解地方物价。州级跨越县界。唯有国家财政能够跨越疆域并具备足够的财政纵深，以为存在缺口的县提供托底，在调整期间保护具备存续能力的社区企业，保障失业转岗劳动者，并直接资助被抚养人

补助；其中，一项明确的宪法性规则约束着国家政策：每当法定工资清偿义务将一家具有社会存续能力的小型企业推向资不抵债边缘时，其财政过渡成本均须严格由国家政府承担，绝不得转嫁予其私营部门竞争对手。

县级法律。县应每年宣告一次其公平薪酬线，并在公布前由抽签产生的该县公民机构予以核验；经认定支付不公平薪酬的雇主应获给予十二个月的合规期限，并应首先从其自身的薪酬基金中提高低薪水平；十二个月届满后仍支付不公平薪酬的雇主即属非法经营，其中，该雇主应由县认定构成受罚事由，并被责令补足支付，或停止在该县境内经营。

州级法律。州[或省，抑或介于县与国家之间的任何一级政府]对未因县级命令而履行的雇主享有同等权力；州可认定该雇主应受处罚，并责令其支付，或令其在其经营所在县面临不可抗力关停[即由国家公权力的上级强制力所施加、而非由雇主自行选择的关停]。

国家级法律。国家政府在享有执法权的同时，还承担着任何单一县级均无力独自履行的五项明确法定职责[并配套对家庭被抚养人的直接补助]：

1. 按县申报与反纸面迁址保障机制。跨多个县或跨国经营的企业，须随其税务申报文件，就每一实际发生劳动的县，分别申报其雇主精算支付能力 M^* 及指定县级薪酬基金。在此项职责下，工作地所在县严格以劳动实际发生的实体街道地址界定，绝不以公司注册登记地址为准，从而阻断企业借纸面迁址逃避高成本工作地公平薪酬线的路径。跨国企业的国别税务报告制度业已确立先例 (OECD, 2015)；本项成文法正是将这一确切的会计纪律向下延伸一个司法管辖层级。

2. 就业供给与按县指数化的国家被抚养人津贴。任何未获私营部门雇用的劳动年龄居民，均应获得一份薪酬高于县级公平薪酬线的公共就业岗位供给；任何经证明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均应自公共财政领取相当于该公平薪酬线的保障金[呼应 Jasutopianism 第LXXI条 (Rodriguez, 2021, Art. LXXI)]。此外，为确保单亲家庭与承担抚养责任的家庭在统一的 Ladult 雇主薪酬底线下绝不跌落至基本

生存线以下，国家政府直接向承担抚养责任的家庭发放按县指数化的国家被抚养人津贴，标准为每名未成年子女 0.3 × Lcounty 外加经核验的县级托育成本差额，从而将家庭补助与雇主薪酬支出清晰分离。

3. 县级缺口差额。当某一县经 OECD 等价尺度折算的比率 R 低于1时，国家政府应将经核验的缺口差额直接支付予该县的劳动居民。若国家政府财政收入不足以覆盖该缺口，其便已受一项具约束力的法定命令所羁束：必须将财政支出从并非直接服务于公民经济福祉的项目中重新调配，而不得任由劳动居民处于公平薪酬线之下。

4. 国家小企业工资桥梁与统筹薪酬抵免。仅严格适用于雇用50名或以下全职等效员工的独立、非特许经营小型企业，且该企业在将企业主与高管报酬上限设定于 3 × L 或以下后[经县级税务申报文件核验]，依据雇主测试审计得出 M* 低于 D。该机制完全由国家一般财政收入出资[以第3项职责所规定的对非经济福祉类联邦财政支出的强制重新调配为支撑]，由国家财政直接发放统筹薪酬抵免，以弥合雇主精算支付能力与法定薪酬总额之间的缺口：

$$\textbf{Creditbridge} = \min(D - M^{*},\ 0.35 \times D)$$

覆盖为期36个月的经营调整窗口期，且仅可针对经指定的低利润社区必需行业[托育、养老照护与农村食品供给]予以续期。这一35%的上限发挥着关键的约束作用：它既能在价格调整期间维持具备存续能力的社区企业继续营业，又能阻止永久丧失存续能力或掠夺性的企业凭借全额公共补贴无限期维持运转。

5. 政府劳动者过渡服务。对于任何在第12个月[或在其三十六个月桥梁窗口期结束时]仍告停业的企业，国家劳动力过渡机构将在第9个月[即停业前九十天]自动启动，保障每位受影响劳动者享有三项权利：立即获得带薪技能再培训与就业匹配；在积极安置期间享有最长六个月、按 1.0 × L 标准不间断发放的过渡性收入保障；以及若私营部门岗位安置尚未落实，则无缝衔接进入第2项职责规定的公共就业岗位供给。

住房供给锁定。 若某县的房租中位数在四个季度中的上涨速度，既快于该县前四个季度所获得的到手薪酬[P]，也快于全国同期四个季度的房租中位数，且在连续两次季度读数中均是如此，那么，两项措施随即生效：州法律依法准许沿该县的交通与就业走廊建设多户住宅，县法律对未改良土地价值超出全国消费者价格通胀的任何上涨征收附加费，所得款项以托管方式留作该县境内的住房建设之用。第三项义务的支付绝不以上述任一措施为条件，也不得削减或延迟。该检验以房租对照薪酬与全国水平，而绝不对照薪酬线，因为薪酬线本身已包含房租。奥克兰于2016年对其约四分之三的住宅用地放宽分区限制，上调分区地区的建设随之增加(Greenaway McGrevy & Phillips, 2023)。

盈余贡献。 不属于第四项义务所涵盖之小企业的企业，若其营业净盈余超过其所属行业类别中盈余与公平薪酬工资总额之比的中位数的三倍[依本国自身的分类：北美为NAICS，欧盟为NACE，其他地区为ISIC]，须按国家法律所定的费率，就超出部分向用于支付第四项与第五项义务的国家一般收入缴纳贡献；第四项义务仍完全由该项收入供资。

公共实体与私营实体同样受此约束。凡支付不公平薪酬的公共实体，均适用同等认定与同等命令，而拥有该实体的政府则须依照第三项职责的规则承担相应成本：在任由自身任何一名劳动者落于公平薪酬线之下以前，必须先行削减并非服务于公民经济福祉的支出。

VIII. 当一县未能通过该方程时

比率低于1的县，并非仅因当地雇主失职所致。该县全部薪酬之总和尚不足以覆盖全部需求之总和，其中，向该县任何单一雇主下达的命令皆无法修补这一总量缺口。国家的第三项职责可以解决当月之困，差额亦得以补足；但它并未回答这一缺口所提出的根本问题。

问题在于，在如此境地之中，货币究竟能否承载这一保障。一个年复一年未能通过该方程的县，已凭其自身经核验的数据证明，若无来自他处的永久性转移支付，货币制度便无法使其当地劳动居民处于七项资源成本之上。这正是本章开篇暂且搁置的那条道路的立论所在。Jasutopianism 并不要求依靠工资去购买这七项资源：第I条直接予以供给，而 Jasutopianism 以其自身措辞称为“资本主义的一种衍生形

式”(Rodriguez, 2021, Argument V) 的地位升级，则在该底线之上以不可转让、不可囤积的方式奖赏贡献。未能通过方程之县，正是以算术为那条道路立论之地。而非凭说服。

该方程在处于过渡期的 Jasutopian 国家内部还具有第二项操作用途。第6章在第1年至第3年间运行三级过渡清算架构[目标是在第1年实现至少90%的第1层级消费者非货币份额，并设定65%的失败底线，同时配合持续至第30个月的第2层级过渡清算信用]。在第一阶段期间[或在制宪前零阶段的各县试点期间]，只要任何国内工资仍以货币计价，公平薪酬门槛便直接约束该工资，并在立国之前通过普通法律颁行，或在过渡期间依据第XCVI条予以实施。

IX. 何种情形将证明本章有误

第7章将本卷的每一项主张均置于足以证伪它的条件检验之下。该章所陈述的五项预测在此不予修订；本章谨为其所论及的货币国家提出一项自身专属的条件。

关于工资底线的实证证据确凿存在，且分歧明显。一项针对快餐店的研究未发现任何迹象表明新泽西州提高最低工资减少了就业 (Card & Krueger, 1994)。一项针对美国各州138次最低工资上调的研究发现，在上调后的五年间，低薪岗位数量基本保持不变 (Cengiz et al., 2019)；而一份为英国政府撰写的国际证据综述则发现，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极为微弱 (Dube, 2019)。与此相对的是一项针对西雅图的研究，其中，在该市最低工资上调至最高13美元之后，低薪岗位的工作时数出现下降 (Jardim et al., 2022)，以及一份认定最低工资并非良好政策工具的综述 (Neumark & Wascher, 2008)。

上述研究均未检验过如公平薪酬线所能达到之高的工资底线。它们所衡量的底线相较于当地薪酬水平尚属温和；而本章的底线由生活成本决定，在贫困县中，它可能接近典型劳动者的薪酬水平。现有证据尚未触及如此境地，本章亦不佯称现有证据已覆盖于此。

因此，本项主张须附以明确条件。在特定的县中，若依据该县自身经核验的记录得出以下两项结果之一，本章的主张即告失败。其一：三部法律生效三年后，该县仍有超过二十分之一的劳动居民领取不公平

薪酬[法律未获执行，或无法执行]。其二：三部法律生效五年后，该县劳动年龄居民的就业比例较该县法律实施前五年的自身均值下降超过五个百分点，而全国的同一比例并未出现同等幅度的下降[该底线所摧毁的工作岗位多于其所修复的岗位]。

两项危险被明确指明并予以监测。若当地租金上涨以吸纳更高的工资，经核定的县公平薪酬线将在下一次年度宣告时自动上调，且县公平薪酬比率随之下降，从而在十二个月内警示住房供给压力；若雇主试图逃离高成本县，双锚规则3便干净利落地封堵一切捷径[依据义务1的反纸面迁址规则，现场工作仍绑定于实体工作场所所在县，而远程工作则遵循每位劳动者的居住地所在县，且不得按县划红线排斥]。任何企业均无法就此在纸面上规避该法规。

X. 总和与法律

在全部论述终结之际，本章提出一项主张：在一个全体薪酬超过全体所需的县，低于生活成本的薪酬便是一种选择，而选择是可以被定为非法的；方程找出这一条件成立的县，三项法律在成立之处施行，而国家则在不成立之处予以支付。特定的国家若保留自身货币，即可凭借其已有的制度实现这一切。这需要一个总和、一条线与一部法律。

收束本卷的是三章。第11章将该体系向外延伸，推及Jasutopianism命名为世界超国家联盟[S.U.W.]的国家联邦，第12章以增补方式弥合仍然存在的经济与政治权力缺口，而第13章则将整体整合为一。

参考文献（第10章）

Azar, J., Marinescu, I., & Steinbaum, M. (2022). Labor market concentration.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57*(S), S167-S199. https://doi.org/10.3368/jhr.monopsony.1218-9914R1

Card, D., & Krueger, A. B. (1994). Minimum wages and employ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fast-food industry in New Jersey and Pennsylvani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4), 772-793.

Cengiz, D., Dube, A., Lindner, A., & Zipperer, B. (2019). The effect of minimum wages on low-wage job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4*(3), 1405-1454. https://doi.org/10.1093/qje/qjz014

Dube, A. (2019). *Impacts of minimum wages: Re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HM Treasury.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impacts-of-minimum-wages-review-of-the-international-evidence

Hagenaars, A., de Vos, K., & Zaidi, A. (1994). *Poverty statistics in the late 1980s: Research based on micro data*.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Greenaway-McGrevy, R., & Phillips, P. C. B. (2023). The impact of upzoning on housing construction in Auckland.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36*, 103555.

Jardim, E., Long, M. C., Plotnick, R., van Inwegen, E., Vigdor, J., & Wething, H. (2022). Minimum-wage increases and low-wage 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Seattle.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14*(2), 263-314. https://doi.org/10.1257/pol.20180578

Neumark, D., & Wascher, W. L. (2008). *Minimum wages*. The MIT Press.

OECD. (2013). *OECD framework for statistic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income, consumption and wealth*. OECD Publishing.

OECD. (2015). *Transfer pricing documentation and country-by-country reporting, Action 13 - 2015 final report*. OECD Publishing. https://doi.org/10.1787/9789264241480-en

Rodriguez, J. (2021). *Jasutopianism*. [Self-published].

Roosevelt, F. D. (1933, June 16). *Statement on N.I.R.A.*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statement-nira

Smith, A. (1976).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R. H. Campbell, A. S. Skinner, & W. B. Todd, E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76)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n.d.). *Social Security and Medicare tax rates*. https://www.ssa.gov/oact/progdata/taxRates.html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25). *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s, 2024* [Data set]. https://www.bls.gov/cex/

U.S. Census Bureau. (2026).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5-year estimates, 2020-2024* [Data set]. https://data.census.gov/

第11章：S.U.W. 运行模型



I. 从承认到超国家架构

第9章解答了国内语言问题：凡使用人数超过公民总数十分之一的任何语言，均确立为官方语言 [承认门槛]。第10章为货币国家提供了县公平薪酬方程、双锚工资下限、雇主精算支付能力 M*，以及全国性的小型企业与劳动者过渡桥梁。第8章将环境合作置于全球和平三大支柱的交汇点，增补了第 CXVII 条至第 CXXIII 条以及消费与生物物理调整后国家份额 [Bi*]。连同就不俘虏原则作出阐明的第 CXXIV 条 [第4章]，整部宪法法典现已共计 124 条。

一个更为宏大的问题依然存在。一部涵盖 124 条的治理架构，如何超越单一国家的边界实现扩展？答案分两个联合阶段运行：首先是受三大立国原则约束、由不同国内制度组成的四领域邦联；随后，唯有在满足严格的全民一致合并条件 [第 VIII 节] 之后，方能形成论点 XVIII 所构想的统一行星政体。

Jasutopianism 直接宣告了这一目的地。论点 XVIII 明确规定了五个组建步骤、跨成员国的三总统选举、官方选举人、失信选举人制裁，

以及行星尺度的治理三权 (Rodriguez, 2021)。目的地已然绘就。运行路径却尚未勾勒。

欧洲一体化的历史揭示了路径为何至关重要。Haas (1958) 曾预言，技术性经济合作将稳步外溢为政治联邦 [煤钢联营催生共同市场，共同市场催生单一货币，单一货币催生统一政府]。欧洲正是沿着这条路径前行，却在政治联盟之前停滞不前，因为贸易讨价还价与共享中央银行从未在各成员国公众之间锻造出深厚的相互公民认同。本卷将 Jasutopianism 的第一性原则原生性地加以延展，并与 Haas (1958)、Moravcsik (1998) 及 Ostrom (2010b) 的研究相衔接，提出 文化优先一体化：跨境文化人文化居先，持久的经济与生态伙伴关系随后，制度协调位列第三，而政治联邦则将数十年间由下而上的公民相知所业已建构的成果加以正式化。外交予以追认。文化先行铺垫。

本章通过四个设有门槛的阶段，详细阐明这一运行模型。条约从不能凭空制造人类团结；条约只是将持续文化相遇所促成的政治可行性加以法典化。每个阶段均设有固定时限，以保持该论题的可证伪性：任何联盟若触及阶段时限而未能通过门槛，即记入公开档案，作为反驳文化优先一体化的证据 [第 IX 节]。

II. 论点 XVIII 的宣告内容

Jasutopianism 关于 S.U.W. 的愿景值得完整重述，这是因为本章所提出的运行模型必须对照其旨在抵达的目的地加以评估。

论点 XVIII 作出如下规定。特定的国家在联合国会议 [或所有国家均可出席的同等大会] 上提议组建一个超国家联盟，其中，该联盟相当于一个国家，而超国家联盟中的每个国家相对于超国家政府的国家级权力而言，均相当于州级权力。所有加入 S.U.W. 的国家在加入之时必须正式退出规模较小的联盟 [原书点名欧洲联盟“或其他国际联盟”]。超国家联盟将举行三总统选举，候选人出自选择以三人一组联合参选的成员国现任领导人。S.U.W. 内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将投票决定由哪一组三总统候选人任职。各国领导人将担任官方选举人，代表本国全体公民投出正式的一票。违背本国公民在普选中所作选择意愿的领导人，将被视为失信选举人。治理方式采用治理三权：即与国家层面相同的三权分立架构 [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 (Rodriguez, 2021)。

这一愿景在制度上是完整的。它明确了治理结构、选举机制、民主问责，以及国家权威与超国家权威之间的关系。它未曾指明的，则是事件的先后顺序、加入的先决条件、衡量准备程度的可量化标准，以及那些独立治理了数个世纪的国家何以逐渐视超国家联邦为值得追求之物的机制。该论点假定 S.U.W. 将会被提出。它并未说明这一提议要获得成功必须具备何种条件。

缺口正在于此。单一国家的宪法设计很少规定国家间一体化的运行机制。立足于第3章的比较证据、第4章的文化外交法典，以及涵盖 Haas、Moravcsik 与 Ostrom 的一体化研究，本章提供了一套可检验的理论，用以阐释主权公众为何会自愿跨境汇集权威。

III. 理论挑战：国家为何结成联邦

两种超国家一体化理论主导着政治学文献。两者皆能解释欧洲联盟。两者又皆未能解释一个国家联盟如何才能演变为论点 XVIII 所描绘的形态。

Haas (1958) 提出了新功能主义：该理论认为，特定部门的经济合作 [就欧洲而言即煤炭与钢铁] 会产生“外溢”效应，从而推动更深层次的政治一体化。某一领域的合作会催生相互依存关系，进而要求在相邻领域建立治理，而这又要求在那些领域开展合作，从而制造出进一步的相互依存。这一过程具有累积性与自我强化特征。经济一体化作为功能性后果催生政治一体化。

新功能主义解释了 1951 年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如何相继演化为 1957 年的欧洲经济共同体、1993 年的欧洲联盟以及 1999 年的欧元区。外溢机制在历史记录中清晰可见。煤钢合作要求制定共同贸易规则。共同贸易规则要求建立共同市场。共同市场要求实行共同货币政策。共同货币政策要求开展政治协调。每一个阶段皆源于前一阶段的功能性需求。

话虽如此，新功能主义并未解释这一进程为何陷入停滞。欧洲联盟已经实现了经济一体化、监管协调，并在其大多数成员国之间推行了单一货币。它尚未实现政治联邦。其共同外交政策仍停留在政府间层面且范围有限 [自 1993 年起实行，且在很大程度上须由各国政府一致同意

作出决定]。它也尚未实现世界超国家联盟所要求的文化一体化。第 I 节已经指明了原因：仅靠经济外溢不足以促成政治联邦。经济合作的功能性需求能够推动监管协调，却无法在不同民众之间催生出使更深层政治联合成为所愿之物的心理认同。德国人与希腊人共享同一种货币。他们却不共享同一种文化认同。外溢止步于文化开始之处。

Moravcsik (1998) 提出了自由政府间主义：该理论认为，欧洲一体化并非源于技术官僚式的外溢，而是源于由国家经济利益驱动的审慎国家间议价。当一体化符合本国利益时，各国政府便选择推进一体化；当不符合时，便予以抵制。这一进程既非累积性，亦非自我强化；它是阶段性间歇展开的，受制于牢牢掌控一体化节奏与范围的各国政府之间的讨价还价。

自由政府间主义对本章的模型构成了最为尖锐的挑战。如果严格受物质性国家利益支配的国家间议价决定了每一步一体化进程，那么文化优先一体化便可能力有不逮。领导人是在国家利害算计趋于一致时推进一体化，而非在公众欣赏外国音乐之时。这一质疑颇具分量。它要求给予直接的分析性回应。

Moravcsik 简明准确地把握了欧洲条约史。各国政府竭力议价、牢牢把握否决权，并在国内经济收益止步之处立刻停止一体化。然而，自由政府间主义将国内偏好视作先于外交形成的既定输入，因此只能解释议价在何处受阻，却无法解释公众偏好如何跨越世代发生转变。文化优先一体化补足了这一缺失的动态机制。立足于关于自下而上的公众舆论形成 (Kertzer & Zeitzoff, 2017) 与群体间同理心衰减 (Cikara, Bruneau, & Saxe, 2011; Decety, 2012; Batson, 2011) 的研究，持续的跨境文化人文化会重塑选民对本国行政当局的诉求，进而改变各国政府带往谈判桌的国内偏好排序。因果方向由此彻底逆转。在自由政府间主义中，精英先行议价，事后再请公众批准；而在文化优先一体化中，公众历经数十年建立情感熟悉感，随后由下而上地授权缔结正式条约。

历史外交提供的是有界而诚实的经验线索，而非确凿证明。文化交流从来不是孤立起效的万能杠杆，然而在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的诸多案例中，跨境人际接触均先于政治破冰而出现：地下西方音乐与艺术交流缓和了苏联青年在冷战时期的疏离感；2018 年 4 月韩国文化演出在平壤举行，数周后朝鲜半岛峰会随之召开 [这一时间顺序与上述机制

相符，但绝非因果关系的证明]；而在 1971 年名古屋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庄则栋与格伦·科恩之间自发的互赠礼物之举，正发生在北京发出正式邀请从而开启美中关系之前。两项当代局限则对过度推论构成了有力制约。在美国围绕 TikTok 展开的争议中 [专栏 5.1]，广大用户的深厚依恋推迟了执法进程，并在 2026 年 1 月重塑了剥离方案，却未能推翻最高法院 2025 年作出的法定裁决。在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数十年来共享的音乐与电影未能阻止一再爆发的边境冲突；2025 年 5 月对峙之后，印度当局指令流媒体服务下架巴基斯坦内容，表明未获宪制固化的开放一旦遭遇国家禁令冲击，便会何等迅速地瓦解。文化优先一体化严格建立在经核实的因果序列之上，同时将开放性锁定于宪法法律之中，使国家禁令无法将其骤然关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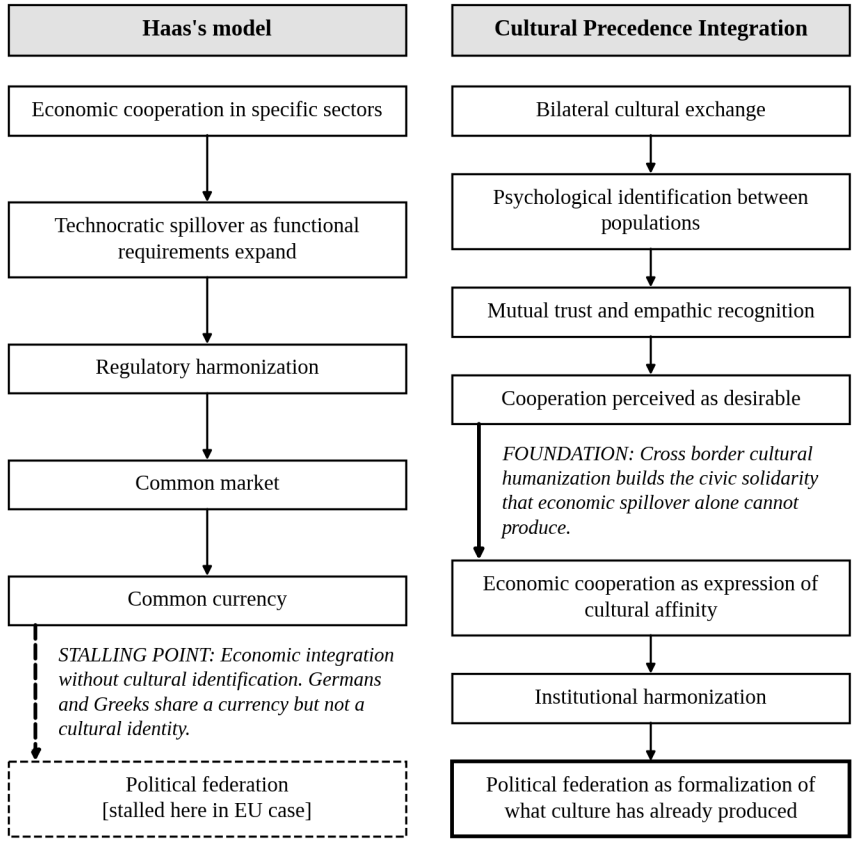


图 **11.1.** 新功能主义与文化优先一体化对比：两种一体化理论。新功能主义解释了 EU 如何建立共同市场。文化优先一体化解释了是什么使欧洲停滞于联邦之前：持续的跨境文化人文化是在条约缔结之前而非之后建构公众团结。

IV. 四阶段运行模型

通往 S.U.W. 的路径循四个阶段推进。每一阶段皆建立在前一阶段的文化与制度成就之上。跳过任一阶段必将付出欧洲所展示的代价：在危机中捉襟见肘、并止步于联邦门前的合作。退回前一阶段的通道始终敞开；当某一阶段被证明尚不成熟时，无须导致整体崩溃。该模型将文化优先一体化的四个阶段 [第8章] 转化为可核验的制度门槛。

这四个阶段分别为：

1. 文化一体化：通过双边与多边文化交流在不同民众之间催生心理认同

2. 经济合作：共享资源协议、联合基础设施项目以及相互兼容的经济结构

3. 制度协调：多中心治理协调，其中，伙伴国家发展出相互兼容 [而非完全相同] 的制度架构

4. 政治联邦：正式建立 S.U.W.，其初始形态为邦联，并在行星层面适用治理三权 [超国家三总统、由超国家参议院与超国家公民议院构成的立法权，以及超国家终极法院]

在国内尺度上，第6章的制宪前零阶段已经阐明，模块化地方试点、经审计的公民信任以及抽签制宪会议如何在立国表决之前为单一国家做好准备。文化铺垫与这些试点试验并行推进，遵循严格受真实性准则 [第4章] 约束的四个有机步骤：公民辨识其本就珍视的自由、生活与繁荣之核心价值；独立艺术家与思想者 [绝非国家部委] 自由表达这些愿景；市政试点与教育交流维系日常的熟悉感；选民最终批准一项感觉由自身赢得而非外来强加的改革。这一国内序列在国家转向双边伙伴之前，先在单一政体内部锚定了文化与治理传导路径。

这四个超国家阶段严格按序运行。欧洲跳过了第一阶段，在缺乏深厚文化同侪认同的情况下径直迈入共同市场与单一货币；财政危机使该联盟承受剧烈张力，并令政治联邦进程戛然而止。文化一体化建构跨境同理心，使经济合作在冲击之下依然保持稳定。经济合作创造互惠的物质利害关系，使制度协调具备现实可行性。制度协调在政治联邦之前核验宪法兼容性。每一步都将文化与治理传导路径由经核实的国内信任向外延展，直至由此形成持久的行星邦联。

Mark (2009) 指出，文化外交 [运用一国文化以支持其外交政策目标] 在增进一国与其他国家关系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远胜于其通常所展现的程度。本书依据不同做法对两国提出的要求，将此类工作可采取的形式划分为三种：文化投射 [单向展览与巡演]、文化交流 [双边项目] 与文化合作 [国家间联合项目]。本书主张，相较于文化投射，文化合作能够催生更深厚的相互认同，而这正是第4章文化外交条款背后的理据所在，这些条款强制规定双边互惠 [第 CVII 条]，而非单向文化广播。S.U.W. 路径正是始于第三种形式：各国投身于联合文化合作，不仅彼此交换文化产品，而且共同创造文化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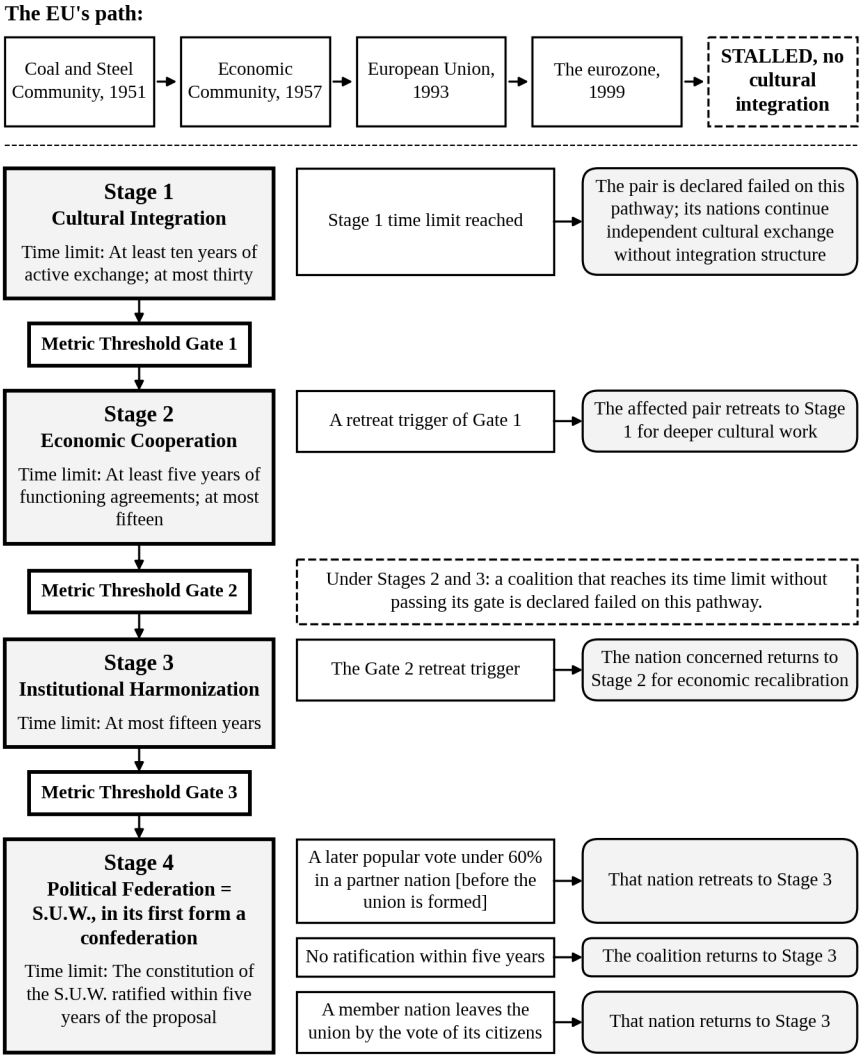


图 **11.2.** 通往 S.U.W. 的四阶段路径。四个阶段之间设有三道门槛，且每个阶段均设有时间限制与退出通道。S.U.W. 并非单向旅程。尚未做好准备的国家可退回前一阶段，而不必导致整个进程崩溃。



V. 第一阶段：文化一体化

文化一体化是整条路径的基石。它也是最为缓慢、最具内生有机性、且最难以人为加速的阶段。这是因为不同民众之间的文化认同无法按照政治时间表刻意制造。它必须历经数年、有时乃至数十年，通过持续接触对方民众的文化产品、传统、智识成就与日常生活，方能逐步涵养而成。

经同行评议的同理心心理学研究清晰阐明了这一机制。持续接触真实的外国音乐、电影、文学以及共享数字空间，能够激活情感与认知同理心通路 (Decety, 2012; Batson, 2011)，并弥合昔日疏离群体之间的群体间同理心鸿沟 (Cikara et al., 2011)。历经数年、在数百万普通公民中不断累积，这种反复发生的跨境文化人文化会自下而上地重塑基准性的社会同侪线索 (Kertzer & Zeitzoff, 2017)。由此形成的同侪认同既非外交辞令，亦非意识形态顺从；它是一种持久的公民承认，确认边境彼端的公民同样是共享可辨识人类利害的完全道德同侪。

S.U.W. 路径的第一阶段通过本卷第4章与第5章业已确立的法律与制度工具，将这一机制付诸运行。第 CIII 条至第 CIX 条 [文化外交] 规定了双边文化交流、经由文化交流委员会提供的制度支持、防止工具化的真实性准则，以及互惠要求。第 CX 条至第 CXVI 条 [数字文化互动]

将上述条款延伸至数字平台，确保文化交流既触及实体展览，也覆盖现代民众度过日常公民生活的数字空间。

欧盟委员会 (2016) 的国际文化关系战略提供了制度先例。EU 的三项原则 [互惠互利、尊重文化多样性与互补性] 恰好映射到 Jasutopian 制度之上：互惠互利对应于第 CVII 条的互惠要求；尊重文化多样性对应于第 CVII 条对文化投射的禁止 [映照，而非压制或取代他国文化]；互补性则对应于 Jasutopian 国家支持文化交流却不控制其内容的原则。《ASEAN 社会文化共同体 2025 蓝图》(ASEAN, 2016) 提供了非西方先例，它依托共识、不干涉与文化多元主义运行，而非 EU 的法条主义路径。S.U.W. 路径必须兼容这两种模式，这是因为一个要求所有国家采取同一种文化合作风格的超国家联盟，本身便已未能通过文化多样性的检验。

严格衡量跨境文化一体化，需要两项正式的量化工具，而非印象式的外交随笔。其一，文化消费指数追踪公民对伙伴国家文化作品的自愿消费，按年龄队列、媒介与双边国家对加以细分 [遵循 Jasutopianism 严格的逐城细分规则]，并采用 Alkire 与 Foster (2011) 的双重临界值法进行汇总，以确保局部的青年参与绝不会掩盖更广泛的停滞。第一道临界值在每个文化领域内部生效：当公民全年每月至少一次在某媒介中选择伙伴国家的创意作品时，即被计入该领域的活跃者。第二道临界值跨越不同领域生效：当公民在至少三个独立领域均达到门槛时，即被计入与伙伴国家存在文化互动者。其二，情感对等指数将双边公众好感度与全球对各该国的基准民意加以对照 [采用诸如皮尤全球态度调查等跨国调查系列，呼应 S.O.L.P.C.I.G. 的全球指数化逻辑]，以相对于世界中位数的正面态度百分点加以衡量。

当各伙伴国的民众达到了本章所称的“超国家文化饱和”状态时，第一阶段即告完成：该门槛标志着双边文化交流已产生充分的相互心理认同，使双方民众将彼此视为文化对等伙伴，而非外来异邦群体。这一门槛可通过文化消费指数与情感对等指数加以衡量，这两项指标针对每一对伙伴国在其整个文化交流周期内进行测度。它并非二元状态，而是一个连续光谱。晋升至第二阶段的指标门槛关口在该光谱上划定了一条界线。在双方各自的民众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全体公民，且在任何年龄段中均不少于十分之一的公民，与对方国家保持文化互动[至少涵盖

三个文化领域：音乐、电影、文学、数字媒体、饮食、学术交流等]，并且该项读数已连续五年得以维持。好感度不仅须处于高位，还须保持均衡：双方各有超过60%的民众对对方持正面评价，各自的读数均高于世界对该国评价的中位数，且两项读数之差在15个百分点以内。仅有对称性并不足够，因为两个对彼此同样冷淡的民众群体固然是对称的，却并非对等伙伴。

Ang、Isar与Mar (2015) 指出，文化外交必须超越其作为国家利益工具的传统框架而得到重新构想。真正的文化交流能够创造出“关系空间”，在此空间内，相互认同是在相遇与接触中自然生发的，而非经由战略宣传所塑造。S.U.W. 路径吸纳了这一洞见：第一阶段的成功标志在于文化互动已在各国民众之间孕育出真实的关系空间，而不在于各国政府签署了文化合作协定。协定只是制度脚手架，关系空间才是实质所在。

VI. 第二阶段：经济合作

经济合作建立在文化一体化所孕育的心理认同基础之上。其内在逻辑如下：将彼此视为文化对等伙伴的民众愿意支持某些经济安排，而将彼此视为外国竞争对手的民众则会对此类安排予以抵制。共享资源协定、联合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兼容的经济结构在政治上是否可行，取决于一项先决条件：各伙伴国的公民均将对方国家的公民视为值得合作的对象，而非构成威胁的群体。

Haas (1958) 的判断在一点上是正确的，即经济伙伴关系能够构建物质上的相互依存。他的失误在于将经济一体化置于公民认同之前。新功能主义在铸就民众团结之前便从煤钢联营起步；文化优先一体化则是在提议建立联合经济机构之前，先从跨境文化人文化着手。这一差异具有因果实质，而非表面修饰。在缺乏民众对等认同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共同货币与财政机制，在2010年至2015年欧元区危机期间出现裂痕，暴露出缺乏共同团结支撑的共同规则之脆弱。而在经过连续五年经核验的文化饱和之后建立起来的经济伙伴关系，在面对冲击时便已具备民众间的相互信任，这一论断将在第IX节所设定的十五年第二阶段门槛中接受公开检验。

对于走上 S.U.W. 路径的 Jasutopian 国家而言，第二阶段涉及与 Jasutopian 经济学相兼容的共享资源协定。这与贸易并非一回事。Jasutopian 国家自其过渡期第2年起即与任何有意愿的国家开展贸易[第6章]，实行企业对企业的交易，按照《Jasutopianism》论点II所述进行劳动与资源的交换，并通过国民身份记录系统予以登记，而此类贸易独立于上述四个阶段之外。在整个第一阶段的各个年份里，不持有货币的公民正是通过同样的交换方式，而非通过购买，得以接触外国文化作品[第4章解释了拨款、预算与外国订阅在地位等级经济中的含义]。第二阶段则是国家之间的合作，即在已经通过文化交流做好准备的伙伴之间达成共享资源协定并开展联合基础设施建设。Jasutopian 国家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运行，与货币国家开展经济合作需要一种接口机制。《Jasutopianism》对此已有直接论述：Jasutopian 国家可以充当世界的生产者，以换取本国公民完全免费使用伙伴国的产品与服务，或者为选择以资源作为支付方式的企业获取稳定的资源收入 (Rodriguez, 2021, 论点XVIII)。这一由伙伴各国通过条约商定的接口机制，构成了第二阶段的经济基础。Jasutopian 国家负责生产，伙伴国提供其产品与服务的使用权。整个交换围绕资源而非货币构建。Jasutopian 国家的地位升级制度确保国际合作的红利经由既有的治理架构加以分配，而非集中于私人手中。

联合基础设施项目是第二阶段的实践体现。第8章的环境合作条款[第CXVII条至第CXXIII条]为此提供了框架：共享可再生能源研究[第CXX条]、环境透明度[第CXVIII条]以及对共同环境挑战的合作治理[第CXIX条]。基础设施项目创造了 Haas 所描述的物质相互依存，但这种依存是在已由第一阶段完成文化铺垫的架构内生成的。此类相互依存为民众所期盼，而非仅仅出于容忍。

持续的跨境文化接触同时还检验着本卷所命名的制度熟悉假说这一经济学命题。公民对陌生的经济规则怀有戒心乃人之常情。然而，提升自身处境的人类驱动力在货币社会与非货币社会中是相通的；所不同的只是引导这一驱动力的制度机制。如果一个 Jasutopian 国家的创意作品与日常文化产出能够使邻国公众连续五年维持在第1道门槛的饱和水平，那么邻国公民便会在日常中频繁接触地位经济体系下的日常生活[学校、工坊、住房、经审计的公共记录等]。一旦熟悉的制度生活不再显得陌生异己，民众对双边经济试验的本能恐惧便会随之降低。

四项坦诚的限定条件将制度熟悉假说严格约束在合理边界之内。第一，它是本卷提出的原创性实证假说，而非业已证实的定律。第二，无人操纵其信息传播：依据第CIV条的真实性准则，艺术家仅以创作价值为依归进行创作，制度熟悉感因而成为未经编排的自然副产品。第三，它附带明确的证伪触发条件：凡伙伴国民众维持了第1道门槛的饱和水平，却未能于第IX节规定的第二阶段十五年期限内通过第2道门槛，则制度熟悉假说在该双边国家对上即告证伪。第四，熟悉感在双向维度上具有对称效应。依据第CVII条的严格互惠原则，Jasutopian 公民同样会在日常中同等程度地接触货币社会；倘若 Jasutopian 国内的各项指标[第6章]与预测[第7章]在实践中令人失望，那么双向透明反而会直接削弱而非助推此项 Jasutopian 改革。

Falkner (2016) 分析了《巴黎协定》如何追求“软互惠”，其中，先行者通过展示切实可行的政策绩效来激励对等国家提升雄心目标，同时他也警示，一旦履约不足，信任便会迅速瓦解。完成经审计的十年过渡期[第6章]的 Jasutopian 国家，恰恰在这一机制下发挥着实证先行国的作用。经过验证的国内治理实绩辅以第一阶段所积累的文化熟悉感，能够促成货币邻国自愿开展双边试验，而非诉诸政治强加。制度熟悉假说直接检验的，正是经核验的治理绩效叠加持续的文化开放，能否有效降低跨国界的制度阻力。

当各伙伴国已建立切实运转的经济合作协定、建成至少一项大型联合基础设施项目，并证明该项合作已为所有伙伴国民众带来了可衡量的福祉[对 Jasutopian 伙伴国通过 I.O. 与 D.P.P. 指标加以评估，对货币伙伴国则通过等效经济指标加以评估]时，第二阶段即告完成。

VII. 第三阶段：制度协调

制度协调是各伙伴国治理结构实现相互兼容的阶段。此处的关键词是“兼容”，而非“完全一致”。以邦联形态起步的 S.U.W. 并不要求每一个伙伴国都采纳 Jasutopian 制度，它所要求的是各伙伴国发展出能够在联邦化架构内彼此对接的治理结构。

Ostrom (2010b) 证明，在治理跨司法管辖区的集体行动问题时，多中心体系的表现优于单中心体系。多中心体系拥有多个在不同尺度上运行且相互重叠的决策中心，其中没有任何单一中心对其他中心享有绝

对权威。从核心而言，这正是 S.U.W. 所需要的治理架构。Jasutopian 制度在国家层面上本就具有多中心特征：治理三权将权力分配于立法、行政与司法职能之中，同时由公民议院提供直接民主参与。第三阶段将这种多中心性延伸至国际层面：多个各自契合本国文化语境的国家治理体系，借由共同原则与兼容的制度接口加以协调运作。

Linz与Stepan (1996) 界定了巩固的民主所须具备的五项条件：自由而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相对自主的政治社会、为公民自由提供法律保障的法治、可供新政府调遣的有效国家官僚体系，以及制度化的经济社会。这五项条件构成第三阶段的制度核查清单。无论具体政体形式如何，每个伙伴国均须证明其治理体系满足这五项条件。凡具备健全运转的公民社会、自主政治机构、法治、有效运作的官僚体系以及制度化经济安排的国家，其治理体系便能够在联邦化架构中与其他国家实现对接。凡欠缺上述任何一项条件的国家，则在迈向政治联邦之前均须进行进一步的制度建设。

制度协调并不要求所有国家都采纳三总统或公民议院[未设公民议院的国家通过下文所述的等效直接公民投票机构形成其授权指令]。它所要求的是所有国家采纳尊重三大立国原则[自由、生活与繁荣]的治理结构，并将其作为联邦共同的宪法根基。一国可以实行议会制、总统制或任何其他民主形式，只要该制度以符合 Jasutopianism 对相关概念之界定的方式保障自由、维系生活并促成繁荣即可。三大立国原则是接口标准，具体的治理实施方式则属于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专属权能。第9章的承认学说属于该接口标准的一部分，这是因为由多民族汇聚而成的联邦首先必然是多语种的；一个压制本国公民语言的伙伴国，无法在任何实质意义上将其公民派往超国家公民议院，且下文所述的邦联委派代表所携带的授权指令也会有一部分民众根本无从阅读。因此，每个成员国须在本国境内适用第9章规定的承认门槛[第3道门槛的一项条件]，并履行第9章向母语未达该门槛的每一位公民所作的保障[以该公民能够理解的语言提供法律文本、选票及基本公共服务]，而联盟亦须以每一成员国的全部官方语言颁布联盟法律以及交付公民表决的授权指令。

Bookchin (2015) 提出了以邦联主义作为自治共同体联邦的治理模式：各自治市通过携带大会授权指令的委任代表组成联邦，而非通过行使独立判断的代议代表。Bookchin 对委任代表与代议代表的区分，构

成了 S.U.W. 治理接口的设计原则。在国家层面，公民议院为立法提供直接民主参与。在超国家层面，S.U.W. 通过邦联委派机制运作：每一项授权指令均由一国公民在其公民议院或等效直接公民投票机构中通过直接投票形成；委任代表将这些授权指令携至超国家公民议院；且委任代表仅如实转达公民的投票结果，不掺杂任何个人判断。由此，各成员国公民皆可直接就联盟事务进行表决，这与《Jasutopianism》为民主超国家联盟所命名的全球公民议院相契合 (Rodriguez, 2021, 论点XVI)，而委任代表仅负责传递表决结果。这一安排确保了超国家权力始终对各成员国公民负责，而非向脱离所代表民众的超国家政客阶层负责。

Mansbridge (1980) 记录了直接民主治理的优势与局限。她针对佛蒙特州城镇会议与合作社工作场所的民族志研究表明，直接民主虽能带来高度合法性与公民参与，但亦伴随时间成本，且可能为非正式权力层级所主导。S.U.W. 必须正视这些研究发现。邦联委派机制并不能消除时间成本。每一项授权指令皆源自一次直接投票，而每一次直接投票都要耗费公民的时间；委派机制为公民省去的只是奔波往返与现场集会，而非决策本身。这一成本反而须借由联盟的管辖范围加以限定：联盟事务严格局限于四个领域[第VIII节对此有具体列举]，从而使公民仅在任何单一国家均无法独自治理的事项上才被召集参与超国家表决。非正式权力层级问题也仅能借由制度设计得到部分应对：超国家层面的治理三权[超国家三总统、由超国家参议院与超国家公民议院组成的立法权、超国家终极法院]提供了结构性制衡，以防止任何非正式权力层级攫取整个联邦，但这些制衡无法触及在授权指令接受辩论的各个场合所形成的层级结构，此类层级在每个成员国内仍是一项持续存在的风险。

DeNardis (2014) 论证指出，互联网治理乃是地缘政治博弈的场域，其中关于基础设施的技术决策[域名系统、加密标准、路由协议]在本质上即是政治决策。第三阶段必须将互联网治理纳入制度协调的范畴。倘若底层技术基础设施在网络层面纵容监控，而治理结构却在政治层面强制要求透明，联邦化的 S.U.W. 便无法运转。第CX条至第CXVI条[数字文化互动]提供了国家层面的相关规定。第三阶段将这些规定延伸至超国家层面：各伙伴国就互联网治理达成兼容的技术标准，并切实尊重第5章所确立的算法透明、数据主权与数字文化互惠原则。

当各伙伴国在 Linz与Stepan 提出的五项条件上实现治理兼容、在各自宪法中保障三大立国原则、在本国境内适用第9章的承认门槛、建立用于超国家决策的邦联委派机制，并在至少三个治理领域[例如环境治理、数字治理与文化交流治理]实现制度协调时，第三阶段即告完成。该项评估不由任何外部机构执行，而是由各伙伴国公民在其本国公民议院或等效直接公民投票机构中，就加入 S.U.W. 成员资格举行直接全民公投加以裁定，相关数据则由各国自身的审计机构核验[在 Jasutopian 国家中即第6章规定的指标审计委员会]。

VIII. 第四阶段：政治联邦

政治联邦即 S.U.W. 本身。它是论点XVIII所宣告之联盟的正式确立，而本书依次赋予该联盟两种形态。它起步于一个由不同制度组成的邦联，在三大立国原则的指引下管辖四个领域。此后，在满足下文所述条件的情况下，它可能演变为论点XVIII所描绘的单一国家。本阶段以其终极归宿命名，且本章凡提及“联邦”之处，均指该联盟当时所处的任一形态。

组建程序将《Jasutopianism》中的五个步骤加以调适，使之契合第一阶段至第三阶段所确立的各项先决条件：

步骤I：某一伙伴国在所有第三阶段国家均出席的大会上提议正式成立 S.U.W.。该提议并非谈判，而是正式确认。文化一体化[第一阶段]、经济合作[第二阶段]与制度协调[第三阶段]业已铸就了联邦的实质内容，该提议只是将既已建成的成果予以正式确立。受理该提议的大会通过 S.U.W. 宪法，且各国须在举行任何选举之前依照本国法定程序批准该宪法[Jasutopian 国家以条约形式予以批准，须在第3道门槛的全民公投之后经立法权三分之二多数同意]。批准程序须自提议之日起五年内完成，否则该伙伴联盟将退回第三阶段。

步骤II：举行超国家联盟三总统选举。合资格候选人从选择以三人组合参选的各成员国领导人中产生。这一安排保留了《Jasutopianism》的设计：超国家层面的行政权与国家层面的行政权相互呼应。

步骤III：各成员国公民为其所选的三总统候选组合投票，各国的普选票将分别计票。各国领导人充当官方选举人，代表本国全体公民投出一张正式选票。Jasutopian 国家拥有三位权力平等的领导人，其正式选票由该国三总统共同投出；其他政体的国家则通过其国家元首投出选票。凡自身作为候选人的领导人不得行使该投票权，而应由副三总统或该国宪政顺位中的下一位公职人员代为投出。

步骤IV。违背本国公民在全民公投中所作选择意志的领导人，将被认定为失信选举人。偏离本国全民公投结果的正式投票均属无效，并由全民公投结果取而代之。S.U.W.宪法就此确立了正式的惩罚措施。《Jasutopianism》未对具体惩罚作出规定 [“此后某个时间点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制定正式的超国家法律与惩罚措施” (Rodriguez, 2021, 第XVIII论证)]。《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则明确规定：失信选举人须依违纪国本国宪法规定的途径接受弹劾 [在Jasutopian国家中，须经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票决启动审理程序，或经法院批准的公民请愿]，在一个完整的三总统任期内被排除出超国家选举程序，并受到超国家参议院的正式谴责。这些惩罚措施旨在维护民主廉洁性，同时避免动摇联邦稳定。

步骤V。其治理方式是在超国家层面施行治理三权：实行两院制的立法权 [由各成员国代表组成的超国家参议院，以及与之并列的、由各国公民议院或同等直接投票机构委派邦联代表组成的超国家公民议院]、须满足3/3确认要求的超国家三总统，以及依据三大立国原则裁定一致性的超国家终极法院。既有区域联盟 [欧盟、ASEAN、非洲联盟等] 的成员资格遵循 分级区域集团成员资格与年度主权退出选择权，而非在加入时仓促退出：

1. 四领域邦联阶段。加入国在整个邦联阶段均保留其在既有区域联盟中的完整成员资格。管辖权界限遵循权限不重叠议定书：S.U.W.法律严格在其列举的四个领域 [行星环境管护、数字基础设施、文化交流协调与共享安全] 内行使权威，而区域联盟则保留对关税、货币区及区域贸易的完整权限。凡在上述四个列举领域内发生明确冲突时，经超国家终极法院裁决，以S.U.W.法律为准。

2. 年度主权退出征询。在成员国获准加入S.U.W.邦联后的每个周年纪念日，超国家参议院均会递交一份正式的主权退出请求，邀请该国

权衡是否退出其规模较小的区域联盟。成员国每年均享有绝对的、免于惩罚的主权权利，可答复“是”或“否” [通过本国宪法程序或公民议院投票决定]。答复“否”不会触发任何惩罚、不会导致任何投票权中止，亦不会造成S.U.W.成员地位的任何减损。

3. 单一制合并强制条款。唯有当联盟启动下文第VIII节的两部分合并条款 [每个成员国均采纳国内Jasutopian法典，并以超过70%的全民公投赞成率批准单一制合并] 之时，正式退出所有规模较小的区域联盟方在法律上成为强制性义务。

Held (1995) 主张建立世界主义民主制，即一种将民主原则延伸至民族国家之外以应对跨界议题的治理体系。S.U.W.正是世界主义民主制的一种形态，但它具备Held的倡议所欠缺的具体制度架构。Held指明了需求，Jasutopianism则提供了结构。S.U.W.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世界政府 [即向从属国强加政策的单一中央集权机构]。它始于异质制度的邦联：各成员国保留其原有的治理结构、文化认同与内部政策自主权。在三大立国原则之下，联盟仅管辖四个领域而不涉足其他领域，这些均为任何单一国家无法独自治理的领域：行星环境管护 [参照第8章条款的模式]、数字基础设施治理 [参照第5章条款的模式]、文化交流协调 [参照第4章条款的模式]，以及三大支柱的共享安全架构。在这些领域内，联盟自主立法：上述各章的条款系以Jasutopian国家的制度为前提，它们为联盟提供范本，但不对采用其他体制的成员国构成约束。

随着成员国范围扩大，第四领域亦随之演进。第8章的三大支柱守护拥核双边组合之间的和平；而在所有其他国家组合之间，和平则依托第二支柱 [情感文化威慑与跨境文化人文化] 与第三支柱 [结构性治理改革]。一旦拥核国家共同加入联盟，第一支柱 [相互确保摧毁] 便在它们之间永久退场，这是因为共享共同安全机构的联邦伙伴不再是依靠恐怖平衡维系距离的武装对手。第二支柱与第三支柱将据此延续邦联的和平。

邦联是联盟的初始形态，但未必是最终形态。第XVIII论证描述了一种“相当于一个伟大国家”的联盟 (Rodriguez, 2021)，而本书则指明了邦联演变为这样一个国家的条件。该条件包含两部分，缺一不可。首先，每个成员国均已通过本国公民投票自主采纳Jasutopian制度 [法律条款、无货币的地位等级经济、治理三权]。随后，每个成员国的公民依

照关口3的门槛投票决定合并 [每个国家的赞成率均超过70%]。在两部分条件同时达成之前，联盟仅管辖上述四个领域而不涉足其他领域。退出权仅属于邦联阶段。Jasutopianism不为任何州或领地提供脱离Jasutopian国家的途径，因此一旦联盟合并为一个国家，其成员便永久归属该国，且合并公投的选票必须对此予以明示。

O'Donnell、Schmitter与Whitehead (1986) 确立了一项结论：当治理转型属于“契约式”转型时便能取得成功，即既有掌权者与改革力量在博弈开始前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先行确立博弈规则。S.U.W.的组建进程正是作为行星层面的契约式转型而设计的。第一阶段至第三阶段通过文化与制度手段完成了契约式转型中谈判所承担的工作。第四阶段即是该契约本身。迈入第四阶段的国家，已经过数十年的文化一体化、经济合作与制度协调，就S.U.W.将采用的原则、指标与治理结构达成了共识。联盟的组建并非凭信而行之举，而是对业经验证的兼容性的正式制度化。

两根结构性支柱在世代更迭中维系着S.U.W.的稳固。其一是宪法固守机制：仿照第CII条 [锁定第I条至第CII条] 与第CXXIII条 [锁定第CIII条至第CXXIV条，仅受制于第7章狭义的操作性替代规则]，S.U.W.宪法锁定自身文本以防遭删改，同时允许经由超国家立法程序增补条文。其二是制度惯性：Pierson (2000) 记录了自我强化的政治安排如何产生递增收益，从而随时间推移不断壮大捍卫该制度的选民群体，这正是同理心与制度反馈循环所追踪的轨迹。与二者并立的是问责与同理心之桥 [第2章]，它在衰败累积成疾之前便发出制度漂移预警，从而维系一种动态平衡，其中，国家能力与公民监督持续相互制衡 (Acemoglu & Robinson, 2019)。

Capra与Luisi (2014) 指出，可持续系统必须是自创生的，即通过自身运作实现自我创造与自我维持，而非依赖外部强制执行。S.U.W.必须满足这一标准。任何依赖单一国家、单一领导人或单一代际方能存续的超国家治理体系都不是永久的，而是脆弱的。持久性架构要求S.U.W.的制度设计使其存续直接源于自身的结构性特质：邦联代表授权的民主问责机制确保联邦服务于其民众；三大立国原则提供了无论何人执政均能约束治理权力的宪法基础；指标阈值关口则提供了使联邦得以评估自身绩效的自我评估工具。

IX. 先决条件、里程碑与退回架构

四阶段模型并非单向自动扶梯。它是一条设有关口的路径，而各道关口均附有条件。

每一道指标阈值关口均规定了晋级下一阶段前必须满足的先决条件。每一道关口同时也规定了触发退回至前一阶段的条件。退回并非失败，而是承认晋级的先决条件尚未具备，需要在前一阶段开展进一步工作。失败则是另一回事，模型对此作出明确界定：每个阶段均设有时间限制，凡触及该时限却仍未能通过相应关口的路径，即告失败。退回架构对于S.U.W.模型而言，与晋级路径同等重要。一个无法退回的超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只能走向崩溃的体系。

若要求不断扩大的联盟内每一对双边组合都必须达到完全双边饱和，将会造成指数级瓶颈：一旦成员规模超出小型创始集团，$n(n-1)\div 2$ 对双边组合的数量便会激增至难以驾驭的程度。为在不牺牲文化凝聚力的前提下防止数学层面的瘫痪，关口1实行两级绝对多数加入规则：

1. 种子联盟 **[n ≤ 5个国家]**。由五个或更少国家组成的创始联盟保留全体双边组合一致通过关口1的标准，以确保初始核心在具备完备相互文化凝聚力的状态下进入第二阶段。

2. 扩展联盟 **[n > 5个国家]**。一旦活跃联盟成员超过五个国家，候选国须同时满足三项累计标准方可通过关口1进入第二阶段：第一，绝对多数饱和与均势，即与至少70%的现有联盟成员国达到关口1的全部阈值 [文化消费指数在至少三个领域连续五年总体达到至少25%且每个年龄群组达到至少10%，好感度高于60%且超过全球中位数，双边对称性偏差不超过15个百分点]；第二，与其余30%或更少比例的联盟成员国满足普遍非敌对底线　[零现行武装冲突或外交冲突，好感度达到或高于45%且主动反感度低于30%，以及依据第CIII条至第CIX条订立的双边文化交流条约持续生效至少五年]；第三，遵守加入后趋同条款，要求候选国在联盟跨越关口3之前 [或在进入第二阶段后十年内] 与至少90%的联盟成员国达到关口1的完全饱和，其中，若任一双边组合触及25个百分点分歧或好感度低于50%的触发线，退回机制严格仅适用于该候选国。

联盟整体集体通过关口2与关口3，而退回机制则严格仅针对经审计数据跌破关口基准线的特定国家或双边组合，从而使状态良好的成员国得以不受干扰地继续推进。

关口**1**：文化一体化 → 经济合作

晋级先决条件：

种子联盟 [n ≤ 5]：全体双边组合达到完全超国家文化饱和度 [文化消费指数在 ≥ 3个领域连续5年总体 ≥ 25%且每个年龄群组 ≥ 10%]，好感度 > 60%且高于世界中位数 [情感均势指数]，双边对称性偏差在15个百分点以内，以及依据第CIII条至第CIX条 [或等效的国内保障机制] 开展满十年的积极文化交流

扩展联盟 [n > 5]：候选国与 ≥ 70%的现有成员国达到完全关口1饱和与均势，与其余 ≤ 30%的成员国满足普遍非敌对底线 [零现行冲突，好感度 ≥ 45%，反感度 < 30%，现行双边文化条约生效 ≥ 5年]，并受加入后趋同条款约束 [在关口3之前或进入第二阶段后10年内达到 ≥ 90%的完全关口1饱和]

退回触发条件：若在第二阶段的任何时点，两项读数分歧超过25个百分点，或任一方民众的好感度连续两个年度读数低于50%，或文化消费指数连续两年跌破饱和标准，受影响的双边组合 [或在扩展联盟机制下该特定候选国] 即退回第一阶段重新开展文化工作，而其他成员国维持其所处阶段。

时间限制：第一阶段积极交流三十年。

关口**2**：经济合作 → 制度协调

晋级先决条件：

至少完成一项大型联合基础设施项目并投入运营

伙伴国之间的共享资源协议正常运行至少五年

伙伴Jasutopian国家的I.O. [创新机遇] 指标相对于合作开始前记录的基准线未出现下降

每个伙伴国的人均D.P.P. [国内产品生产] 或货币制伙伴国的等效指标均高于合作开始前记录的基准线 [完成第二阶段的可衡量收益]

每个Jasutopian伙伴国的公民议院投票率达到或高于30% [第6章的第5年门槛]

退回触发条件：若某一伙伴国的I.O.跌至合作开始前记录的基准线以下，或D.P.P.连续四个季度萎缩，该国将从第三阶段退回第二阶段以进行经济重新校准，而联盟其他成员国维持其所处阶段。

时间限制：第二阶段十五年。

关口**3**：制度协调 → 政治联邦

晋级先决条件：

所有伙伴国均满足Linz与Stepan (1996) 提出的巩固民主五项条件

邦联代表授权机制在特定政策领域 [环境治理、数字治理、文化交流]历经至少三轮超国家决策检验

每个伙伴国就加入S.U.W.举行直接全民公投，且赞成率超过70%

经联合运作评估验证，至少在三个治理领域实现制度协调

每个伙伴国的宪法均对三大立国原则 [自由、生活与繁荣] 作出保障

每个伙伴国在其本国境内落实第9章的承认门槛

退回触发条件（适用于联盟正式成立之前）：若某一伙伴国随后就继续参与S.U.W.路径举行的全民公投赞成率低于60%，该国将退回第三阶段以进行制度修订与新一轮民主协商，而其他成员国维持其所处阶段。

时间限制：第三阶段十五年。

第四阶段：政治联邦

时间限制：联盟内所有国家须在提议提出后五年内批准S.U.W.宪法 [第VIII节步骤I]，否则联盟整体退回第三阶段。

退出联盟：联邦成立后，关口3的退回触发条件不再适用，成员国可通过其当初加入时所用的同一机制，即本国公民的直接投票，退出联盟。退出须获得多数赞成，并须在首次投票至少两年后经第二次投票予以确认。退出即意味着退回第三阶段：该国保留其文化、经济与制度协议，且可再次经由关口3重新加入。

时间限制赋予了超国家主张一项第7章对每一项经验主张所要求的要素：明确的证伪结果。任何双边组合或联盟若在未通过其关口的情况下触及阶段时限，即告在该路径上失败；这一结果无须任何部长级官员自行承认，因为各国的独立审计机构 [在Jasutopian国家内即指标审计委员会] 会公开发布每个阶段的累计耗时年数 [计入任何退回之前已累计的年数]。伙伴国继续作为独立国家维持正常的双边关系，而失败的路径则进入不利于文化优先一体化的经验记录。倘若绝大多数尝试路径均在未能通过关口的情况下超时，超国家论题即在经验层面遭到驳倒。第7章检验国内可行性；这些时间限制则检验超国家一体化。

Measure	Stage 1: Cultural Integration [Gate 1: Seed n ≤ 5; Scaling n > 5]	Stage 2: Economic Cooperation [Gate 2]
Supranational Cultural Saturation & Supermajority Accession	Seed [n ≤ 5]: all pairs ≥ 25% total & ≥ 10% per age cohort across ≥ 3 domains for 5 yrs. Scaling [n > 5]: ≥ 70% full saturation + Universal Non Hostility Floor [≥ 45% fav, < 30% unfav, 5 yr treaties] + ≥ 90% convergence by Gate 3 [or 10 yrs].	
Favorable opinion, with the Sentiment Parity Index	Above 60% in each population and above the world's median; the two readings within 15 percentage points. Retreat of the pair: a gap beyond 25 points, or a reading under 50% two consecutive years.	
I.O. [Innovative Opportunity]		Not below its baseline before cooperation [Jasutopian partners]. Return of the nation to Stage 2: I.O. below that baseline.
D.P.P. [Domestic Product Production] per citizen		Above its baseline before cooperation [a monetary partner: its equivalent indicator]. Return of the nation to Stage 2: four consecutive quarters of contraction.
Chamber of Citizens voting rate		At or above 30% in each Jasutopian partner.
Joint infrastructure and shared resource agreements		One joint infrastructure project in operation; shared resource agreements functioning five years.
Time in stage	At least ten years and at most thirty.	At most fifteen years.

Measure	Stage 3: Institutional Harmonization [Gate 3]	Stage 4: Political Federation
Popular vote on S.U.W. membership	Above 70% in each partner nation. Retreat of a nation to Stage 3: a later vote under 60%.	A member nation leaves by a majority vote of its citizens, confirmed by a second vote no sooner than two years later; it returns to Stage 3.
Linz and Stepan conditions	The five conditions met in each partner nation.	
Three Founding Principles and Recognition Threshold	The Three Founding Principles guaranteed in each constitution; the Recognition Threshold applied.	
Confederal Delegation Operational Test	Three rounds of confederal delegation completed.	
Harmonized governance domains	Harmonization in three governance domains.	
Time in stage	At most fifteen years.	Constitution ratified within five years of the proposal, or the coalition returns to Stage 3.

Stage 1 Stage 2 Stage 3 Stage 4 No threshold at this stage

图 **11.3.** 先决条件矩阵：分阶段指标。每一道关口均设有明示阈值、退回触发条件与时间限制。S.U.W.路径的设计使得过早晋级在结构上绝无可能，且退回机制始终可供启用。

各项里程碑的设计秉持审慎原则。S.U.W.并非一项可在十年内建成的工程。仅文化一体化阶段便至少需要十年，而从第一阶段通往第四阶段的完整路径很可能跨越数十年。历史证据印证了这一时间表。欧盟从欧洲煤钢共同体演进至当前形态历时半个世纪，迄今仍未实现政治联邦。北欧模式在达到当前的社会凝聚力水平之前，亦历经数十年的制度建设 (Christiansen et al., 2006)。S.U.W.路径不承诺速度，而承诺持久性。建立在数十年文化一体化、历经检验的经济合作与获得核验的制度兼容性之上的超国家联盟，才是旨在长存的联盟。未经文化准备而由政府谈判缔结的联盟正是欧盟：它行之有效、富有裨益、颇具价值，但在结构上却无法从经济与制度协调迈向真正的政治联邦。



X. 永久性超国家架构

Jasutopianism 宣告了三大立国原则。《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以十一章的篇幅表明，为服务于这些原则而构建的制度能够得到拓展、植根于证据、具备可证伪性、应用于 Jasutopianism 未曾涵盖的领域，并在超越单一国家的尺度上投入运作。这些原则本身系宣告确立的，无论检验显示何种结果，它们皆始终成立。

S.U.W. 是最大的尺度。在其初始形态下，它在四个领域内、在所有已加入其中的国家之间，将三大立国原则与治理三权延伸至国家之上。在其后期形态下，倘若每一个成员国均如此选择，它便是将 Jasutopian 治理应用于地球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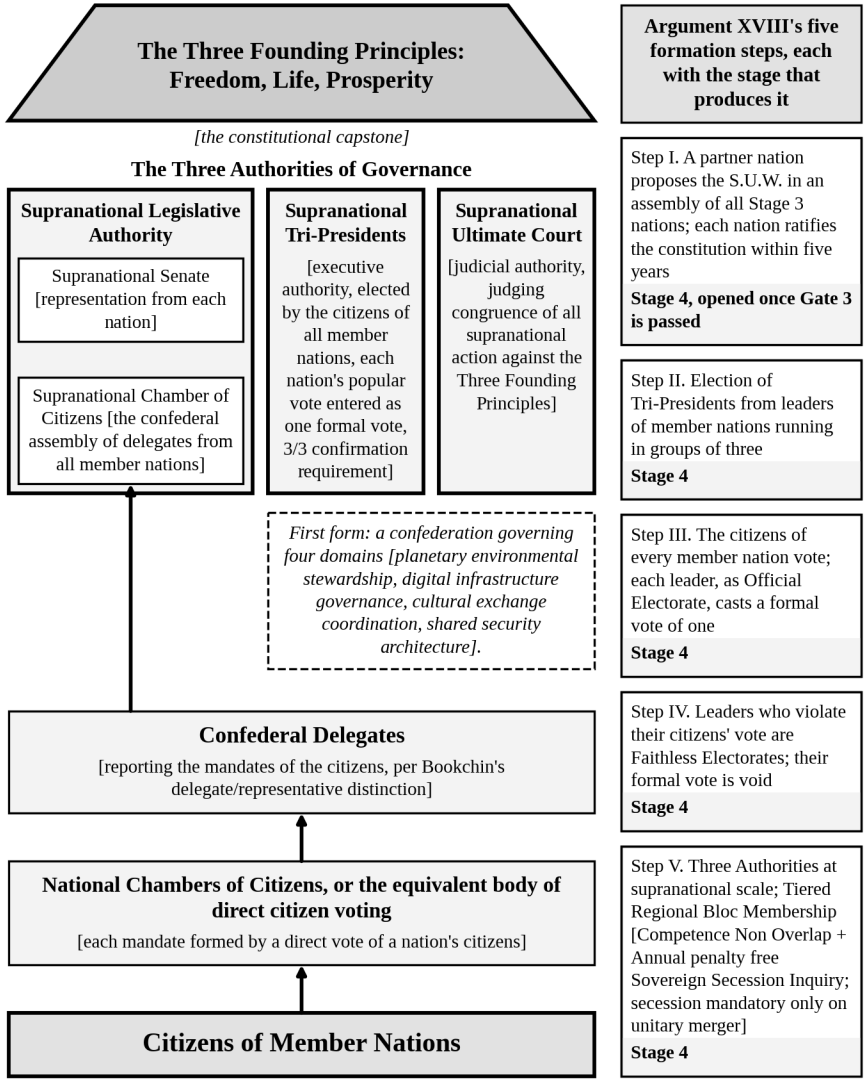


图 **11.4.** S.U.W. 治理架构。民主问责从公民自下而上经由代表传导至超国家公民议院。治理三权在超国家层面的运作方式与在国家层面相同。三大立国原则约束每一层面的一切治理。

该架构在设计上旨在永久存续。永久存续的是这一架构本身，而在联盟尚为邦联期间，任何国家在其中的成员资格皆非永久：届时，成员国可经由其本国公民的投票退出 [第IX节]，而其退出后的联盟依然如故。持久性架构要求该制度通过自身的结构属性实现自我维系，而非依靠外部强制力或任何单一世代的意志。邦联委派机制确保超国家权力持续向各国民众负责。指标阈值关卡确保联邦持续评估自身绩效。三大立国原则确保宪法根基无法被临时政治多数通过修宪予以废除。退出通道确保倘若联邦的前提条件遭到侵蚀，回退之路始终敞开。

S.U.W. 并非最终答案。没有任何治理制度是最终答案。三大立国原则正是调适机制：随着新挑战涌现，随着新领域需要治理，随着新的人口群体加入联邦，原则恒定不变，而制度的表现形式则随之调适。Jasutopianism 曾如此宣告：三大立国原则是目的；制度乃其工具。

接下来还有两章。第一章以增补方式弥合仍然存在的经济与政治权力缺口；最后一章将本书所构建的一切 [哲学拓展、经验证据、新法律条款、延长过渡期、证伪条件、环境整合、超国家架构] 汇集为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问题已不再是 Jasutopianism 能否得到改进。《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的十一章已经对其加以改进。问题在于，就其当前形态而言，这一完整的制度体系是否构成一项严肃的治理方案，能够供政治学界予以探讨、检验、批评与评估。

第13章列明了读者回答这一问题所需的内容。

参考文献（第11章）

Acemoglu, D., & Robinson, J. A. (2019). *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 Penguin Press.

Alkire, S., & Foster, J. (2011). 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5*(7-8), 476-487.

Ang, I., Isar, Y. R., & Mar, P. (2015). Cultural diplomacy: Beyo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21*(4), 365-381.

ASEAN. (2016). *ASEAN socio-cultural community blueprint 2025*. ASEAN Secretariat.

Batson, C. D. (2011). *Altruism in huma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okchin, M. (2015). *The next revolution: Popular assemblies and the promise of direct democracy* (D. Bookchin & B. Taylor, Eds.). Verso.

Capra, F., & Luisi, P. L. (2014). *The systems view of life: A unifying vis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ristiansen, N. F., Petersen, K., Edling, N., & Haave, P. (Eds.). (2006). *The Nordic model of welfare: A historical reappraisal*. Museum Tusculanum Press.

Cikara, M., Bruneau, E. G., & Saxe, R. R. (2011). Us and them: Intergroup failures of empathy.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3), 149-153.

Decety, J. (Ed.). (2012). *Empathy: From bench to bedside*. MIT Press.

DeNardis, L. (2014). *The global war for internet governa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European Commission. (2016). *Towards an EU strategy for international cultural relations*. JOIN(2016) 29 final. 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

Falkner, R. (2016). The Paris Agreement and the new logic of international climate polit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 92*(5), 1107-1125.

Haas, E. B. (1958). *The uniting of Europ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 1950-1957*.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eld, D. (1995). *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 From the modern state to cosmopolitan governan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Kertzer, J. D., & Zeitzoff, T. (2017). A bottom up theory of public opinion about foreign polic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1*(3), 543-558.

Linz, J. J., & Stepan, A.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Mansbridge, J. (1980). *Beyond adversary democracy*. Basic Books.

Mark, S. (2009). *A greater role for cultural diplomacy* (Discussion Papers in Diplomacy No. 114).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ingendael'.

Moravcsik, A. (1998). *The choice for Europe: Social purpose and state power from Messina to Maastricht*.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O'Donnell, G., Schmitter, P. C., & Whitehead, L. (Eds.). (1986).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4 vol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Ostrom, E. (2010b). Polycentric systems for coping with collective action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4), 550-557.

Pierson, P. (2000).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4*(2), 251-267.

Rodriguez, J. (2021). *Jasutopianism*. [Self-published].

第12章：以增补方式弥合经济与政治权力缺口

第11章将这一制度向外推进至世界超国家联盟，并使法典停留在一百二十四条法律条款。仍有两类缺口存在，而且都不属于第1章所列的十项缺口。

第一类是经济缺口。Jasutopianism对现有资源及可能需要的资源进行实时普查(Rodriguez, 2021, 论点VIII)，依据每种资源的必要性与其经清点的丰裕度对其估值[论点I]，并规定其企业在全国贸易日以资源换取资源[第XC条]；然而，2021年的文本并未说明：当第6章的过渡清算信用在第30个月衰减殆尽之后，这一普查以何种频率、何种形式送达特定的企业所有者，在该日期仍然滞后的部门如何被带过这一节点，以及在一个以经核实的产出评定工作的制度中，高风险的工作如何获得回报。

第二类涉及权力。三总统的3/3表决[第XIX条]使行政权不落入任何单一之手，但一次拒绝仍可能使电网陷入黑暗、使分配过期失效、使法案被搁置。一个让每位公民就每项法案投票的议院，所要求的聆听超出了特定的公民所能付出的程度。一个记录每一笔交易的记录系统，若落入不当之手，便会显示每位公民的所作所为；而负责分派资源的官员，如同发布据以评判该制度之数据的机构一样，会把影响力吸引到自己身上；此外，一个退出联盟的小国也可能担心其协议会因退出而被终止。

本章以增补方式弥合这两类缺口。十一条法律条款加入法典[第CXXV条至第CXXXV条]，其中没有任何一条废止、改写或削弱先前的条款：地位升级仍是非货币性的，三总统保留第XIX条的3/3表决，公民议院保留《治理三权条款》所定的门槛，记录系统保留2021年条款赋予它的每一项职能，过渡清算信用仍在第30个月衰减。这些条款大体以四种方式发挥作用：通过无人持有的信号[第CXXV条与第CXXVI条]，通过仅在未能作出决定之处才启动的默认规则[第CXXVIII条]，通过分开保存的记录[第CXXX条与第CXXXI条]，以及通过其利益与粉饰性数据相悖的机构[第CXXXII条与第CXXXIII条]。

每一条款都载明据以评判它的读数以及它失败的条件，如同第6章与第7章的每一项机制那样。十一条中的最后一条将增补规则作为法律写入法典。

I. 经济架构

以下条款编号为第CXXV条至第CXXXV条，接续第4章的澄清性第CXXIV条。这些条款以Jasutopianism的宪法语体起草，其中前三条在不使用任何货币的情况下把稀缺性传达给企业所有者，把滞后的部门带过第30个月，并奖励那些在成功之前屡遭失败的研究。

第**CXXV**条 生产调度瞬时信号。

[兹此宣告] 第LXXXV条至第LXXXIX条所规定的记录系统应每日为每个州或领地发布企业之间相互交易的每种原材料与加工材料[其中包括能源载体]的三项读数，作为Jasutopianism论点VIII所描述的实时普查[即对现有资源及可能需要的资源的普查]。第一项读数是清点数Y，即论点I所清点的此类资源的丰裕或短缺[第A.VI节：一个经清点的数值，以尽可能高的准确度清点，此后通过记录所有交易、出口与进口保持更新]，其中，特定的材料g在州或领地s于第t日的清点数，等于前一日的清点数加上并减去当日所记录的流动：

$$\mathbf{Y(g,\,s,\,t) = Y(g,\,s,\,t-1) + In(g,\,s,\,t) - Out(g,\,s,\,t)}$$

In计算第t日记录为流入s的每一单位g[在当地新勘测或新生产的、进口的，或从另一个州或领地接收的]，Out计算记录为从该地流出的每一单位[被耗用的、出口的，或发往另一个州或领地的]，二者均以实物单位计。第二项读数是所寻求之物。每家企业应在国家政府档案中，于第XC条已要求其登记的交易对方旁边，登记其在下一个全国贸易日所寻求的种类与数量，该读数即为该州或领地内这些登记的总和。第三项读数是价值。拥有调整资源与加工商品价值之权力的参议院[《治理三权条款》第I条第XVII款]，应依论点I的规定，以法律确定图G，将特定的州或领地内某种材料的必要性X与其在当地的清点数Y联系起来；每个州或领地内每种材料的价值即为其图示价值，并依每日的清点数重新读取：

$$\mathbf{V(g,\,s,\,t) = G(X(g,\,s),\,Y(g,\,s,\,t))}$$

所寻求之物从不进入价值。论点I依据一种资源对于维护社会的必要性与其经清点的丰裕度来估值，而绝不依据特定的企业想要多少；发布第二项读数，是为了让每家企业看到何处缺乏某种资源，并把交易引向那里，正如论点VIII所意图的那样。

这些读数只是信号。仅此而已。任何企业和任何公民都不持有、不花费、也不以之出价，因为Jasutopianism禁止一切电子货币[论点I第A.XI节]，而且每日的读数取代前一日的读数。企业之间的贸易仍是按最新公布的价值以资源换取资源。每一笔这样的贸易都在第XC条的全国贸易日作为一笔交易达成并记录，同样两家企业之间的交易不超过四笔，每个交易对方都须事先在国家政府档案中登记。一笔交易可以为其后的若干日排定交付计划；每一次交付都作为该笔交易的履行予以记录，不单独算作一笔交易，从而使企业“按需每日”交易资源(Rodriguez, 2021，社会组织条款，商业，II)，而任何企业都无法通过把一笔贸易拆分为多笔来获得积分[即论点I第A.X节赋予第XC条的目的]。参议院依其对词语含义所享有的最终发言权，以这种方式将两段文本合并解读[《治理三权条款》第I条第XXVII款]。

论点II规定州政府与国家政府每三个月[或法律所定的期限]向每家企业发放的材料奖励，应从记录系统中读取，而不得取自任何官员的估计。每家企业所获奖励的材料，是其经核实的采用量在上一期限内所耗用的材料[即记录系统已记录的单位数x(g)]，并在法律为其层级所定的限度内，按其依第LIV条所得的排名以及其对国家的必要程度予以上调或下调；处于第一个期限的企业，取用其地位等级依主权生产资本配置所解锁的部分[第3章]。该奖励是在该期限内取用的权利。它随期限届满而失效，任何企业都不得将其作为储存或余额结转。凡某种材料在某一州或领地内短缺[即该地所寻求之物高于清点数]，该材料的奖励按以下顺序满足：首先是供应第I条所定必需品的用途，其次按企业所制造之物的必要性X，在两者相当时则按下文所定义的配置效率评分。

记录系统应在每项价值旁边发布一单位该材料在第CXXI条基于消费的账户中所承载的足迹b(g)[碳、养分、土地与水]，使特定的工程师在重新设计某一流程时，能在其稀缺性旁看到其生态成本。每家企业应获得一项配置效率评分，该评分应列入据以解读第LIV条排名的客观经验数据之中：

A(e) = [Σj X(j) × U(j) ÷ Σg V(g) × x(g)] ÷ e所在企业层级中同一比率的中位数

其中，U(j)是公民与企业在一年中对其产出j经核实的采用量，x(g)是其所耗用的投入品g的单位数[记录系统已就每件成品记录这些数据，论点I第A.XI节]；原材料与加工材料分开核算，正如论点I第A.VIII节将这两类分开，直至法律将其合并为止。参议院应逐类完成这一合并：一旦指标审计委员会核实记录系统已就某一类加工材料记录了制造每一件所用的平均工作时间与原材料[即第A.VIII节所指明的两项衡量]，该类中每种加工材料的必要性X即依法律所定的规则从这些已记录的衡量中推导得出，不再逐种材料分别标定[第A.V节]。该评分不改变第LIV条与第LXX条的任何积分制度。指标审计委员会应每年逐个部门[部门指第LVI条的一个企业层级，或参议院依第LVIII条指定的一组层级]读取在贸易日所寻求而未获满足部分的中位份额与交货期的中位数，各自与该部门最后一个完整的货币年度相比较；若第30个月之后连续两次年度读数中任一中位数高出该基线四分之一以上，那么，本条即未通过其检验，该失败依第7章第IX节处理。

立法理由。 Ludwig von Mises (1920/1935)与Friedrich Hayek (1945)认为，没有任何计划者能够汇集市场价格所承载的关于地方稀缺性的分散知识，而Oskar Lange (1936, 1937)则以一个通过试错修正价格的中央委员会作答。他们的争论针对的是计划者。Jasutopianism并不在生产之上设置计划者：其企业属于公民并在自由市场中交易[政府并不控制全部生产资料]，企业执照是在法定限度内取用国家资源的权利，而不是这些资源的储存[第3章]，论点I赋予每种资源一个价值，论点VIII承诺进行显示何处缺乏资源的实时普查。2021年的文本把两件事留给法律。第一件是这一普查以何种频率、何种形式送达企业所有者；第二件是如何在两位想要同一种稀缺材料的持照所有者之间作出区分[第3章]。本条回答第一件，并为第二件给法律提供一个衡量标准。所有者每日按州或领地读取清点数、所寻求之物、价值与足迹；效率评分列入第LIV条事先确定的排名之中；没有任何委员会修正价格，因为价值是从清点数与排名中读取的，绝不来自出价。尽管如此，人们所想要的仍在引导这一经济，其途径有三条，而这三条都不是价值。企业通过与公民的交易赚取积分，因此公民所采用之物决定哪些企业得以上升[《社会组织条款》]；材料奖励追随这一经核实的采用量，而绝不追随预测；所寻求

之物每日与清点数并列公布。企业无法通过多耗用来扩大其奖励，因为只有进入被采用之物的材料才会再次获得奖励。对于在企业之间流转的无数加工品，一旦其类别完成合并，每一项价值都从已记录的工作与已记录的材料中推导得出，正如货币型国家的大型企业早已按计划、按核算成本在其自有工厂之间调拨零部件，而工厂之间并无市场(Coase, 1937)。交付每日进行。唯有计数的交易须等待贸易日。足迹位于价值之旁而绝不在价值之内，因为一个Jasutopian国家把行星边界当作界限而不是价格来权衡[第8章]。Hayek的反对意见在部分程度上仍然成立[清点能够为已记录之物估值，却无法发现无人想到去寻求之物]，因此本条只主张较窄的收益，并载明足以驳倒它的读数。这是因为稀缺信号无需货币来承载，只需在资源仍以资源形式易手之际公布的清点数。话虽如此，过渡清算信用仍在第30个月衰减，此后没有任何企业持有任何可以花费之物。

第**CXXVI**条 影子运行与部门缓冲账簿。

[兹此进一步宣告] 自过渡期第18个月至第30个月，第CXXV条的信号应在第6章的过渡清算信用旁边发布，但不结算任何交易，指标审计委员会应每月为每个部门k发布其履约偏差：

$$\mathbf{F(k,\,t) = \max[O(k,\,t) \div O(k,\,0),\; L(k,\,t) \div L(k,\,0)] - 1}$$

O为此前三十日内所寻求而未获满足的份额，L为同期的平均交货期，下标0表示该部门最后一个完整的货币年度。每一过渡清算信用在第30个月的衰减完全按照第6章的规定保持不变。若F(k)在第27个月超过四分之一，那么，该部门的部门缓冲账簿于第30个月开启。国家政府应通过其三种正式途径中的第一种[论点II：与外国及外国企业谈判]，以交换而绝不以购买的方式，经由第3级的对外贸易接口及其主权清算账户和论点II的分支商业伙伴关系，取得部门k所缺乏的材料，一如第6章所规定。所取得之物进入公共仓库。依本条的常设拨款[《治理三权条款》第II条第VI款]从该仓库提取，并通过指标审计委员会所核实的实物资源配置时间表[第6章]授予该部门的企业，正如论点II规定州政府与国家政府按层级、按层级内的表现以及按每家企业对国家的必要程度以材料奖励企业那样。没有任何企业为此出价。也没有任何企业以此为抵持有余额。记录系统将每一单位所取得之物与每一单位所授予之物记入该账簿，该账簿始终向委员会公开；如此取得的任何物品都不经过家庭

账户，因此第6章围绕第3级设立的隔离得以维持[外国货币永不进入零售流通]。当F(k)连续九十日保持在十分之一或以下时，该账簿关闭。若某一账簿开启的部门在十二个月内未能回到十分之一，本条即未通过其检验。

立法理由。 一个让整个经济在同一天达成的期限，会招致当天的冻结。影子运行提供十二个月，其中，新信号将在旧清算旁边接受观察，然后才有任何交易依赖于它们；账簿只处理滞后的部门，使第30个月的衰减对所有部门保持不变。国家弥补短缺的方式，正是论点II一向要求的方式：在第3级保持开放的那些年份里，以本国的劳动与服务同更广阔的世界交换。没有任何东西被提前储存。在这一制度中，执照是取用资源的权利而非资源的储存[第3章]，账簿记录流经之物而不保留任何东西，论点II劝告国家节省的储备资源保持不动，任何货币都不进入本国自身的贸易。四分之一与十分之一这两条界线属于本卷自身，是事先选定的，并非取自任何研究，正如30%的投票门槛一样。

第**CXXVII**条 探索特许。

[兹此宣告] 立法权应每年以法律在主权生产资本配置之外并在其之上拨出不少于该配置百分之三的资源，用于高风险研究的探索特许；地位等级依主权生产资本配置所解锁的任何部分均不得被抽调用于这些特许。特许是第4章所赋予该词意义上的资助：一种材料、实验室、仪器与工作时数的分配，其中，工作时数作为劳动计算，并如一切劳动那样获得积分[第XI条]。半数特许以二次方背书授予，其中，每位公民和每位注册专家每年可在法律规定的一个年度上限之内给予背书，每个国民ID一个上限，对同一项特许的n次背书按n^2计入该上限[以使广泛的信念胜过小圈子的强度]。另一半特许由从该领域注册专家中抽签产生的技术评审团授予，每六个月更换一个新的评审团。在特许之下的工作，无论特许成功或失败，都按持有人职位层级的全额费率获得积分。持有特许的企业，就该项工作被视为已完成其交易配额[论点VI]，失败的特许不降低第LIV条规定的任何排名，唯一条件是须在九十日内公开发布一份完整且可复现的失败报告。每份经核实的失败报告为其作者赢得一笔固定的信用，该信用如同论点VIII的信用那样转化为通往地位等级的积分，而突破性成果则保留第3章的稀缺性加权地位乘数。指标审计委

员会应每年公布已结束的特许中产生已发表成果或已发布失败报告者所占的份额；若该份额连续三年低于一半，本条即未通过其检验。

立法理由。 一个依经核实的产出评定工作的制度会奖励稳妥的步子，而在成功之前失败九次的那一步，直到最后一次之前看起来都像是浪费。没有任何守法公民可以被降级[第XXXVII条]；依2021年的规则，高风险工作可能付出的代价是：在配额未完成时积分速度放慢，以及企业排名降低，而本条在特许期限内消除这两者。Pierre Azoulay、Joshua Graff Zivin与Gustavo Manso (2011)把资助允许早期失败并奖励长期成功的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研究者，与由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以短审查周期资助的同类科学家加以比较；前一组产出高影响力论文的比率要高得多，正如Manso (2011)关于激励创新的模型所预测的那样。两条途径依循Steven Lalley与E. Glen Weyl (2018)以及Vitalik Buterin、Zoë Hitzig与E. Glen Weyl (2019)；国民ID提供二次方背书所需的“一人一个上限”规则。

II. 政治权力架构

七条条款处理该制度自身的机构可能造成的权力集中，从三总统之间的僵局直至一个国家退出联盟。

第**CXXVIII**条 连续性默认规则。

[兹此宣告]《治理三权条款》第XIX条与第IV条第VIII款按原文继续有效，其中，每项行政决定均须三总统以3/3表决作出；下列默认规则仅在未能作出此类决定之处适用：

1. 民事保护。 针对电网故障、流行病、自然灾害或灾难性环境事件，常设民事保护议定书应在和平时期作为普通法律经由治理三权的每一层级通过，并由指标审计委员会每年审计。若在事件发生后六小时内[缓慢发生的事件为七十二小时]未能作出3/3决定，那么，相应的议定书即在其所指定的文官机构之下生效，不享有超出其自身文本的任何权力。议定书绝不依第XVI条宣布国家危机，绝不推迟任何法院的审理，绝不援引第XVII条或第XVIII条，也绝不调动军事力量[《治理三权条款》第IV条第IX款至第XI

款]。任何3/3决定一经作出即予取代，事件结束时议定书即告失效。

2. 行政。 若年度资源分配在其法定期限届满十四日后仍无3/3决定，上一年度的分配即按实物平价作为依法常设拨款[第II条第VI款]继续执行，直至作出决定为止。若某项法定任命没有此类决定，在任官员留任至继任者就职为止，第IV条第XIII款的临时委任仍可使用。

3. 法案。 否决仍须3/3表决。公民议院已通过的法案，若在十日内既未获得3/3签署也未遭3/3否决，即视同已签署而移送司法权机关，正如依《美国宪法》第I条第7款法案未经签署即成为法律一样，而《治理三权条款》正是取材于该宪法。

投下阻止某项决定之唯一一票的三总统，应在二十四小时内发布一份署名的说明，阐明其理由。该票不附带任何处罚。免职仍循2021年文本所写的第I条第IX款与第IV条第XV款的途径，其中，参议院以三分之二票数开启审判，公民请愿经法院批准亦可开启审判。依本条采取的每项默认规则，均在第7章的僵局指标中计为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的决定。

立法理由。 一致同意可防止行政权被一人攫取，其已知的代价是预测三已在衡量的僵局。这些默认规则消除僵局可能造成的损害[黑暗的电网、过期失效的分配、被挟持的法案，等等]，同时不使任何一位三总统在任何决定上少于完整的一票。损害既已消除，便无可惩罚，这就是本条不对异议票附加任何罢免机制的原因：由阻止票触发的罢免，会让两位三总统提出第三位必须拒绝的措施，然后罢免第三位，而这恰恰是一致同意所要防止的攫取。军事力量完全仍处于2021年条款所写的3/3规则之下。把每项默认规则计为一次僵局，可使预测三的检验保持诚实，因为一个在暗处修补其僵局的设计永远不可能通不过该检验。

第**CXXIX**条 公民审议陪审团。

[兹此宣告] 公民议院的例行表决每年应在不少于四个表决时间进行，由法律提前一年确定，因为Jasutopianism规定公民“在排定的表决时间”投票(Rodriguez, 2021, 论点XVI)；不能等待的法案[依第XVI条处理国家危机的法案、源自公民全国民主商业委员会表决且须在第LXVIII

条规定的三十日内裁决的法案，或参议院以三分之二票数宣告为紧急的法案]提交至特别表决时间；并且在每一个例行表决时间之前，应如同抽选指标审计委员会那样，从公民全国人口普查中抽签产生一个由三百名公民组成的陪审团，按州或领地、年龄、地位等级区间与教育程度保持均衡。其服务将作为工作予以记录，并按第XI条的要求获得积分。陪审团以抽签分为每组不少于二十四人的小组，该表决时间的每项法案交由一个小组，该小组与专家、受影响最大的公民以及持异议者举行听证[每项法案不少于三日，且不超过四周]。陪审团以签发选票所用的每一种语言[第9章]，在每项法案的选票上附上三项内容：一份由该小组撰写、不超过两页的声明，说明该法案的取舍、其按第CXXV条价值计算的实物成本及其对少数群体的影响；全体陪审团在每位成员都读过该声明之后赞成与反对的比例；以及支撑这两者的听证时数。在特别表决时间提交的法案，在该法案所允许的时间内，由当时在任的陪审团中的一个小组听证；国家危机法案不设陪审团。陪审团不作任何决定；唯有公民议院的表决依《治理三权条款》所定的门槛通过或否决该法案。任何公民不得同时在两个以抽签产生的机构中任职，指标审计委员会应每年公布在每个此类机构中任职的公民人数及其付出的时数。该委员会应每年以匿名抽样衡量选民对提交给他们的法案主要条款了解多少；若在首个陪审团设立五年后，阅读了该声明的选民并未表现出比未阅读者更多的了解，本条即未通过其检验。

立法理由。 一个让每位公民可就每项法案投票的议院需要大量的关注，而特定的公民无法聆听每项法案的证人。陪审团替所有人进行聆听，再把决定交还出去。每个表决时间只设一个陪审团，使负担保持在较小的程度：每年四个陪审团共有一千二百名公民就座，而若一个每年通过一百五十项法案的立法机构为每项法案都设一个陪审团，则需四万五千名公民就座。俄勒冈州的Citizens' Initiative Review自2010年起即如此运作：一个随机选出的小组撰写一份声明，由该州印入官方选民手册；在一项实验中，阅读该声明改变了选民对议题的了解及其投票意向(Gastil et al., 2018)。小组的规模与俄勒冈州的相当，因为声明最好由少数人撰写。陪审团的规模更大，因为除非询问过数百人，否则赞成与反对的比例意义不大；而同时按多项特征保持均衡的抽签，仍可让每一位公民获得公平的被抽中机会(Flanigan et al., 2021)。固定的表决时间把公

民的注意力集中在一年中的少数几天。陪审团增添一种声音。它不剔除任何声音。

第**CXXX**条 不可关联凭证。

[兹此宣告] 国民ID应以盲签发方式，为四个领域分别签发凭证，每个领域由其各自的保管人保管：公民议院的投票[由依第LXIII条承办投票系统的独立公共公司保管]；记录系统中的资源、地位等级与工作记录[按论点VIII所述方式保管]；第CXII条的合格数字交易[由文化交流委员会保管]；以及指标审计委员会的调查[由该委员会保管]。在每个领域内，公民以一个由其本人卡片密钥、领域与期间所导出的化名出现：

$$\mathbf{N = H(k,\ 领域,\ 期间)}$$

没有该密钥，任何保管人都不能把一个领域的化名与另一个领域关联起来。记录系统保留2021年条款赋予它的每一项职能：每笔交易时的国民ID与面部扫描、每次转移的记录、积分的计入、资源的实时普查、第LXXXVIII条的红色警示、论点VIII对不明收益与损失的追踪、依第XC条对交易对方的登记，以及第II条第VI款的报表与账目。其记录保持完整；唯一被关闭的是官员对化名背后之人的查看，而各项自动职能无需此种查看即可运行。一张选票携带两个作废标识，一个对应该法案，一个对应该年度，使任何公民都不能就同一法案投票两次，而指标审计委员会仍能计算第6章的投票率。更为妥当的投票制度的四个投票档案按2021年文本的规定保持不变[投票者的公开名单、依公民全国人口普查剔除虚假选票，以及公民对本人选票的自行核查]；本条所关闭的，是公民的选票与该公民在其他三个领域中的记录之间的关联。一笔合格数字交易携带一个对应该平台与三十日周期的作废标识。一项调查携带一个在各轮调查中保持不变的化名，正如第6年与第9年的检验所要求的那样，且该化名绝不关联受访者的选票或文化消费。保管人应从其记录中剔除网络位置与时间信息，而在投票站投票的方式继续保留。

立法理由。 一部记录每位公民每笔交易的账簿，若落入不当之手，便是对每个人生活的普查。2021年的设计需要这部账簿[积分、欺诈侦测与资源估值都以之为依据]，因此本条保持账簿完整，并把可以阅读它的人与它所描述的人分开。第3章在爱沙尼亚的设计中发现，分开保存、无任何单一行为者掌握全部的记录，既能抵御故障，也能抵御

滥用，并留下了一个开放的问题：一个地位等级经济能否同样保存其自身的记录；四个保管人便是本卷的回答。这种保护在凭证层面是真实的，也仅止于此：网络位置、时间信息以及在家中受胁迫的选民，仍可能泄露凭证所隐藏的东西，这就是保管人剔除前两者、而2021年的投票站为第三者保留的原因。

第**CXXXI**条 门限令状与封存档案。

[兹此宣告] 在第CXXX条的自动职能之外，把记录系统的化名与某个人关联，须有一份以五份密钥份额中的三份签署的令状，其中，终极法院或下级法院法官的份额始终是三份之一[第XXIII条]，其余两份来自由十二名公民组成、以抽签产生的隐私陪审团、指标审计委员会、调查机关，以及从持照律师中抽签产生的公民隐私辩护人。每份令状在签发时即以其指纹记入一份只可追加的公开令状透明日志，并在其案件结案时或在十二个月内全文记入，以较早者为准。点名超过一百人的请求一律驳回，该企图亦记入日志。记录系统的任何记录都绝不销毁[第LXXXVIII条与第II条第VI款]；超过七年的可识别记录转入封存档案，仅凭同样的令状方可开启，而化名副本则不受时间限制地向指标审计委员会开放，以使第5年、第10年、第20年与第25年的数据始终能够复现。

立法理由。 第XXIII条已规定搜查前须有法官的令状。一份需要由向不同主体负责的机构所持有的三把密钥的令状，不可能由其中任何一方秘密签署，而公开日志则使搜查的规模为每位公民所见。一百与七这两个数字属于本卷自身。以封存取代销毁，可保留2021年条款所要求的记录，以及本卷所依赖的衡量。

第**CXXXII**条 红队与开放可复现性。

[兹此宣告] 应如同抽选指标审计委员会那样，从公民全国人口普查中抽签产生一个红队，任期一届三年，独立于治理三权；其公民成员挑选其技术成员，其唯一职责是检验并设法驳倒官方指标、合格数字交易的评分以及第CXXV条的信号，这项工作作为已记录的劳动获得积分。在每一次第5年关卡、每一次第10年表决、依第CXXI条就国家份额作出的每一项执行决定，以及依第7章第IX节进行的每一次审查之前九十日，指标审计委员会应公布该数据的完整源代码，以及在差分隐私下

发布的微观数据(Dwork et al., 2006)。委员会的统计人员、其来自国外的观察员以及红队，在委员会监督下于保密记录上精确复现官方数据；任何公民或大学都可在其噪声的公布范围之内复现该数据。本法典所规定的每一次抽签[指标审计委员会、第CXXVII条的技术评审团、第CXXIX条与第CXXXI条的陪审团、红队以及第CXXXIII条的小组]，均依一项公开的程序，以抽签前即已确定的一个公开随机值进行；红队与委员会来自国外的观察员精确复现每一次抽签，任何公民都可以对照其本人的国民身份核验同一程序。公布的义务仅属于委员会。延迟公布可使其所服务的表决推迟不超过九十日，且绝不使任何触发条件、关卡或审查归于无效。

立法理由。 第5章已经提到的Charles Goodhart的警告，在数字成为目标之处皆然。因发现错误而受奖励的团队，是唯一一个利益与粉饰性数据相悖的机构。精确复现将由那些可以查看保密记录的人完成，因为隐私噪声正是保护公民的东西；其他所有人则在其范围之内核查该数据。让表决等待公布，而不是随公布一同落空，就关上了一扇门，使扣留的文件无法借此取消一次问责。

第**CXXXIII**条 生产资本分配者的轮换与冷却期。

[兹此宣告] 编制主权生产资本配置拨款的官员[第3章第III B节]、编制论点II分派给企业之材料奖励的官员、第3级主权清算账户及主权清算中介机构的官员[第5章与第6章]、第CXXVII条的技术评审团，以及发布第CXXV条信号的官员，在任何单一周期内更替不得超过三分之一；生产资本的申请凡其性质允许者，提交时均不得载明企业名称，并在提交后分派给以抽签产生的小组；任何人在离开此类职务后五年内，不得获得与其曾经分配资本的企业或部门相关联的地位等级信用。公民全国民主商业委员会完全按照第LV条至第LXX条的规定保持不变，其选举仍按第LV条至第LVII条及第XCII条的规定进行。

立法理由。 影响力聚集于资源分派之处。在两部书中，这些是立法权的拨款，以及州政府与国家政府给予企业的材料奖励[论点II]，而自本卷起，还有本卷所增设的信号与特许；该委员会监管企业而不分配任何东西，因此规则跟随分配，而不触动该委员会的选举。

第**CXXXIV**条 超国家联盟中的退出连续性。

[兹此宣告] 当任何国家经其公民的两次表决[第11章第IX节]退出世界超国家联盟的邦联时，该国保留其与本国的文化、经济与制度协议，正如第11章就回归第三阶段所规定的那样；在退出后不少于三十六个月内，本国不得因该国退出而终止、中止或不予续签其中任何一项协议[依论点II进行的劳动与资源交换、第二阶段的联合基础设施项目、第CXVIII条的环境数据、第CXX条的共享研究、第CXIII条的开放获取，以及第CIX条所保护的文化交流]；本国出席联盟制宪大会的代表团应为每个成员国提议同样的保障。联盟内部的表决规则仍由该大会决定。

立法理由。 一个小国在门口所担心的强制，首先是经济与文化上的，其次才是选举上的。第11章已使退出的国家保留其协议。它未曾言明的是，成员国事后能否以终止这些协议来惩罚退出；承诺不因此原因终止其中任何一项，便拿走了这一杠杆，而不必为整个联盟决定第13章留给联盟自身创立者的表决规则。双重多数还会给人口最多的国家以阻挡性的分量，这与所寻求的保护恰恰相反。

III. 增补规则

一条条款锁定其前的十条，并连同它们锁定增补规则。

第**CXXXV**条 永久文本与增补规则。

[兹此宣告] 编号为第CXXV条至第CXXXV条的任何法律条款，在通过后均永远不得删除或在文字上修改，从而延伸第CII条与第CXXIII条的永久文本锁定；编号为第CXXV条或其后的任何条款，均不得被解读或适用为废止、改写或削弱编号为第I条至第CXXIV条的任何条款、《治理三权条款》或《社会组织条款》；出现冲突之处，以较早的文本为准，由司法权机关在其一致性判断中予以认定，并与第XCI条及第LXV条相符，唯有一种情形除外：依第7章宪法替代议定书的全部五项条件通过的操作性替代条款，可以中止或修改一项在连续两个周期内始终处于被证伪状态的经济、行政或程序机制的操作性执行，但绝不触及其文本，也绝不触及任何不可克减的条款，因为三大立国原则高于每一项法律条款[《社会组织条款》，法治，I]；凡解释、校准或替代较早条款的条款，均应以编号指明该条款并引述其所涉及的词语，司法权机关

应保存并公布现行法典，其中，每一项条款均以其完整的原始文本列出，其后依次列出涉及该条款的每一项较晚条款，并载明各自的日期与表决票数；第CXXV条至第CXXXIV条的每一项机制，均载有其自身文本所述的指标与失败条件，由指标审计委员会读取，并首先以增补校准处理，在连续两个周期失败之后，再依第7章的宪法替代议定书处理。第CXXXV条本身永远不可克减。

立法理由。 法典此前的每一层都以一道锁定作结，而新法只能增补的规则迄今仅是一项方法上的声明；在此写成法律之后，它约束法典的每一位读者，包括法院在内。一项未附检验即被增设的机制，将成为一个要求接受检验之制度中唯一未经检验的部分。一部法典中若有两条优先规则，将使每一个解读它的法院无所适从，因此本条只保留一条。在两项条款之间，以较早者为准。三大立国原则高于每一项条款，而对于经核实的数据两度表明其运作与这些原则相悖的机制，第7章的议定书是这些原则据以作用其上的唯一通道。任何读者都不会在不见其沿革的情况下读到一项条款，因为现行法典把较晚的文本印在较早的文本之下，而每一项较晚的条款都指明其所涉及的词语。

IV. 十一条条款所增补的内容

总而言之，本章的缺口仅以增补方式弥合。企业所有者将每日按州或领地读取每种材料的清点数、所寻求之物、价值与足迹，并仍在全国贸易日以资源换取资源；在第27个月仍然滞后的部门，借助国家以交换方式从国外取得的材料被带过第30个月；探索特许之下的工作，无论特许成功或失败都获得积分，而全文发布的失败不会降低任何排名。一次拒绝不再使电网陷入黑暗，也不再使法案被搁置。以抽签产生的陪审团在议院表决之前聆听法案，并且不作任何决定。每笔交易的记录在四个任何保管人都无法关联的领域中保持完整，其中，在记录系统的自动职能之外，化名只有凭以五份密钥份额中的三份签署的令状才能与某个人关联。红队检验数据，分派资源的官员实行轮换，退出联盟的国家保留其与本国的协议。

这一切都尚未得到证明。每一条款都载明足以驳倒它的读数，指标审计委员会读取该读数，失败首先以增补校准处理，在连续两个周期失败之后，再依第7章的宪法替代议定书处理[第CXXXV条]。话虽如

此，本章的主张是狭窄的：仍然存在的缺口可以在不从法典中拿走一个字的情况下得到弥合。

法典现有一百三十五条法律条款。第13章汇集完整的制度，并提出第11章留给最后一章的问题。

参考文献（第12章）

Azoulay, P., Graff Zivin, J. S., & Manso, G. (2011). Incentives and creativity: Evidence from the academic life sciences.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42*(3), 527-554.

Buterin, V., Hitzig, Z., & Weyl, E. G. (2019). A flexible design for funding public goods. *Management Science*, *65*(11), 5171-5187.

Coase, R. H.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4*(16), 386-405.

Dwork, C., McSherry, F., Nissim, K., & Smith, A. (2006). Calibrating noise to sensitivity in private data analysis. In *Theory of Cryptography Conference* (pp. 265-284). Springer.

Flanigan, B., Gölz, P., Gupta, A., Hennig, B., & Procaccia, A. D. (2021). Fair algorithms for selecting citizens' assemblies. *Nature*, *596*(7873), 548-552.

Gastil, J., Knobloch, K. R., Reedy, J., Henkels, M., & Cramer, K. (2018). Assessing the electoral impact of the 2010 Oregon Citizens' Initiative Review.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46*(3), 534-563.

Hayek, F. A. (1945).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5*(4), 519-530.

Lalley, S. P., & Weyl, E. G. (2018). Quadratic voting: How mechanism design can radicalize democracy.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08*, 33-37.

Lange, O. (1936).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Part on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1), 53-71.

Lange, O. (1937).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Part two.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2), 123-142.

Manso, G. (2011). Motivating innovation. *Journal of Finance*, *66*(5), 1823-1860.

Mises, L. von. (1935). 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In F. A. Hayek (Ed.),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pp. 87-130). Routledg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0)

Rodriguez, J. (2021). *Jasutopianism*. [Self-published].

第13章：完整体系



《Jasutopianism》在其序言中以一项宣告开篇。三大立国原则[自由、生活、繁荣]在任何法律条款、任何论证、任何理论之前便已载明。它们并非推导自既有哲学。它们也非经由实证数据加以证成。它们是被直接宣告的，正如宪法第一性原则历来被宣告那样，因为作者认为它们是特定的人类社会得以宣称自身实现公正治理的不可化约之条件。《Jasutopianism》中此后展开的一切[一百零二条法律条款、治理三权条款、三总统办公室、公民议院、公民全国民主商业委员会、地位升级制度、永恒相对论、十三项正式指标、四年过渡计划、世界超国家联盟]，皆源出于这三个词。

自由。生活。繁荣。

《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并未改动这些词。它没有增添第四项，也没有重新诠释原有的三项。它在十二章的篇幅中所做的，是在《Jasutopianism》所奠定的根基之上向外建构：补足实证证据、拓展后的哲学阐述、新增法律条款、延展后的过渡方案、证伪条件、环境整合机制以及超国家运作模型；凡此种种，皆为原著受限于其论述范围与体裁之自然边界而无从提供的。

本章将完整体系汇集于同一视野之中。第11章留待本章作答的问题，即就目前形态而言，这一完整体系是否构成一项严肃的治理方案，正是本书全部内容一直蓄势指向的核心问题。在给出答案之前，必须对已建构的内容、已测度的内容以及仍悬而未决的内容作出诚实盘点。

I. 《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所建构的内容

第1章将Erik Olin Wright (2010) 提出的三项标准[合意性、可行性与可实现性]应用于作为单一国内宪法蓝图的《Jasutopianism》(2021)，由此识别出十项结构性缺口。这些疏漏自然源于其国内论述范围、宣告式体裁以及2021年的出版时间节点。下文的总对照矩阵不再重复第2至11章已详述的十项独立总结，而是将每一项缺口直接索引至其可操作解决方案：

缺口	第1章审定的结构性疏漏	章节	增补的可操作机制
缺口1	缺乏预注册的证伪标准	第7章	五项三层级预测、双重物理创新基准[ΔEp, ΔMp]，以及与第1级增补和第2级宪法替代议定书相配套的五项条件性证伪检验
缺口2	缺乏国际文化外交法	第4章	第CIII条至第CIX条[文化交流委员会、真实性准则、对等原则、危机延续性]，外加关于不俘虏与投降的阐明性第CXXIV条
缺口3	缺乏数字平台治理	第5章	第CX条至第CXVI条[栖居型与观赏型分类、透明度、数据主权、反操纵]，外加合格数字交易[QDT]反刷量规范与主权清算中介机构
缺口4	分析性论断中未经审慎限定的决定论表述	第3、7、9、13章	在保留宣告式宪法条文的同时，于分析语体中采用明确的概率性限定修饰与前瞻性条件表述
缺口5	缺乏比较实证案例研究	第3章	七项比较案例研究[蒙德拉贡、基布兹、北欧国家、不丹、时间银行、爱沙尼亚、罗贾瓦]，外加四项国内人才外流反制机制[第III B节]
缺口6	缺乏规范的学术引证体系	全部章节	经同行评审的APA第7版引证体系，将宪法设计贯通于经济学、系统科学、同理心心理学、环境科学与政治学之间

缺口	第1章审定的结构性疏漏	章节	增补的可操作机制
缺口7	未经法典化的环境政策与生态限度	第8章	独立的全球和平三大支柱、第CXVII条至第CXXIII条，以及经由MRIO、热边界与流域补给加以核验的消费与生物物理调整后国家份额[Bi*]
缺口8	对TER过于压缩的哲学阐释	第2章	四项在系统科学与信息科学中具有同构结构对应关系的拓展概念、跨越三个经同行评审层级的多分辨率人文化、认识论和平命题，以及问责与同理心之桥
缺口9	未予明确的通向S.U.W.的可操作路径	第11章	跨越四个关卡式阶段的文化优先一体化、制度熟悉假说、绝对多数加入规则[n > 5]，以及附带年度主权退出征询的分级区域集团成员资格
缺口10	缺乏指标、零阶段或B2B衔接机制的四年过渡方案	第6章	制宪前零阶段[0A至0D阶段]、三级过渡清算架构[TCC持续至第30个月]、指标审计委员会、第5年巩固关卡，以及第10年续期

全部十项缺口现已在一部可审计的著作中得以闭合。另有三章特意并立于该矩阵之旁，并不对应原有的十项缺口。第9章借助第XCVI条推演了一场现实的国内语言争议，设定了10%的承认门槛，从而确保任何寻求加入联邦的国家首先在其本国疆界之内尊重每一种已确立的语言。第10章则直接面向当今仍保留货币制度的国家，提供了经OECD等价规模调整的公平薪酬方程、双锚工资下限、雇主精算支付能力M*、全国小企业统筹薪酬抵免、第9个月劳动者过渡服务，以及直接被抚养人津贴。第12章以增补方式弥合经济与政治权力缺口：无需任何货币即可传递稀缺性的每日调度信号、第30个月之前的影子运行与部门缓冲账簿、探索特许、保持3/3表决完整的连续性默认规则、咨询性的公民审议陪审团、配有门限令状的不可关联凭证、红队、分配者的轮换，以及联盟中的退出连续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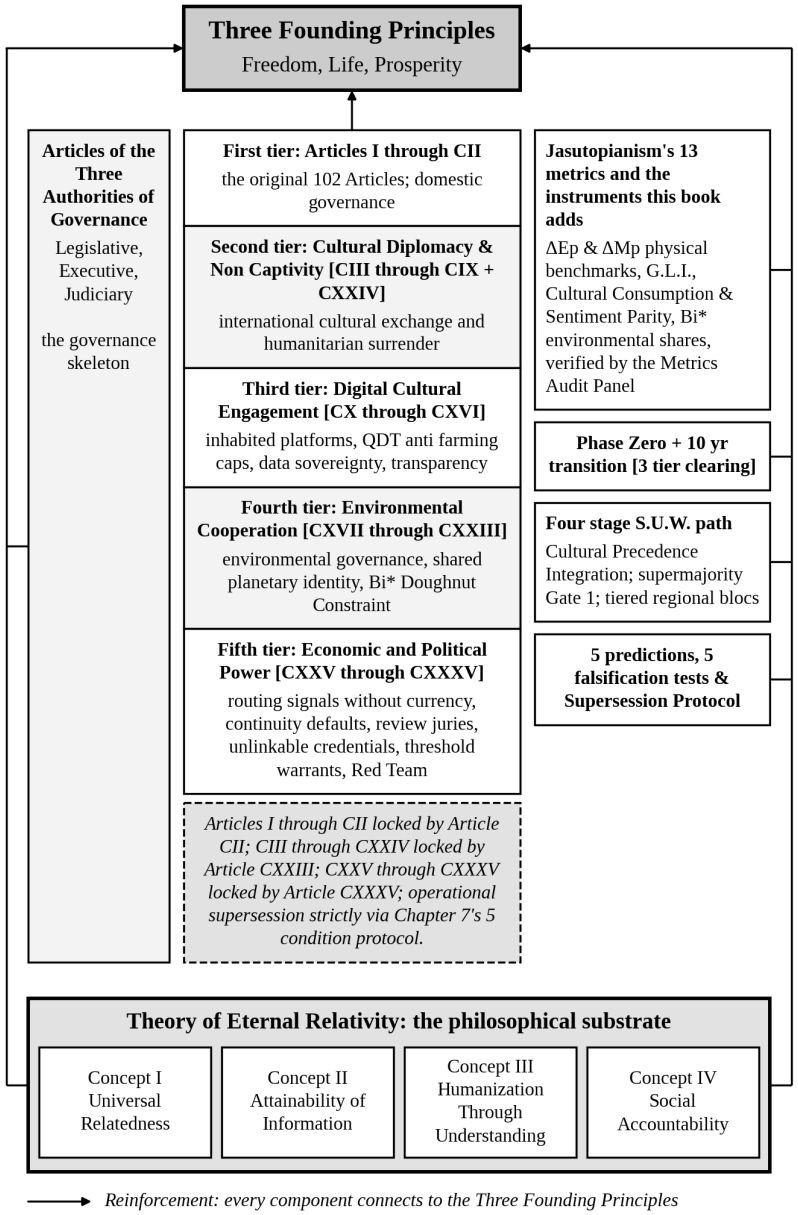


图 **13.1.** 完整体系架构。每一组成部分皆受三大立国原则制约，并可由《Jasutopianism》的指标加以测度，同时由本书增补的工具予以完善。

II. 完整的宪法架构

法典稳固如初。三十三条新条款加入原有的一百零二条之中。立宪原文分毫未动。与治理三权条款并立，这一由一百三十五条法律条款构成的拓展宪法架构，将国内物质权利、开放的跨境文化外交、算法平台主权、人道主义不俘虏规则、经消费调整的生物物理限度以及对经济与政治权力的制约约束于同一部可核验的法典之内；其中，无论是党派漂移还是隐蔽的官僚俘获，皆无法悄然抹除其项下的任何一项法定保障。

原有的第I条至第CII条以具体而严密的可操作精度规制国内生活：第I条向每一位做出贡献的公民保障七项基本资源，第IX条将地位升级严格锚定于可核验的工作绩效，而第CII条则永久锁定第I条至第CII条的条文文本，禁止删改或重写。纵贯第4、5、8、12章，本卷增补了三十三条条款，将此种同样严密的宪法纪律延伸至五大领域：

第CIII条至第CIX条[第4章]将文化外交法典化，设立独立的文化交流委员会，确立真实性准则、双边对等原则、公开登记册以及危机延续机制，从而确保跨境文化人文化永不沦为隐蔽操纵或党派废止的牺牲品。阐明性第CXXIV条[第4章，第V节]将第IV条的不俘虏义务锁定为明确的人道主义法规范，既禁止设立拘押营，也禁止对投降战斗人员拒绝受降饶命。

第CX条至第CXVI条[第5章]规制栖居型平台时代，将栖居型生态空间与观赏型传播渠道区分开来，强制要求所有平台实现算法透明与公民数据主权，通过可强制执行的合格数字交易[QDTs]取缔注意力操纵，为境外运营商提供主权清算中介机构易货结算安排，并禁止算法文化禁运。

第CXVII条至第CXXIII条[第8章]确立行星托管制度：包括二十五年可再生转型、公开环境记录、多中心权威、将每家企业经审计的生态记录与地位等级绩效相挂钩的共享非涉密研究、消费与生物物理调整后国家份额[Bi*]、五十年环境未来监督，以及自我执行的生态条约。第CXXIII条将第CII条的文本锁定效力延伸至第CIII条至第CXXIV条；与此同时，适用范围严格限定的宪法替代议定书**[上位法优先运作性覆盖]**[第7章]仅在同时满足五项累积条件时，方允许经由增补的运作性替代

条款严格中止某项两度被证伪的程序性或经济机制[经指标审计委员会核验并连续两个周期触发、参议院为期十二个月的调查、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公民议院70%以上批准，以及司法权一致性审查宣告第I、III、IV、V、IX、XII、XIV、CII、CXXIII、CXXIV与CXXXV条永久不可克减]。

第CXXV条至第CXXXV条[第12章]以增补方式弥合经济与政治权力缺口：记录系统每日发布每种材料的清点数、所寻求之物与价值，作为任何企业都不持有、也不用以出价的信号；影子运行与部门缓冲账簿把滞后的部门带过第30个月；探索特许奖励在成功之前屡遭失败的研究；连续性默认规则仅在未能作出3/3决定之处启动；公民审议陪审团在议院表决之前聆听法案；四个不可关联凭证领域与门限令状使记录系统保持完整，同时关闭官员对其背后之人的查看；红队检验官方数据；轮换约束分配者；退出连续性保护退出联盟的国家。第CXXXV条将文本锁定延伸至第CXXV条至第CXXXV条，并把增补规则写入法典。

一百三十五条条款如今在同一部可检验的法典之内，横跨国内权利、国际文化开放、数字主权、人道主义克制、生物物理限度以及对经济与政治权力的制约。范围是其所主张者，完美则不然。最终由证据裁决。

Jasutopianism [2021]	The Complete System [Jasutopianism + 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	Provided by
102 Articles of Law	135 Articles of Law [102 + 7 cultural + 7 digital + 7 environmental + Art. CXXIV non captivity + 11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pters 4, 5, 8 and 12
TER in four paragraphs	TER expanded with isomorphic structural parallels and peer reviewed Multi Resolution Humanization	Chapter 2
4 year transition	Phase Zero + 10 year transition [3 tier clearing bridge, TCC decay Month 30, Year 5 gate, Year 10 renewal]	Chapter 6
13 metrics [named in the Preamble's National and Global level sections and defined in the Glossary, not operationalized with threshold gates]	13 metrics operationalized alongside ΔEp, ΔMp, G.L.I., Bi*, and Gate 1 indices; verified by Metrics Audit Panel	Chapters 6, 7, 8 and 11
No falsification conditions	5 predictions, 5 falsification tests, Tier 1 addition, and Tier 2 Constitutional Supersession Protocol	Chapter 7
No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provisions	Cultural Exchange Commission, Authenticity Imperative, and Art. CXXIV non captivity standard	Chapter 4
No digital governance	Inhabited and admired platforms, QDT anti farming caps, Sovereign Clearing Intermediary, data sovereignty	Chapter 5
No environmental integration	Shared planetary identity, Doughnut Constraint, and Bi* adjusted national shares	Chapter 8
Article CII locks Articles I through CII	Article CXXIII locks CIII through CXXIV and Article CXXXV locks CXXV through CXXXV; narrow 5 condition operational supersession protects nonderogable core	Chapters 7, 8 and 12
A census of resources in real time; 3/3 executive unanimity; one National ID Log System	Daily routing signals without currency, continuity defaults, review juries, four unlinkable credential domains, threshold warrants and a Red Team [Articles CXXV through CXXXV]	Chapter 12
S.U.W. declared but not operationalized	Cultural Precedence Integration, Supermajority Accession [n > 5], and Tiered Regional Bloc Membership	Chapter 11

图 **13.2.** 《Jasutopianism》与完整体系：前后对比。《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在不改动原有102条条款的前提下，拓展了《Jasutopianism》的每一组成部分，将法典扩充至135条条款，并与零阶段、十年蓝图、预注册证伪检验及宪法替代议定书相配套。

III. 认识论基础

如第2章所示，永恒相对论并非Jasutopian制度的补充性附录。它正是该制度各项机构赖以生长的认识论根基。其四大概念[普遍关联

性、信息可得性、通过理解实现人文化以及社会问责]构成了一套将信息本质与治理结构相联结的哲学论证。倘若万物皆相关联[概念I]，倘若使这种关联得以显现的信息是可以获取的[概念II]，且倘若理解自身与他人关系的本质能够产生人文化[概念III]，那么规范人类互动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以透明为设计目标[概念IV]。当这一认识论论证与三大立国原则相结合时，后者补足了单凭论证本身无法提供的前提[即自由、生活与繁荣值得加以保障]，从而解释了宪法架构为何采取其现有形态。

此处结构严谨性至关重要。第2章明确将TER与Shannon的信息论(1948)、Bertalanffy的一般系统论 (1968)、Wiener的控制论 (1948) 以及Barabási (2003) 和Watts (2003) 的网络模型之间的联系，归类为系统论范畴内的同构结构对应，而非演绎证明，并坦诚指出物理熵与认知局限在实践中何处制约了信息复原。多分辨率人文化[第2章]继而将同一人文化过程原生地映射于三个经同行评审的分析尺度之上：认识论层面的元信息追踪[TER概念I至III]、认知层面的群体间同理心鸿沟消解，以及立足于发展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而非未经证实的生化论断的情感具身相遇。

认识论基础为何如此重要？因为它回应了任何乌托邦治理批评者都会提出的问题：为何应当设立这些制度，而非其他制度？植根于TER，答案在于：在人类生活的认识论条件下，正是这些制度服务于三大立国原则。透明度并非任意的价值偏好；它是以下论断的制度表达，即经妥善追踪的信息能够约束实施暴力的能力。问责制并非一时的政治风尚；它是以下论断的治理表达，即通过理解实现人文化能够孕育出使问责成为可能的同理心。自由、生活与繁荣并非口号，亦非由该理论推导而出：它们是经郑重宣告而确立的，无论检验结果如何均屹立不移。该理论阐明了为何透明与问责制度服务于这三大原则；即便该理论遭到反驳，倒下的也只是这一解释，而非原则本身。

IV. 证据基础与证伪架构

第3章为Jasutopianism提供了一项它此前从未宣称需要、但任何严肃的治理方案终究必须具备的要素：证明与其自身相近的机制曾在现实社会中以局部形式切实发挥作用的证据。

七项案例研究并非证明。任何诚实的评估都不会作此宣称。依照第7章的过程追踪标准归类，每一项案例均严格位列跳环检验或风中草芥检验，绝不高于此级。蒙德拉贡为地位升级的生产率提供了风中草芥检验：在压缩薪酬差距的条件下历经七十年工人治理[1990年代约为六比一，如今税前约为九比一]，但仍受限于货币工资制度。以色列的基布兹既提供了警示记录，也构成了最为尖锐的跳环检验：一旦具备专长的成员为追求更高的外部货币工资而离去，绝对平均主义便发生侵蚀，而这正是地位升级连同第3章第III　B节所述四项国内人才流失防范机制[主权生产性资本配置、稀缺性加权地位乘数、固定任期国际轮岗以及归属与重返留任账簿]所要应对的失效情形。北欧社会民主制度为四项预测提供了跳环检验：高信任度与普惠底线同创新能力、生产率、政体持久性及低贫困率并存[但仍受限于货币市场]。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为写入其2008年宪法的非货币公共指标提供了风中草芥检验。爱沙尼亚的数字治理为留痕式国家透明度提供了风中草芥检验：该国自独立时的1.57百万居民起步，历经二十五年建成覆盖全国的电子政务服务，并允许公民通过其数据追踪系统核查数据查询记录[截至2025年十二月已覆盖超过300个国家系统中的15个]。时间银行在货币市场之外的邻里尺度上提供了风中草芥检验。罗贾瓦则为自下而上的议事会提供了风中草芥检验，这些议事会在长达十四年的实战环境中存续，直至2026年解体，尚未及在和平环境下接受检验。

第7章将这一证据基础转化为预先登记的问责机制。五项预测经由Sartori的抽象阶梯与Goertz的三层概念框架加以操作化，将明确的时间跨度与非货币基准[OECD劳动力活跃度与实物产出、取材自IEA与OECD生产率数据的双重物理创新基准ΔEp与ΔMp、Polity5政体持久性、EU物质匮乏率以及匿名G.L.I.调查]同前瞻性、附条件的证伪裁定相配对。每一项数据均由抽签产生的指标审计委员会独立核验。经核实的证伪首先依据第XCVI条触发第1级增补式校准；若连续两个周期均告失败，则在五项累积绝对多数保障措施的约束下，严格针对已被证伪的程序性或经济性规则解锁第2级操作性替代，同时核心权利始终保持永久不可触动[第7章第IX节]。满足Popper (1963) 的可证伪性底线及Lakatos (1978) 关于进步性研究纲领的第一项标准，从而以其可检验性取代武断断言。

本卷在Jasutopianism原有十三项指标之外所增设的工具清晰列于同一清册之中。第6章增设了第1级与第2级非货币份额、过渡清算信用衰减追踪、实物生产基准以及议院投票率。第7章增设了劳动力活跃率、人均产出、自愿贡献度、双重物理创新基准[ΔEp与ΔMp外加开放科学引文产出]、行政僵局指标以及治理合法性指数。第8章在四个经审计的行星领域内，以消费与生物物理调整后国家份额[Bi*]取代了简单的人均生态配额划分。第11章增设了文化消费指数与情感对等指数，用以规制关卡1的饱和度与非敌意底线。第12章增设第CXXV条的每日读数及其配置效率评分、影子运行的履约偏差、产出已发表成果或失败报告之探索特许的年度份额、选民对提交给他们之法案了解程度的年度测量，以及令状透明日志。每一项数据在公布前均须经指标审计委员会独立核验。

至此，认识论转型业已完成。Jasutopianism最初是一部规范性论著。它至今仍是一部规范性论著。但如今它同时也是一项可检验的治理方案。这两个范畴并非彼此排斥。不妨试想：《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是一部规范性文件。经过两个半世纪的施行之后，它同样构成了一套关于在特定宪制条件下何者行之有效、何者行不通的证据体系。Jasutopianism在施行之前而非事后回溯性地提供了各项预测与失败标准。按照任何诚实的标准衡量，这一结果都标志着认知严谨性的实质提升。

V. 过渡路径：国内层面与超国家层面

完整的过渡架构由两个层级共同构筑。

在国内层面，第6章在第1日之前设定了制宪前零阶段[包含为期十年的模块化县级公平薪酬试点、经核验的绩效联盟、提前公布操作日程的抽签制宪会议，以及分别达到60%筹备授权门槛与超过70%最终批准门槛的两阶段绝对多数表决]。第1年至第4年[奠基阶段]自第1日起通过免费基本生活物资保障家庭生计，同时依托三级过渡清算架构为工厂提供缓冲[第1级消费端逐步退出、第2级于第30个月起衰减的零息过渡清算信用，以及第3级隔离式对外贸易清算]，并由独立的指标审计委员会与第2年的首份环境报告提供支撑。第5年[评估阶段]对照四项严格的关卡标准检验消极巩固成效，并同步举行首次第CXVII条能源表决。第6

年至第10年[成熟阶段]致力于推进积极巩固 (Schedler, 1998)，设立文化交流委员会并开展双边交流，最终以第10年的民主更新法案及第二次可再生能源表决收官。

在超国家层面，第11章明确规定了由文化优先一体化驱动的四个设卡阶段[文化一体化、经济合作、制度协调、政治联邦]。该联盟最初以四领域邦联形式启动，统筹行星环境管护、数字基础设施、文化交流协调与共同安全，并实行分级区域集团成员资格[依据权限不重叠议定书保持既有区域联盟完整无损，并辅以年度免罚主权退出征询，直至最终实现全体民众一致同意的合并]。Haas的新功能主义 (1958) 刻画了欧洲市场的外溢效应，却未能洞察为何一体化会在文化平等共同体止步之处陷入停滞；Moravcsik的自由政府间主义 (1998) 解释了国家间讨价还价的界限，却将国内利益视作静态不变。文化优先一体化则揭示了持续的跨境文化人文化如何在正式联邦建立之前，自下而上地重塑国内公众偏好。

指标门槛关卡把守着每一次跨越。关卡1适用绝对多数加入规则[五个及以下国家的种子联盟须实现全部成对完全饱和；超过五国的联盟则转为70%绝对多数饱和度，并配以普遍非敌意底线以及入盟后90%趋同规则，以防呈指数级增长的二元配对瓶颈冻结扩张进程]。关卡2审计联合基础设施与经济收益，并同步开展对制度熟悉假说的十五年检验；关卡3要求具备巩固的民主制度、满足承认门槛、将三大立国原则载入宪法，并通过超过70%的民众直接投票。定向退出通道使承受压力的成员得以有序回撤而不致令联盟瓦解，两轮民众投票程序允许成员和平退出邦联，而严格的阶段时限[第一阶段三十年、第二与第三阶段各十五年、批准程序五年]则将陷入停滞的路径公开记录为反驳文化优先一体化的实证依据。

两个尺度共同遵循一条名为文化与治理传导路径的操作序列：其一，经核验的国内公平率先奠定公民信任；其二，国内信任支撑对外文化开放；其三，持续的跨境人文化促成联合经济与生态事业；其四，经核验的制度兼容性为政治邦联做好准备。缺乏公民信任的治理必然脆弱；缺乏持久制度支撑的公民开放则会在危机之下土崩瓦解。

VI. 依然开放的议题

没有任何法典能够洞悉每一个世纪。坦诚说明尚存的界限体现的是严谨自律，绝非回避推诿。第1章所审计的全部十项结构性缺口如今均已配备操作性设计，但完成一套制度蓝图绝不意味着终结历史。

制度调适始终系于三大立国原则[自由、生活与繁荣]。第CII条、第CXXIII条与第CXXXV条永久保存第I条至第CXXXV条的完整文本记录，第XCVI条允许在全新领域浮现时增订新条款，而第7章所设五项条件的宪法替代议定书则赋予公民绝对多数操作性否决与替代权，但严格限于经两次证伪的非核心规则。核心权利永久稳固。操作规则持续接受检验。

在本书已解决的规范设计之外，仍有四大开放前沿。

其一：人工智能。自主模型业已重塑劳动形态、新闻核查与创意著作权；第5章规制的是数字平台而非基础模型本身，从而将未来依据第XCVI条制定新条款、把自主系统直接约束于自由、生活与繁荣原则之下的任务留待后人。

其二：星际治理。论证XX勾勒了轨道太阳能工程这一远期技术目标，而非地球之外的宪法规范；地球以外的永久定居点将需要建立全新机构，以回应同样的三大立国原则。

其三：文明分歧。退出通道与绝对多数加入规则规制着彼此兼容的民主国家之间的联盟扩张，但如何与在结构上拒斥三大立国原则的大国长期共存，依然是一个开放的战略前沿。

其四：超国家宪制运作机制。尽管第11章的绝对多数加入规则解决了大型联盟的准入瓶颈，但有三项宪制规则理应留归S.U.W.自身的制宪会议予以确立：超国家终极法院对成员国争端的精确管辖权、在人口规模不等的成员国之间维持一国一票官方选举团的正式理据，以及超国家参议院与公民议院内部的席位分配与表决规则。

这些前沿并非回避之词。任何自诩不存在任何开放问题的蓝图都只会招致怀疑；明确指出尚待探索之处，正是直接为未来的法学与科学学者指明下一阶段的研究方向。



VII. 持久性架构

持久的和平与自治需要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层级上同时运转的保障机制。在跨境层面，跨境文化人文化与情感文化威慑能够缓和不同群体间的敌意；在特定的国家内部，Jasutopianism的治理三权、经审计的记录系统与永久性条款则守护着公民开放性与物质公平。Carlisle与Gruby (2019) 指出，多中心系统通过重叠的制度冗余降低了崩溃风险。倘若外交紧张局势中断了双边交流，那么根深蒂固的国内法将维系开放权利直至交往恢复；倘若国内领导层滑向被俘获状态，持续的文化平等共同体与透明的横向比较基准将激发推动宪制修复的公众压力。跨层级冗余严格以冲击相互独立为前提，而坦诚的分析亦须承认其局限：国内威权审查与国外国家间战争的同时爆发，可能令两个层级一并受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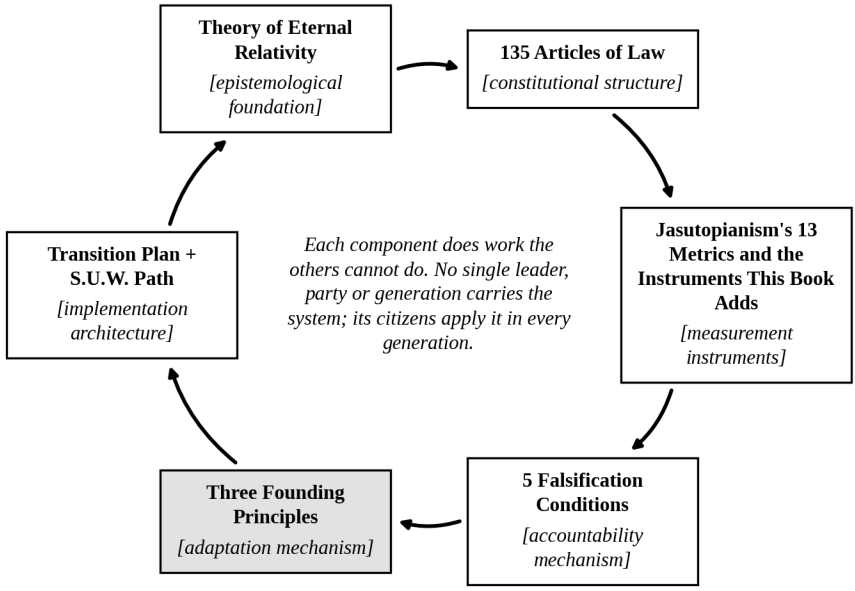
第5章以持久的人类同理心能力配以永久性宪法规范界定了持久性架构。本终章则进一步勾勒国内各项构件如何在一国之内彼此咬合。

永恒相对论提供了将可追踪信息与自治相连结的认知理据。一百三十五项条款将该理据转化为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制度。Jasutopianism的十三项指标与本卷经审计的各项基准[由指标审计委员会核验]持续衡量真实绩效。五项预先登记的证伪条件，外加第1级增补与第2级操作性替代，防止制度陷入意识形态僵化。居于顶端的三大立国原则跨越更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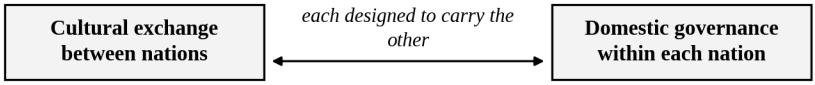
世纪守护着不可克减的权利，而制宪前零阶段、十年过渡期与四个超国家阶段则将蓝图与现实贯通起来。

在单一国家之内，这些要素彼此互补而非相互重复。抽离TER，条款便丧失认知根基。抽离条款，哲学便沦为空谈。抽离独立审计，指标便形同虚设。抽离预先登记的证伪机制，持久性便会退化为教条；反之，将这五项要素紧密锁合在一起，便能在各异的构件之间形成相互强化，同时在国内法与跨境人文化之间构筑起跨层级冗余。

这种结构性反馈与Capra与Luisi (2014) 在生命系统中所称的“自创生”相呼应：彼此咬合的过程持续再生产其自身存续所需的条件。然而，这一对照严格止步于类比。条款绝不会自行实施。实施条款的是公民。三总统一致同意机制阻断了单人行政俘获，议院直接表决阻断了精英立法俘获，第CII条、第CXXIII条与第CXXXV条阻断了静默废止，而设卡退出通道则阻断了过早冒进；国内制衡能否稳固经受检验，由预测三公开检验[第7章]，而第11章的阶段时限则检验超国家路径。



Leader dependent system	Structure dependent system
Fragile	Designed for permanence
Requires continuous political will	Requires that citizens keep applying the structure
Vulnerable to authoritarian capture	Checks designed to prevent capture
Degrades when the founding generation departs	The founding principles constrain all future interpretation



Redundancy holds where failures are independent; a war can strike both levels at once.

图 **13.3.** 持久性架构：冗余与强化。在一国之内，持久性架构表现为互不重复的各构件之间的相互强化；在国与国之间及其内部，则表现为跨越两个层级的冗余保障。

VIII. 立即可供检验的模块化实证议程

无人必须等待全国性的宪法转制。政治学界有理由对那些将一切实证检验都推迟到想象中革命之后的全盘式蓝图抱持警惕。契合Erik Olin Wright (2010) 的真实乌托邦方法与制宪前零阶段[第6章]，五条模

块化研究与政策轨道如今即可在现有的货币型民主国家内，借助实时公共数据与普通市政法规率先启动：

1. 轨道**1**：地方经济核验**[第10章]**。 县级统计机构与高校劳动经济学团队可基于实时国家微观数据，为每一个县测算并公开发布开源公平薪酬线[L]及按OECD等价尺度折算的县公平薪酬比率[R]，并同步开展关于雇主精算支付能力[M*]、双锚通勤群体变动及小微企业统筹薪酬抵免支出的财政模拟。算术先行。立法在后。

2. 轨道**2**：抽签审计机构**[第6章]**。 市县政府可试点设立法定指标审计委员会[由随机抽选的公民陪审团与独立统计学家协同运作]，负责核验细分至社区层面的贫困状况、暴力犯罪、住房可及性以及地方流域或排放数据，并与条件匹配的对照辖区开展受控纵向调查，以检验Rothstein (2005) 关于公民审计透明度能够提升制度信任的因果论断。

3. 轨道**3**：平台与语言保护**[第5章与第9章]**。 地方与国家立法机关无需触动国家货币，即可将10%的承认门槛制定为普通语言法规，并将栖居型与仰慕型数字平台分类体系、强制算法披露、合格数字交易反刷量指标及公民数据主权编纂成法。模块化立法得以清晰独立地接受检验。

4. 轨道**4**：正式预登记与计算建模**[第3章与第7章]**。 政治学者与经济学者如今即可公开预先登记OECD实物能源与物质生产率基准轨迹[ΔEp与ΔMp]、Polity5政体持久性基准以及匿名地方治理合法性指数调查，同时计算建模研究者可就地位升级的1至Z等级区间流动速率、QDT操纵上限以及第3章所述四项防人才流失留任机制[主权生产性资本配置、Y调整乘数、国际轮岗及归属账簿]运行开放式基于主体的模拟，从而在真实试点之前暴露失效边界。

5. 轨道**5**：自愿参与的供应链中的调度信号与贸易日**[第12章]**。 合作网络与大学运筹学研究团队可以在一年内把第CXXV条的三项读数公布在其日常账目旁边，不据此结算任何事项，然后在每周一个贸易日，按公布的价值在彼此之间交易一组选定的材料，并附有排定的交付以及从其自身记录中读取的材料奖励。第CXXV条所指明的两个中位数[所寻求之物中未获满足部分的份额与交货期]

每季度公布一次，并与同一网络的前一年相比较。若某一网络的中位数恶化超过四分之一，即表明该设计在其自身供应链深度上的极限，这一发现与成功一样公开发布。

每一条轨道均可在三至五年内产出可供发表的研究成果。倘若某一构件在实证压力测试中宣告失败，那么研究者将公开公布这一失败结果，并在公民将国家生计押注于其上之前很早即对该机制予以修订或弃用。

IX. 依然留存的问题

第11章以一项直接的检验收束：此处构建的完整体系，能否作为一项可供政治学者审视、建模、质疑与检验的严肃治理方案而成立？十二章的内容提供的是证据，而非对确定性的断言。

其哲学基底立足于认识论，而非教条。永恒相对论提出了一条明确的链条，将可追溯信息、群体间人文化与公共问责联结起来，并得到同构系统类比及经同行评审的同理心心理学研究的支持。倘若该认识论论证失效，则其解释体系随之倒塌，而所宣告的三大立国原则依然向重新展开的制度设计保持开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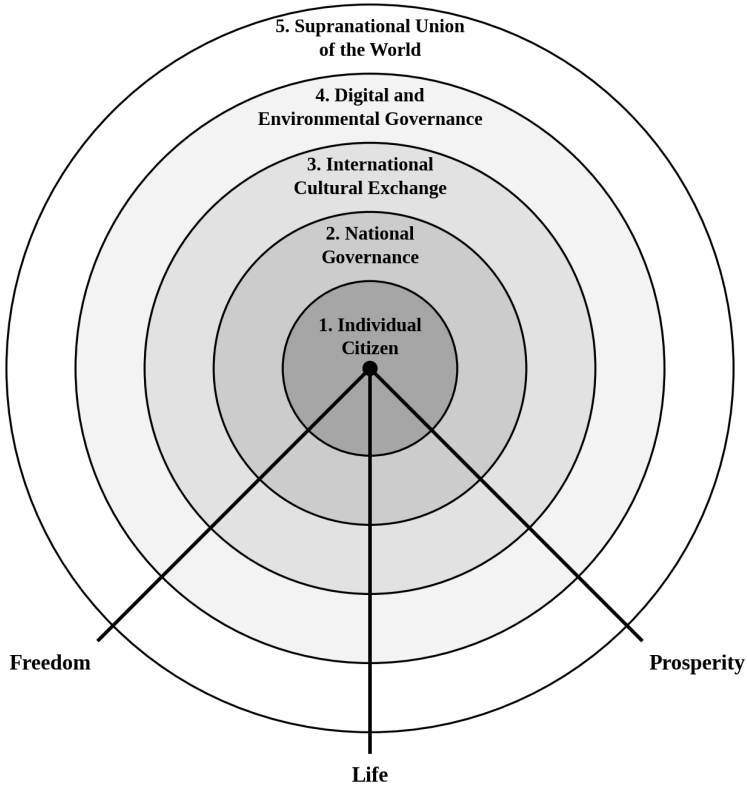
实证案例提供的是有界的过程追踪先例，而非证明。七项历史与当代研究证实，邻近机制[工人合作社、普遍社会底线、非货币社会核算、数字公共审计轨迹、地方议事会]在现实社会中能够有效运转，而第3章中的四项人才外流反制机制则公开直面选择性退出问题。国家尺度的分级非货币交换仍未经受检验；预测一将其直接交付检验。

宪法的精确性取代了抽象的宣言式修辞。一百三十五项条款就国内治理、文化外交、数字平台、人道主义不俘虏、行星生态边界以及第12章对经济与政治权力的制约规定了可执行规则，并配套明确指定的执行机关以及包含五项条件的宪法替代议定书。

可操作的分阶段推进取代了乌托邦式的跃进。制宪前零阶段在地方层面构建民主证明，三级过渡清算架构在不发生供给崩溃的前提下衔接第1年至第3年，十年蓝图衡量每一项国内里程碑，而四个设有门控的阶段则在明确时限与定向回撤机制下，引领有意愿的国家迈向邦联。

预注册证伪规范着学术诚实。五项预测、双重物理效率基准[ΔEp 与 ΔMp]以及五项条件性失败检验，均事先明确宣告究竟何种证据将驳倒每一项制度主张。

评判者静候于书页之外。证据裁决一切。这一扩展后的宪法架构是否真正堪当一项持久、严肃且在经验上站得住脚的治理方案，其裁决严格属于远在作者书桌之外开展工作的独立研究者、持怀疑态度的批评者、市政统计人员以及投票公民；每一项规范、基准、方程与证伪门控均已公开置于桌面之上，严格的检验现已切实交付于相关政治学界。



The three lines: the Three Founding Principles, Freedom, Life and Prosperity, constrain governance at every level of scale.

1. Individual Citizen	Status Level; essential resources guaranteed; democratic voice through the Chamber of Citizens
2. National Governance	102 Articles of Law; Three Authorities; Tri-Presidents; 13 metrics and audited instruments added by this volume
3.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Articles CIII through CIX + CXXIV; Cultural Exchange Commission; Authenticity Imperative; bilateral reciprocity
4. Digit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rticles CX through CXXIII; inhabited platforms, QDT caps, data sovereignty, shared planetary identity, Bi* Doughnut Constraint
5. Supranational Union of the World	Four domain confederation with Tiered Regional Bloc Membership; Supermajority Gate 1; Confederal Delegation; Supranational Three Authorities

图 13.4. 从国内治理到行星架构。相同的原则统领每一个层级。个体公民与世界超国家联盟同受三大立国原则的治理，并受同一问责标准的约束。



X. 致读者的一封信

行文的语域在此转换。在这最后一节之前的所有内容，皆遵循学术治理理论所要求的口吻：克制审慎、引据确凿、措辞留有余地且可供核验。在此，我卸下学术的盔甲，以我自己的声音坦率而言。

我于2021年写下《Jasutopianism》。我是独自完成它的，没有研究实验室，没有机构经费，没有大学教席，也无从确信是否会有人阅读。我将它落于纸面，是因为这套宪法架构在我脑海中清晰鲜活，也因为数十年来对人类社会的观察令我确信，普遍匮乏、政治俘获与周期性冲突属于结构性失灵，而非自然规律。改变制度架构，人类的境遇便随之改变。

《Jasutopianism》从未完美无瑕。五年的批判性审视使其显而易见的空白无从回避：缺失实证案例研究、哲学推演过于压缩、国际文化与生态规则未经法典化、缺少针对出版后随即展开之时代的数字平台法、为期四年的过渡安排缺乏明确的失败门控，以及预注册证伪检验为零。然而，《Jasutopianism》是以完全的诚意写就的，它提供的是一份独立的第一性原理蓝图，而非又一番置身事外的批评。

《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标志着这项工作历时五年的完成。2021年原著文本的一字一句均未遭到删抹或暗中改写。相反，横跨十三章篇幅，原有基础已拓展为一套包含135项条款的宪法体系，其背后支撑包括比较实证证据、国内人才外流反制机制、制宪前零阶段试点、三级经济过渡桥梁、经消费与流域调整的行星限度、适用于货币制国家的模块化县级公平薪酬方程、面向超国家联邦的绝对多数扩展规则、五项预注册证伪条件，以及一项范围严窄的宪法替代议定书，从而使持久性永不演变为盲目。每一项主要主张的表述均足够明晰锐利，令持怀疑态度的学者可以对其加以检验、模拟或证伪。

致坚持读完全部十三章的读者：谨致谢意。一部治理学论著无法提供虚构文学那般的叙事慰藉。它至多只能提供值得争辩的具体架构，以及五条今日便可即刻推进的实证路径。你是否认同每一项条款、每一个方程或每一道门槛，从来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这项方案如今已完整成型、引据完备且可供审计。请用实时统计数据检验各项县级方程。请试点推行抽签审计委员会。请模拟地位升级档位与 QDT 上限。请对照本书各页印载的预注册基准，挑战每一项机制。

致初次接触本作的读者：请先阅读《Jasutopianism》，以了解原始序言、三大立国原则以及第I条至第CII条；随后再阅读《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以掌握其经验基础、扩展后的宪法法典、可操作过渡方案以及证伪架构。

兹此郑重陈述于每一位阅读这些文字的学者、批评者与公民之前：一项宪法方案赢得尊重，并非凭借宣称自身绝无谬误，而唯独凭借坦然立于证据面前。

《Jasutopianism》于2021年奠定根基。《Jasutopianism 2: The Answer》于2026年完成了可供审计的结构。蓝图已然就绪。接下来将检验什么、挑战什么、修订什么或建造什么，如今归属于每一位愿意接过这项事业的学者、设计者与公民。

参考文献（第13章）

Barabási, A.-L. (2003). *Linked: How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to everything else and what it means for business, science, and everyday life*. Plume.

Bertalanffy, L. von. (1968). *General system theory: Foundations, development, applications*. George Braziller.

Capra, F., & Luisi, P. L. (2014). *The systems view of life: A unifying vis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rlisle, K., & Gruby, R. L. (2019). Polycentric systems of governance: A theoretical model for the commons. *Policy Studies Journal*, *47*(4), 927-952.

Haas, E. B. (1958). *The uniting of Europ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 1950-1957*.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akatos, I. (1978).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1, J. Worrall & G. Currie, E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oravcsik, A. (1998). *The choice for Europe: Social purpose and state power from Messina to Maastricht*.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opper, K. R. (1963).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Routledge & Kegan Paul.

Rodriguez, J. (2021). *Jasutopianism*. [Self-published].

Rothstein, B. (2005). *Social traps and the problem of tru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chedler, A. (1998). What is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9*(2), 91-107.

Shannon, C. E. (1948).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 *27*(3), 379-423.

Watts, D. J. (2003). *Six degrees: The science of a connected age*. W. W. Norton.

Wiener, N. (1948). *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 Technology Press; John Wiley & Sons.

Wright, E. O. (2010).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Verso.